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25 1960

# 考古學報

KAOGU XUEBAO

4

1959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
科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 考 古 學 報

## 一九五九年　第四期

（總第二十六册）

目　錄


廣東省博物館：廣東南海西樵山出土的石器……………………………（1）

王思禮：山東安邱景芝鎮新石器時代墓葬發掘……………………………（17）

丁　穎：江漢平原新石器時代紅燒土中的稻穀殼考查……………………………（31）

蔣纘初：關於江蘇的原始文化遺址……………………………（35）

曾昭燏、尹煥章：試論湖熟文化……………………………（47）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安徽屯溪西周墓葬發掘報告……………………………（59）

楊　根：晉代鋁銅合金的鑑定及其冶煉技術的初步探測……………………………（91）

## **КАОГУ СЮЕБАО** (Вестник археологии)

№ 4, 1959 г.

26-ый выпуск общей серии

Содержание

Гуандунский провинциальный музей: Каменные орудия, найденные в горах Сицяошань уезда Нанхай пров. Гуандун ........................ ( 1 )

Ван Сы-ли: Раскопки неолитических могил в поселке Цзинчжи уезда Аньцю пров. Шаньдун ........................ ( 17 )

Дин Ин: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исовой шелухи в обожженной земле не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в равнине района между реками Яньцзы и Ханьшуй ........................ ( 31 )

Цзян Изань-чу: О стоянках первобыт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пров. Цзянсу...... ( 35 )

Цзэн Чжао-юе и Инь Хуань-чжан: К вопросу о Хушу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 ( 47 )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тряд Быро по делам культурны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пров. Аньхой: Раскопки погребений Западного Чжоу в уезде Туньци пров. Аньхой ........................ ( 59 )

Ян Гэнь: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сплава алюминия с медью династии Цзинь и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ехники её сплавки ........................ ( 91 )

## **KAOGU XUEBAO**

(Chinese Journal of Archaeology)

No. 4, 1959

Contents

The Kwangtung Provincial Museum: The Stone Implements Unearthed at Hsi Ch'iao Shan, Nan Hai County, Kwangtung ........................ ( 1 )

Wang Ssŭ-li: Excavations of Neolithic Tombs at Ching Chih Chên, An Ch'iu County, Shantung ........................ ( 17 )

Ting Ying: Notes on the Neolithic Rice Husks Unearthed in Hupei ........... ( 31 )

Chiang Tsan-ch'u: Notes on the Remains of Primitive Cultures in Kiangsu ... ( 35 )

Tsêng Chao-yu and Yin Huang-chang: On the "Hu Shu Culture" ........... ( 47 )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Bureau of Culture, Anhui Province: Excavations of Two Western Chou Tombs at T'un Ch'i, Southern Anhui ........... ( 59 )

Yang Kên: Scientific Analysis of the Chin Dynasty Alloy of Aluminun and Copper and Its Metallurgy ........................ ( 91 )

# 廣東南海西樵山出土的石器

廣東省博物館

1955年10月初，中山大學地理系教師黃玉昆帶領二年級學生前往南海縣西樵山進行地質實習，在山的東、西麓發現了部分打製石器；同年10月21日，中山大學由梁釗韜、方瑞廉、李見賢組成一個調查組，和廣東省博物館由梁明燊、彭如策另組成一個調查組，分別到上述地方進行了爲時3天的調查，發現了石器地點9處，並由中山大學調查組根據他們所獲得的資料，編寫成廣東南海縣西樵山石器的初步調查一文，在中山大學學報1959年第1期內發表；1958年12月14日廣東省博物館、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和南海縣文教局派王維、黎金、關沃培等8同志組成一個調查組，復到上述地點進行了爲時4天的複查，除採集了大量的石器之外，還新發現了有極爲豐富文化遺物的第十、第十一地點兩處；爲了進一步摸清情況，廣東省博物館和南海縣文教局派梁明燊、莫稚、彭華美等8同志於1959年4月16日到第十地點進行了探掘，並對上述地點再一次進行了複查，又新發現了第十二、十三地點兩處，時間共5天；同年5月6日又由廣東省博物館莫稚、梁昌顯到第十一地點進行了探掘，且對部分地點進行了複查，並新發現了第十四地點1處，時間共4天，採集和發掘了極其豐富的文化遺物。現根據調查所得情況，作如下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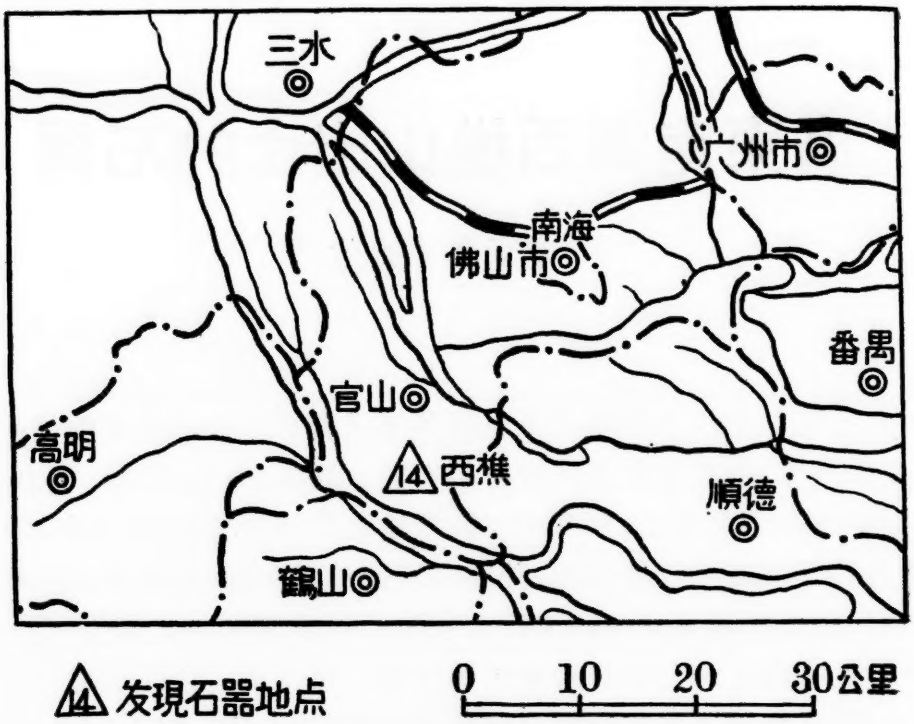
## 一、地理形勢及發現石器地點情況

西樵山距廣州西南約70公里（圖一），原是珠江三角洲冲積平原上一座孤立的古火山。整個山略呈圓形，直徑長達4，周邊長約13公里，面積約12平方公里。在山的四周，有少數的大、小洞穴，還有低矮的小山坡，和高矮不等的台地。根據中山大學調查組的意見：認爲這裏在3000年以前，乃是沼澤地區，而現在是四周環水，河流滿佈，以西南面的集兆江、西江之水流入南海的河流爲最大。西樵山的石器地點就是發現在山外周的小山崗及第二台地上，其下第一台地則一直伸延到現今的河岸邊。顯然，當古代時，這裏應是良好的狩獵與耕作地帶，具備了人類選擇住地應有的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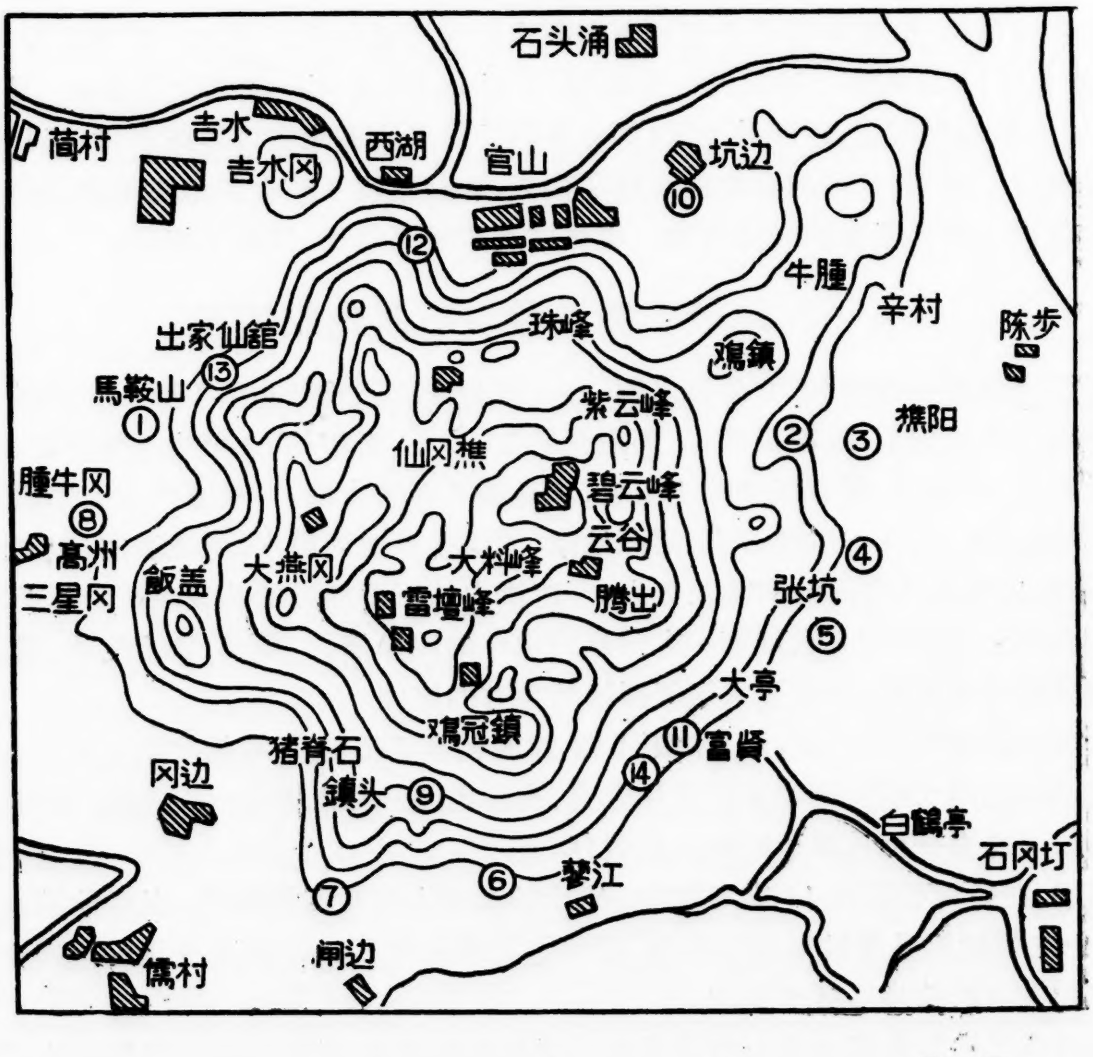
發現石器地點共14處，大多相距不遠，遠的約有3公里，近的約有半公里左右（圖二）。根據這些地點出土遺物所表現的文化性質，有多處顯然和東南沿海一帶的“幾何印紋陶文化”不同，而代表一種較爲早期的文化遺存。

因爲，在發現石器的14處地點中，出土的石器大多數爲打製的，其中除第三、八、九、十二、十三等地點是屬於東南沿海的“幾何印紋陶文化”以外，其它各地點所出土的石器，是廣東和東南沿海地區所少見的。

我們爲了便於說明西樵山所發現的石器地點的情況，將已發現的地點分成三類，列表說明如下：




圖一 西樵山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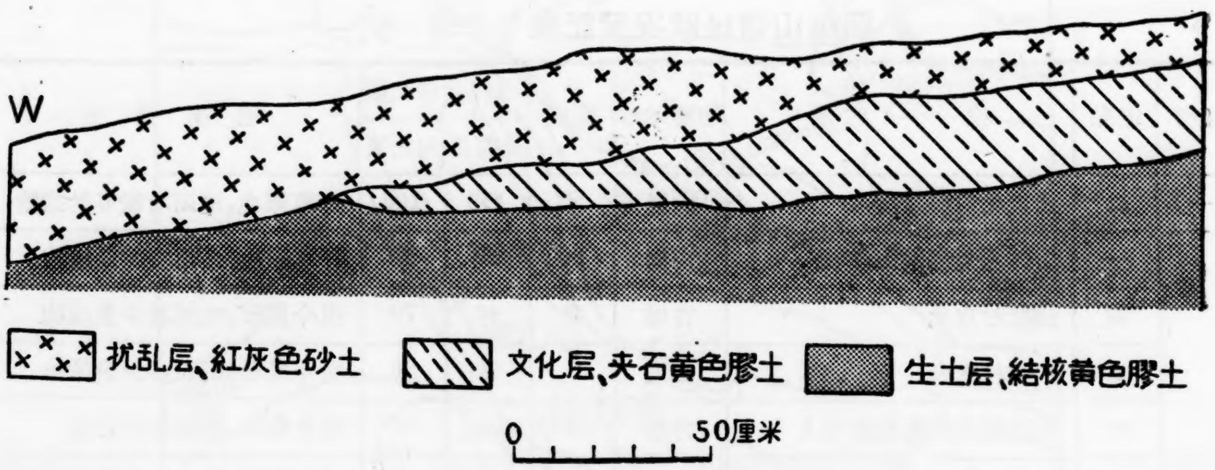

圖二 西樵山形勢及發現石器地點（圖中雲泉仙館誤爲出家仙館）

**西樵山遺址狀况登記表**（單位：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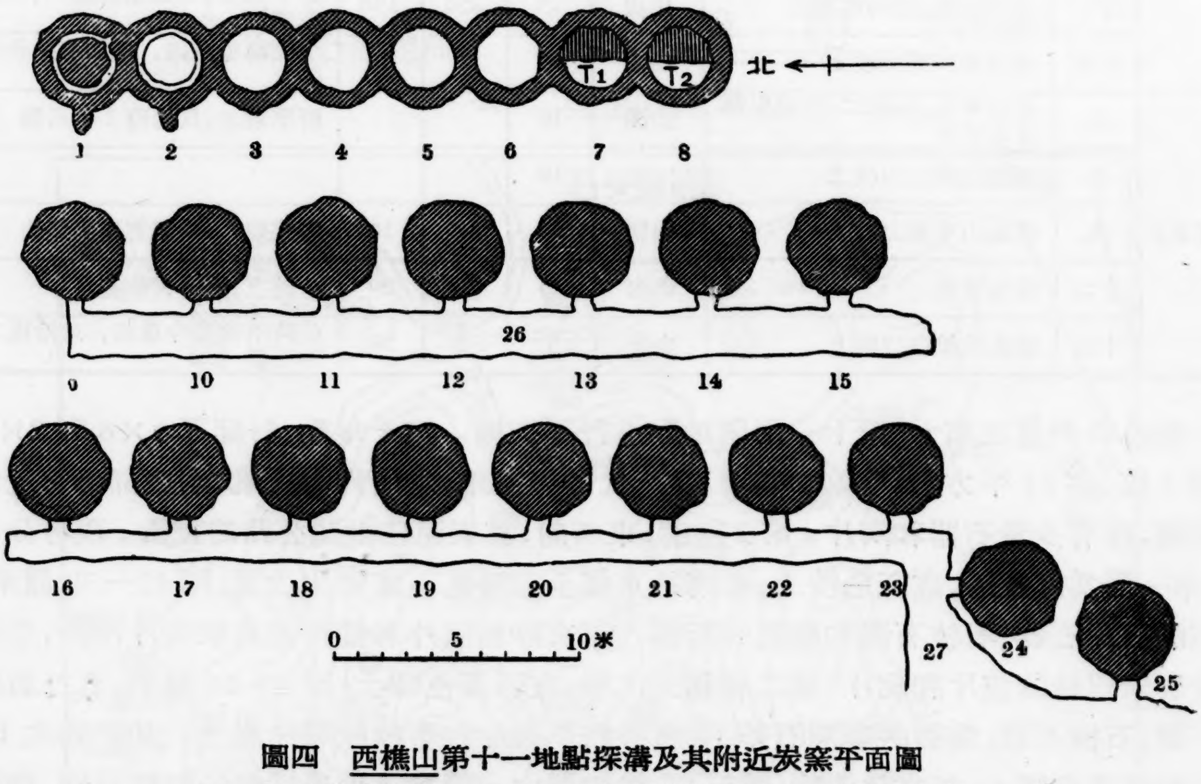
| 類別 | 地點 | 位置 | 座落地形 | 高度 | 遺物分佈範圍 | | 地面情况 |
|---|---|---|---|---|---|---|---|
| | | | | | 東西長 | 南北寬 | |
| (一) | 二 | 山東北角鷄鎭南 | 山崗 | 50 | 150 | 100 | 野草叢生，地面有較多的遺物 |
| (二) | 一 | 山西北角馬鞍山西坡 | 山崗 | 30 | 50 | 50 | 野草叢生，地面有少量遺物 |
| | 四 | 張坑村東北 | 台地 | 8 | 40 | 70 | 現今農田，地面有少量遺物 |
| | 五 | 張坑村東南 | 台地 | 8 | 30 | 50 | 現今農田，地面有少量遺物 |
| | 六 | 鷄冠鎭南面的二台地上 | 台地 | 6 | 100 | 10 | 現今農田，遺物俯拾皆是 |
| | 七 | 鎭頭山南面二台地上 | 台地 | 6 | 150 | 10 | 現今農田，遺物俯拾皆是 |
| | 十 | 珠峯東北山脚二台地上 | 台地 | 5 | 300 | 100 | 現今農田，地面遺物比六、七地點豐富 |
| | 十一 | 山東南角，南爲富賢村 | 山崗 | 15 | 250 | 150 | 野草叢生，地面遺物比六、七地點豐富 |
| | 十四 | 鷄冠鎭東的山坡上 | 山崗 | 50 | 60 | 30 | 西樵農場住地，地面有少量遺物 |
| (三) | 三 | 在山東北，與第二、四地點略呈品字形 | 山崗 | 10 | | | 野草叢生、只拾獲1件石器 |
| | 八 | 飯蓋山西北山坡上 | 山崗 | 10 | | | |
| | 九 | 鎭頭山東面山坡上 | 山崗 | 30 | 10 | 10 | 野草叢生，地面有極少遺物 |
| | 十二 | 珠峯東北 | 山崗 | 15 | 50 | 20 | 公路上，拾獲3件石器 |
| | 十三 | 雲泉仙舘西公路上 | 台地 | 5 | 100 | 20 | 公路兩側爲今農田，只拾獲2件石器 |

此外我們還在第十、第十一兩個地點進行了探掘。第十地點，計開了1×6和2×3的探溝2條，共12平方米。第1探溝，是近代的屋基地，地層均被擾亂，至底部仍有近代磚瓦發現，亦有少量石器和陶片。第2探溝，東西向，其表面已被開公路時挖去。現可分作三層：第一層爲擾亂層，紅灰色沙土，探溝的東部全被擾亂，直至生土層，厚11—30厘米，有打製的石片石器、石核石器和磨製的石器，有夾砂粗陶片和籃紋泥質軟陶片出土，並夾有少量唐宋以後的瓷片和瓦片；第二層爲文化層，夾石黃色膠土，厚2—26厘米，有打製的石片石器、石核石器，磨製的有肩石斧，有夾砂粗黑陶片和籃紋軟陶片出土；其下爲生土層，亂石結核黃色膠土，無文化遺物（圖三）。從探掘中，證實了地表採集的打製石器、磨製石器，包括有肩石斧和夾砂粗陶片、籃紋泥質軟陶片等，是同一時期共存的文化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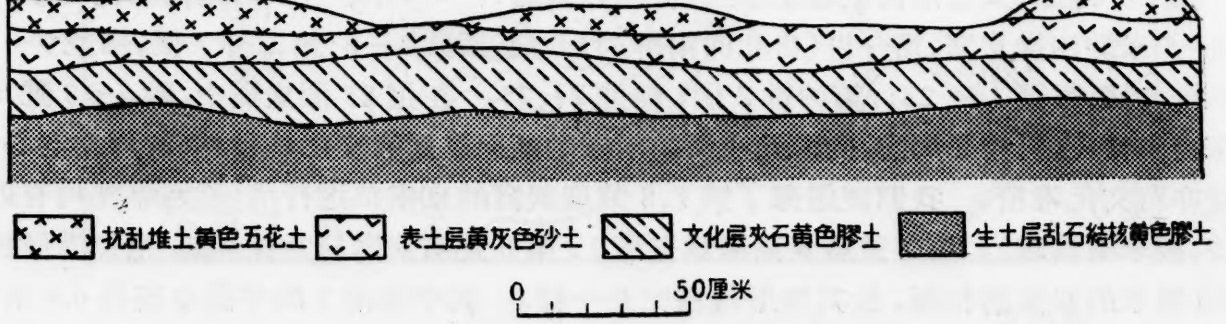
第十一地點，其西南面坡地上，原曾被闢作炭窯，在1120平方米的地面上挖掘了相距從2—5米的四排炭窯，第一排（自北向南排列）8個，編號1—8；第二排7個，編號9—15；第三排8個，編號16—23；第四排2個，編號24、25。在這25個炭窯中，除3—8號6個炭窯尙未修成，只挖了周溝，因而除在溝的兩壁的斷面暴露有文化堆積外，餘均爲空心，在窯壁亦有文化堆積。我們便選擇了第7、8號廢炭窯的東半部進行清理（西半部均有近代墓葬，故未有清理）。第7號廢炭窯稱爲探溝1，第8號廢炭窯稱爲探溝2，兩探溝僅被一寬50厘米的炭窯溝相隔，故其地層堆積完全一樣。其中探溝1的半圓直徑長6.4米，合10.05312平方米；探溝2的半圓直徑6米，合9.4248平方米，共19.47792平方米。探溝東




圖三　西樵山第十地點探溝2剖面圖




圖四　西樵山第十一地點探溝及其附近炭窯平面圖
3—8. 未修成的炭窯　1、2、9—25. 廢炭窯　26、27. 炭窯排水溝




圖五　西樵山第十一地點探溝1剖面圖

西向(圖四)。可分作四層:第一層(僅探溝1有)擾亂堆土,黃色五花土,厚12厘米,有打製石器和石片出土;第二層表土層,黃灰色砂土,厚5—14厘米,出土遺物和一層同,並有磨製石器出土,惟探溝1的東部有少量唐宋以後的瓷片和3枚北宋元祐等年號的銅錢;第三層爲文化層,夾石黃色膠土,厚12—25厘米,出土遺物和二層同,打製的有肩石斧有5件之多;第四層爲生土層,亂石結核黃色膠土,無文化遺物發現(圖五)。從這個地點的探掘,證實了地面採集的打製石器、磨製石器,包括有肩石斧是一個時期共存的文化遺物。雖然這個地點始終未有發現陶片,但從石器可以看出它與第十地點是同一文化性質的。

## 二、文 化 遺 物

西樵山出土石器,依據其性質及與陶片共存的關係來看,大體可分爲三部分來說明它:一部分是第二地點所出土的,似乎打製技術較爲原始;一部分是第一、四、五、六、七、十、十一、十四地點出土的,打製技術比較進步,並有磨製石器和陶片共存;另一部分是第三、八、九、十二、十三地點出土的,爲磨光石器與幾何印紋陶共存的文化遺存。現按三部分區別說明如下:

### (一) 第二地點

全部石器都是從地表採集,經挑選出來的標本有51件,主要是一些打製的石片石器、石核石器等,其餘未選出的有打製石片43件、石核30件,均第二步加工不明顯,但有的也有使用痕迹,多是各種型式的刮削器。現就選出的標本,按其類型分述如下:

1. 石片石器,46件。是這裏最爲常見而又典型的遺物。原料採用火石和砂岩。製法主要採用石錘直接敲擊而成,片疤深而短,台面及半錐體顯著,第二步加工時採用壓製法,但更多是只有使用痕跡,主要爲單面加工,很少雙面加工的,保留自然岩面的石器只有很少發現。石片一般較厚而大,很少薄而小的,最薄的0.7,最厚的5.4厘米,這是打製石片中重要的特徵之一。器形比較簡單,有斧形器、尖狀器、刮削器和鏃形器等類。

斧形器　2件。橢圓形斧1件,器身呈扁平橢圓形(近似舌形),刃部由兩面加工而成,臂部較厚。長6.9,寬6,厚2.8厘米。有肩斧1件,器身扁平,雙肩與身同長,有二次加工痕迹。長3.5,寬5.5,厚0.8厘米(圖六,3;圖版壹,1、2)。

尖狀器　17件。可分下列各式:

三稜尖狀器,3件。器身厚重,破裂面微隆起,陰面中有稜,與左右緣呈弧形尖出,有二次加工和使用痕迹。長14.8,寬9.8,厚5.4厘米(圖版壹,3)。

三角尖狀器,4件。有二次加工痕迹,長4.5—7,寬3.2—8,厚1.2—2.4厘米(圖版壹,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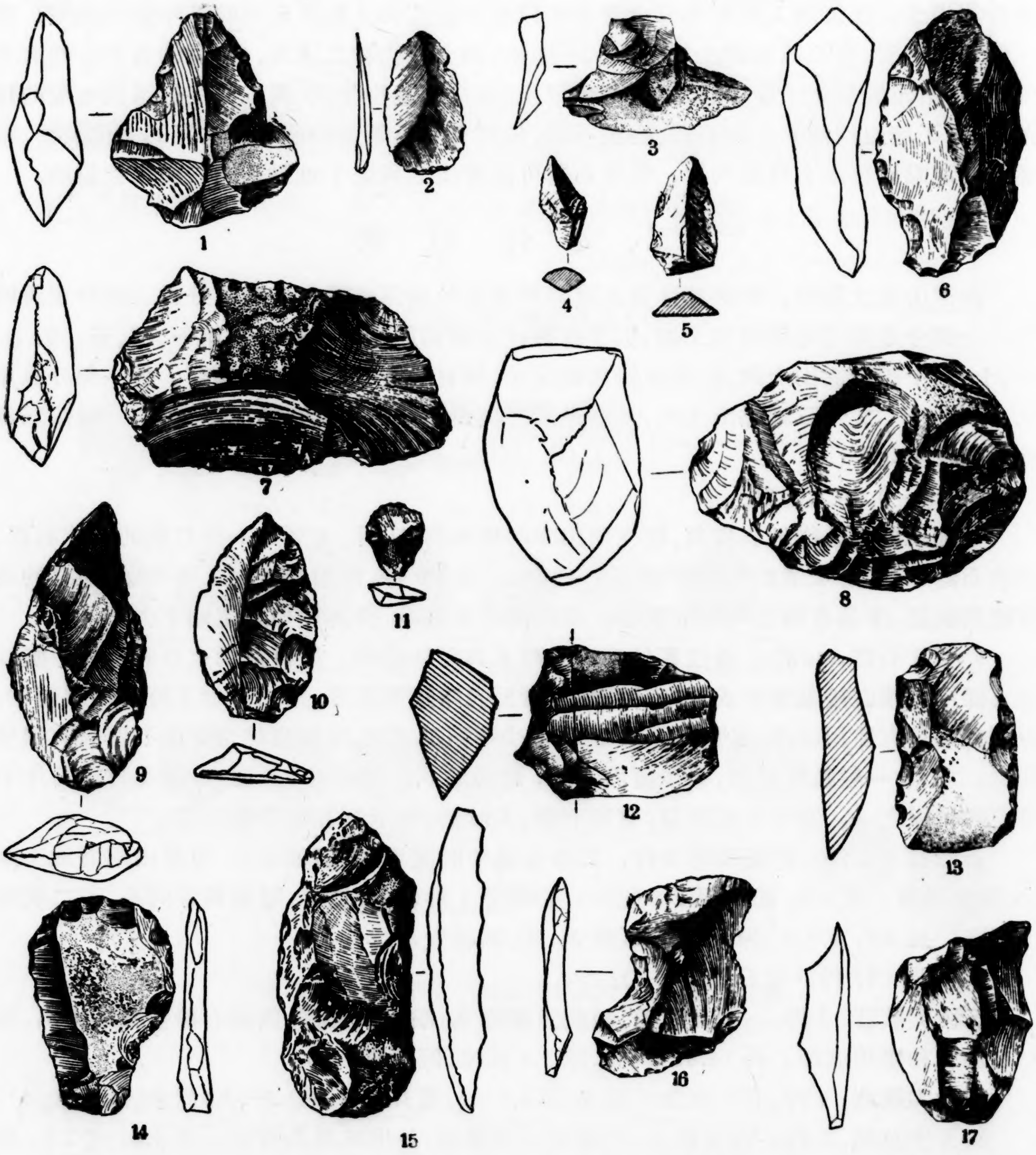
斜刃尖狀器,5件。器形較小,尖鋒由一面修成,斜出略呈鳥嘴狀。長4.1,寬2.4,厚1.1厘米(圖版壹,5)。

長條尖狀器,3件。尖端均有單面二次加工。1件的邊緣亦有二次加工,並保留有部分自然岩面。長4.5,寬2.9,厚1.1厘米(圖版壹,14)。

圭形尖狀器,2件。扁平而薄,製作較精細,左右緣至尖端均有二次加工痕迹。1件尾部加工成凹刃,似亦可作刮削器。長2.7,寬2.6,厚0.6厘米(圖版壹,15、16)。

刮削器　16件。可分下列各式:

短刮削器，6件。 器形較小，在石片短的一端修成平刃或凹刃，有二次加工或使用痕迹。長2.2—4.4，寬2.5—3.8，厚0.6—1.6厘米。



圖六 石 器（1/2）

1. 三稜尖狀器(NSP7:300) 2. 長條形鏃(NSP11:51) 3. 有肩斧(NSP2:3)
4. 四稜鏃(NSP2:12) 5. 長條形鏃(NSP2:44) 6. 長刮削器(NSP2:22)
7. 長刮削器(NSP6:86) 8. 敲砸器(NSP2:20) 9. 斜刃尖狀器(NSP7:12)
10. 三稜尖狀器(NSP7:118) 11. 三角形鏃(NSP7:301) 12. 方形刮削器(NSP7:14)
13. 長身斧(NSP11T1:1.11) 14. 鏃(NSP7:35) 15. 長身斧(NSP7:93)
16. S形刮削器(NSP7:117) 17. 斜刃尖狀器(NSP11T1:2.35)

長刮削器，5 件。 器形有大小，在石片的長端修成平刃、凹刃或凸刃，有的雙面加工，有的尙保留自然岩面。長 5—7.7，寬 2.5—4.1，厚 1.1—2.6 厘米(圖六，6；圖版壹，6)。

複刃刮削器，3 件。1 件在兩邊有二次加工痕迹，一邊爲平刃，一邊爲凹刃，呈四方形。長 4.2，寬 4.7，厚 1.2 厘米。2 件在石片的三邊均有二次加工痕迹，有平刃、凸刃的。長 3.3，寬 1.8，厚 0.8 厘米(圖版壹，7)。

S 形刮削器，2 件。 器身薄而狹長，略呈"S"形。 有二次加工痕迹，製作較精細。長 12.2，寬 4.7，厚 1.8 厘米(圖版壹，8)。

穿孔石飾　1 件。孔已殘缺半邊。

鏃形器　10 件。可分下列各式：

三角形鏃，5 件。形狀呈不規則三角形。長 2.3，寬 1.6，厚 0.4 厘米(圖版壹，17)。

長條形鏃，3 件。陰面均有一稜，均有二次加工痕迹。長 4，寬 1.6，厚 0.8 厘米(圖六，5；圖版壹，18、19)。

四稜鏃，1 件。尖端鋒利，尾端有仔細的二次加工，製作精細。長 2.9，寬 1.4，厚 0.8 厘米(圖六，4)。

有鋌鏃，1 件。頂端尖圓，下半收分似鋌，中有一稜，左右緣及尖端均有精細的二次加工痕迹。長 4.5，寬 2.3，厚 0.9 厘米。

2. 石核石器，5 件。原料採用火石和砂岩，製法與石片石器同，惟器形較大而重，有的直接用河礫石製成。器形可分有肩器、尖狀器、敲砸器及石球等四類。

有肩器　1 件。器身粗厚，兩面琢平，僅有右肩，刃部殘缺，肩部雙面二次加工痕迹較細。長 9.1，寬 7.5，厚 3 厘米(圖版壹，9)。

尖狀器　2 件。1 件屬斜刃尖狀器，形式與石片器的大體相同。長 6.7，寬 3.7，厚 1.7 厘米(圖版壹，10)。1 件屬三角尖狀器(圖版壹，13)。

敲砸器　1 件。呈橢圓形，一面保留自然岩面。長 9.2，寬 6.3，厚 3.4 厘米(圖六，8；圖版壹，11)。

石球　1 件。呈圓形球狀，在周面打琢製成。直徑 8.4 厘米(圖版壹，12)。

### (二) 第一、四、五、六、七、十、十一、十四地點

這些地點，除第十、十一兩地點的部分遺物爲探掘出土外，餘均從地表採集。 經挑選出來的標本有 602 件，主要是一些打製的石片石器、石核石器和磨製石器；其餘未選出的打製石片 1954 件、石核 334 件，其第二步加工不明顯，但不少有使用痕跡的，多是各種刮削器。現僅按其類型分述如下。

1. 石片石器，529 件。也是這裏最常見而又最典型的文化遺物。原料主要採用燧石，也有火石、板岩、石英岩和變質頁岩的。製法主要採用石錘直接敲砸而成，片疤深而短，第二步加工比較普遍和精緻，多採取壓製法，雙面加工的非常多，單面加工的也有一定的數量，台面及半錐體只在這類石器中才有保存。保留自然岩面的現象極少，全部石器中不超過10 件。石片薄的很多，最薄的 0.5，最厚的 2.8 厘米，一般厚度在 1 厘米左右。在打製技術上似比第二地點的要進步一些，器形亦比之更爲複雜，有斧形器、尖狀器、矛、鏃、刀形器、刮削器等七類。

斧形器　143件。可分四式:

Ⅰ式: 45件。呈扁平舌狀, 兩面均採用壓製法進行二次加工, 甚爲精細, 只有10件石器陽面的二次加工僅限於刃部, 刃部鋒利均呈弧形。一般的長6.8, 寬4.6, 厚1.2厘米;最大的殘長0.6, 寬8.3, 厚2.3厘米;最小的長5, 寬4.3, 厚1.4厘米(圖七, 3、7;圖版貳,1、2)。

Ⅱ式:短身斧, 39件。有的呈長方形,有的平面呈梯形,扁平,大多數刃部微微凸出,身寬而短。多數採用單面二次加工,也有3件保留有自然岩面的,製作遠不及Ⅰ式精細。一般的長6.2,寬4.3,厚1.9厘米;最大的長10.3, 寬6.1, 厚2厘米;最小的長4.7, 寬4.1, 厚1厘米(圖七, 2;圖版貳, 3)。

Ⅲ式:長身斧, 23件。器身狹長呈條狀,有10件略成柱狀,其餘扁平,多數爲凸刃,少數爲平刃,二次加工與Ⅰ式同,但不及其精細。一般的長6.8, 寬3.8, 厚2厘米;最大的長9.5, 寬4.2, 厚2厘米;最小的長5.8, 寬3.1, 厚1.2厘米(圖六, 15;圖版貳, 4)。

Ⅳ式:有肩斧, 36件。器身有的較長,有的較寬而短,均扁平,刃部多微凸出,肩均成銳角並短於身,有的雙肩較明顯,單肩的僅有4件。其二次加工方法亦與Ⅰ式同,有的亦甚爲精細。常見的長7.3, 寬4.4, 厚1.6厘米;最大的長11.8, 寬5.3, 厚1.4厘米;最小的長3.6, 寬4.8, 厚0.9厘米(圖八, 1; 圖版貳,5、6)。

尖狀器　122件。可分六式:

Ⅰ式:三稜尖狀器, 14件。器形有大小,與第二地點所出者同,惟二次加工較細緻,有的還在刃部採用雙面加工。有的呈扁平桂葉形,陰面中間有一稜,與左右緣成弧狀尖出。長5—10, 寬3.4—5.7, 厚1.2—2.8厘米(圖六, 1、10; 圖版貳,7; 圖版肆, 1)。

Ⅱ式:三角尖狀器, 27件。與第二地點出土的相同,大部分雙面二次加工,有的加工較細。長3.4—7.3, 寬2.9—5.6, 厚0.6—1.2厘米(圖七, 9; 圖版貳,8、9;圖版肆,2、3)。

Ⅲ式:扁平尖狀器, 20件。形狀不規則,扁平無稜,有的尖鋒狹長,有的尖圓,有的呈錐狀,雙面加工的不少,製作比其它各式爲精細。長4.1—9.6, 寬3.7—6.3, 厚0.9—1.4厘米(圖七, 1、4; 圖版貳,10、11)。

Ⅳ式: 長條尖狀器, 37件。器身特別狹長, 多扁平。長5.4—8.7, 寬1.5—3.2, 厚0.9—1.2厘米(圖七, 5; 圖版肆,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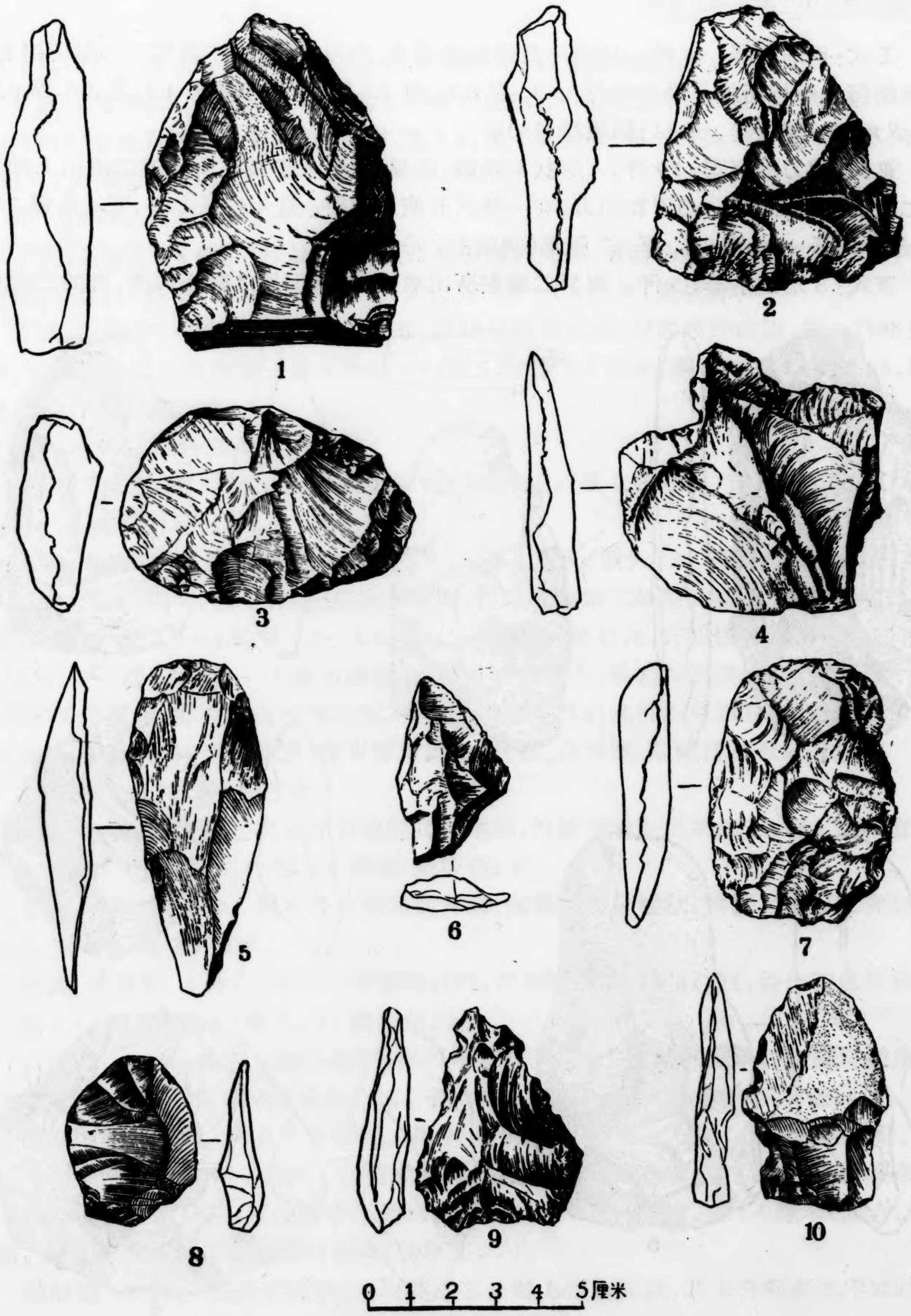
Ⅴ式:斜刃尖狀器, 23件。器身扁平,尖端斜出,有的帶稜,有的似鳥嘴,斜出的邊緣多有單面二次加工。長4.1—7.2, 寬2.2—4.1, 厚0.8—1.1厘米(圖六, 9、17; 圖版叁, 2; 圖版肆, 5)。

Ⅵ式:圭形尖狀器, 1件。長4.4, 寬3.4, 厚0.5厘米(圖版肆, 4)。

刀形器　9件。均屬有柄式刀,器形作扁平長條狀,一邊有柄, 甚似現在的廚刀,刃部圓形凸出, 有6件左緣亦有刃, 全器均採用雙面二次加工, 製作精細。最大的長4.6, 寬9.2, 厚1.4厘米;最小的長2.8, 寬4.6, 厚0.9厘米(圖八, 2; 圖版叁, 7)。

刮削器　219件。可分五式:

Ⅰ式:短刮削器, 26件。在石片短的一端修成平刃、凸刃或凹刃,與第二地點所出者同。最大的長9.4, 寬9,厚2.8厘米;最小的長3.8, 寬3.4, 厚0.9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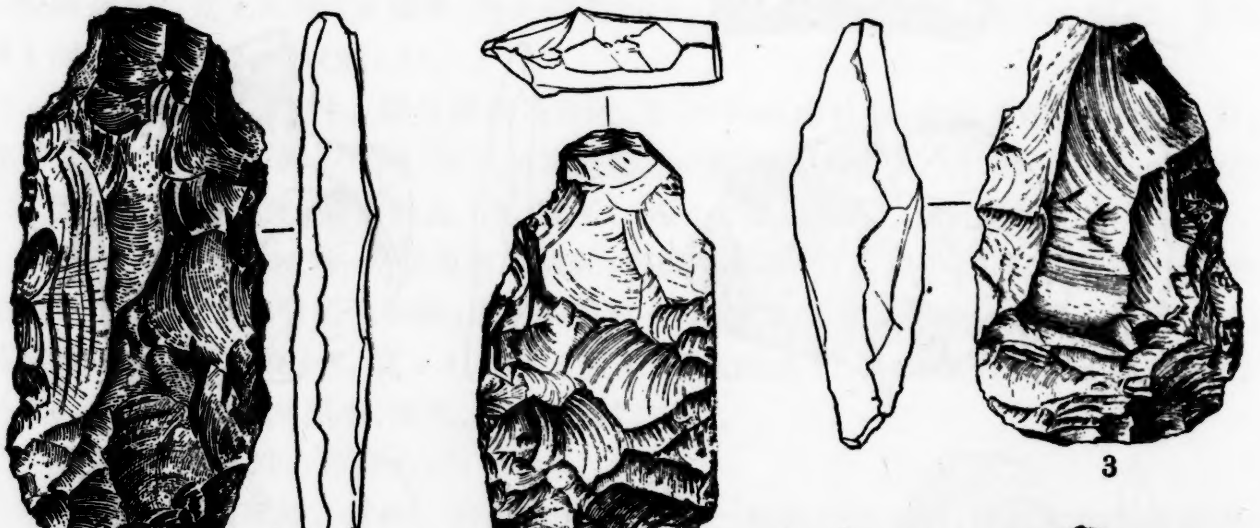

圖七　石　　器

1. 扁平尖狀器(SNP10:80)　2. 短身斧(NSP10:375)　3. 橢圓斧(NSP11T2:2.177)
4. 扁平尖狀器(NSP10:173)　5. 長條尖狀器(NSP10:266)　6. 有鋌鏃(NSP11T1:1.134)
7. 橢圓斧(NSP11:5)　8. 有鋌鏃(NSP10:345)　9. 三角尖狀器(NSP11:28)
10. 有鋌矛(NSP10:483)

Ⅱ式：長刮削器，96件。在石片長端修成平刃、凸刃或凹刃，亦與第二地點所出者同，但無保留自然岩面的。最大的長13.3，寬8.5，厚2.2厘米；最小的長4.2，寬2.6，厚0.5厘米（圖六，7；圖版叁，8、11；圖版肆，13）。

Ⅲ式：複刃刮削器，79件。形狀不規則，呈扁平狀，大多數在石片的二邊以上採用單面二次加工，成平刃、凸刃和凹刃，有一些只有使用痕跡。最大的長10.4，寬6.7，厚2.5厘米；最小的長4.7，寬3.4，厚0.7厘米（圖版叁，9）。

Ⅳ式：S形刮削器，5件。與第二地點所出者同，惟器形比之較小而薄，有的二次加工




圖八 石 器

1. 有肩斧(NSP11:173)　2. 有柄刀(NSP11:146)　3. 有肩斧(NSP11T2:2.370)
4. 圓刮削器(NSP11:39)　5. 有肩斧(NSP10T2:2.34)　6. 圓刮削器(NSP11:111)

却不及其精細。長 6.8，寬 4.2，厚 0.8 厘米(圖六，16；圖版叁，10)。

V式：圓刮削器，13 件。略呈扁平橢圓形，在石片四周進行雙面的二次加工，製作較其他式的刮削器為精細。最大的長 9.5，寬 8.8，厚 1.8 厘米；最小的長 4.2，寬 3.8，厚 0.9 厘米(圖八，4；圖版叁，12)。

矛 12 件。可分二式：

I式：長身矛，6 件。作扁平長條狀，尾端厚於尖端，全器均進行雙面二次加工，有的僅有使用痕跡。長 10.1—10.4，寬 4.1—3.4，厚 0.9—1.1 厘米(圖版肆，7)。

II式：有鋌矛，6 件。呈扁平長條形，兩緣呈弧形尖出，尾端收分成鋌，有 1 件略呈橢圓形，均進行雙面二次加工。最大的長 9.6，寬 5.3，厚 1.3 厘米；最小的長 5.6，寬 3.4，厚 1 厘米(圖七，10；圖版叁，3、4)。

鏃 24 件。可分三式：

I式：三角形鏃，6 件。中有一稜，單面二次加工。長 2.1—2.4，寬 1.6—2.1，厚 0.7 厘米(圖六，11；圖版肆，12)。

II式：長條形鏃，10 件。長 4.2，寬 2.3，厚 0.4 厘米(圖六，2；圖版肆，8、9)。

III式：有鋌鏃，8 件。有的鋌部加工明顯，器形也較第二地點的細小。有的陰面有少許磨製痕跡。長 4.3—4.9，寬 2.5—3.3，厚 0.5—1厘米(圖七，6、8；圖版叁，5、6；肆，10、11)。

2. 石核石器，25 件。石核石器較少，原料採用燧石、砂岩和石英岩，製法與石片石器同，惟較大而厚重，亦有些直接用河礫石製成。從石器的性質上可以看出，比之第二地點所出者為進步。器形比較簡單，僅有斧形器、尖狀器、刮削器、敲砸器和石球五類。

斧形器 16 件。可分三式：

I式：短身斧，5 件。與石片石器同式斧略同，均採用雙面二次加工，有 1 件保有少部分自然岩面。長 8，寬 7.4，厚 2.6 厘米(圖版伍，1)。

II式：長身斧，3 件。與石片石器同式斧同，惟器身均呈柱狀，均採用雙面二次加工。長 9.3，寬 4.4，厚 2.5 厘米。

III式：有肩斧，8 件。與石片石器同式同，但無單肩者，均呈柱狀，製作較為精細。長 9.2，寬 5.7，厚 2.6 厘米(圖八，3；圖版伍，2)。

尖狀器 3 件。均屬三稜尖狀器，與石片石器同式同，惟器形較大，兩緣均採用雙面二次加工，有 1 件保留有部分自然岩面。長 10.4，寬 5.3，厚 4.2 厘米(圖版伍，3、9)。

圓刮削器 2 件。與石片石器同。長 9，寬 8.3，厚 3.3 厘米(圖八，6；圖版伍，4)。

方形刮削器 1 件。長的一端修成平刃，頂端亦有寬大的打擊面，細長石片剝落的條痕只在石器的一面存在，還保留少許的自然岩面。長 5.7，寬 4.6，厚2.4 厘米(圖六，12；圖版伍，8)。另有 1 件為圓錐形刮削器(圖版伍，7)。

敲砸器 2 件。呈長形球狀，用河礫石在全器上打製而成，其上有敲砸使用痕跡。長 11，寬 9.6，厚 6.1 厘米(圖版伍，5)。

石球 1 件。呈圓形球狀，在周面打琢製成。直徑 8.4 厘米(圖版伍，6)。

3. 磨製石器，45 件。它是這裏最為典型的產物，也代表了較為進步的石器加工技術。這種石器的原料多採用燧石、火石、砂岩和板岩，也有少量的變質頁岩。製法主要是把它

敲砸成一定形狀以後，再在其重要的位置上如刃、肩或全器進行磨製，但打製痕迹仍然遍存全器，與研磨的粗細成正比例。其內包括從石片石器和石核石器中加磨而成的，而以前者爲最多，器形比較簡單，數量也比較少。計有石斧、石刀和礪石三類。

石斧 36件。可分三式：

Ⅰ式：短身斧，10件。與石片石器同式的相同，器形寬而短，刃部對稱鋒利，平刃、凸刃均有。最大的長5.6，寬7.2，厚2.8厘米；最小的殘長2.2，寬3.8，厚0.9厘米（圖版陸，1）。

Ⅱ式：長身斧，8件。與石片石器同式的相同，器身扁平而長，刃部對稱鋒利，爲平刃。長6，寬3.5，厚1.8厘米（圖六，13；圖版陸，2）。

Ⅲ式：有肩斧，18件。與石片石器同式的相同，但無單肩的，多數肩短於身，也有2件肩長於身的，有的很厚，有的很薄，多在肩部及刃部研磨，也有些全器磨製的。最大的長11.1，寬6，厚3.5厘米；最小的長3.7，寬4.2，厚1厘米（圖八，5；圖版陸，3、5）。

石刀 7件。可分三式：

Ⅰ式：半月形刀，3件。作扁平半月形，均在刃部加磨，刃微凸。長7.7，寬4.2，厚1.4厘米（圖版陸，8）。

Ⅱ式：三角形刀，1件。呈長三角形，背厚，平刃，刃部加磨精細。長8.2，寬3.1，厚1.7厘米（圖版陸，9）。

Ⅲ式：有柄刀，3件。與石片石器同式者相同，惟在背面加磨。長6.3，寬3.6，厚1厘米。

礪石 2件。爲用作研磨石器的石砧。1件其上有十字形的磨槽。1件背面磨平（圖版陸，10）。

4. 陶器。在第一地點等8處中有出現，但數量均不多，並在探掘中得到證實。陶器可分二系。

一系爲夾砂粗陶，多爲黑胎，有的表面白色，有的表面紅色，有的表胎均爲紅色，均有細砂粒和石末爲羼和料，陶土未經淘洗，火候很低。手製，表面抹平，也有的附以籃紋和點紋。因陶片過於破碎，器形均不能辨（圖版陸，15、16）。

一系爲泥質軟陶，有紅色、灰白色，也有黃胎、灰胎紅表的，均有較少量的細砂和石末爲羼和料，其餘均與上系同（圖版陸，11–14）。

（三）第三、八、九、十二、十三地點

這幾處的石器、陶器和廣東中部地區所出的同期的文化遺物基本相同。在西樵山附近所發現的5個地點，出土遺物均不多，且不具典型。石器原料爲燧石和板岩。製法有比較精細的打製和磨光石器兩種。器形有斧、錛兩類。

1. 石器

斧 4件。分二式：

Ⅰ式：長身斧，1件。磨製粗糙，呈扁平長條狀，凸刃。

Ⅱ式：有肩斧，3件。2件磨製較精細，1件磨光，雙肩，肩短於身，作扁平長條狀，雙面平刃。長7，寬4.1，厚1.2厘米（圖版陸，6）。

锛 3件。分二式:

I式:短身锛,1件。磨光,扁平近方形,邊緣磨平,單面凸刃,長5.9,寬5.4,厚1.5厘米(圖版陸,4)。

II式:有肩锛,2件。同石斧同式同,單面平刃或凸刃。長4.8,寬3.5,厚1.2厘米(圖版陸,7)。

2. 陶器

爲方格印紋灰色軟陶,只有第十二地點有所發現,與其他地區同時期的遺址所出者完全一樣。

## 三、結　　語

廣東以至於東南沿海一帶,過去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多屬於磨光石器與幾何印紋陶共存的所謂"幾何印紋陶文化",即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或者更後的一種文化。較爲早期的只有廣西"武鳴文化"和浙江紹興發現的石器時代遺存。現在,南海西樵山發現的石器,絕大部分比廣東地區的"幾何印紋陶文化"爲早,這是值得重視的。

在西樵山出土的豐富的石器中,根據石器的性質及其與陶片共存的關係來看,似乎第二地點的打製石器比較原始,還不見磨光石器和陶片,其時間或許較早,約相當於新石器時代早期或者稍早一些。第一、四、五、六、七、十、十一、十四地點的石器,打製技術似乎比較進步,器類也較爲複雜,並有磨製的石器和陶器,其時間或許比第二地點稍晚。第三、八、九、十二、十三地點爲磨光石器與幾何印紋陶共存的文化遺存,也即是廣東與東南沿海一帶的所謂"幾何印紋陶文化",其時間當又較後。

我們把西樵山的石器,初步的這樣分期,認爲較早的約相當於新石器時代早期或稍早一些,這是因爲:西樵山的打製石器在廣東地區是一新的發現,即東南地區也較爲少見,這樣一批新材料尙缺少比較研究的資料;另外,我們所謂比較早期的第二地點,遺物純係地面採集,沒有經過試掘,地層情况還不瞭解,雖尙未見磨製石器,但有不少石器的器形與打製技術,仍與那些出土有磨製石器的地點相當接近,似乎不會過早;再則西樵山的石器較爲普遍地出現打製的和一些磨製的有肩石斧,這一器形與廣東中部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近似甚至沒有區別(在廣州市郊飛鵝嶺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就發現過),而且典型的鏃和矛的出現和陶器的共存,指出了西樵山石器地點大部分在時代上是接近的。這一推論是否確當,尙待進一步證實與研究。至於有幾何印紋陶共存的地點,它與廣東及東南沿海地區的"幾何印紋陶文化"是同一個文化系統,在時代上也不會相距太遠。

從西樵山出土的大量的尖狀器、矛、鏃等石器來看,說明了當時人們過着採集和漁獵的經濟生活。大量的各式石斧出現,其中包括打製的和磨製的有肩石斧,還有石刀等,可以推測已經有了"鋤耕農業"。

再從帶有地區性的典型的有肩石斧這一特點來看,西樵山的石器其所反映的文化性質,應該與廣東地區、特別是中部地區的爲同一類型的文化,不過在時間上有早晚的不同而已。

執筆者:莫　稚

# STONE IMPLEMENTS UNEARTHED AT HSI CH'IAO SHAN, NAN HAI COUNTY, KWANGTUNG

THE KWANGTUNG PROVINCIAL MUSEUM

Hsi Ch'iao Shan lies about seventy kilometers to the southwest of the city of Canton. Somewhat circular in shape and measuring four kilometers in diameter, it is an isolated volcanic hill standing in the midst of a fluvial plain. The specimens under discussion have been collected from the low-lying slopes of this hill.

Since October, 1955 successive investigation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the area by the Chung-Shan University, the Kwangtung Provincial Museum and the CPAM of the City of Canton. As a result fourteen sites were found to contain stone implements and two of them, sites No. 10 and No. 11, have also been excavated.

The specimens collected from these fourteen sites show that some of them belong to a culture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well-known Neolithic culture found in Kwangtung and the southeastern coastal region of China and characterized by the hard pottery with impressed geometric design. Judged by the techniques involved in making these implements as well as by their contemporaneous potsherds, they represent several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ulture. The earliest of them is found at site No. 2 where the technique is of a more primitive kind producing only flake and core implements. Their shapes include celt, point, scraper, chopper, arrowhead, etc. Apparently, direct flaking with a hammerstone is the first step involved in making these implements which bear deep but short scars. The second step is pressure flaking which is usually applied on one side only. Significantly, no potsherds have been uncovered at this site.

The artifacts unearthed at sites Nos. 1, 4, 5, 6, 7, 10, 11 and 14 include both chipped and polished implements. Here, the flaking technique is clearly more advanced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implements have been processed on both sides and nearly all over the entire surface. Their shapes are also a bit more complicated, including celt, point, spearhead, arrowhead, blade, scraper, chopper, etc. Some of the implements, such as the celt, blade (both crescent and triangular shaped) and grindstone, have been further polished either along the cutting edge or on the shoulders while a few appear to have been polished all over the body. However, the polishing was done in a very crude manner. All the eight sites in this group have yielded potsherds, though in very small numbers. They belong to either of the following two types of ware: 1) coarse sandy ware with either black or red paste, the outside being either red or white; and, 2) a finer ware with either yellow or grey paste, the outside being either red or greyish-white. Both are hand-made and low-fired, with polished surface. A few are further decorated with impressed basket or dot desig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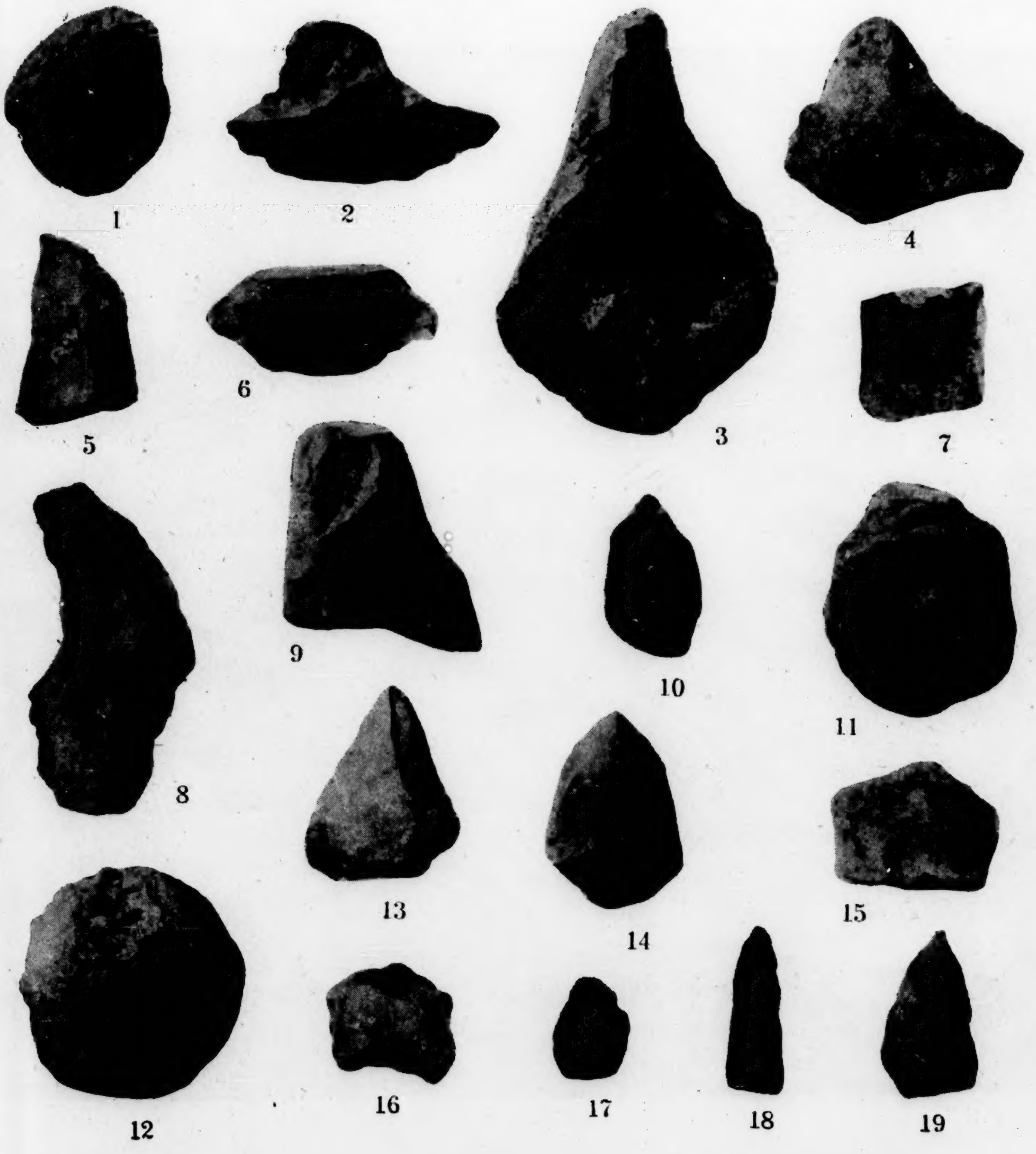
The specimens found at sites Nos. 3, 8, 9, 12 and 13 are largely similar to those uncovered from other sites in the delta of central Kwangtung. Here, the stone implements are of a more advanced type. Among the eight pieces collected are such shapes as the celt, adze and grindstone. Only site No. 12 of the group yields potsherds which belong to a grey ware with impressed trellis design.

Although no excavation has been conducted at the site yet, the absence of polished stone im-

plements and potsherds as well as the crudeness of the workmanship of the former seem to indicate that site No. 2 is probably the oldest of the fourteen sites, attributable to the early Neolithic or perhaps even earlier. Next come the eight sites in the second group where pottery and polished implements began to appear alongside chipped implements. Besides, there is also a marked improvement in the workmanship of the stone implem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fine polished implements and the pottery with impressed trellis design collected at the sites Nos. 3, 8, 9, 12 and 13 bear a certain resemblance to those found in the other Neolithic sites of Kwangtung and the southeastern coastal region of China and characterized by the hard pottery with impressed geometric design. It, therefore, stands to reason that this group of five sites is of a later date.

The most common stone implements found at Hsi Ch'iao Shan is the shouldered celt, either chipped or polished. The fact that this shouldered celt is a typical implement of all the Neolithic sites in Central Kwangtung may be taken as a good indication that the Hsi Ch'iao Shan sites belong to the same main culture group as the others, though their date might be a bit earlier.

That the people of the Hsi Ch'iao Shan sites lived on hunting and fishing as well as on gathering is amply borne out by the presence of large quantity of such implements as the point, spearhead, arrowhead etc. However, the abundance of stone knives and celts of various types also shows that they must have practiced some sort of farming as we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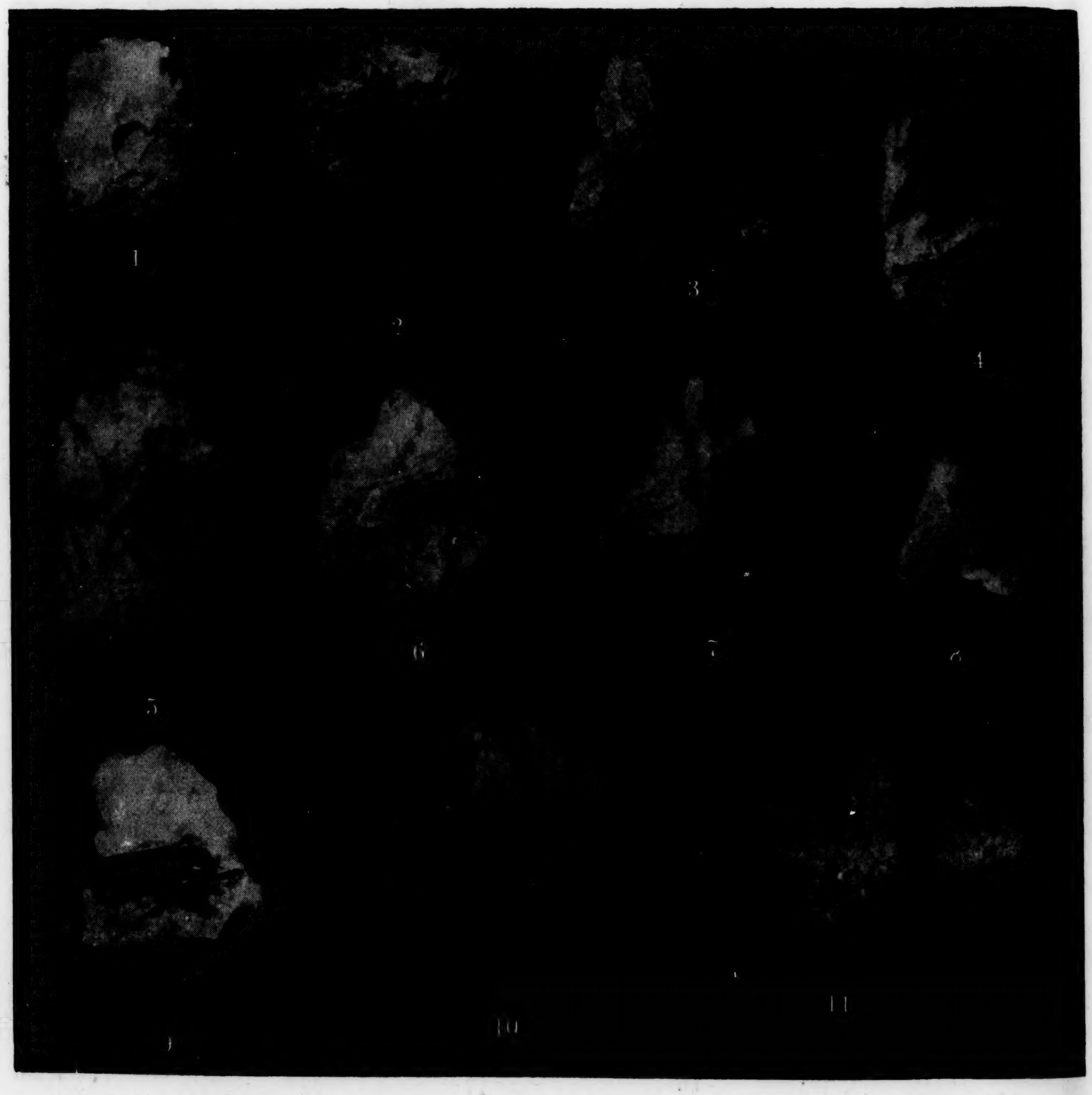



廣東南海西樵山第二地點出土石器

1. 橢圓形斧 (49) 2. 有肩斧 (3) 3. 三稜尖狀器 (15) 4. 三角尖狀器 (52) 5. 斜刃尖狀器 (53) 6. 長刮削器 (22) 7. 複刃尖狀器 (24) 8. S形尖狀器 (42) 9. 有肩器 (50) 10. 斜刃尖狀器(54) 11. 敲砸器 (20) 12. 石球 (55) 13. 三角尖狀器 (51) 14. 長條尖狀器 (56) 15、16. 圭形尖狀器(14、58) 17. 三角形鏃 (57) 18、19. 長條形鏃 (35、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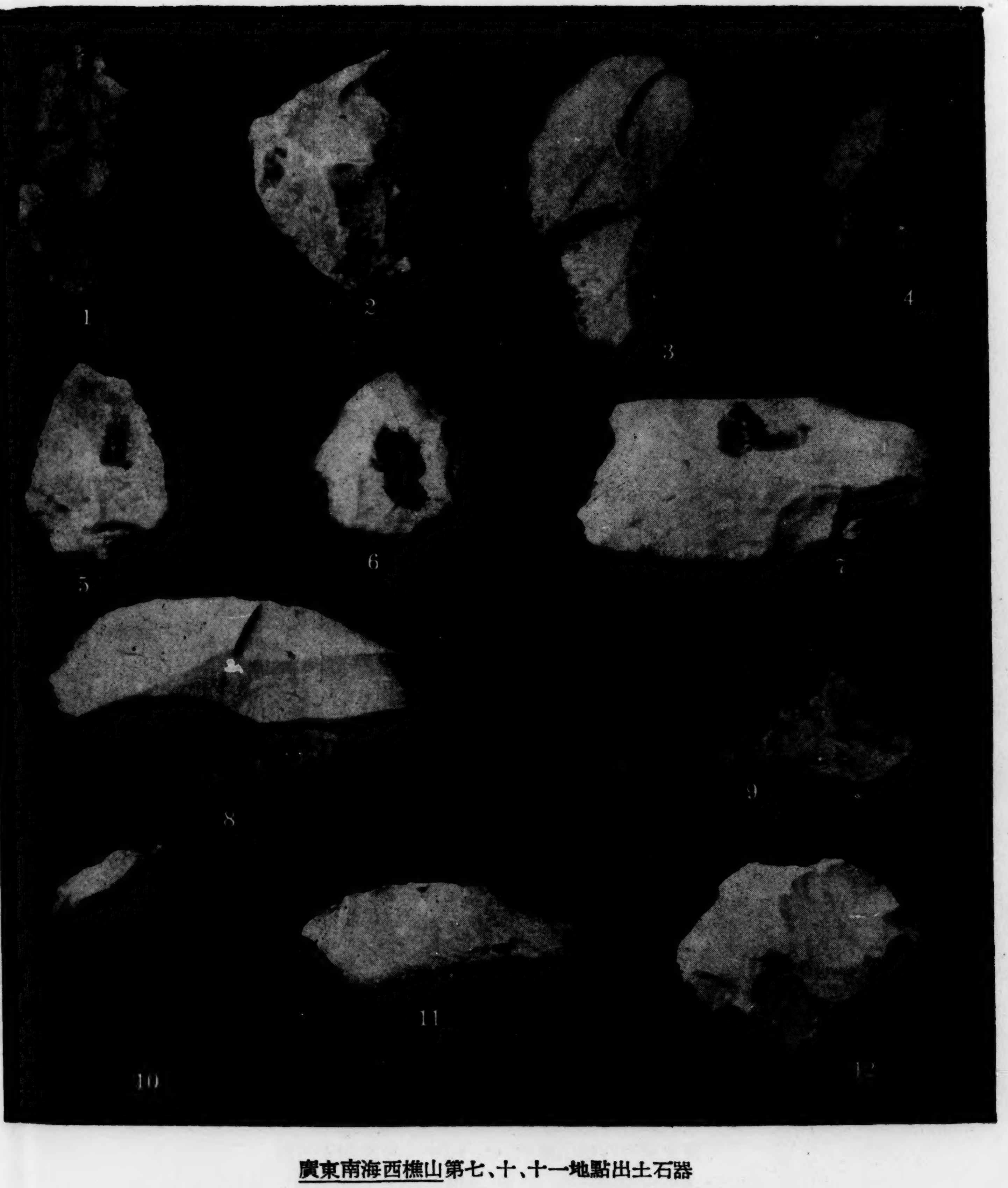
註：括號內的器物號前面的出土地點號 NSP2，一概省去。

# 圖 版 貳 (II)



廣東南海西樵山第七、十、十一地點出土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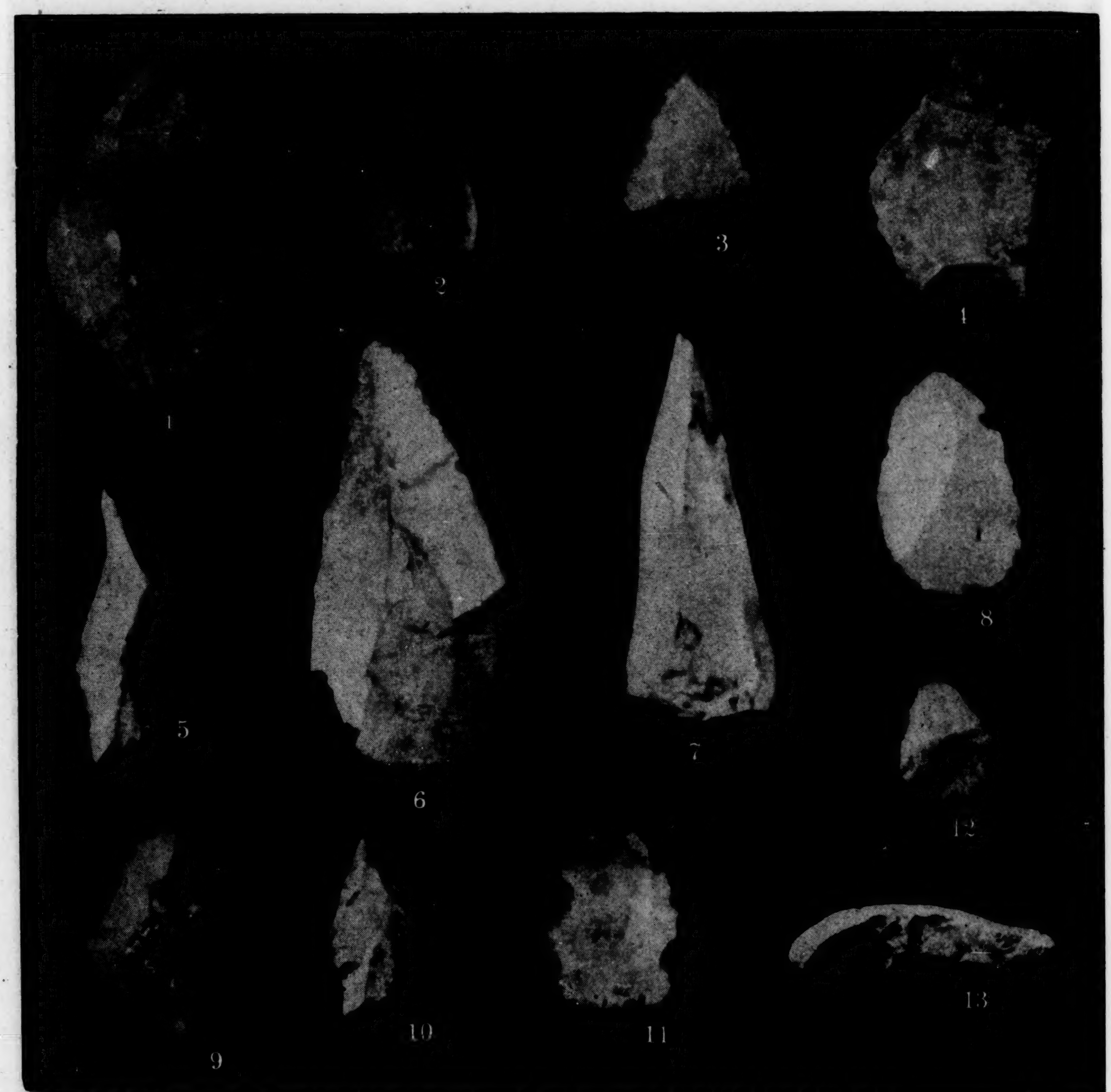
1. 橢圓斧 (NSP11:5) 2. 橢圓斧 (NSP7:41) 3. 短身斧 (NSP10:375) 4. 長身斧 (NSP7:93) 5. 有肩斧 (NSP11:173) 6. 有肩斧 (NSP11T2:2.175) 7. 三稜尖狀器 (NSP7:300) 8、9. 三角尖狀器 (NSP11:28、11) 10、11. 扁平尖狀器 (NSP10:80、173)




廣東南海西樵山第七、十、十一地點出土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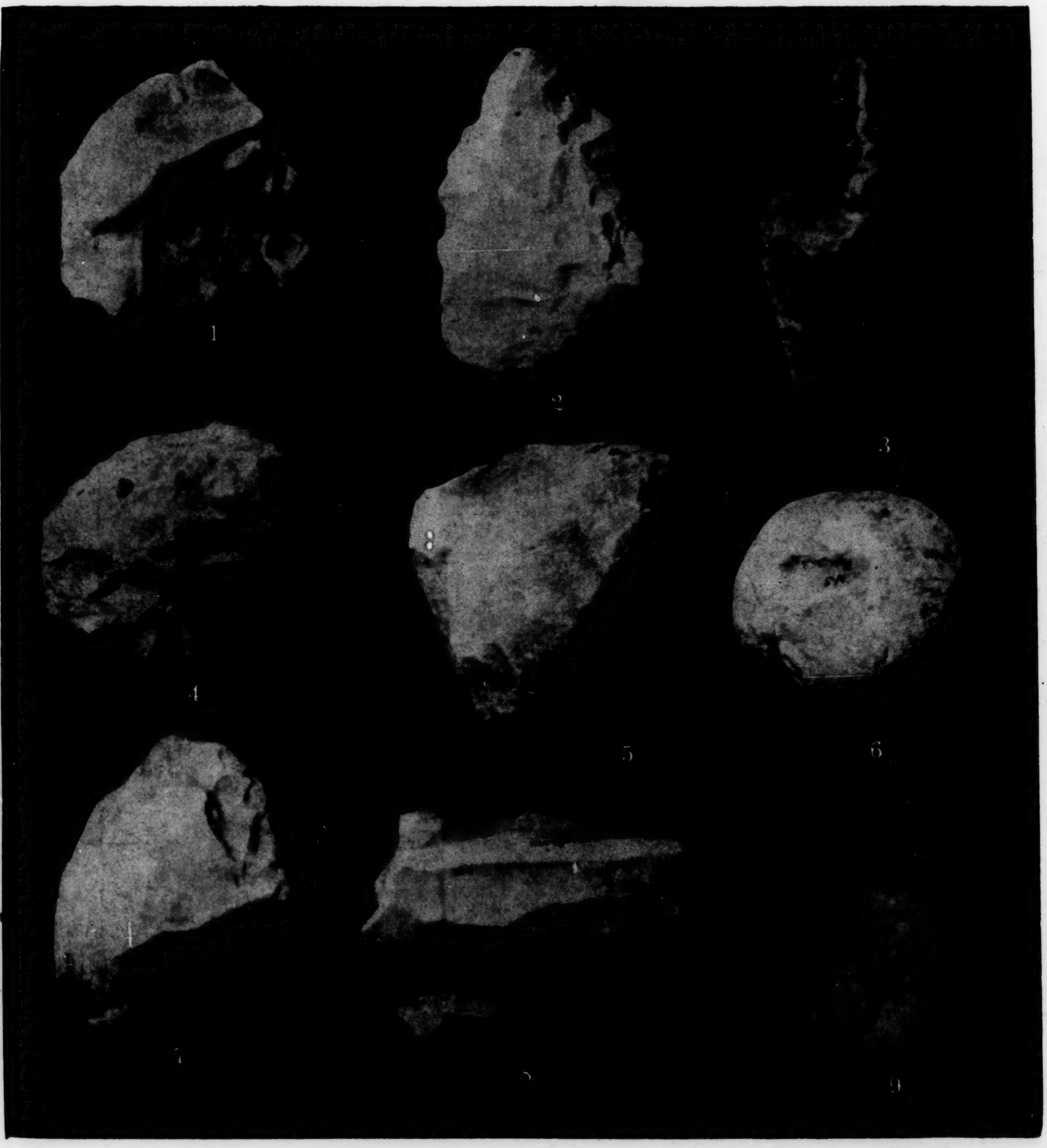
1．長條尖狀器 (NSP11T1:1.42)　2．斜刃尖狀器 (NSP11T1:2.35)　3、4．有鋌矛 (NSP11T2:1.19、10:483)　5、6．有纖鋌 (NSP11:101、P11:263)　7．有柄刀 (NSP11:146)　8．長刮削器 (NSP11:105)　9．複刃刮削器 (NSP7:103)　10．S形刮削器 (NSP7:117)　11．長刮削器 (NSP11:53)　12．圓刮削器 (NSP11:39)

# 圖 版 肆 (IV)




廣東南海西樵山第六、七、十、十一地點出土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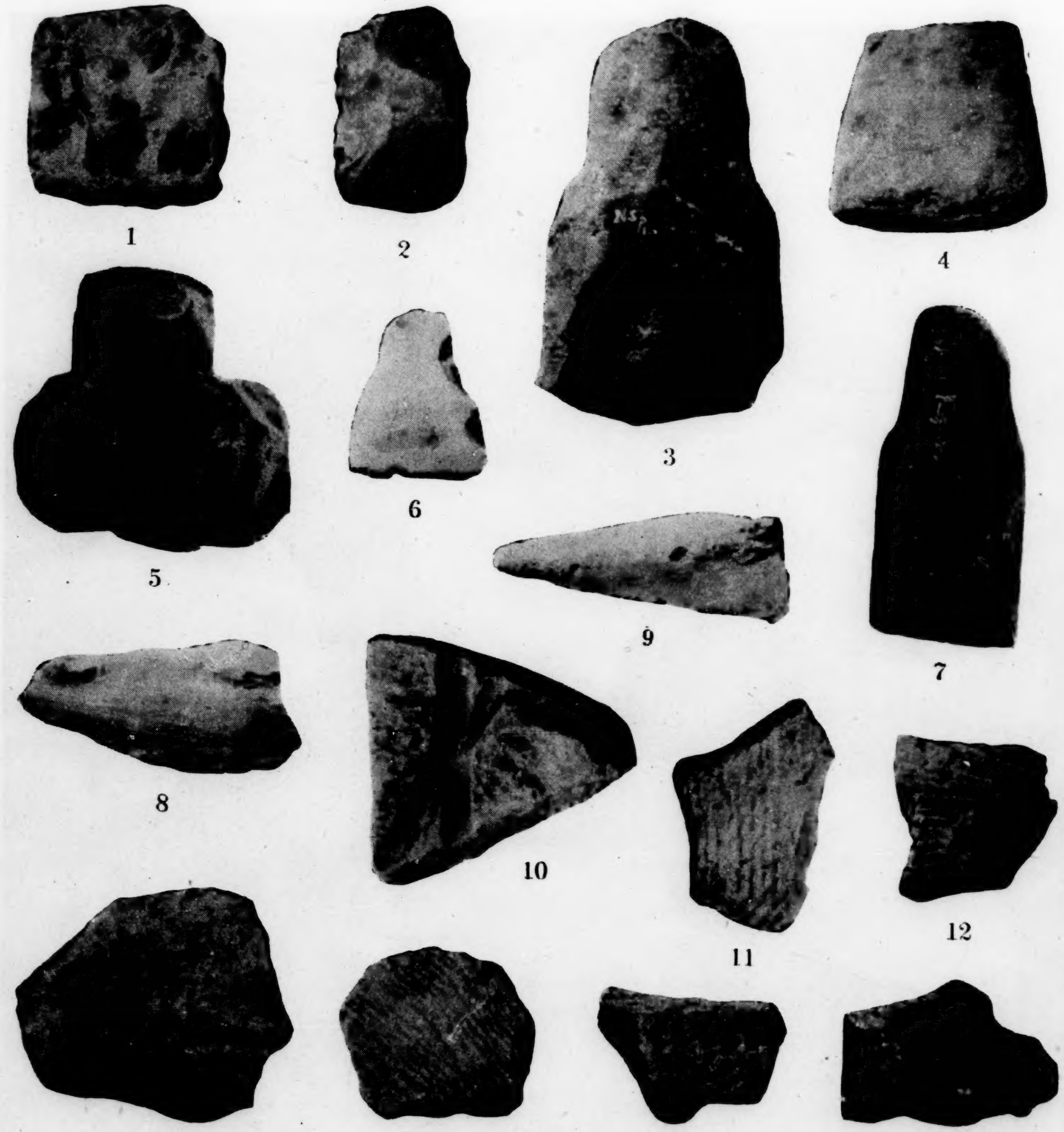
1. 三稜尖狀器 (NSP7:118)　2、3. 三角尖狀器 (NSP11:500、7:124)　4. 圭形尖狀器 (NSP11T1:1.47)　5. 斜刃尖狀器 (NSP6:89)　6. 長條尖狀器 (NSP10:266)　7. 長身矛 (NSP6:87)　8. 長條形鏃 (NSP11:51)　9. 長條形鏃(NSP10:343)　10、11. 有鋌鏃 (NSP11T1:1.134、P11T1: 1.193)　12. 三角形鏃 (NSP7: 301)　13. 長刮削器 (NSP10:371)



廣東南海西樵山第四、七、十、十一地點出土石核石器

1. 短身斧 (NSP10:79)  2. 有肩斧 (NSP11T2:2.370)  3. 三稜尖狀器 (NSP7:105)  4. 圓刮削器 (NSP11:111)  5. 敲砸器 (NSP10:183)  6. 石球 (NSP10:263)  7. 圓錐形石核 (NSP4:41)  8. 方形刮削器 (NSP7:14)  9. 石核尖狀器 (NSP4:31)

# 圖版陸 (VI)




<u>廣東南海西樵山</u>第七、九、十、十一、十三地點出土石器、陶片

1. 短身斧 (NSP10:376) 2. 長身斧 (NSP11T1:1.11) 3. 有肩斧 (NSP10T2:2.34) 4. 短身锛 (NSP13:1) 5. 有肩斧 (NSP7:27) 6. 有肩斧 (NSP13:2) 7. 有肩锛 (NSP9:1) 8. 半月形刀(NSP10:243) 9. 三角形刀(NSP11T1:1.1) 10. 礪石 (NSP10:203) 12—14. 紅色軟陶片(NSP10T2:2) 15、16. 夹砂粗黑陶片(NSP10T2:2)

# 山東安邱景芝鎮新石器時代墓葬發掘

王 思 禮

(山東省文物管理處)

景芝鎮位於安邱縣東南 24 公里,附近地勢平坦遼闊,西靠浯河,向西略偏北隔浯河距鎮約 3.5 公里就是鳳凰山。浯河發源於鎮西南 20 公里的官莊一帶,經鎮南和西面繞道流向東北的武家漫,匯濰河奔入渤海。古墓葬在鎮南偏西約 300 米的磚瓦窯場基地下面。

1957 年山東全省開展文物普查時,於景芝鎮窯場取土中發現了這一古墓葬區。經我處祝志成同志調查,當時認爲是一古文化遺址。並從窯場工人處蒐集到石箭頭 1 件,紅陶鉢和大口尖底缸各 1 件,還有鬹足和豆的圈足等遺物。經我們研究認爲這些器物的質地、色澤和形制,都與我省其它地區的古文化遺址出土的遺物有些不同。 當時我處忙於普查輔導工作,無暇顧及發掘,便卽函告當地縣人委會,予以妥善保護。

同年 10 月,窯場因用土量的增加,曾數次來信催促解决。我們本着兩利的原則,便派祝志成、王思禮二同志前往詳細勘查或進行小規模的探掘, 並對窯場今後用土劃出範圍,以解决文物保護問題。

爲了進一步探明這裏的情況,便決定在窯場的東北角, 就原來破壞處開掘兩條 3 × 5 米的探溝。在這兩條探溝裏就發現 7 座墓葬。 再把探溝線打開向四面擴展, 7 座墓就全部暴露出來。發掘面積52.8平方米,合計取土 102.5 立方米。出土遺物 74 件。從10 月 31 日開工,至 11 月 12 日結束,共計 13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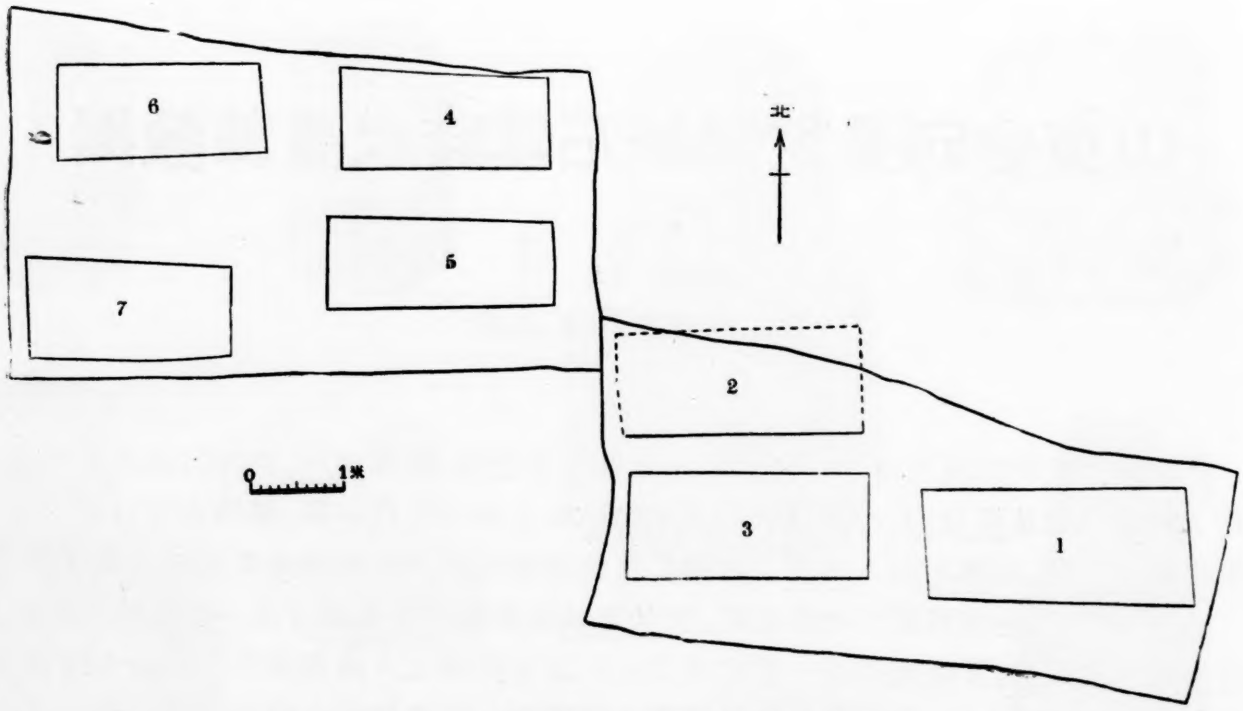
至於與這墓葬區有關的當時人們的住地,現在我們還未完全弄清,估計約在墓葬區的北部三角高地一帶,因爲在這裏看到了少許的灰土,也曾採集到紅陶片。

## 一、墓 葬 形 制

這 7 座墓葬全是單身葬。東面 3 座,西面 4 座,南北排列的的很整齊。我們從東至西編爲 1—7 號墓(圖一)。

由地表下掘至 1.85—1.9 米時卽到墓口。 發現有的墓葬的塡土中夾雜着很細的炭渣(內中也有較粗的),如 2、3 號墓就很明顯。同時還發現有的墓壙穴四周有厚 0.15—0.2 米的黑灰土中夾雜着大量的紅燒土末和碎陶片等,無疑這是從居址上特意移來的。 這種黑灰土較原地的黄泥夾雜着細沙的土質密度大得多,自然是經過加工錘砸而成的。 但這種做法並不普遍,僅見 1、4 號墓如是。

墓室皆作長方形土坑豎穴,大者一般長 2.7, 寬 1.23,墓口至墓底深 0.56 米,最小者長 2.06, 寬 1.02,墓口至墓底深 0.53 米。墓與墓南北間相距 0.4—1.15,東西相距 0.55—1米。




圖一 景芝鎮 1—7 號墓葬分佈位置圖

2 號墓的北壁已被破壞，出土遺物已不清楚。其它 6 座墓都較完整，但也有的骨架很亂，甚至頭骨竟移到墓的中間，如 5、7 號墓就屬這類情況。 至於怎樣擾亂的，還沒得出可靠的證據，似乎不見被後人擾亂的痕跡。另外還在個別墓中發現有的器物並不完整，如 6 號墓內的寬玉鐲只有數塊殘片，因而我們認爲可能隨葬時就不完整。

骨架已腐朽，僅僅採集了一塊腿骨。葬式皆爲仰臥伸直葬，頭東脚西，相差不過 0—2 度。 看來此地的葬法與日照兩城鎮、曲阜夏侯及江蘇新沂花廳的新石器時代葬法相同或近似。由此可見仰臥伸直、頭東脚西的葬式爲當時一般民族所通用。當然，在其他地區的個別墓中亦有不同的葬法，但爲數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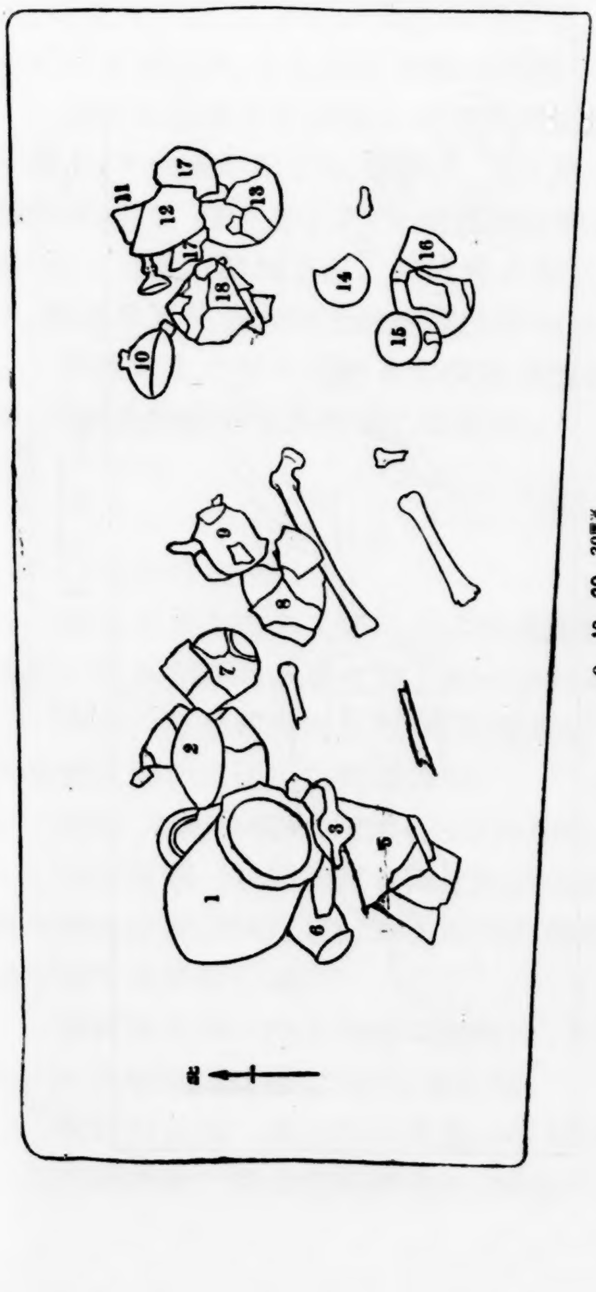
至於各墓的坑形、葬式、隨葬品分佈位置等，可參閱附圖（圖二——七；圖版壹，1—4）。關於各墓的尺寸，見附表（表一）。

**表一 墓葬尺寸登記表**（單位：米）

| 墓號 | 墓坑 長 | 墓坑 寬 | 墓坑 深 | 方向 | 墓號 | 墓坑 長 | 墓坑 寬 | 墓坑 深 | 方向 |
|---|---|---|---|---|---|---|---|---|---|
| 1 | 2.7 | 1.23 | 0.56 | 東 西 | 5 | 2.46 | 0.91 | 0.55 | 東 西 |
| 2 | 2.5 | 1.1 | | | 6 | 2.31 | 1 | 0.53 | 東 西 |
| 3 | 2.6 | 1.2 | 0.57 | 東 西 | 7 | 2.5 | 0.98 | 0.53 | 東 西 |
| 4 | 2.06 | 1.02 | 0.53 | 東 西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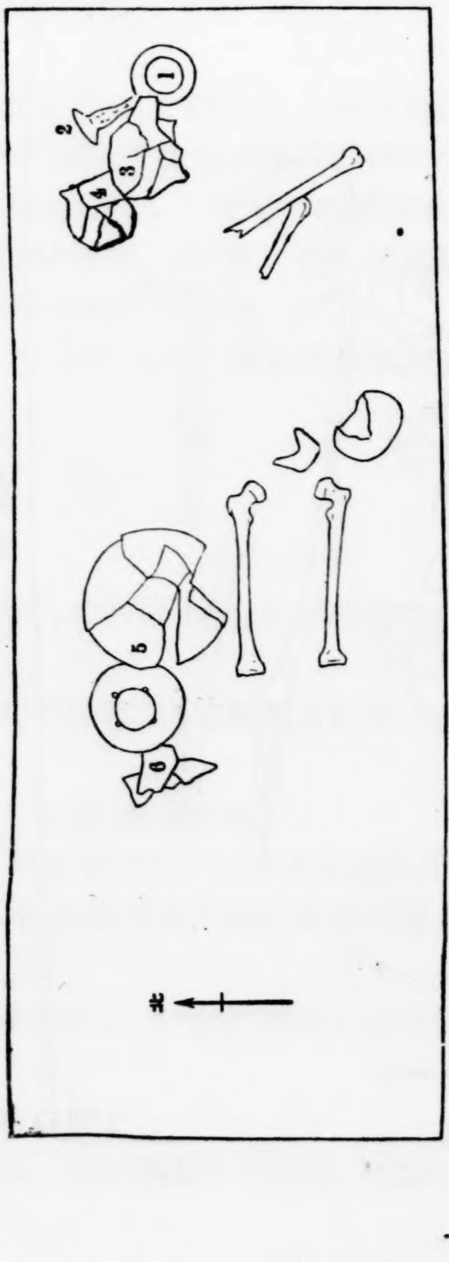
## 二、隨葬器物的位置

從這 7 座墓葬的器物的分佈觀察，是有它一定的規律性的。但其數量、類型却有所不同，隨葬最多者達 18 件，最少者 6 件。 隨葬品的陳放位置：陶器多放在尸體的右面和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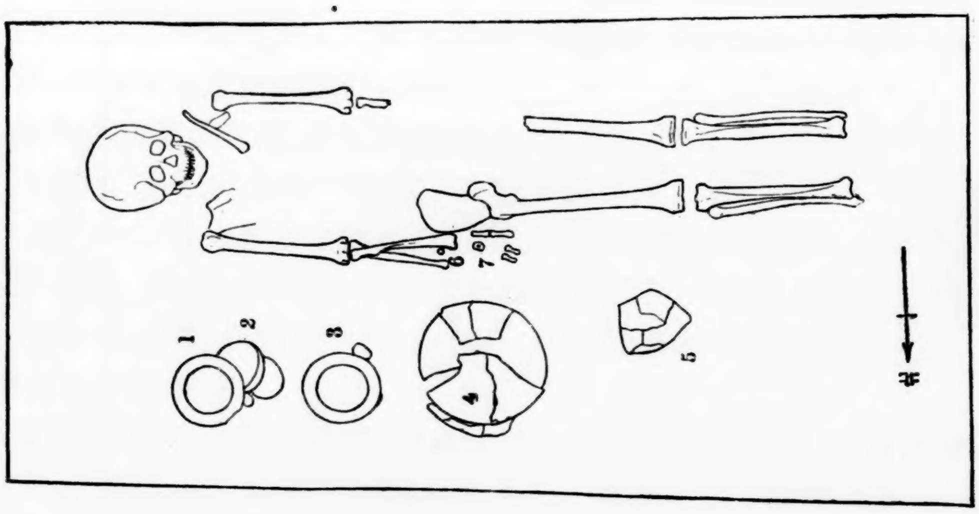

圖二 1號墓平面圖

1. 大口尖底缸 2,4,9,17. 紅陶鼎 3. 白陶鬹 5. 紅陶盆 6,7,18. 灰陶罐 8. 灰陶碗 10. 紅陶碗 11. 黑陶杯 12,16. 紅陶豆 13. 黑灰陶罐 14,15. 紅陶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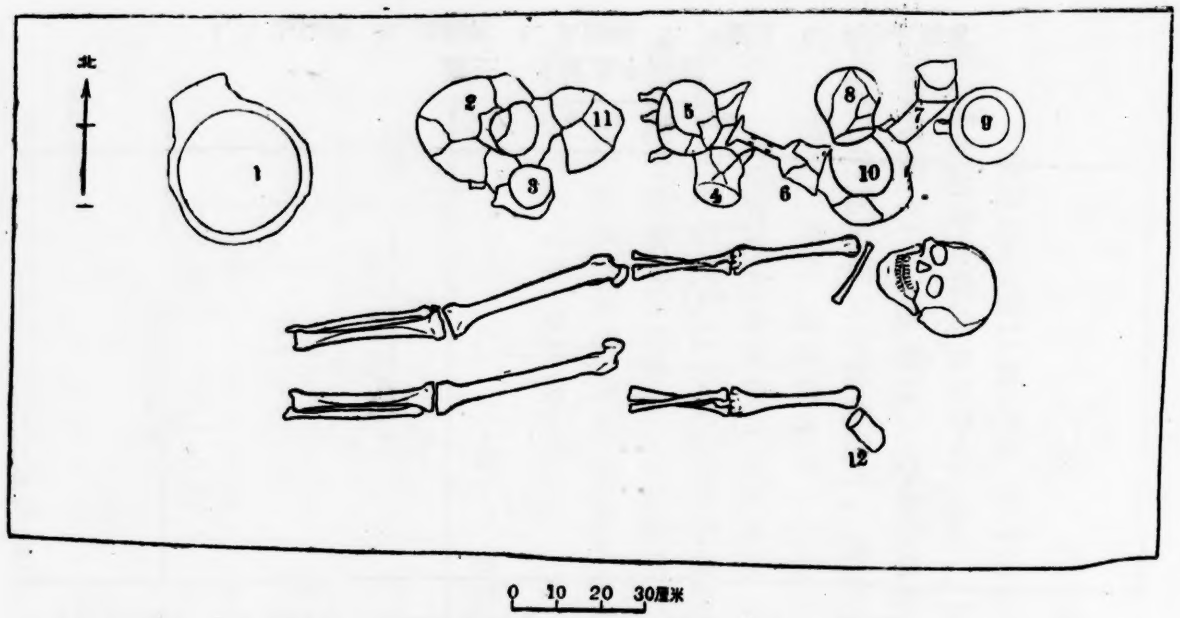

圖三 5號墓平面圖

1,3. 紅陶罐 2. 黑陶杯 4. 灰陶罐 5. 灰陶豆 6. 夾砂紅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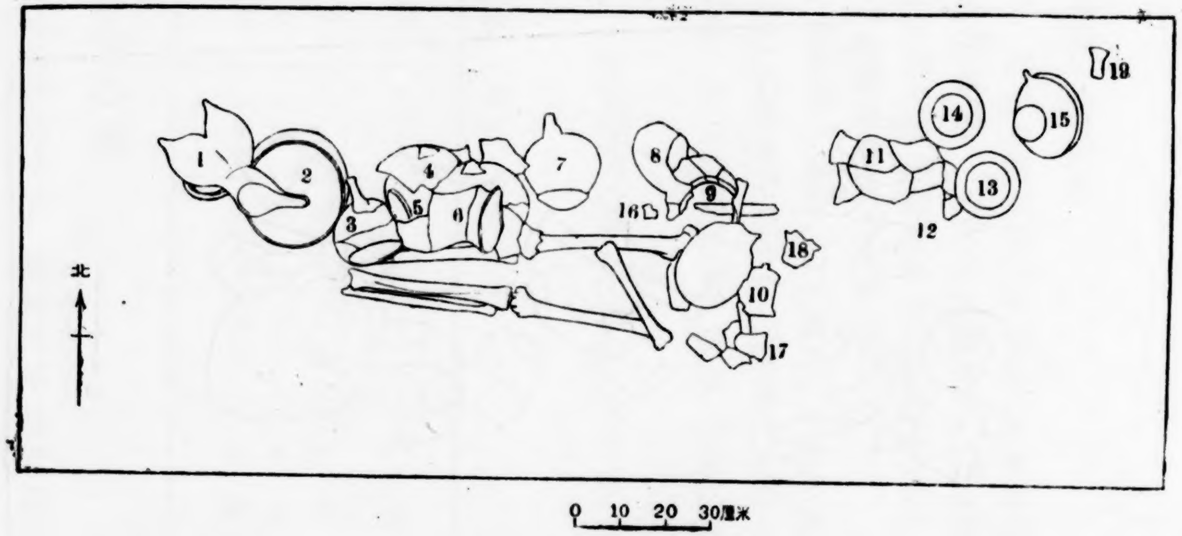

圖四 4號墓平面圖

1,3. 灰陶罐 2. 黑陶杯 4. 灰陶豆 5. 灰陶碗 6,7. 玉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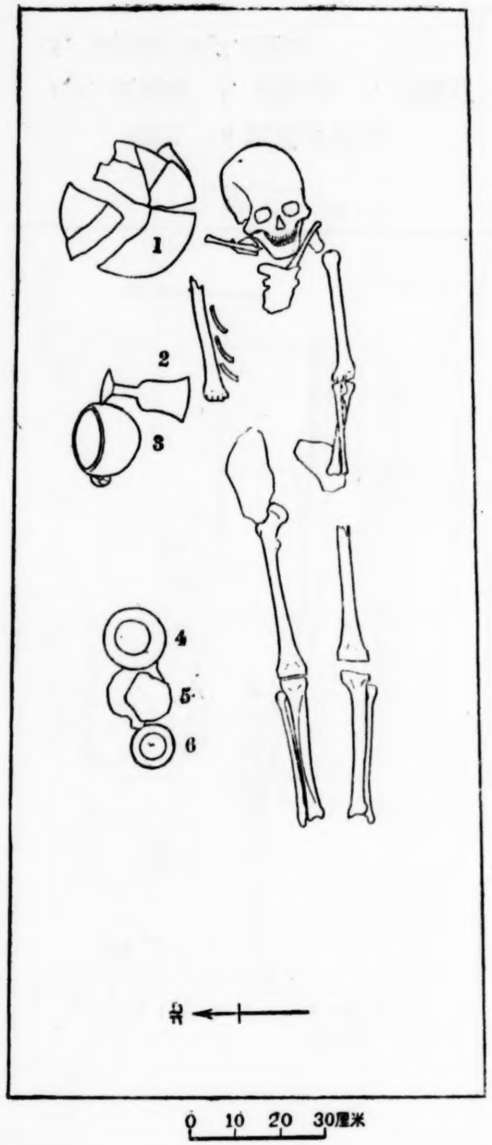

圖五　3號墓平面圖

1. 大口尖底缸　2. 紅陶雙耳罐　3、4. 陶鼎　5. 紅陶鬶　6、7. 黑陶杯　8. 紅陶罐
9. 紅陶單耳罐　10. 紅陶器　11. 紅陶碗　12. 夾砂陶片




圖六　7號墓平面圖

1. 紅陶鬶　2. 鉢形器　3. 紅陶鼎　4. 灰陶罐　5. 紅陶碗　6、8、9、13、14. 紅陶罐　7. 灰陶鼎
10、12. 黑陶杯　11. 紅陶三足器　15. 紅陶小口尊　16. 玉鐲殘片　17、18. 紅陶片　19. 鼎足




圖七　6號墓平面圖

1. 灰陶豆　2. 黑陶杯　3. 灰陶單耳罐
4、6. 紅陶鼎　5. 紅陶罐

下,較少者僅放在右面,左面和頭部很少見,7 座墓中只見 1 號墓一例。 玉飾品不是各墓俱有,它的陳放位置與墓主人生前佩帶的位置應該是相同的。 在這 7 座墓中沒見到一件生產工具,這或者與當時的葬制有關。

生活用具的陳放位置,同類型器物多放在同一位置上,但也並不盡同。

如尖底缸(墓 1、3)放在尸體脚下或脚下偏右方。

鬶(墓1、2、3、7)一般和缸的位置靠近,獨有 3 號墓的鬶放在尸體的右中部。盆(墓 1 )與缸、鬶相靠, 僅見此一例。三足鼎形器各墓都有,多放在脚右面,由於這種器物數量不一,有的在脚右,有的在體右中部。 另外,在 3 號墓的墓口南發現一鼎、一碗,鼎下有少許灰堆,鼎底有火燒痕迹。

罐類各墓都有,且數量較多,陳設位置一般在頭右的居多,中部亦有,下部較少。

盤形豆(墓 1、4、5、6)多放在體右側的上、中部, 以中部者居多。 高足杯,除墓 2 外,各墓都有 1 件,惟 3 號墓 2 件。多放在尸體頭部的右面,墓 3 的另一件則放在右中部。碗(墓 1、3、7)的位置各有不同,墓 3 的在頭右側;墓 1 的在右中部;墓 7 的在右下部。 三足器,只見於 1 號墓,放在尸體頭部的左側,是各墓隨葬物陳設的典型一例。 其它各種器物都不佔主要位置,多擺在以上器物之間。

玉飾隨葬的位置應與生前所佩帶位置相同。如鐲(墓 2、7)出土時,2 號墓的還套在左手腕上; 7 號墓的出土右手腕處。璧(墓 2 )放在胸間,和新沂花廳的新石器時代墓葬中玉璧位置相同。墜(墓 2、7) 2 號墓的發現於胸間,和玉璧相近; 7 號墓的則壓在右上方(肩部)的三足盤形器的下面。其位置也和花廳玉墜的位置相同。珠(墓1、4) 1 號墓發現於頷下,與曲阜夏侯墓葬出土的玉珠位置相同, 4 號墓則發現於右手骨旁。

根據以上主要生活用具和裝飾品的具體位置, 可以看出這一地區在葬俗方面的規律性,可能是依據器物的用途而擺設的。

## 三、隨 葬 器 物

### (一) 陶器

都是死者生前的生活用具。因爲燒製的火候很低,都碎成小塊,不能把全部器物粘對復原。這裏介紹的僅是復原了的一部分陶器。

陶質: 可分爲泥質黑陶、泥質黑灰陶、泥質灰陶、夾砂粗灰陶、細泥質紅陶、泥質紅陶、夾砂粗紅陶和夾砂粗白陶等八種。

紋飾:有素面磨光,條紋,凸出的帶紋,還有鏤孔,盲鼻,圓餅飾等。

泥質黑陶　一種細膩的陶土經過細緻的淘洗, 不加羼和料, 較其它陶質的火候稍高, 因而陶質較硬,陶壁很薄,表面經過打磨有光澤。和各地龍山文化的標準黑陶完全一樣。器形僅有高柄杯一種。

泥質黑灰陶　陶土未經細緻淘洗,亦不加任何羼和料。 表面分飾陶衣和不飾陶衣兩種。火候較紅陶略高,器形如罐之類。

夾砂粗灰陶　陶土加入大量小砂粒,器形如尖底缸即是。

泥質灰陶　陶土似不經淘洗,但也不另加羼和料, 而在陶壁中尚保留少微的細砂粒。

罐、盤形豆就屬這種陶質。

細泥質紅陶　陶土經過淘洗，土較細膩，但火候很低，觸手即碎，輭如泥土。陶壁皆經過打磨，有光澤，上着陶衣。陶壁一般較厚，如缽、杯、盤等是。

泥質紅陶　與上述的泥質灰陶一樣，製品有罐、碗等。

夾砂粗紅陶　與夾砂粗灰陶一樣，但亦有較細者，器形有缸、鼎形器、鬶、盆、碗等。

夾砂粗白陶　亦同上述夾砂的陶質，其製品僅見鬶一例。

1. 尖底器

缸　共3件(墓1、3)，內中1件爲蒐集品。口沿有明顯的輪紋，下部手製。唇外折近平，直腹，腹下部外凸然後再內收成尖底，外飾斜條紋，體大壁厚，高55.5，口徑34.3，壁厚3.5厘米。此類型陶器在山東各遺址中尙未見到。它與南京市北陰陽營的夾砂紅陶缸相同，與鄭州洛達廟商代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陶罐的形式亦相近，惟底稍尖。

2. 平底器

罐類　共10件。分六式。

Ⅰ式：3件。爲單耳陶罐，分泥質黑灰陶、灰陶、紅陶等種，式樣相同，皆爲手製。現以5號墓出土的爲例：器形作侈口，寬耳，肩腹無明顯分界，腹的最大徑在下部，下收爲小平底，高13.7，口徑9.4，腹徑13，壁厚0.5，耳寬2.5厘米(圖八，1；圖版貳，4)。

Ⅱ式：2件(墓1、7)。泥質紅陶，手製。皆唇外折，口內收。1號墓者爲球腹，通高12，腹徑13，壁厚1厘米(圖八，2；圖版貳，1)；7號墓者腹的最大徑在腹上部，高12.7，腹徑14，壁厚0.7厘米(圖八，3)。

Ⅲ式：1件(墓3)。細泥質紅陶，手製，外加陶衣。折唇，高頸，鼓腹，下收小平底，高12.7，腹徑13.4，壁厚0.5厘米(圖八，4；圖版貳，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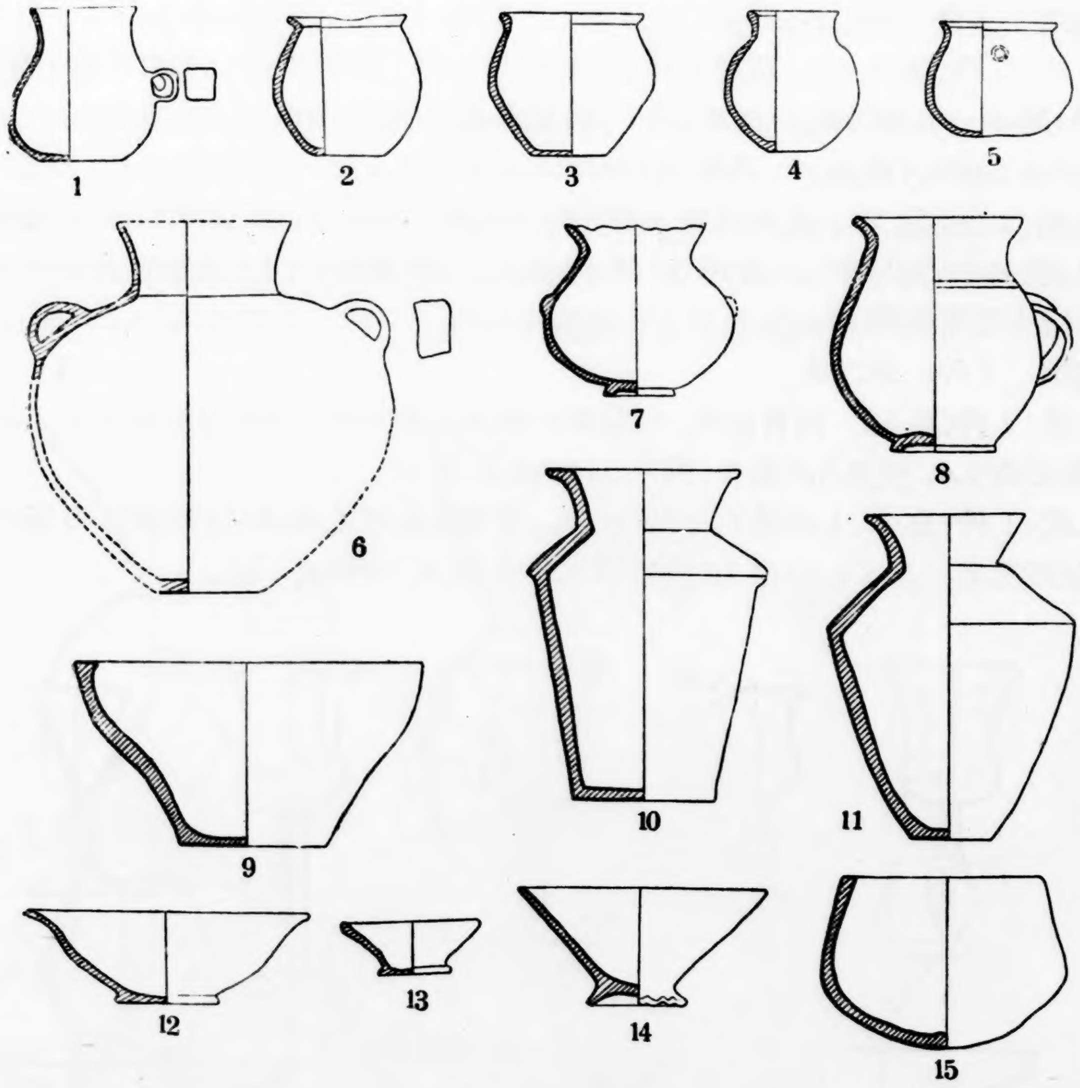
Ⅳ式：1件(墓7)。細泥紅陶，手製，外加陶衣。唇外折，鼓腹，小平底，腹上部左右各飾圓餅一個，高10.2，腹徑12，壁厚0.8厘米(圖八，5；圖版貳，3)。這種罐及其裝飾曾見於曲阜夏侯，圓餅飾在兩城和龍山二地的鬶腹亦常見。

Ⅴ式：1件(墓3)。細泥紅陶，手製磨光，外加陶衣。很難復原，僅就粘對起的上部和底，再根據當時繪的草圖，其形狀仍可以說明。唇外折，高頸，大腹，最大徑於腹上部，下收成小平底，在肩腹處附雙耳。通高約32，頸高6.2，壁厚0.8，耳寬2厘米(圖八，6)。此器形制與兩城的雙耳橫鼻黑陶罐相似，不同處特別是兩耳，兩城式爲橫鼻，景芝式爲豎耳。

Ⅵ式：1件(墓3)。泥質黑陶，輪製磨光，其下部又似手製的。製作較規整。全器亦不能復原，只有上部和底部。其形狀似罈，小口，唇稍折，高頸，大腹，小平底，形狀亦相當別致。通高29.7，底徑9.5，壁厚0.6厘米。

尊形器　2件(墓2、7)。泥質灰、紅陶各1件。輪製磨光，製作極其規整。墓2的侈口，唇外折，高頸，闊肩，肩外凸出於腹，因此肩腹有明確分界，腹作筒形，向下微收成平底。通高28.8，壁厚0.9厘米(圖八，10；圖版伍，1)；墓7的與上近似，惟侈口而不折唇，肩腹雖有明確分界，但肩不凸出於腹，肩腹間帶有弧線，底口亦皆小於前者。通高28，底徑6.4，壁厚0.8厘米(圖八，11；圖版伍，2)。

盆　1件(墓1)。夾砂粗紅陶。敞口，腹壁斜直，小平底。高16，底12.8，壁厚1.1厘



圖八　陶　器

1. Ⅰ式平底罐(墓5,1/8)　2. Ⅱ式平底罐(墓1,1/8)　3. Ⅱ式平底罐(墓7,1/8)
4. Ⅲ式平底罐(墓3,1/8)　5. Ⅳ式平底罐(墓7,1/4)　6. Ⅴ式平底罐(墓3,1/4)
7. Ⅱ式罐(墓3,1/6)　8. Ⅰ式罐(墓4,1/6)　9. 紅陶盆(墓1,1/8)
10. 尊形器(墓2,1/8)　11. 尊形器(墓7,1/8)　12. 陶碗(墓1,1/8)
13. 小陶碗(墓7,1/8)　14. Ⅰ式碗(墓1,1/6)　15. 紅陶鉢(採集,1/6)

米(圖八, 9; 圖版伍, 5)。器形頗厚重,不同於兩城等地的敞口大平底的盆。

碗　2件(墓1、7)。一爲細泥紅陶,體形較大,一爲泥質紅陶,體形較小。均爲手製。前者表面似經打磨,敞口唇微折,腹壁下部略呈弧形,底盤凸出,底面有刮削痕,呈圓形實底,若從外表看去頗有圈足感覺。高 8.2,底徑 8.5,壁厚 0.5 厘米(圖八, 12; 圖版貳, 7);小碗亦爲敞口,腹壁斜直,突收成小平底,底沿凸出飾以花邊,裏面腹底分明,高 4.5,底徑 6.2,壁厚 0.5 厘米(圖八, 13)。這種小碗與兩城、龍山出土的相同。

鉢　1件(蒐集品)。是窯場取土時掘出的。細泥紅陶。手製磨光,腹下部有刮削痕,外加陶衣。直口向下漸次外凸至腹下爲最大徑,然後突收作小平底,其底之小恰似圜底。高 10.9, 口徑 12.6, 底徑 3.9,壁厚 0.4 厘米(圖八, 15;圖版伍, 4)。

3. 圈足器

罐類　3 件。分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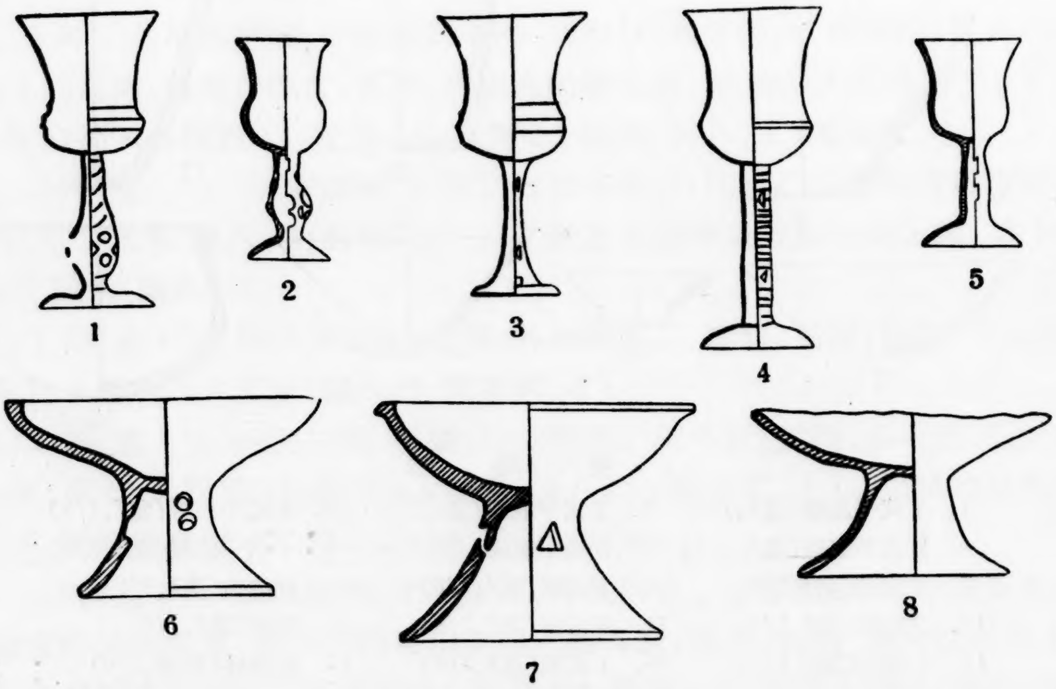
Ⅰ式：2 件(墓 4、6)。泥質紅陶、黑灰陶各 1 件。手製磨光。其式樣與平底器的Ⅰ式罐相同,僅多一小矮圈足。在罐(墓 4)的耳上部有弦紋一周,高 15.3,腹徑 13.5,圈足高 0.3,壁厚 0.3 厘米(圖八,8;圖版貳,5)。

Ⅱ式：1 件(墓 3)。泥質紅陶。磨光外加陶衣。脣外侈,扁腹,腹上部左右飾小盲鼻,高 11.1,腹徑 12.5,足高 0.3,壁厚 0.3 厘米(圖八,7;圖版貳,6)。這種盲鼻在兩城、龍山各地的陶罐上亦常見到。

碗類　2 件。分二式。

Ⅰ式：1 件(墓 1)。泥質紅陶。形制與平底的小碗相同,但底部有矮圈足。高 65,口徑 15.9,圈足高 0.6,壁厚 0.4 厘米(圖八,14;圖版叁,9)。

Ⅱ式：1 件(墓 3,上南邊)。泥質紅陶。手製,器厚重頗與缽形相同,口微斂,腹稍外鼓,下如矮圈足。高 8.2,口徑 16.5,壁厚 0.7—1 厘米(圖版叁,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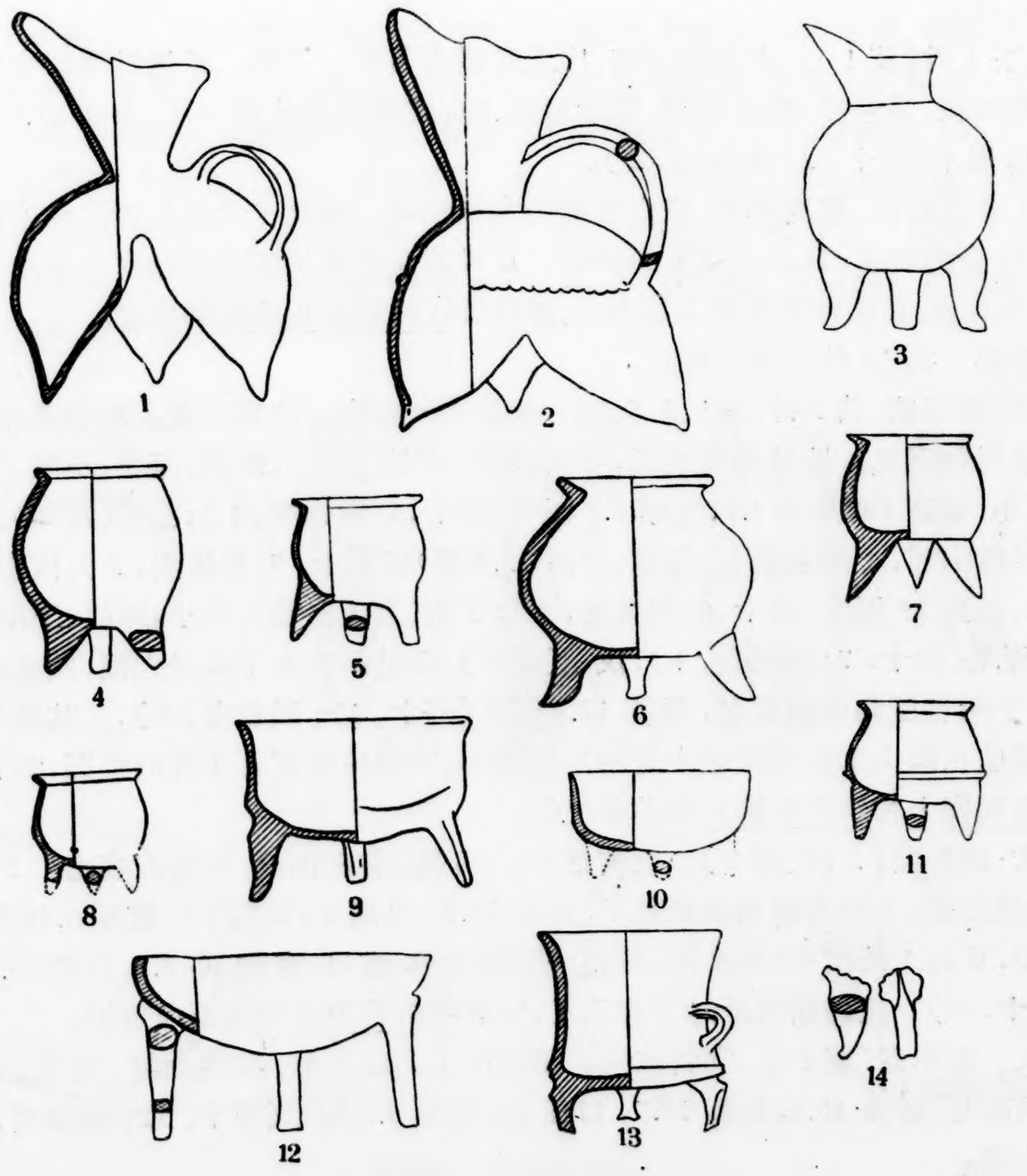
圖九　黑陶杯、陶豆

1. 陶杯(墓1)　2. 陶杯(墓4)　3. 陶杯(墓7)　4. 陶杯(墓3)　5. 陶杯(墓6)
6. 陶豆(墓5)　7. 陶豆(墓4)　8. 陶豆(墓6)　(1、3、4. 1/6,餘皆 1/8)

杯類　8 件。各墓均有出土。僅復原 5 件。均爲細泥黑陶。輪製磨光,黑色。爲陶器中最精美的。壁厚一般爲 0.1—0.2 厘米。器形上部爲敞口杯,腹稍內收,底部略有不同,柄空心,下有喇叭足。1 件柄部飾凹弦紋,下鼓呈球狀,飾圓形和三角形的鏤孔,通高 19.2,柄高 9.3,足高 0.6 厘米(圖九,1;圖版肆,1)。1 件形同,通高 19.5厘米(圖九,2;圖版肆,2)。1 件柄中部較細,下端稍粗呈錐狀,亦有鏤孔,通高 18.3 厘米(圖九,3;圖版肆,3)。1 件柄部作直管狀,上有弦紋,並飾三角形鏤孔,通高 22 厘米(圖九,4;圖版肆,4)。還有 1 件,柄直且短,無弦紋,僅有對稱的四個鏤孔,通高 18.9 厘米(圖九,5)。

這種高足杯以往很少發現。1958 年我們在曲阜進行復查試點時，曾見於東魏莊、大果莊和夏侯村。

豆類　5 件(墓4、5、6)。分泥質灰、紅陶兩種。手製。其形狀和裝飾大同小異。墓 5 的爲盤形敞口，圈足作喇叭形，足上部飾有相對稱的雙圓鏤孔。通高 17，口徑 26.8，壁厚 0.8 厘米(圖九，6；圖版伍，3)。墓 4 的與上相異處，僅唇稍折，傾斜的腹壁的弧度較圓滑，足上飾以三角形的鏤孔，體形亦較前者稍大，通高 20 厘米(圖九，7)。墓 6 的近同，惟喇叭足無鏤孔，通高 15 厘米(圖九，8)。此種豆與南京市北陰陽營的陶豆近似。




圖十　陶　器

1. Ⅰ式鬹(墓2,1/6)　2. Ⅲ式鬹(墓1,1/6)　3. Ⅱ式鬹(墓3,1/4)
4. Ⅰ式甲型鼎(墓7,1/8)　5. Ⅰ式乙型鼎(墓6,1/8)　6. Ⅰ式丙型鼎(墓7,1/6)
7. Ⅰ式丁型鼎(墓6,1/6)　8. Ⅰ式乙型鼎(墓3,1/8)　9. Ⅱ式鼎(墓1,1/6)
10. Ⅱ式鼎(墓1,1/8)　11. Ⅰ式戊型鼎(墓3,1/8)　12. Ⅲ式鼎(墓1,1/8)
13. 三足器(墓1,1/6)　14. 陶鬹足(墓3,1/8)

4.三足器

鬶類　4件。分三式。

Ⅰ式:2件(墓2、7)。夾砂粗紅陶。手製。現以墓2出土的爲例。器形作敞口,唇外折,有狹窄流,頸細,腹、足相合呈羊乳形,後足附一寬帶式的鋬。通高25.8,頸高7.5,壁厚0.33厘米(圖十,1;圖版陸,1)。

Ⅱ式:1件(墓3)。夾砂粗紅陶。手製。可惜破碎過甚已不能復原,現僅就圖樣和殘片來看,有流,頸不甚高而粗,腹作罐形,小平底,腹下附三實足,足近扁鑿式,但窄厚,寬等於厚的1/2,足根外面有棱角,正下面呈三角形,足尖扁而外撬。全高約26,壁厚0.6厘米(圖十,3、14)。

Ⅲ式:1件(墓1)。夾砂粗白陶,出土時微有黃色。手製。是這批陶器中唯一的白陶器。頸高而細,長窄流,腹足分開,鋬附於頸、腹,腹飾凸出花紋一周,通高27.9,頸高13.8,壁厚0.33厘米(圖十,2;圖版陸,2)。

以上各式的鬶,都與兩城、龍山等地的陶鬶相同。景芝Ⅰ式與上述二地羊乳式鬶足相近,但足腹合併製成,爲以往罕見的新型;Ⅲ式與曲阜夏侯出土的相同,惟景芝的頸高流長,這是相異處;Ⅲ式都不見於上述各地,而近於江蘇新沂花廳村的陶鬶。

鼎形器　共10件。分三式。

Ⅰ式:罐形鼎,共7件(墓1、3、6、7)。全是夾砂紅陶。均爲手製。形制基本相同,皆爲罐形下面附加三足。按其局部不同,可分五型:甲型(墓7),折唇,深腹,小底,下附厚扁鑿式足,襠小,通高18,足高4.7,壁厚0.7厘米(圖十,4;圖版叁,1);乙型(墓6),矮腹,最大徑凸出於腹中部,下附扁鑿足,寬襠,通高13.3厘米(圖十,5;圖版叁,2);丙型(墓7),折唇,鼓腹,通高15厘米(圖十,6;圖版叁,3);丁型(墓3南邊),型小,球腹,下附圓錐足,通高10.9厘米(圖十,7;圖版叁,4);戊型(墓3),腹壁斜直至下腹最大徑,此處綴飾凸出花紋一周,下附有棱角的扁鑿足,通高12.3厘米(圖十,11;圖版叁,5)。其他多同上述五型。這種鼎在龍山文化各遺址中是常見的器形,不過內中亦有少許的差別,如有棱角的扁鑿足與滕縣崗上和新沂花廳村的鼎足近似。

Ⅱ式:缽形鼎,2件(墓1)。泥質紅陶。手製,有刮削痕,加陶衣磨光。1件口稍侈,淺腹,腹壁近直,下附有棱角的扁鑿足,通高11.7,足高6,口徑15,壁厚0.45厘米(圖十,9;圖版叁,6);1件稍小,足全無,僅剩一圜底缽形,直口,直壁,高7.3,口徑15.4,壁厚0.8厘米(圖十,10)。這種鼎只是缽下加三足,它與新沂花廳村的缽形鼎近似。

Ⅲ式:盤形鼎(墓1)。泥質紅陶。製法同上。口微斂,腹淺如盤,圜底,下附三只棱角顯著的高足,通高15.8,足高10.5,口徑26,壁厚0.8厘米(圖十,12;圖版叁,7)。這式的鼎頗少見。

三足器　1件(墓1)。泥質紅陶。手製,刮削痕明顯,加陶衣。口侈,腹壁近直,中部微收,近底部有寬帶式小鋬,底附棱角極爲顯著的扁鑿足。通高13.2,足高3,口徑12,壁厚0.45厘米(圖十,13;圖版伍,6)。從器形看,所附三足不是爲了燒煮用的。

另外還有一些不能粘對復原的陶器,如平底器中還有一種泥質紅陶缽,斂口,腹淺,腹下收成小平底。又如一件圜底缽(墓6)與Ⅲ式鼎的形制一樣,惟無三足而已。其形制都

與龍山文化的有差別，但與仰韶文化的器形頗有相似之處。

非容器中僅蒐集到紡輪1件，還是殘半，形制平厚。也是這批陶器中所僅有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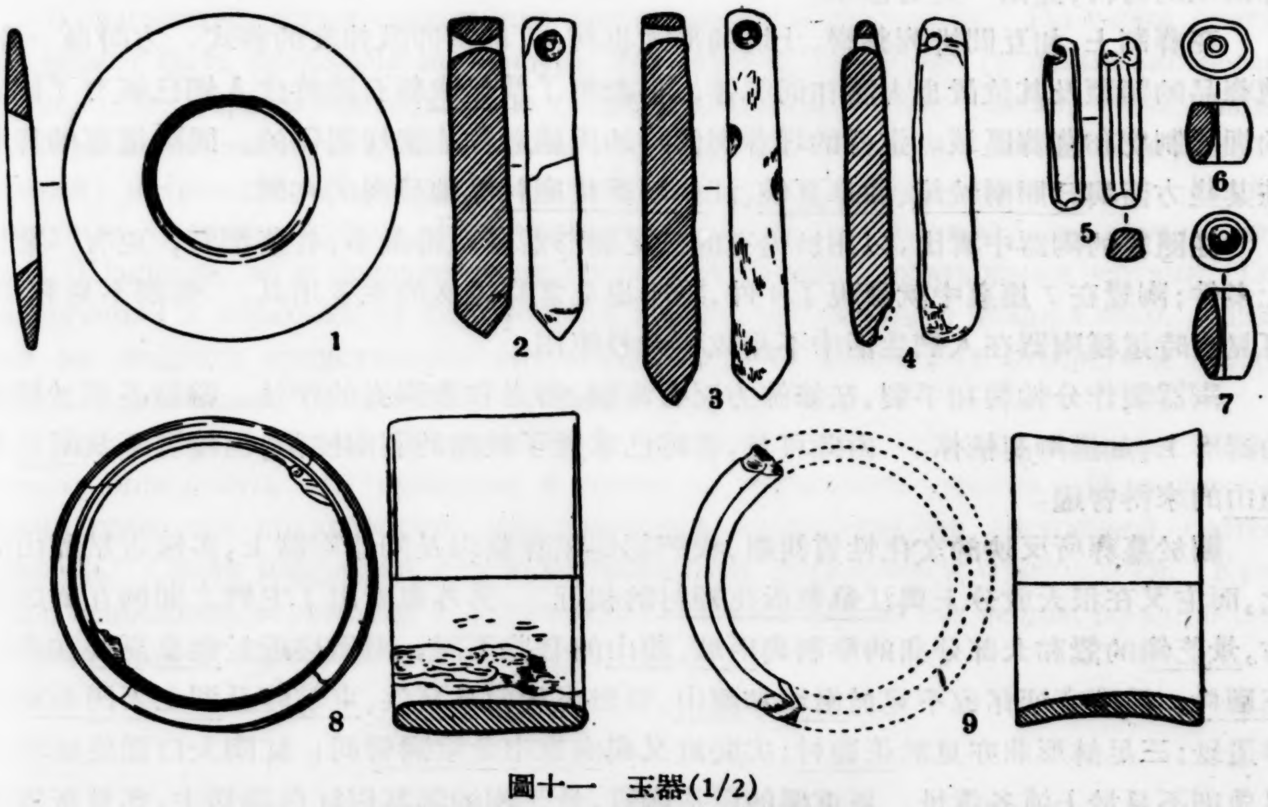
(二) 玉飾

有鐲和璧、墜、管形珠等。

鐲 2件(墓2、7)。作寬帶式。色澤與式樣略不同：墓2的色白間有黑斑點，壁近直，外徑6.8，壁厚0.5，寬3.85厘米(圖十一，8；圖版陸，4、5)；墓7的殘缺，色綠鮮艷，內含相當成分的雲母。與前者不同的是外壁中間內收，恰似束腰，外徑6.5，壁厚0.5，寬3.8厘米(圖十一，9；圖版陸，3)。

璧 1件(墓2)。質地堅硬，呈白色內中夾有綠色，鮮艷且有透明感，周邊並不甚圓，製做得外薄內厚。內徑一面大一面小，是由一面鑽透所形成的，外徑6.9，內徑一面3.5，一面3.3，相差0.2，面寬1.9，內壁厚0.55，外壁厚0.1厘米(圖十一，1；圖版陸，11)。

玉墜 4件(墓2出3件，墓7出1件)。墓2的較長，內有2件呈鷄骨色，1件爲煙灰色並有透明感；墓7的形小。其狀皆爲一端從四面磨成尖狀，一端穿孔。內中1件的穿孔磨去一半。大的長8.5，小的長3.7厘米(圖十一，2—5；圖版陸，7—10)。此種玉墜，曾發現於新沂花廳村墓葬中。




圖十一 玉器(1/2)
1. 璧(墓2) 2—4. 墜(墓2) 5. 墜(墓7)
6,7. 珠(墓4) 8. 鐲(墓2) 9. 鐲(墓7)

管形玉珠 3件(墓1、4)。墓1的體小，白色；墓4的較大，1件呈白色，1件呈煙灰色，兩端細而中間較粗，中孔由兩面穿透，一長1.9，一長1.3厘米(圖十一，6、7；圖版陸，6)。這種珠飾曾見於曲阜夏侯及新沂花廳村的墓葬中。

表二　隨葬器物登記表

| 墓號 | 陶 | | | | | 器 | | | | | 玉飾 | | | | 總計 | 備註 |
|---|---|---|---|---|---|---|---|---|---|---|---|---|---|---|---|---|
| | 缸 | 罐 | 尊 | 盆 | 碗 | 鉢 | 豆 | 鬹 | 鼎 | 杯 | 璜 | 璧 | 墜 | 珠 | | |
| 1 | 1 | 4 | | 1 | 2 | | 3 | 1 | 4 | 1 | | | | 1 | 18 | |
| 2 | | | 1 | | | | | 1 | | | 1 | 1 | 3 | | 7 | |
| 3 | 1 | 3 | | | 2 | | 2 | 1 | 3 | | | | | | 12 | 內中1碗1鼎位在南壁上面 |
| 4 | | 2 | | | 1 | | 2 | | | | | | | 2 | 7 | |
| 5 | | 3 | | | | | 2 | | 1 | | | | | | 6 | |
| 6 | | 2 | | | | | 2 | | 2 | | | | | | 6 | |
| 7 | | 6 | 1 | | 1 | 1 | 1 | 1 | 3 | | 1 | | 1 | | 16 | |
| 蒐集 | 1 | | | | | 1 | | | | | | | | | 2 | |
| 合計 | 3 | 20 | 2 | 1 | 6 | 2 | 12 | 4 | 13 | 1 | 2 | 1 | 4 | 3 | 74 | |

# 四、結　　語

上述7座墓葬出土的隨葬品數量是相當豐富的。由於我們對墓主人的居住址沒進行發掘，也還不够清楚它的位置，就很難對這些墓主人的生活情况作出分析。現僅就7座墓葬出土的材料，提出一些看法來。

在葬制上，相互間排列整齊，土坑的形式也統一，都爲仰臥伸直的葬式，方向也一致，隨葬品的類型及其位置也大體相同等等，都說明了景芝鎮新石器時代人們已經有了固定的埋葬制度和墓葬區域。這樣的埋葬與當時的氏族社會是密切關聯的。同時這裏的葬制在某些方面與日照兩城鎮、曲阜夏侯、江蘇新沂花廳村等地發現的相同。

從隨葬的陶器中看出，以用於燒煮的三足鼎形器發現得最多，各墓都有，更有一墓出土多件；陶鬹在7座墓中就發現了4件，證明也是當時燒煮的主要用具。惟獨不見有鬲，可見當時這種陶器在人們生活中不用或不大量使用。

陶器製作分輪製和手製，在修飾方面有刮削、磨光和着陶衣的作法。輪製多用於精美的器形上，如黑陶高柄杯。由此可見，當時已掌握了較高的製陶技術，但輪製不及兩城和龍山的來得普遍。

關於墓葬所反映的文化性質問題，我們認爲在葬制以及陶器形制上，多接近於龍山文化，而它又在很大成分上與江蘇新沂花廳村的相近。另外也看出了它們之間的互異的地方，景芝鎮的鬹和大部分鼎的形制與兩城、龍山的有些不同，而稍接近於曲阜夏侯和新沂花廳村；黑陶高柄杯也不見於兩城和龍山，而出現於曲阜夏侯、東魏莊及湖北天門石家河等遺址；三足鉢形鼎亦見於花廳村；尖底缸又與南京市北陰陽營同；紅陶大口圜底鉢形三足鼎則不見於上述各遺址。更重要的還是陶質，景芝鎮的陶器以紅色陶爲主，亦有灰陶和白陶等，兩城、龍山則以黑陶爲主並有白陶，而紅色陶、特別是細泥紅陶少見，雖然兩者都有黑陶和白陶，但與新沂花廳村和南京市北陰陽營的紅色陶到有些相同。因此，我們初步認爲景芝鎮墓葬的陶器，應該列於龍山文化系統之內。但它都不同於所劃分的兩城——龍山——辛村各期。至於它的年代問題，由於材料還感不足，尙有待於將來發掘較多的遺物來解决。

# РАСКОПКИ НЕОЛИТИЧЕСКИХ МОГИЛ В ПОСЕЛКЕ ЦЗИНЧЖИ УЕЗДА АНЬЦЮ ПРОВ. ШАНЬДУН

Ван Сы-л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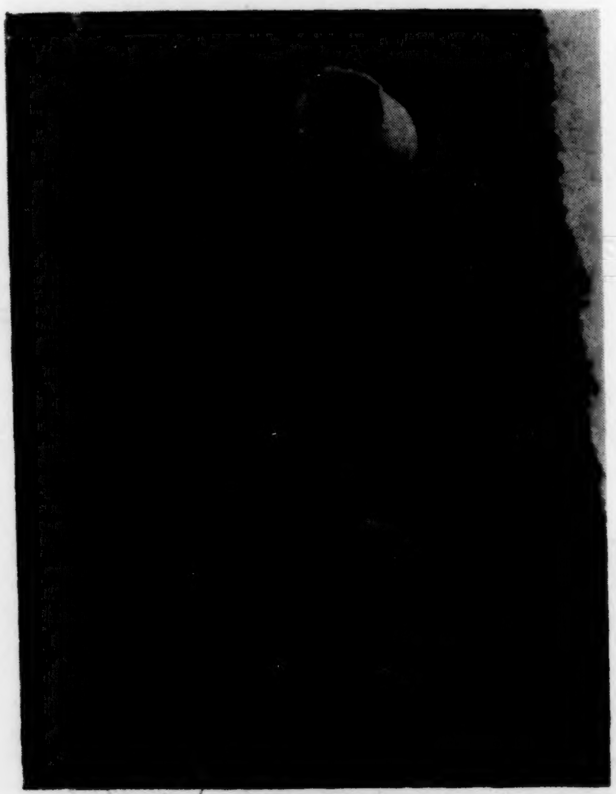
В 24 км к юго-востоку от уезда Аньцю находится посёлок Цзинчжи, примыкаемый к реке Ухэ своей западной частью. В 300 м к югу и немного к западу от этого посёлка находится керпично-черепичный завод. Именно под его площадью располагаются древние могилы, которые обнаружены рабочими завода при выкопке глины. В октябре 1957 г. семь из них были раскопаны.

Могилы расположены аккуратно. Все грунтовые ямы имеют прямоугольную форму. В каждой яме есть один костяк, лежащий на спине и в вытянут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Погребальный инвентарь расставлен в определенном порядке. Среди него керамика поставлена в большинстве своём направо от костяка и на месте немного дальше от его ног. В меньшей части могил встречены украшения из нефрита, поставленные на том же месте, где люди носили их при жизни. Орудия призводства здесь не были обнаружен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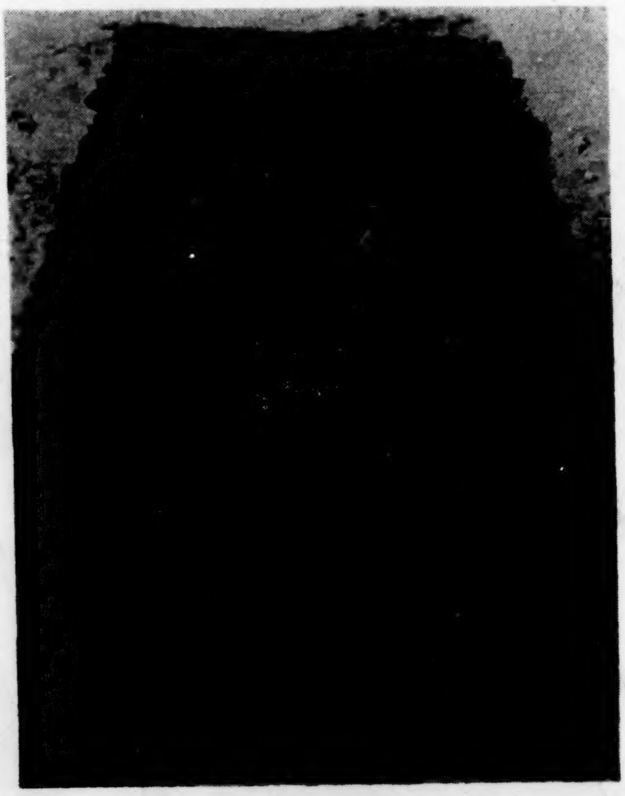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погребальных предметов является керамикой. По своим цветам она может быть разделена на чёрную, темносерую, красную (с примесью песка) и белую; по формам—остродонную (корчаги), плоскодонную (банки, тазы, чаши, миски), кольцевоногую (чаши, чары, доу—豆, т.е. тарелки с большой и длинной ножкой) и треногую (гуй—鬹, т.е. треостродонные котлы, триножники). Из них наилучше сделаны кубки. Вся керамика похожа на керамику из других мест пров. Шаньдун, но и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последней своими характерными чертами. Она аналогичнаи к керамике из Бэиньяньиня Накина и Хуатинцуя уезда Синьи. Изделия из нефрита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круглыми плоскими яшмами (с отверстием посередине), подвесками, браслетами, бусами и др.

Поселение, имеющее отношения к могилам, пока ещё не найдено; однако можно определить его примерно к северу от могильного участка. Расположение могил позволяет предпологать, что покойники погреблены по постоянной системе похорон. Среди найденной керамики наибольше встречаются триножники. Культура, нашедшая отражения в этих могилах и добытых из них вещах, по-видимому,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к Луншань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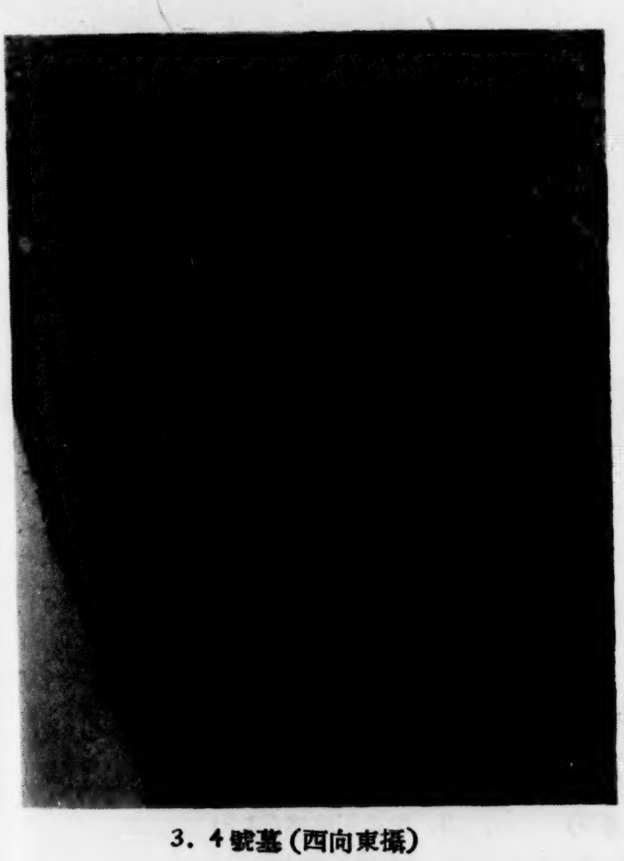
# 圖 版 壹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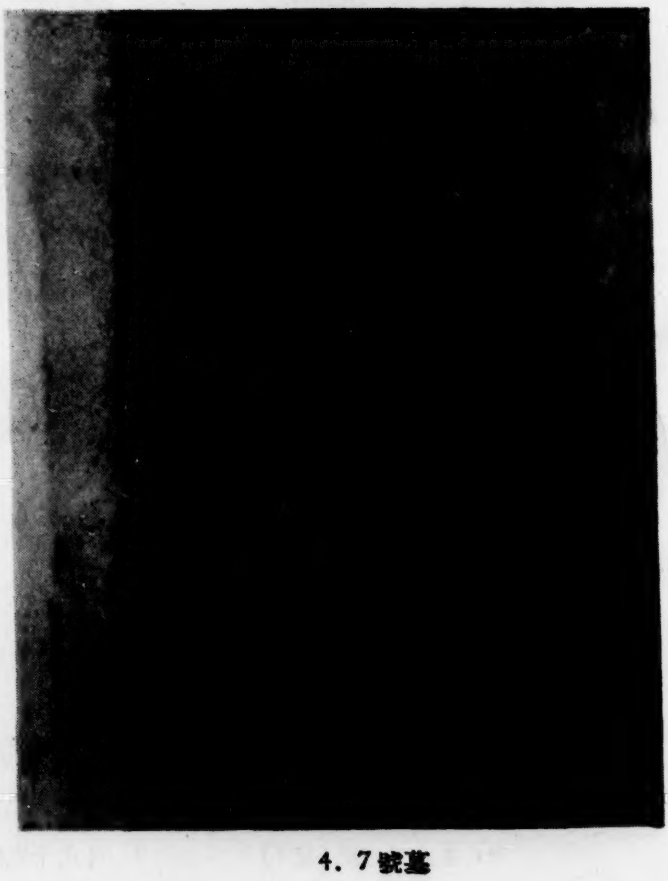
1. 1號墓(由西向東攝)



2. 5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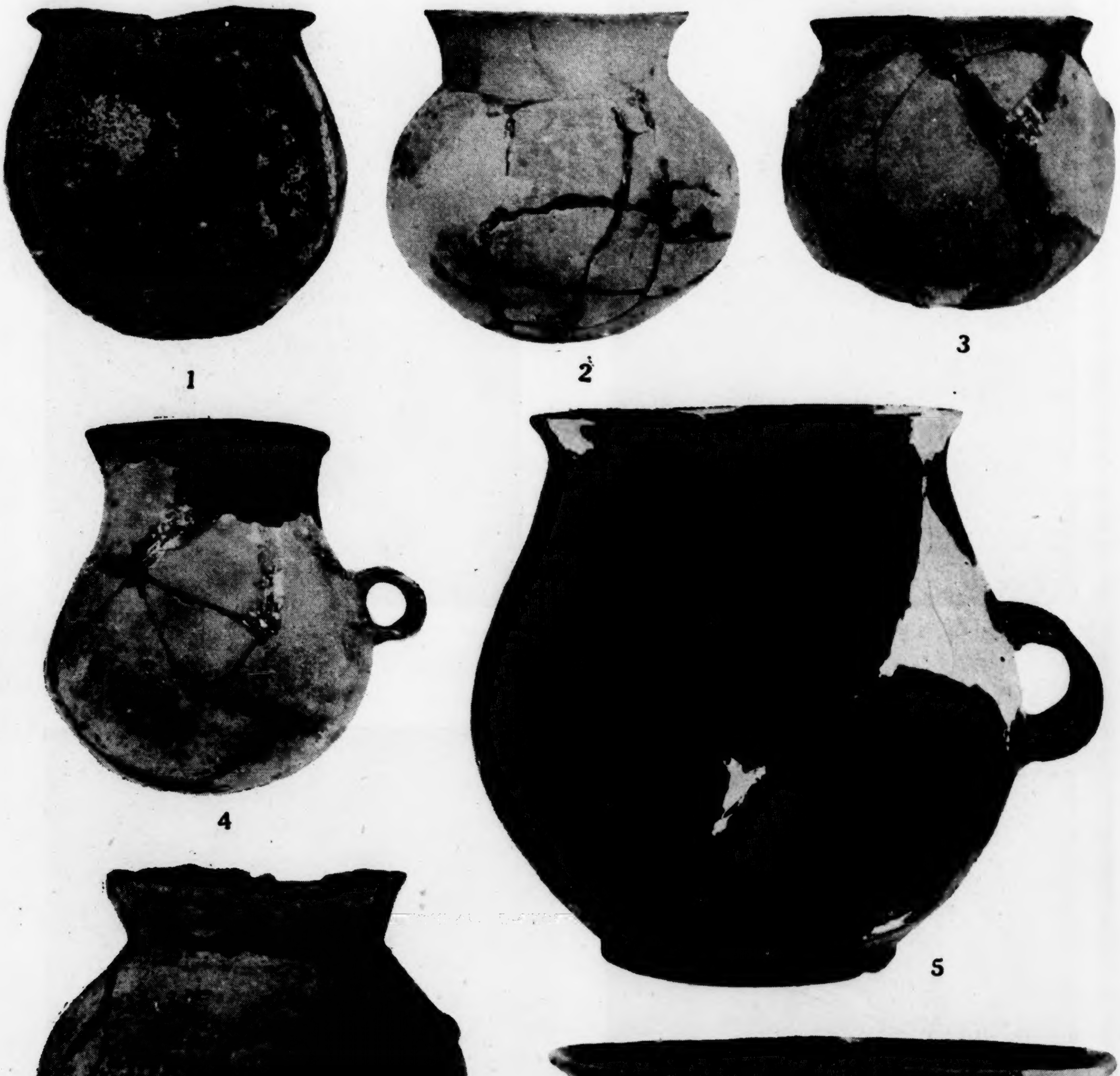
3. 4號墓 (西向東攝)



4. 7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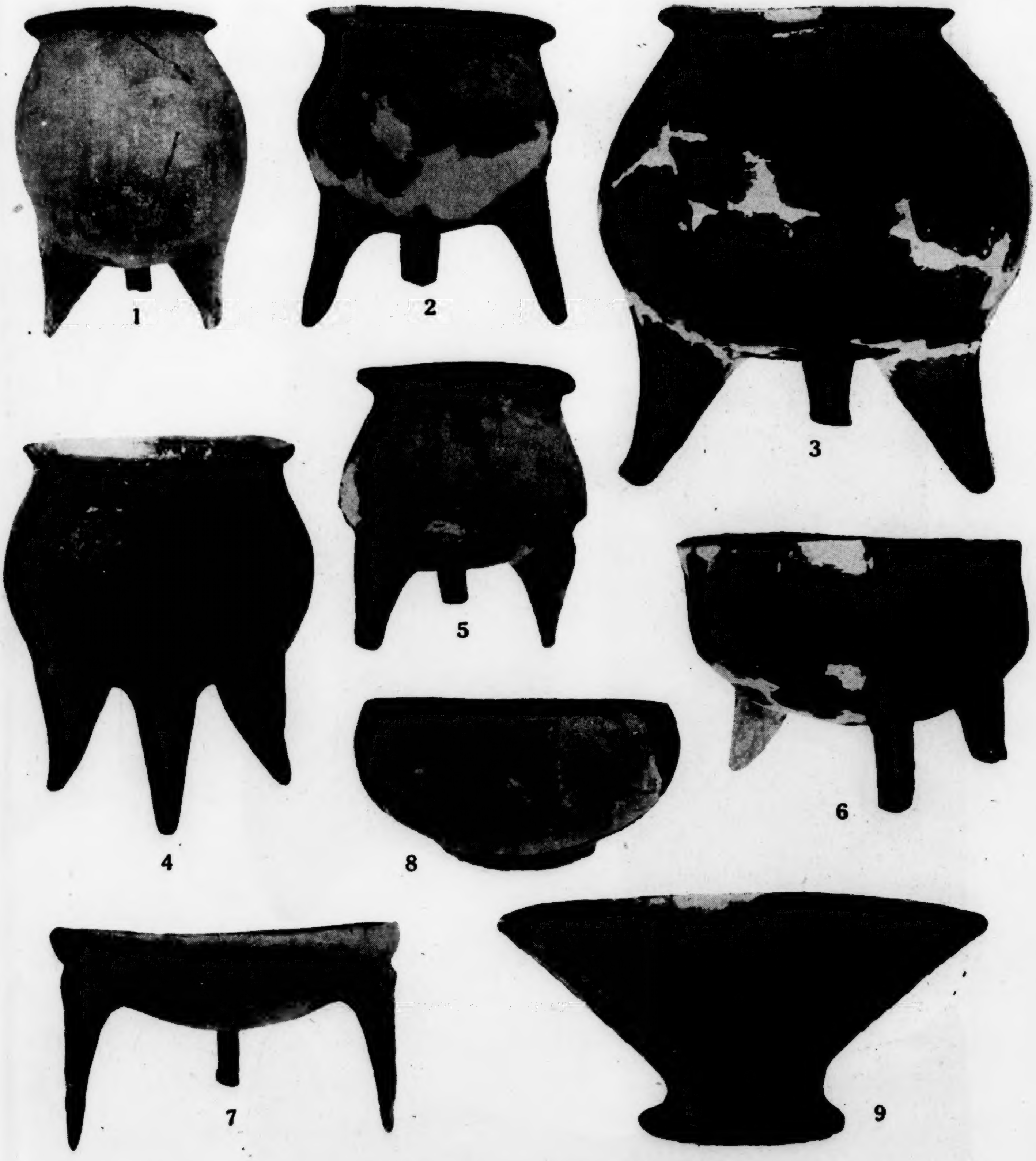
山東安邱景芝鎭新石器時代墓葬隨葬品分佈情况

圖 版 貳 (II)




山東安邱景芝鎭新石器時代墓葬出土陶器

1. Ⅱ式平底罐(墓1)　2. Ⅲ式平底罐(墓3)　3. Ⅳ式平底罐(墓7)
4. Ⅰ式平底罐(墓5)　5. Ⅰ式罐(墓4)　6. Ⅱ式罐(墓3)
7. 陶碗(墓1)



山東安邱景芝鎭新石器時代墓葬出土陶器

1. I式甲型鼎(墓7)　2. I式乙型鼎(墓6)　3. I式丙型鼎(墓7)　4. I式丁型鼎(墓6)
5. I式戊型鼎(墓3)　6. II式鼎(墓1)　7. III式鼎(墓1)　8. II式碗(墓3南壁)
9. I式碗(墓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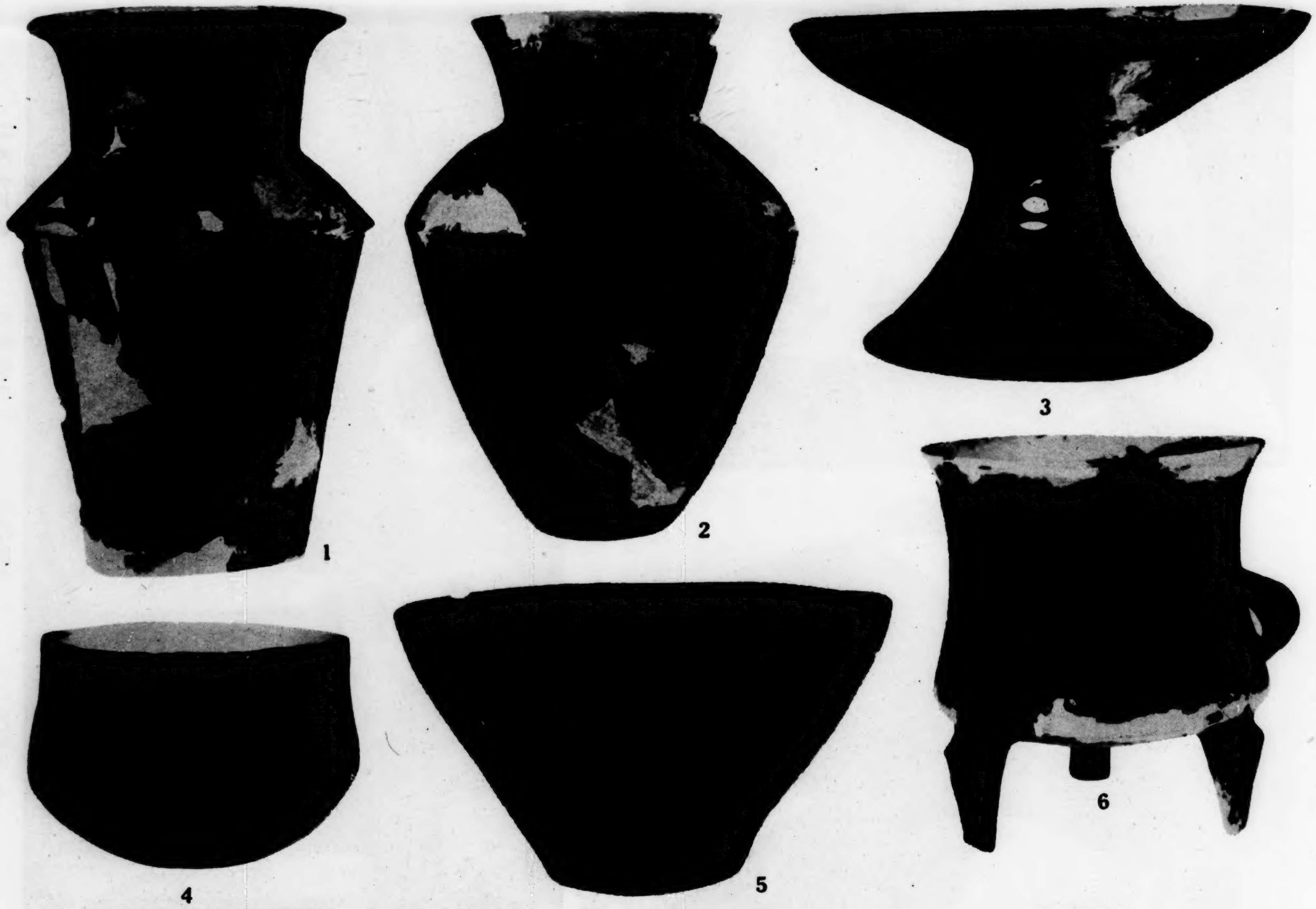
圖版肆 (IV)

1　　2　　3　　4

山東安邱景芝鎭新石器時代墓葬出土陶器

1. 高柄杯(墓1)　2. 高柄杯(墓4)　3. 高柄杯(墓7)　4. 高柄杯(墓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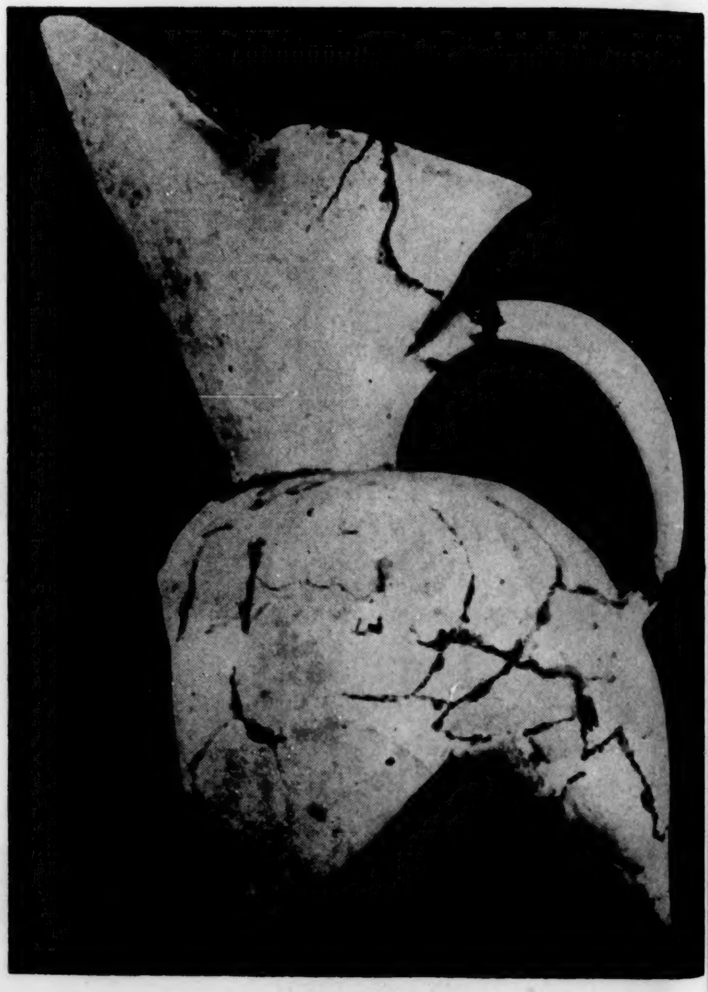
圖版伍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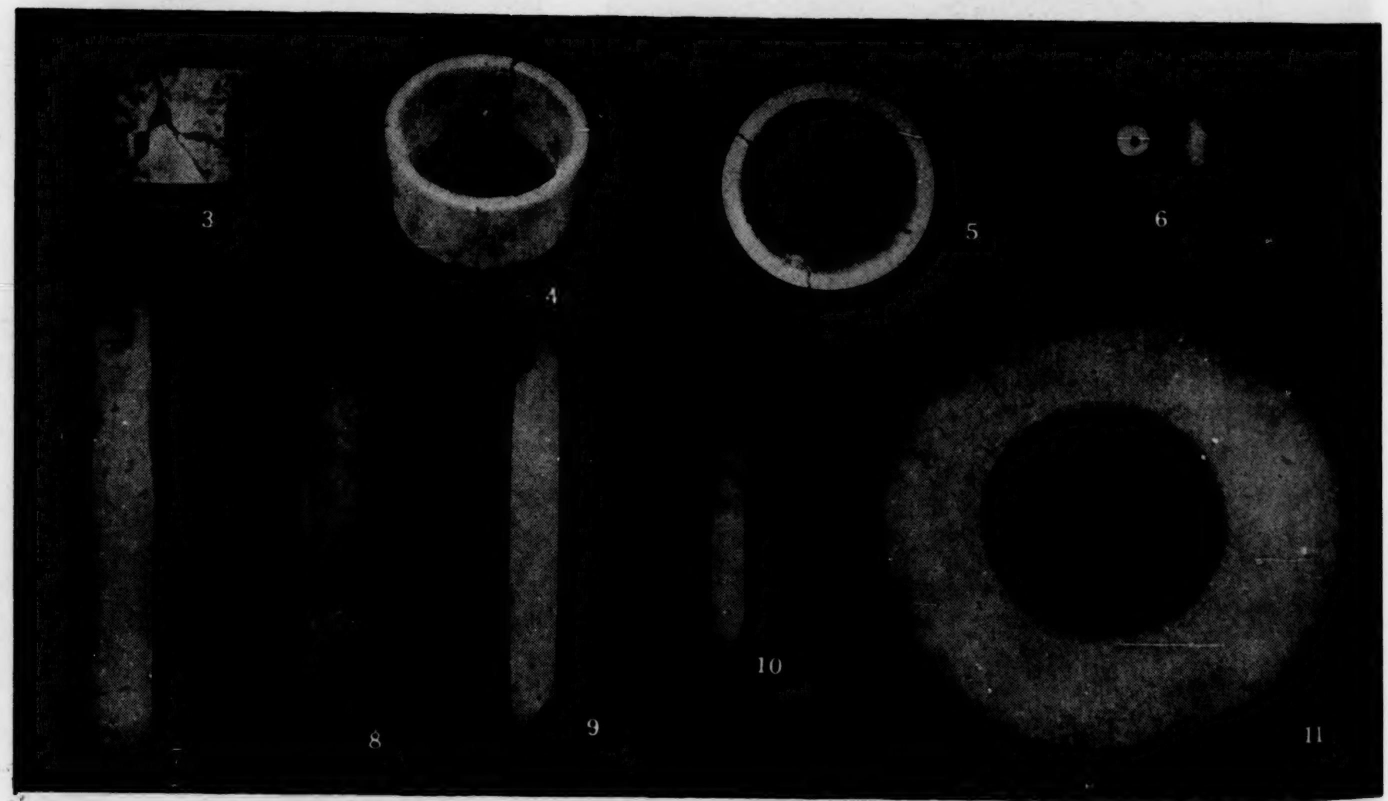

1. 尊形器(墓2)　2. 尊形器(墓7)　3.豆(墓5)　4. 鉢(蒐集)　5. 盆(墓1)　6. 三足器(墓1)

# 圖 版 陸 (VI)

1. I式鬶 (墓2)



2. Ⅲ式鬶 (墓1)




3. 玉鐲(墓7)　4. 玉鐲(墓2)　5. 玉鐲(墓2)　6. 玉珠(墓4)
7—10. 玉墜(墓2、7)　11. 玉璧(墓2)

# 江漢平原新石器時代
# 紅燒土中的稻穀殼考查

丁　穎

（中國農業科學院）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江流域考古隊於1955年起，在武昌西150公里的京山縣屈家嶺發掘出新石器時代的紅燒土中的稻穀殼很多。其後又在天門縣石家河（武昌西110公里）和武昌洪山放鷹台等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續有發現。同時出土的石刀、石斧和陶器等很多。這三個地方都在廣闊的江漢平原範圍內，地勢約高出海平面50—100米，適於農耕活動。考古隊綜合其它出土遺物，認爲這一發現應屬於新石器時代末期原始父系氏族社會時代，約比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爲晚，距今尚不及四千年。據考古隊的意見，這個紅燒土是新石器時代末期建築物的主要材料，即將穀殼和草類羼入泥中，作成房子後，爲了更加牢固，特加火燒成紅色堅硬的土塊，因而形成紅燒土。據武漢大學生物系的化學檢定結果，這些穀殼以矽的成分爲主，因矽的化合物是很牢固的，所以能長期保存（據考古隊通訊）。這些羼入土中的穀殼有很多斷碎的，也有少數相當完整的（圖版壹，1），還有不少斷碎的穀芒，間有一些稃屑。這些紅燒土塊和一些圖片，由該隊張雲鵬同志送給我的，希望將這些穀殼加以考查。現將考查結果報告於下。

## 一、穀　殼　形　態

羼在土中的穀殼，一般可以看到淡稃黃或灰稃黃色，與當今栽培的品種相同。粒形如圖（圖版壹，1；圖版貳，1—3）。把碎片放大，可以看到稃面有齊整格子形中的顆粒狀突起，稃稜和稃間有顯著的茸毛，稃端有芒的斷痕（圖版貳，4、5），這似乎是一個成熟未完全的穀殼粒。從芒的斷片看（圖版貳，6），芒是很粗長的。護穎僅見痕跡。

根據較爲完整的10個穀殼標本（圖版貳，7）的測定結果（表一）：最長的7.5，最短的6.8，平均6.97毫米；粒幅最大的3.8，最小的3，平均3.47毫米；長幅比最大的2.33倍，最小的1.84倍，平均2.01倍。

表一　紅燒土中的穀殼粒形測定

| 標　本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平均 |
|---|---|---|---|---|---|---|---|---|---|---|---|
| 長（毫米） | 7.0 | 7.0 | 7.5 | 7.0 | 7.0 | 6.8 | 7.0 | 6.8 | 6.8 | 6.8 | 6.97 |
| 幅（毫米） | 3.5 | 3.5 | 3.5 | 3.5 | 3.0 | 3.5 | 3.8 | 3.4 | 3.5 | 3.5 | 3.47 |
| 長幅比（倍） | 2.00 | 2.00 | 2.14 | 2.00 | 2.33 | 1.94 | 1.84 | 2.00 | 1.94 | 1.94 | 2.01 |

## 二、考 查 結 果

從圖片的稃毛、粒形和標本測定看，這些谷粒當屬於粳稻，且在我國是比較大粒的粳型品種。一般秈粳的穀粒區別：秈（秈）的穀粒多長歪橢圓形，稃端無芒或有少數的短芒（如淡水稻或鹹水稻有長芒的很例外），稃面茸毛少而短；粳（粳）的穀粒多短圓形，腹背兩面的長短相稱，稃端有長芒，稃端茸毛既多而且長（表二）。

**表二　秈粳區別表**

| 秈 | 粳 |
|---|---|
| 穀粒多長歪橢圓形，稃面茸毛少而短，芒無或少而短。 | 穀粒多短圓形，腹背相稱，稃端有長芒，稃面茸毛多而長。 |
| 糙米多長形，間有短圓粒則多白肚，粒中含糖少，味較淡，黏性弱。 | 糙米多短圓形，粒多玻璃色，中含糖分較多，味較甘，黏性強。 |
| 葉多長大，綠色淡，茸毛多，中肋基部毛特密生。 | 葉多短小，綠色濃，茸毛少，近中肋處無毛。 |
| 多莖高大，穗梗短直，脫粒較易。 | 莖多矮小，穗梗細硬彎垂，脫粒較難。 |

根據我們所測定的現在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秈稻 3509 個品種，粳稻 114 個品種的結果，秈稻長幅比在 1.75—3.60 之間，平均 2.38倍；粳稻在 1.60—2.55 之間，平均 1.95倍。

**表三　現在華東栽培的粳稻粒形**

| 早　粳 | 長 | 幅 | 長/幅 | 晚　粳 | 長 | 幅 | 長/幅 |
|---|---|---|---|---|---|---|---|
| 崑山 900 | 6.75 | 3.61 | 1..87 | 雲和早粳穀 | 7.08 | 3.62 | 2.00 |
| 丹陽光殼粳 | 7.02 | 3.52 | 2.00 | 崇明嶜子晚 | 7.34 | 3.63 | 2.02 |
| 崑山瀋陽粳 | 7.18 | 3.53 | 2.03 | 五夫雲晚粳 | 7.41 | 3.55 | 2.08 |
| 崑山黃胖子 | 7.72 | 3.79 | 2.04 | 雲和大白穀 | 7.50 | 3.47 | 2.16 |
| 崑山涿州稻 | 7.62 | 3.64 | 2.09 | 9298 | 7.19 | 3.31 | 2.17 |
| 松江白稻 | 7.17 | 3.43 | 2.09 | 麗水百年粳 | 7.76 | 2.64 | 2.94 |
| 崑山白香粳 | 7.69 | 3.57 | 2.15 | | | | |
| 飛來鳳 | 7.26 | 3.33 | 2.18 | | | | |
| 松江鐵粳青 | 7.90 | 3.46 | 2.28 | | | | |
| 紫金箍 | 7.90 | 3.46 | 2.28 | | | | |
| 八十子 | 7.16 | 2.99 | 2.39 | | | | |
| 崑山鐵耙子 | 8.28 | 3.39 | 2.44 | | | | |

註：麗水百年粳似秈稻

單位：毫米

就現在看法，這些標本不可能屬秈型品種。據現在華東栽培的粳稻 18 個品種的測定結果（表三），與上列紅燒土中的粒形類似的很多；也有與下述漢墓出土的稻谷粒形類似的，可見距今三千多以至四千年前，在江漢平原栽培的品種粒形與今天栽培的粳型品種最爲相近。

查 1953 年洛陽漢（公元 25—219）墓出土的稻谷形狀比江漢平原出土的更長大些，稃面方格條紋和稃毛與江漢平原出土的同樣顯著（圖版壹，2）；這與日本中尾佐助的檢查

結果稱爲無稃毛的不同(見考古學報 1957 年 4 期)。根據稃毛和粒形,我認爲漢墓出土的穀粒當屬於粳稻而非秈稻。

## 三、推　　論

據江漢平原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紅燒土中的穀殼,可以肯定約距今三、四千年前,在這個大平原裏已有不少的粳稻栽培,這可能與上述漢墓出土的和當時分佈於黃河流域的粳稻類型有一定的關係;同時也使漢代典籍說到稻的多稱爲"粳",得了一些具體證明;和根據外國古籍,認定古代在黃河流域所栽培的水稻品種當以粳爲代表的論定(參閱農業學報 1957,8:3),得了一些有關的事實根據。相信今後在長江和黃河流域可能發現的這類出土遺物一定不少,這有造於我國古代農業文化和史前期文化發展的研究也不少。

本文中的穀殼檢查由廣東農業科學研究所錢詠文同志協助進行,圖片攝映由華南農學院吳炎龍同志協助進行,謹此提明。

# NOTES ON THE NEOLITHIC RICE HUSKS UNEARTHED IN HUPEI

TING YING

Since 1955, Neolithic rice husks contained in baked red clay (Fig. 1), have been successively unearthed by the Yangtze Valley Archaeological Team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cademia Sinica at the following sites in Hupei: Ch'ü Chia Ling (屈家嶺) in Chin Shan County (京山縣); Shih Chia Ho (石家河) in Tien Mên County (天門縣) and Fang Ying T'ai (放鷹台) in the city of-Wu Han (武漢市). The results of an examination of ten relatively complete husks indicate that the average grain shape is 6.97 mm. long, and 3.41 mm. wide, with a length to width ratio of 2.01 (Tab. 1). On the husk surface, there are uniform square-shaped granular convexes. Prominant fine hairs appear on both the husk surface and the ridges. In the baked red clay short and big awn fragments are observed, (Fig. 2, 3 and 5).

The appearance of these rice husks resembles the Keng subspecies (O.S.f. Spontanea Roschev. subsp. Keng Ting) of the present day; but differs entirely from the Hsien subspecies (O.S.f. Spontanea Roschev. subsp. Hsien Ting). In some Hsien varieties, there are round and large grains with stiff and rough awns; but plentiful growth of fine long hairs on the husk surface has never been reported. From the practice of the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cultivated rice plants to-day, it is readily concluded that the rice husks in the baked red clay belong to the Keng varie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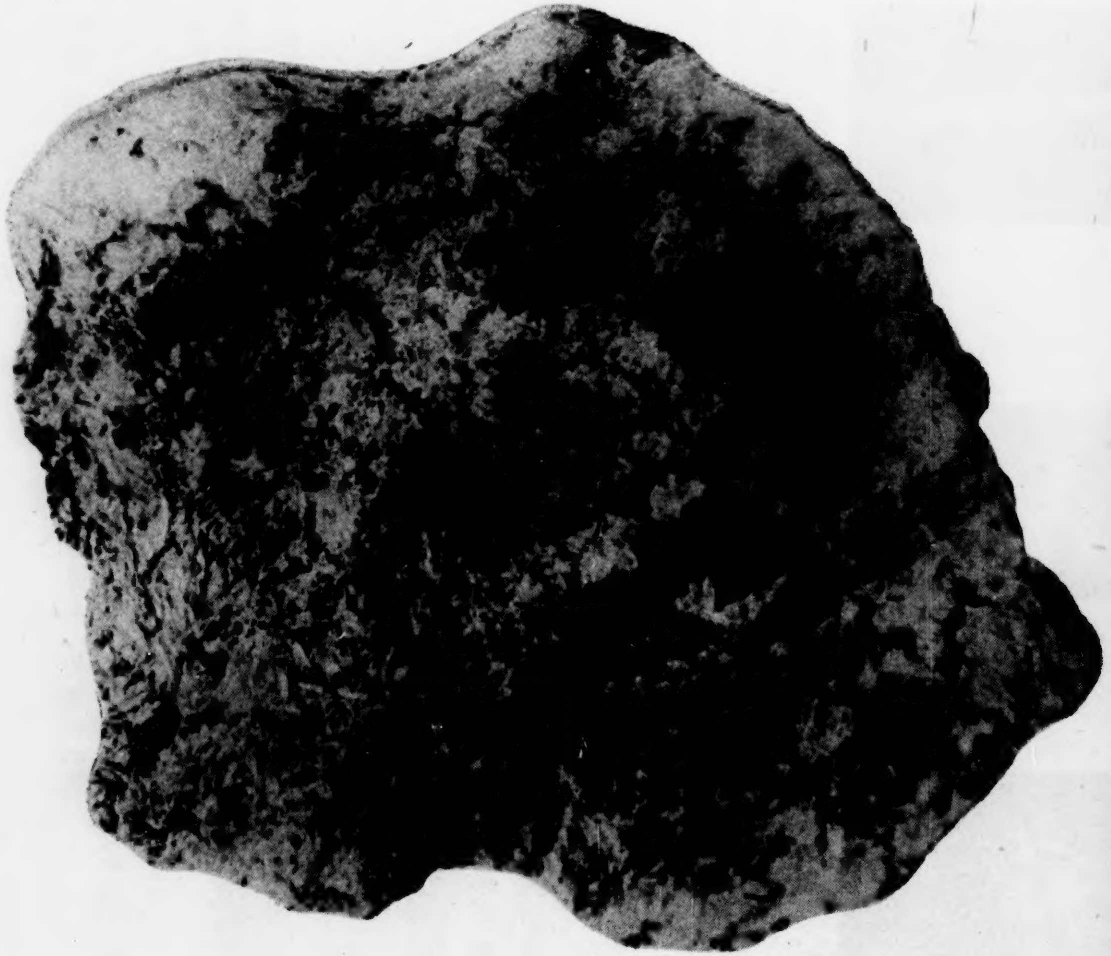
Other relics found in the Han Dynasty (25—220 A. D.) tombs of at Loyang in 1953

*Baked red clay is a kind of ancient time construction mateaial. It is made by mixing some rice straws and grain husks with the mud to form a wall-building material, whidris then baked for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firmness and durability,

also contain rice husks. The shape and hair growth of these husks indicate that they are likewise of the Keng type (Fig. 6).

According to the study of the Expedition, these excavated relics probably belong to some primitive clans of the late Neolithic which are later than the Yang Shao Culture of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This seems to indicate that the Keng varieties were cultivated on a considerable scale in Hupei at a very early date. The present investigations show that tha Keng varieties of Hupei may have a certain pedigree relationship with those found in the Han tombs of Loyang and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as well as with those discovered at the Yang Shao Sites. It is believed that more finds of such rice husks will be reported from both the Yangtze and Yellow River Valleys. Further studies based on such material will throw much new light up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ice cultivation and agricultural achievements.

## 圖版壹 (I)



1. 湖北京山屈家嶺出土羼入穀殼的紅燒土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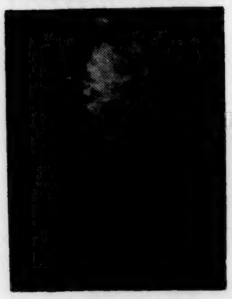
2. 洛陽漢墓出土穀粒形、稃面方格和稃毛(放大 30 倍)

# 圖 版 貳 (II)

1. 谷殼(放鷹台)

2. 谷殼(屈家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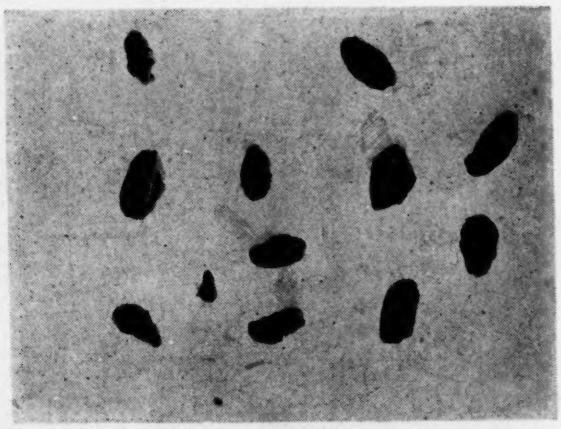
3. 谷殼(放鷹台)



4. 稃面方格、稃毛和稃端斷痕

5. 稃面一部分(放大36倍)

6. 谷粒上的芒(放大18.9倍)



7. 谷殼(右二行放鷹台,左二行屈家嶺)

湖北放鷹台、屈家嶺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谷殼

# 關於江蘇的原始文化遺址

蔣纘初

（南京大學歷史系）

解放十年來，由於黨和政府的重視，江蘇的考古工作隨着各項基本建設的蓬勃開展而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就原始文化遺址的發現數量來說，目前已經達到兩百多處，爲解放前的五十倍。[1] 其中試掘和發掘過的遺址，已經有了卄一處。因此，現在已有可能對江蘇的原始文化開始進行綜合的研究。由於發表的材料還不够充分，本文只就有關江蘇原始文化遺址的分佈問題、文化類型問題以及年代問題，發表一些初步的看法。

## 一、遺址分佈和發掘簡況

爲了叙述的方便，我們按照地理上的區劃，分爲徐淮、南京、鎮(江)揚(州)、蘇(州)(無)錫四個區域來說明。

### (一) 徐淮地區

這一地區位於淮河的下游，並有廢黄河(淮河故道)橫亘在北部。在解放以前，這裏從未發現過原始文化遺址。現在已經發現了泗洪下草灣、徐州高皇廟、銅山蔡邱和台上村、邳縣黄樓村、淮安青蓮崗和菱陵集、漣水笪巷、新沂花廳村和三里墩、宿遷青墩和井兒頭以及新海連的玉帶河等十三處遺址。其中經過試掘和發掘的有高皇廟、青蓮崗、花廳村和三里墩四處，泗洪下草灣則是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化石的發現地點。

高皇廟遺址位於徐州附近的微山湖畔。發掘的結果說明它有上、中、下三層文化，上層是戰國秦漢到隋代的文化層，遺物多雜亂；中層是商代以至西周的文化層；下層是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層。其中下層文化的特點基本上和山東典型的龍山文化相同。[2]邳縣黄樓村遺址的文化性質亦與此相近。

青蓮崗遺址位於淮安東北的廢黄河之南。其文化層大部分處於地面下 2 米厚的黄褐色淤土下面，出土遺物的特點雖和“龍山文化”有相似之處，但具有更多的地方特點。[3]因此，它應該是一種受到“龍山文化”濃厚影響下的江蘇土著文化。附近的菱陵集和漣水的笪巷遺址，文化性質亦與此相似。

---

1) 解放前江蘇境內發現的原始文化遺址，只有南京的栖霞山、北陰陽營、蘇州越城和金山戚家墩四處，武進奄城則是春秋戰國時代的遺址。

2) 江蘇省文管會：徐州高皇廟遺址清理報告，考古學報 1958 年第 4 期。

3) 華東文物工作隊：淮安縣青蓮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査報告，考古學報第九册，1955 年；南京博物院：江蘇淮安青蓮崗古遺址、古墓葬清理簡報，考古通訊 1958 年第 10 期。

花廳村遺址位於新沂縣西南的馬陵山中。遺址分居地和葬地兩部分。遺物的特點和青蓮崗遺址相近，但數量更爲豐富。有大量的扁平帶孔石斧、扁平石碑和石鑿，粗砂紅陶的鼎和鬶，圈足鏤孔豆和雙耳陶壺，以及豐富的玉、石飾品等。在墓葬形制方面，更可以補青蓮崗的不足。在隨葬品的類別上，男女之間已有區分；在數量方面，死者之間也有多寡的不同，顯示出一種具有時代特點的葬俗。[1]

三里墩遺址位於新沂縣的南面 35 公里。遺址文化層可分上、下兩層：上層遺物以粗砂灰陶的鬲、甗和大量的骨蚌器，以及銅斧範、卜龜板等爲代表；下層以粗砂紅陶的鼎和黑陶的杯、壺爲代表，還間有陶鬶碎片發現。[2] 第一次試掘時因見上層所出的陶器形制與西周相近，且有一種鹿角製的戈飾與濬縣辛村衛侯墓所出的同樣，因而把上層暫定爲西周，下層暫定爲商代或略早，並肯定它們都是和龍山文化有密切關係的。經過第二次的發掘，並與徐州高皇廟出土的遺物對比以後，上層似可提前到商代，其下限仍爲西周，下層亦可和龍山文化晚期的遺址相比。其堆積情況約和高皇廟遺址的中層和下層相當。附近的宿遷青墩和井兒頭遺址大體上也和三里墩的文化特點相近。

（二）南京地區

這一地區（包括江寧、江浦和六合三縣），有長江、秦淮河和玄武湖等流經境內，大小丘嶺亦較多。在解放前只發現過栖霞山甘家巷附近的兩處遺址和南京城內的北陰陽營遺址。解放十年來，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等單位在這一地區發現的遺址已達九十處左右。這些遺址絕大部分都位於長江兩岸、玄武湖四周和秦淮河的中、下游。

位於長江北岸的有：大廠鎮附近的廟山和團山，浦鎮附近的花旗營小山子、護國庵和高里店，江浦橋林鎮附近的蔣城子、湖裏鏟等十多處遺址。其中廟山遺址係南京博物院在 1958 年的基建取土工程中發現，文化層由黃灰土、蚌殼及螺螄殼構成。發現的遺物在陶器中以粗砂紅陶居多，灰陶和黑陶較少；器形有盆、缽、豆、盤、釜、罐，以及陶杵和網墜等，但未見三足器；表面裝飾有磨光、加紅黑陶衣、鏤孔和凸飾等，很像青蓮崗陶器的作風。石器只見斧、碑，骨蚌器則比較豐富，常見多孔的蚌刀。在一件陶器蓋上，我們還發現了稻殼的痕跡。這處遺址的時代似較附近的大廠鎮、浦鎮、橋林鎮諸遺址爲早。

位於長江南岸的，由東北向西南看，有栖霞山和堯化門之間的上花林團山和平山村後園頭，堯化門和燕子磯之間的方山墩和前頭山，邁臯橋的何家巷，小市安懷村的柴山，鼓樓崗下的北陰陽營，西善橋的泰岡寺，板橋鎮附近的喬家山、大小龍山和東西神子山等二十多處遺址，並且緊密啣接着安徽省馬鞍山市慈湖鎮附近的一系列遺址。其中經過發掘的有何家巷、柴山和北陰陽營三處，而以北陰陽營最爲典型。

北陰陽營遺址位於南京城中部鼓樓崗的西面。1955 至 1958 年間，由南京博物院連續作了四次發掘工作，基本上已把文化堆積掘完。在第一、二次發掘中，曾把文化層暫定爲兩次堆積，下層主要是葬地，遺物以粗砂紅陶鼎、帶彩陶器、長方形扁平石碑、方柱形石鑿和玉飾品爲主，與青蓮崗和花廳村出土遺物的特點相近；上層主要是居地，遺物以粗砂紅

---

1) 南京博物院：新沂花廳村新石器時代遺址概况，文物參考資料 1956 年第 7 期。
2) 蔣纘初：江蘇新沂縣三里墩遺址試掘記，考古通訊 1958 年第 1 期。

陶的鬲、甗，泥質印紋紅陶的盌、盆、缽、罐，少量的幾何印紋硬陶，較多的石錛和石刀、石鐮，以及銅箭頭和卜骨、卜龜板等爲特徵。[1]在第三、四次發掘中進一步肯定了遺址有四個文化層，分別代表宋至明清、春秋戰國以及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堆積。在第四層葬地的東部，發現了同期的居地，有燒土構成的住所的遺跡。在第三層中發現了幾處燒製陶器的窯址和煉銅用的帶柄粗陶勺，證明遺址居民已經完全掌握了煉銅的技術。這四個文化層的確定，爲研究江蘇原始文化的年代問題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材料。

1956 年發掘的安懷村柴山遺址[2]和 1957 年發掘的邁皋橋何家巷遺址亦均與北陰陽營遺址的第三層文化相同。長江北岸的遺址除廟山以外，大體上也相當於北陰陽營的第三層文化。

位於玄武湖四周的有：鎖金村、鍐家山、四明山、朱家山、氣象站山和操坡山六處遺址。其中鎖金村遺址是比較典型的。

鎖金村遺址位於玄武湖的東北岸。1956 年和 1957 年連續發掘了兩次。[3]發掘的結果說明這裏的文化層均屬同一時代的堆積，並且相當於北陰陽營的第三層文化。發現的遺跡和遺物除與北陰陽營第三層文化相同的外，在文化層的底部還有少數的墓葬發現，多爲單人仰身葬，很少或者沒有隨葬品，如在一個女性墓內只有半個紡輪隨葬，小孩則埋葬在住所下面的長方形小坑中，沒有隨葬品。這顯示出當時的葬俗已與北陰陽營第四層文化有很大的不同。此外，還發現了大量石料、石片和半成品的堆積現象，青銅器除箭頭外，還有刀(削)和魚鈎，陶祖的發現也爲這一時期的宗教信仰和年代問題提供了線索。

其餘操坡山等五處遺址，根據地面採集的遺物看來，均與鎖金村的文化性質相同。

位於秦淮河中下游的遺址數量最多，總計在六十處左右。從北往南看，有南京中華門外的窨子山、橙子墩、竇于墩，大定坊的神子山，東善橋的前花墩和溝墩，陶吳鎮的肥料山和後頭山，橫溪的葡萄灘船墩，秣陵關的神墩和大坟灘，解溪的蛇墩和磨子山，湖熟鎮的老鼠墩和前崗，以及土橋附近的露水墩和茅前墩等，其中老鼠墩、前崗、窨子山、神墩和溝墩五處遺址都經過試掘。

老鼠墩和前崗遺址均位於江寧縣湖熟鎮的西面，秦淮河的北岸，1951 年南京博物院在這裏作了試掘工作，所謂“湖熟文化”的名稱也卽由此而定的。[4]其中老鼠墩出土的遺物比較豐富，有粗砂紅陶的鬲、甗，扁平石錛、帶孔石斧和扁棱形石箭頭等，還有較多的魚骨、鹿角、狗牙和螺螄殼等。前崗出土的遺物則比較貧乏。現在看來，這兩處遺址的特點也不超過北陰陽營第三層文化和鎖金村遺址所代表的文化特徵。

南京中華門外的窨子山遺址、秣陵關的神墩和東善橋附近的溝墩遺址，均經試掘，其文化性質亦與北陰陽營第三層文化相近。

(三)鎮揚地區

這一地區在地理上屬於鎮揚山區，雖然中隔大江，但在地形上的區別不大。解放以

---

1) 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北陰陽營第一、二次的發掘，考古學報 1958 年第 1 期。

2) 南京博物院：南京安懷村古遺址發掘簡報，考古通訊 1957 年第 5 期。

3) 尹煥章、蔣纘初、張正祥：南京鎖金村遺址第一、二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 1957 年第 3 期。

4) 南京博物院：南京附近考古報告，上海出版公司，1952 年。

前，只在武進奄城發現了一處相當於春秋戰國時期的遺址。解放十年來，已經發現的遺址有八十多處，並有五處曾經試掘。

這八十多處遺址都集中在鎮揚山區間小河交叉的地帶和秦淮河的上游一帶，以揚州、鎮江、丹徒、武進、句容和溧水等市縣分佈較密。如揚州和儀徵一帶有鳳凰河和老虎山等五處遺址，鎮江和丹徒一帶有癩黿墩、文昌閣、斷山墩、土山口、木魚墩、砂子台、仙子墩、煙袋山等四十處遺址，武進有湖塘橋、安居山、村頭山、城頭山等九處遺址，句容和溧水有白蟒台、神面山、大小沈頭山、神世墩、窯崗山等三十處遺址。其中經過試掘的有揚州鳳凰河、丹徒大港葛村的癩黿墩和文昌閣[1]、平昌村的斷山墩以及諫壁的土山口等五處遺址。

在已經試掘的遺址中，以癩黿墩和斷山墩比較典型。癩黿墩的遺物以粗砂紅陶的鬲、甗、鼎，泥質幾何印紋紅陶的瓿、罐，以及黑皮磨光陶的豆、盆等較常見，幾何印紋硬陶最少；石器中以碑最多，箭頭和刀次之，有段石碑亦有發現。從各種特徵看來，這處遺址都接近於南京北陰陽營的第三層文化。

斷山墩出土的遺物，以粗砂紅陶和細泥紅陶爲主，黑皮磨光陶次之，幾何印紋硬陶的比例不到百分之十，器形以鬲、甗、鼎、罐爲多，紋飾以幾何印紋最常見；石器有圓柱形斧和帶孔刀；青銅器則有刀和箭頭出土。它的文化特點也和癩黿墩相近。

其餘鳳凰河[2]、文昌閣和土山口三處遺址的試掘結果，也大體上和癩黿墩、斷山墩兩處遺址相同。

（四）蘇錫地區

這一地區大部分濱臨太湖，爲一河湖交叉的平原地帶。解放前曾有人對蘇州越城和金山戚家墩兩處遺址作過調查，但文化性質不十分清楚。解放十年來，在無錫發現了仙蠡墩、錫山、闔閭城等遺址，在蘇州和吳縣發現了五峯山、金鷄墩、陽山、虎山、夷陵山、黃泥山等遺址，在吳江發現了松陵鎮和九里湖遺址，在青浦發現了澱山湖遺址，在崑山發現了陳墓鎮遺址。此外，在蘇州市郊的磚瓦廠和吳江城郊也有成批的黑陶器出土，震澤的衡山、漫山、五子山一帶的太湖湖底中亦常有石器、陶器、鹿角和獸牙等出現。總計解放後發現的遺址已有二十多處，其中經過發掘的有仙蠡墩和錫山公園兩處遺址。

仙蠡墩遺址位於無錫市西南三里的梁溪河北岸。遺址的文化堆積分上下兩層，上層出有幾何印紋陶、夾砂粗紅陶和有肩石斧等；下層出有粗砂紅陶鼎、鏤孔黑陶豆、刻劃紋黑陶片、扁平帶孔石斧、長方形石碑、小石鑿、長方形雙孔石刀，以及石珠、石環、石圈等飾品。此外，還發現有燒土面、獸骨、稻穀殼等遺跡和遺物。[3]從下層的文化特點看來，它顯然是接近於北陰陽營的第四層文化，至於上層，因發掘材料不够充分，還不能肯定是否相當於北陰陽營的第三層文化。

錫山的施墩遺址，位於無錫市的西郊。遺址文化層亦可分爲上下兩層：上層出有近代磚瓦、粗砂陶片和石碑等，下層則出有粗砂陶的鼎、鬲，黑陶的杯、豆、盤，細泥紅陶的罐，幾

1) 南京博物院：江蘇丹徒葛村新石器時代遺址探掘記，考古通訊 1957 年第 5 期。
2) 蘇北治淮文物工作組：江蘇揚州附近鳳凰河遺址發掘簡報，考古通訊 1957 年第 1 期。
3) 江蘇省文管會：江蘇無錫仙蠡墩新石器時代遺址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 1955 年第 8 期。

何印紋陶，陶杵，方柱形石碑、扁平石鑿、石箭頭和穿孔斜刃小石刀等，還有燒土面、稻穀殼和灰燼等發現。[1]從地層關係和出土遺物來看，這處遺址的下層似乎還可分作兩個文化層，最下的不出幾何印紋陶的一層可能相當於仙蠡墩的下層，較上的出幾何印紋陶較多的一層或者也相當於仙蠡墩的上層。總之，這處遺址的文化性質並未超越南京地區，即以北陰陽營第三、四層文化爲代表的範疇。

除了這兩處正式發掘過的遺址外，在蘇州、吳縣和吳江一帶，還分佈着和無錫仙蠡墩、施墩等文化性質不甚相同的遺址。通過在取土工程中的觀察，這些遺址（如蘇州市郊的大東磚瓦廠工地、吳江城郊和松陵鎮等處），大多位於地面下1至3米不等，出土遺物以泥質黑陶的壺、罐、豆居多，粗砂紅陶的三足器次之，也有幾何印紋硬陶發現。從遺址的環境和遺物的特點來看，它們和浙江杭縣的良渚遺址很相似。如果將來進行正式發掘的話，恐怕還可以把文化層劃分爲上下兩層，下層很可能不出幾何印紋陶器。至於這一類型的遺址爲什麽常常在地面下發現，這大致是由於錢塘江和太湖流域的地貌上的原因，這一地帶的平原區是經常表現"下降運動"的。[2]

此外，吳縣唯亭夷陵山所出陶器的特點，與南京北陰陽營第四層文化的陶器作風非常相似。

如上所述，江蘇的原始文化遺址是相當密集的，除了鹽城和南通地區迄今還未發現外，在其餘地區的分佈也是比較平衡的。至於鹽城和南通地區未發現原始文化遺址的原因，或許是由於這一地區大部分位居海濱和長江口附近，其中小部分且係近一兩千年內新生成的，而且多屬鹽滷之地，因此不太適合於遠古人類的居住。

## 二、遺址的主要文化類型

根據目前的材料看來，江蘇的原始文化遺址大體上有四種主要的文化類型。

### （一）第一類型

這一類型的遺址，它和山東典型的龍山文化基本上是很少差別的。就陶器而言，江蘇的龍山文化遺址中所出的黑陶豆、杯、盆，粗砂陶鼎和白衣紅陶鬶，大量的器蓋、圈足和三足，都與城子崖遺址所出的基本上一致。就石器和骨蚌器而言，橢圓形石斧、梯形石碑、雙孔石刀，以及大量的骨針、骨錐、骨笄、骨鏃和蚌刀、蚌鋸等，也符合於山東龍山文化的特點。而且，已經發現的這一類型遺址的地理位置都緊靠着魯南。因此，我們把它列爲一個文化類型。

江蘇境內的龍山文化遺址發現得還不多，並且都分佈在徐淮地區內，如徐州高皇廟、邳縣黃樓村、新沂三里墩等遺址都位於今隴海線的兩側。就目前材料看，廢黃河（古淮河）似乎是這種文化的南限。

### （二）第二類型

這一類型是以"青蓮崗文化"爲代表的。"青蓮崗文化"是因淮安青蓮崗被最早發現而

1) 江蘇省文管會：江蘇無錫錫山公園古遺址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1期。
2) 嚴欽尙：浙江省錢塘江及太湖流域地貌發展過程，華東師範大學地理集刊第一輯，1958年。

前，只在武進奄城發現了一處相當於春秋戰國時期的遺址。解放十年來，已經發現的遺址有八十多處，並有五處曾經試掘。

這八十多處遺址都集中在鎮揚山區間小河交叉的地帶和秦淮河的上游一帶，以揚州、鎮江、丹徒、武進、句容和溧水等市縣分佈較密。如揚州和儀徵一帶有鳳凰河和老虎山等五處遺址，鎮江和丹徒一帶有癩黿墩、文昌閣、斷山墩、土山口、木魚墩、砂子台、仙子墩、煙袋山等四十處遺址，武進有湖塘橋、安居山、村頭山、城頭山等九處遺址，句容和溧水有白蟒台、神面山、大小沈頭山、神世墩、窯崗山等三十處遺址。其中經過試掘的有揚州鳳凰河、丹徒大港葛村的癩黿墩和文昌閣[1]、平昌村的斷山墩以及諫壁的土山口等五處遺址。

在已經試掘的遺址中，以癩黿墩和斷山墩比較典型。癩黿墩的遺物以粗砂紅陶的鬲、甗、鼎，泥質幾何印紋紅陶的瓿、罐，以及黑皮磨光陶的豆、盆等較常見，幾何印紋硬陶最少；石器中以磷最多，箭頭和刀次之，有段石磷亦有發現。從各種特徵看來，這處遺址都接近於南京北陰陽營的第三層文化。

斷山墩出土的遺物，以粗砂紅陶和細泥紅陶爲主，黑皮磨光陶次之，幾何印紋硬陶的比例不到百分之十，器形以鬲、甗、鼎、罐爲多，紋飾以幾何印紋最常見；石器有圓柱形斧和帶孔刀；青銅器則有刀和箭頭出土。它的文化特點也和癩黿墩相近。

其餘鳳凰河[2]、文昌閣和土山口三處遺址的試掘結果，也大體上和癩黿墩、斷山墩兩處遺址相同。

（四）蘇錫地區

這一地區大部分濱臨太湖，爲一河湖交叉的平原地帶。解放前曾有人對蘇州越城和金山戚家墩兩處遺址作過調查，但文化性質不十分清楚。解放十年來，在無錫發現了仙蠡墩、錫山、闔閭城等遺址，在蘇州和吳縣發現了五峯山、金鷄墩、陽山、虎山、夷陵山、黃泥山等遺址，在吳江發現了松陵鎮和九里湖遺址，在青浦發現了澱山湖遺址，在崑山發現了陳墓鎮遺址。此外，在蘇州市郊的磚瓦廠和吳江城郊也有成批的黑陶器出土，震澤的衡山、漫山、五子山一帶的太湖湖底中亦常有石器、陶器、鹿角和獸牙等出現。總計解放後發現的遺址已有二十多處，其中經過發掘的有仙蠡墩和錫山公園兩處遺址。

仙蠡墩遺址位於無錫市西南三里的梁溪河北岸。遺址的文化堆積分上下兩層，上層出有幾何印紋陶、夾砂粗紅陶和有肩石斧等；下層出有粗砂紅陶鼎、鏤孔黑陶豆、刻劃紋黑陶片、扁平帶孔石斧、長方形石磷、小石鑿、長方形雙孔石刀，以及石珠、石環、石圈等飾品。此外，還發現有燒土面、獸骨、稻穀殼等遺跡和遺物。[3]從下層的文化特點看來，它顯然是接近於北陰陽營的第四層文化，至於上層，因發掘材料不够充分，還不能肯定是否相當於北陰陽營的第三層文化。

錫山的施墩遺址，位於無錫市的西郊。遺址文化層亦可分爲上下兩層：上層出有近代磚瓦、粗砂陶片和石磷等，下層則出有粗砂陶的鼎、鬲，黑陶的杯、豆、盤，細泥紅陶的罐，幾

1）南京博物院：江蘇丹徒葛村新石器時代遺址探掘記，考古通訊 1957 年第 5 期。
2）蘇北治淮文物工作組：江蘇揚州附近鳳凰河遺址發掘簡報，考古通訊 1957 年第 1 期。
3）江蘇省文管會：江蘇無錫仙蠡墩新石器時代遺址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 1955 年第 8 期。

何印紋陶,陶杵,方柱形石碎、扁平石鑿、石箭頭和穿孔斜刃小石刀等,還有燒土面、稻穀殼和灰燼等發現。[1]從地層關係和出土遺物來看,這處遺址的下層似乎還可分作兩個文化層,最下的不出幾何印紋陶的一層可能相當於仙蠡墩的下層,較上的出幾何印紋陶較多的一層或者也相當於仙蠡墩的上層。總之,這處遺址的文化性質並未超越南京地區,即以北陰陽營第三、四層文化爲代表的範疇。

除了這兩處正式發掘過的遺址外,在蘇州、吳縣和吳江一帶,還分佈着和無錫仙蠡墩、施墩等文化性質不甚相同的遺址。通過在取土工程中的觀察,這些遺址(如蘇州市郊的大東磚瓦廠工地、吳江城郊和松陵鎮等處),大多位於地面下1至3米不等,出土遺物以泥質黑陶的壺、罐、豆居多,粗砂紅陶的三足器次之,也有幾何印紋硬陶發現。從遺址的環境和遺物的特點來看,它們和浙江杭縣的良渚遺址很相似。如果將來進行正式發掘的話,恐怕還可以把文化層劃分爲上下兩層,下層很可能不出幾何印紋陶器。至於這一類型的遺址爲什麽常常在地面下發現,這大致是由於錢塘江和太湖流域的地貌上的原因,這一地帶的平原區是經常表現“下降運動”的。[2]

此外,吳縣唯亭夷陵山所出陶器的特點,與南京北陰陽營第四層文化的陶器作風非常相似。

如上所述,江蘇的原始文化遺址是相當密集的,除了鹽城和南通地區迄今還未發現外,在其餘地區的分佈也是比較平衡的。至於鹽城和南通地區未發現原始文化遺址的原因,或許是由於這一地區大部分位居海濱和長江口附近,其中小部分且係近一兩千年內新生成的,而且多屬鹽滷之地,因此不太適合於遠古人類的居住。

## 二、遺址的主要文化類型

根據目前的材料看來,江蘇的原始文化遺址大體上有四種主要的文化類型。

### (一)第一類型

這一類型的遺址,它和山東典型的龍山文化基本上是很少差別的。就陶器而言,江蘇的龍山文化遺址中所出的黑陶豆、杯、盆,粗砂陶鼎和白衣紅陶鬶,大量的器蓋、圈足和三足,都與城子崖遺址所出的基本上一致。就石器和骨蚌器而言,橢圓形石斧、梯形石碎、雙孔石刀,以及大量的骨針、骨錐、骨笄、骨鏃和蚌刀、蚌鋸等,也符合於山東龍山文化的特點。而且,已經發現的這一類型遺址的地理位置都緊靠着魯南。因此,我們把它列爲一個文化類型。

江蘇境內的龍山文化遺址發現得還不多,並且都分佈在徐淮地區內,如徐州高皇廟、邳縣黃樓村、新沂三里墩等遺址都位於今隴海線的兩側。就目前材料看,廢黃河(古淮河)似乎是這種文化的南限。

### (二)第二類型

這一類型是以“青蓮崗文化”爲代表的。“青蓮崗文化”是因淮安青蓮崗被最早發現而

1) 江蘇省文管會:江蘇無錫錫山公園古遺址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1期。
2) 嚴欽尙:浙江省錢塘江及太湖流域地貌發展過程,華東師範大學地理集刊第一輯,1958年。

得名。這個文化稱謂的提出，是在 1956 年的“全國考古工作會議”上，作爲南京市北陰陽營第一、二次的發掘報告中的主要結論之一。到目前爲止，它的代表性遺址除青蓮崗本身外，還有新沂花廳村、淮安茭陵集、漣水笪巷、南京江北的廟山、南京城內北陰陽營的第四層文化、無錫仙蠡墩下層文化以及吳縣唯亭夷陵山等處。

它們在文化上的共同特點是：陶器方面以粗砂和泥質的紅陶爲主，灰陶和黑陶次之，不見或少見幾何印紋陶；在器形上流行三足和圈足，也有相當數量的平底和圜底，並多把手和器蓋；在類別上，以鼎、鬶、壺、缽、豆、盌、盤、罐等爲多，不見或少見鬲、甗；在表皮處理和紋飾上，流行打磨表面、加紅或黑的陶衣、加簡單的彩繪，以及繪紋、鏤孔紋、刻劃紋和凸飾等。石器方面以長方形扁平碎、扁平帶孔斧、方柱形或扁平形的鑿、長方形帶孔刀等較常見，有段石碎和有肩石斧也間有發現。石製或陶製的紡輪，陶拍、陶杵和陶網墜等也有較多的發現。骨蚌器除少數遺址（如花廳村、廟山）較多外，一般不佔重要地位，骨器有針、錐、箭頭等，蚌器則少見。裝飾品一般比較豐富多樣，石質、玉質和陶質的均有，類別有珠、管、圈、環、墜、玦、璜等種，特別在葬地中有大量的發現。

當時人們的經濟生活已經以農業爲主，石碎、石斧、石鋤和石刀都可用於農業生產，南京的廟山和無錫的仙蠡墩還發現了稻穀殼的遺跡。陶器的多樣性和裝飾品的豐富，也反映了相當發達的定居的農業生活。但捕魚和狩獵除少數遺址外，一般似乎沒有得到很大的發展，只居於輔助的地位。

當時的住所還沒有比較完整的發現，一般說來是在地面上以黃土作基，再用火燒成硬的表面，上加竹木構成的牆壁和屋頂。住所的面積一般都不大，從已經發現的居住面來看，很少有達到 20 平方米以上的。住地和葬地已經分開，葬地通常都是比較集中的氏族公共的，數十個以至數百個死者埋葬在同一地點。從隨葬品看來，這時在生產上已經有了相當的剩餘，男女之間已經有了明確的分工，氏族成員之間或者也已經發生了貧富的差別。因此，在社會發展上可能已經進入了父系氏族社會。

從以上種種特徵看來，“青蓮崗文化”顯然是在龍山文化濃厚影響之下的一種江蘇的土著文化，但是在陶器的裝飾作風上可能也受到仰韶文化的一定程度的影響。如果我們從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的話，或者也可稱之爲“江蘇龍山文化”。

（三）第三類型

這一類型的文化遺址，它與浙江地區的良渚遺址有近似的地方，是錢塘江[1]和太湖流域分佈得最廣的一種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江蘇太湖流域的一些遺址，如蘇州、吳縣、吳江、震澤、崑山、青浦等市、縣境內所發現的，絕大部分應屬於這一文化類型。

良渚的陶器，有大量的泥質黑陶，粗砂和泥質的紅陶及灰陶次之；器形多圈足和三足，也有相當數量的圜底和小平底器，類別有鼎、鬶、壺、豆、簋、盆、皿、杯、罐等；器表處理以打磨和加黑色的陶衣爲主，紋飾以弦紋、鏤孔和刻劃紋最流行。石器方面，以扁平帶孔斧、有段石碎、半月形帶孔刀、大型的三角形刀、石鉞和鐮等，是這類文化中常見的遺物，石質和

1）浙江省文管會、浙江博物館合編：浙江新石器時代文物圖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58 年；施昕更：良渚 西湖博物館，1938 年；蔣纘初：杭州老和山遺址 1953 年第一次的發掘，考古學報 1958 年第 2 期；浙江省文管會：錢塘江流域五個縣的幾處古遺址初步調查，文物參考資料 1956 年第 8 期。

玉質的裝飾品也常在住地和葬地中發現。但骨蚌器一般發現得很少。

從發現的農業生產工具(刀、鐮、斧、䃶)、農作物以及反映定居的農業生活的住所建築(浙江錢山漾)和大量精緻的黑陶器等來看，都說明了當時的農業繁盛情況。捕魚在這裏有一定的地位，但狩獵和畜牧除在個別的遺址外(如最近在嘉興發掘的馬家濱遺址)，一般似乎不佔重要的地位。

這樣看來，良渚一類遺址的文化性質，有不少特點是與"青蓮崗文化"相近的，但是它更接近於山東典型的龍山文化。良渚的農業似乎要比"青蓮崗文化"發達，它們的社會發展程度可能也是相近的。從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也可稱它爲"浙江龍山文化"。

（四）第四類型

這一文化類型是以"湖熟文化"爲代表的。這個文化稱謂也是由南京博物院提出的。[1]這種文化的分佈地區，主要是在蘇皖境內的長江兩岸、寧鎮山脈和秦淮河流域一帶，[2]遺址的分佈要比上述三種文化更爲密集。

"湖熟文化"在陶器方面的特徵是出現了大量粗砂紅陶的鬲、甗，以及帶幾何印紋的泥質紅陶，粗砂紅陶鼎亦有發現，但數量較少；其中鬲和鼎有帶角狀把手的，甗的腰部則通常都有一圈附加堆紋。泥質灰陶和黑陶還佔有一定地位，但幾何印紋硬陶的比例很小。器形除鬲、鼎、甗外，以盆、罐、豆、缽、盤、盌等爲多；紋飾除幾何印紋外，以繩紋和附加堆紋爲主，有少數的刻劃紋，鏤孔紋則少見，並且不見彩繪。在陶製工具中，陶拍子和紡輪發現較多。燒製陶器的窰也常有發現。

這種文化在石器方面的特徵是：刀、鐮、䃶的數量特別多，刀都作半月形，帶雙孔或單孔；鐮都作長三角形，有的也帶孔；䃶大部分作扁平梯形，其中有段的較少。可以安柄的複合工具的衆多，是這種文化石器的顯著特徵之一。此外，還常可發現大量石料、石片和半成品的堆積現象。骨器的數量一般較少，只有少數的箭頭、針、錐之類的小型工具發現。

青銅器的出現是這一類型文化的最突出的特點，類別有箭頭、斧、刀(削)、魚鈎等，同時還曾發現銅煉渣以至煉銅用的粗砂帶柄陶勺等，說明當時當地的人民已經完全掌握了煉銅的技術。

卜骨和卜龜板在這一類型遺址中也間有發現，鎖金村遺址更發現有"陶祖"，說明當時流行的父權崇拜。

由於青銅工具的出現，農業生產工具及複合工具的衆多，以及陶器的多樣性看來，當時的農業生產顯然已較"青蓮崗文化"時期更爲發達。從較多的猪、狗、牛、羊等的遺骨看，當時也有了頗爲發達的畜牧業，捕捉魚、鼈、螺螄和鹿等則是一種輔助的生產。

當時人們的住所也是由位居地面上的燒土作基的，以圓形和橢圓形的居多，有的房基四周和中央曾有柱孔發現。面積較大的居住面圓徑可達 6.5 米左右，上面還有圓形或長方形的灶，中有陶片和獸骨等發現，周圍的烟燻痕跡很顯著。

當時的葬俗已趨於個體單葬，而不是埋在公共葬地內。隨葬品很少，甚至沒有。如在

1) 曾昭燏、尹煥章：試論湖熟文化，考古學報本期 47—58 頁。(編者)

2) 尹煥章、張正祥：寧鎮山脈及秦淮河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普查報告，考古學報 1959 年第 1 期。

鎮金村發現的三座墓葬中，只一座女性墓用陶紡輪隨葬，其餘兩座均未發現隨葬品。另外，小孩則埋在居住面下的長方形小坑中。

從以上種種特徵看，這種文化顯然是繼承"青蓮崗文化"而來，同時也受了黃河流域青銅器文化的許多影響。在過去，人們常把這一類型的遺址籠統地稱爲新石器時代遺址，現在看來，這是不恰當的。比較明確的提法應該是"青銅時代早期"或至少也應該稱爲"銅石並用時期"。在社會發展的程度上，可能已處於原始氏族社會的瓦解時期了。

## 三、遺址的年代問題

關於江蘇以至東南地區原始文化遺址的年代問題，在過去和現在都有一些爭論，現有的材料似乎還不能完全解決這個問題，只能提出一些參考性的意見。

前述四類型的文化的相對年代問題，大體上已經由考古發掘中的地層關係解決了。其中"青蓮崗文化"和"湖熟文化"的早晚順序比較清楚，它們是江蘇境內時代相繼的兩種主要的土著文化，而"湖熟文化"在地層上又早於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化層。"青蓮崗文化"和良渚式的文化，是江、浙境內平行發展的而又密切相關的兩種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它們的時代也應該是相近的。江蘇境內的"龍山文化"遺址則要比"青蓮崗文化"和良渚式的遺址爲早。

至於絕對年代，我們只能從下往上推，先來解決"湖熟文化"的年代。

上面已經提到，在地層上"湖熟文化"要早於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化，這是一個重要的前提。其次，"湖熟文化"與中原的青銅器文化之間有着一定的關係，如各處遺址所出的銅箭頭和銅刀(削)，和中原地區殷周之際的同類器的形制非常相似；部分陶器如甗、罍，以及印紋陶器上的雲雷紋等，也接近於殷周銅器的形制和紋飾。同時，"湖熟文化"中的部分遺址且直接與出西周銅器羣的墓葬有着密切的關係，如出宜侯夨簋的西周墓就位於丹徒大港一帶的"湖熟文化"遺址羣之間，墓中所出的銅鬲形制與遺址所出的陶鬲形制非常相近，墓中出土的青釉陶器，在遺址上層亦有碎片發現；另一處出西周銅器羣的儀徵破山口墓葬，亦位於"湖熟文化"系統遺址的老虎山附近，情況和丹徒大港的一樣。

這樣看來，"湖熟文化"的年代是不會距離殷末周初太遠的。由於它的文化層堆積較厚，分佈又比較稠密，應該是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的。因此，我們把它的絕對年代暫定爲相當於商代後期(殷)和西周，即在公元前 1400 年到公元前 770 年左右。

"青蓮崗文化"未出現青銅器和幾何印紋陶器，在遺物中也未發現中原青銅器文化影響的痕跡。它具有不少地方性的特點，同時也受到"龍山文化"的濃厚影響和"仰韶文化"的一定影響。它的遺址數量雖然不多，但大江南北都有分佈，說明它是經過一段長期發展過程的。由於它在地層上壓在"湖熟文化"層下面，所以我們把這一類型遺址的絕對年代暫定爲相當於中原的夏商之際，即公元前 2100——前 1400 年左右。

良渚式的和"青蓮崗文化"，是江浙境內平行發展的兩種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因此在年代上也應該相近。不過，這種文化在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地區得到了更充分的發展，並且也和中原的青銅器文化發生了關係。所以，它的下限或者要比"青蓮崗文化"爲遲。

至於江蘇境內的"龍山文化"遺址，因材料不多，還不容易進行斷代，但一般說來，它應

該早於"青蓮崗文化"。從目前僅有的材料看來，它或者相當於尹達先生所定的"龍山期"，即其絕對年代約爲公元前 2500——前 2100 年左右。當然，這些絕對年代都僅僅是一個不成熟的約數，還需要繼續深入討論。比較準確的年代更有待於今後進一步的調查發掘和分析研究來解決。

## 四、結　　語

綜上所述，解放十年來江蘇境內發現的原始文化遺址是相當豐富的，並且包括了不少重要的發現，爲研究我們偉大祖國的原始文化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材料。

根據目前的材料看來，江蘇境內的原始文化遺址可分爲四種文化類型。其中"龍山文化"多分佈於徐淮地區，其文化性質基本上和山東典型的"龍山文化"相同；"青蓮崗文化"分佈在大江南北，北及隴海綫，南到太湖北岸，它是江蘇境內最主要的一種新石器時文代化；具有良渚的文化性質的遺址分佈於太湖流域，南及錢塘江流域，它是與"青蓮崗文化"平行發展的一種新石器時代文化；"湖熟文化"主要分佈在長江兩岸、秦淮河流域和寧鎮山脈一帶，它是一種青銅時代早期、或銅石並用時期的文化，它的時代雖較晚，但亦是江蘇境內主要的原始文化之一。

至於有關江蘇原始文化遺址的其他問題，由於材料和篇幅所限，這裏就不加討論了。

# О СТОЯНКАХ ПЕРВОБЫТ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ПРОВ. ЦЗЯНСУ

Цзян Цзань-чу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уже открыто больше 200 стоянок первобыт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пров. Цзянсу. В этой статье мы изложим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б их местонахождении, культурных типах и 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их вопросах. Из этих стоянок были подвергнуты разведочным раскопкам или раскопкам всего 20, а именно Гаохуанмяо, Цинляньган, Саньлидунь, Хуатинцунь, Хэцзясян, Цайшань, Бэйньяньинь, Социньцунь, Лаошудунь, Цяньган, Иньцзышань, Шэньдунь, Гоудунь, Фэнхуанхэ, Лайюаньдунь, Вэньчангэ, Дуаньшаньдунь, Тушанькоу, Сяньлидунь и парк Сишань.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этих 200 стоянок располагаются более плотно.

По имеющимся нами материалам, стоянки первобыт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пров. Цзянсу могут быть в общих чертах разделены на 4 типа.

К первому типу относятся стоянки «луншань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аходящиеся близко к северной части пров. Цзянсу, напр. Гаохуанмяо г. Сюйчжоу, Хуалоуцунь уезда Пэйсянь, Саньлидунь уезда Синьи и т.д. Найденные здесь черные глиняные доу (豆, бокал с высоким поддонам), стакановидные сосуды и тазы, дин из глины с примесью крупного песка, красные глиняные гуй (鬶, треостродонный котел) с белым ангобом и др. в основном однородны с чэнцзыяйскими;

鎮金村發現的三座墓葬中，只一座女性墓用陶紡輪隨葬，其餘兩座均未發現隨葬品。另外，小孩則埋在居住面下的長方形小坑中。

從以上種種特徵看，這種文化顯然是繼承"青蓮崗文化"而來，同時也受了黃河流域青銅器文化的許多影響。在過去，人們常把這一類型的遺址籠統地稱爲新石器時代遺址，現在看來，這是不恰當的。比較明確的提法應該是"青銅時代早期"或至少也應該稱爲"銅石並用時期"。在社會發展的程度上，可能已處於原始氏族社會的瓦解時期了。

## 三、遺址的年代問題

關於江蘇以至東南地區原始文化遺址的年代問題，在過去和現在都有一些爭論，現有的材料似乎還不能完全解決這個問題，只能提出一些參考性的意見。

前述四類型的文化的相對年代問題，大體上已經由考古發掘中的地層關係解決了。其中"青蓮崗文化"和"湖熟文化"的早晚順序比較清楚，它們是江蘇境內時代相繼的兩種主要的土著文化，而"湖熟文化"在地層上又早於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化層。"青蓮崗文化"和良渚式的文化，是江、浙境內平行發展的而又密切相關的兩種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它們的時代也應該是相近的。江蘇境內的"龍山文化"遺址則要比"青蓮崗文化"和良渚式的遺址爲早。

至於絕對年代，我們只能從下往上推，先來解決"湖熟文化"的年代。

上面已經提到，在地層上"湖熟文化"要早於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化，這是一個重要的前提。其次，"湖熟文化"與中原的青銅器文化之間有着一定的關係，如各處遺址所出的銅箭頭和銅刀(削)，和中原地區殷周之際的同類器的形制非常相似；部分陶器如甗、罍，以及印紋陶器上的雲雷紋等，也接近於殷周銅器的形制和紋飾。同時，"湖熟文化"中的部分遺址且直接與出西周銅器羣的墓葬有着密切的關係，如出宜侯夨簋的西周墓就位於丹徒大港一帶的"湖熟文化"遺址羣之間，墓中所出的銅鬲形制與遺址所出的陶鬲形制非常相近，墓中出土的青釉陶器，在遺址上層亦有碎片發現；另一處出西周銅器羣的儀徵破山口墓葬，亦位於"湖熟文化"系統遺址的老虎山附近，情況和丹徒大港的一樣。

這樣看來，"湖熟文化"的年代是不會距離殷末周初太遠的。由於它的文化層堆積較厚，分佈又比較稠密，應該是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的。因此，我們把它的絕對年代暫定爲相當於商代後期(殷)和西周，卽在公元前 1400 年到公元前 770 年左右。

"青蓮崗文化"未出現青銅器和幾何印紋陶器，在遺物中也未發現中原青銅器文化影響的痕跡。它具有不少地方性的特點，同時也受到"龍山文化"的濃厚影響和"仰韶文化"的一定影響。它的遺址數量雖然不多，但大江南北都有分佈，說明它是經過一段長期發展過程的。由於它在地層上壓在"湖熟文化"層下面，所以我們把這一類型遺址的絕對年代暫定爲相當於中原的夏商之際，卽公元前 2100——前 1400 年左右。

良渚式的和"青蓮崗文化"，是江浙境內平行發展的兩種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因此在年代上也應該相近。不過，這種文化在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地區得到了更充分的發展，並且也和中原的青銅器文化發生了關係。所以，它的下限或者要比"青蓮崗文化"爲遲。

至於江蘇境內的"龍山文化"遺址，因材料不多，還不容易進行斷代，但一般說來，它應

該早於"青蓮崗文化"。從目前僅有的材料看來,它或者相當於尹達先生所定的"龍山期",卽其絕對年代約爲公元前 2500——前 2100 年左右。當然,這些絕對年代都僅僅是一個不成熟的約數,還需要繼續深入討論。比較準確的年代更有待於今後進一步的調查發掘和分析硏究來解決。

## 四、結　　語

綜上所述,解放十年來江蘇境內發現的原始文化遺址是相當豐富的,並且包括了不少重要的發現,爲研究我們偉大祖國的原始文化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材料。

根據目前的材料看來,江蘇境內的原始文化遺址可分爲四種文化類型。其中"龍山文化"多分佈於徐淮地區,其文化性質基本上和山東典型的"龍山文化"相同;"青蓮崗文化"分佈在大江南北,北及隴海綫,南到太湖北岸,它是江蘇境內最主要的一種新石器時文代化;具有良渚的文化性質的遺址分佈於太湖流域,南及錢塘江流域,它是與"青蓮崗文化"平行發展的一種新石器時代文化;"湖熟文化"主要分佈在長江兩岸、秦淮河流域和寧鎮山脈一帶,它是一種青銅時代早期、或銅石並用時期的文化,它的時代雖較晚,但亦是江蘇境內主要的原始文化之一。

至於有關江蘇原始文化遺址的其他問題,由於材料和篇幅所限,這裏就不加討論了。

## О СТОЯНКАХ ПЕРВОБЫТ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ПРОВ. ЦЗЯНСУ

Цзян Цзань-чу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уже открыто больше 200 стоянок первобыт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пров. Цзянсу. В этой статье мы изложим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б их местонахождении, культурных типах и 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их вопросах. Из этих стоянок были подвергнуты разведочным раскопкам или раскопкам всего 20, а именно Гаохуанмяо, Цинляньган, Саньлидунь, Хуатинцунь, Хэцзясян, Цайшань, Бэиньяньинь, Соцзиньцунь, Лаошудунь, Цяньган, Иньцзышань, Шэньдунь, Гоудунь, Фэнхуанхэ, Лайюаньдунь, Вэньчангэ, Дуаньшаньдунь, Тушанькоу, Сяньлидунь и парк Сишань.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этих 200 стоянок располагаются более плотно.

По имеющимся нами материалам, стоянки первобыт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пров. Цзянсу могут быть в общих чертах разделены на 4 типа.

К первому типу относятся стоянки «луншань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аходящиеся близко к северной части пров. Цзянсу, напр. Гаохуанмяо г. Сюйчжоу, Хуалоуцунь уезда Пэйсянь, Саньлидунь уезда Синьи и т.д. Найденные здесь черные глиняные доу (豆, бокал с высоким поддонам), стакановидные сосуды и тазы, дин из глины с примесью крупного песка, красные глиняные гуй (鬶, треостродонный котел) с белым ангобом и др. в основном однородны с чэнцзыяйскими;

предметы из камня, костей и раковин также имеют общие черты с изделиями луншань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К второму типу относятся стоянки «цинляньга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апр. Цинляньган, 4-ый слой Бэиньяньиня, Хуатинцунь уезда Синьи, Дяолиди уезда Хуайань, Дасян уезда Ляньшуй, нижний слой Сяньлидуня уезда уси, горы Илинь в местности Вэйтин уезда Усянь и т. д. Их общие черты состоят в том, что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керамики красная, из глины или глины с примесью крупного песка, меньшая черного и серого цвета, а керамики со штампованным орнаментом очень мало или вовсе не встречается. По форме керамики,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сосуды трехногое или кольцевоногое именно дин, гуй, кринки, миски, доу, чашки, блюда горшки. Эти сосуды имеют полированную поверхность, покрытую красным или черным ангобам; на них нанесена простая роспись и спиральный, прорезные, резный, выпуклый узор. Среди каменных орудий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попадаются прямоугольно-плоские тесла, сверленные плоские топоры, квадратные и плоские долота, сверленные прямоугольные ножи и т.д. Иногда встречаются ступенчатые тесла и топоры с плечами. Найдены и костяные изделия и очень мал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изделий из раковин. Кроме того, найдены еще украшения из нефрита, камня и глины. Все эти находки позволяют предполагать, что «цинляньга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является лок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о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Цзянсу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луншань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определенной мере и «яншао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Поэтому можно называть её «луншаньской культурой Цзянсу».

К третьему типу относятся стоянки,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е в бассейне озера Тайху пров. Цзянсу. По свойству она близка к культуре Лянду.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керамики черная, из глины.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сосуды кольцевоногое или трехногой, он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дин, гуй, кринками, доу, жертвенными сосудами (для проса), тарелками, мисками, стакановидными сосудами и горшками с полированной поверхностью и черным ангобом. Среди каменных орудий чаше встречаются сверленные плоские топоры, ступенчатые тесла, сверленные сегментные ножи, треугольные каменные орудия, юе (鉞 скира) и серпы. Они во многом близки к изделиям «цинляньга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о еще более близки к изделиям луншань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пров. Шаньдун. Земледелие, отраженное в стоянках 3-его типа, по-видимому, было более развито, чем земледелие цинляньга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К четвертому типу относится «хушу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вшаяся в районах реки Циньхуайхэ и горной цепи Нинчжэньшань. Характерно для керамики огром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красных ли (鬲, котел на трёх ногах) и янь (甗, большой горшок с двумя отделениями, нижнее—для варки на огне, верхнее——для варки на пару.), сделанных из глины с примесью крупного песка, и красной керамики из глина и с геометриляскими узорами Среди них ли и дин с ругкой Также обнаружена керамика черная и серая, именно ли, дин, янь, тарелки, горшки, доу, миски, блюда и чашки. Среди каненных орудий преобладают ножи, серпы тесла. Найдены и гадательные кости и мелкие медные изделия.

Переходим к 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им вопросам стоянок первобыт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Очень ясна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ь культур цинляньганской и хушуской, последняя была раньше культуры эпох «Весны и Осени» и «Воюющих царств» и существовала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в конце эпохи Инь и начале Чжоу. Цинляньга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относится к времени Ся или Шань.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культуры стоянок, относящихся с Лдиду к одному типу, то она должна была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в пров. Цзянсу параллельно с «Цинляньга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ой», развивавшейся в пров. Чжэцзян, и обе должны были быть не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 試論湖熟文化

曾昭燏　尹煥章

（南京博物院）

## 一、"湖熟文化"的面貌

"湖熟文化"是主要存在於江蘇、安徽境內長江沿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末期（或者最好說銅石並用時代）一直到銅器時代的一種文化。它最初發現於江蘇省江寧縣湖熟鎮附近，所以稱爲"湖熟文化"。

這種文化遺址是在1951年3月首次發現的，到1959年6月共發現了159處。遺址所在的地方，計秦淮河流域（包括江寧縣湖熟鎮一帶），南京玄武湖周圍，南京東北沿江和西南郊一帶，安徽馬鞍山慈湖地區，鎮江市郊龍脉團山等處，句容丹徒交界寶堰河旁和丹徒高資、上黨、辛豐、諫壁至大港以及太平河兩岸，丹陽九曲河一帶，武進、儀徵破山口等地區。[1]

這些遺址的分佈範圍，假使我們以南京爲中心，可以看出它們是西南沿着寧蕪鐵路，至寧鎮山脉西南端的馬鞍山市地區，東經鎮江、丹徒至武進縣孟河鎮一帶，東南至句容天王寺一帶，南至江寧秣陵關一帶，北至長江兩岸（長江北岸的遺址，經過調查的有南京北郊卸甲甸團山公園1處及儀徵破山口3處，在儀徵、六合、江浦、滁縣一帶，這類遺址還很多，有的是遙望可見，有的是已發現遺物，但都未經實地勘查，所以未列入）。在此東西長100，南北寬50公里，約計5000平方公里的地區內，這些遺址成羣地分佈着。[2]

這些遺址共同的特點，即都是突出地面的土墩，我們稱之爲"台形遺址"。它們的形狀多圓形或橢圓形，也有條形和少數不規則形狀的。突出地面一般是6—7米左右，但也有低到2米和高到10米以上的，其絕對高度（即高出吳淞口海面）爲海拔10—20米。上部的面積一般是6000—7000平方米，但也有小到300或大到90000平方米的。

這些遺址多分佈在河流或湖沼的沿岸，緊靠山崗成羣地存在着。按其地理環境可分爲三種。

第一種：北臨大江，南靠起伏綿延的土崗，遺址在兩者之中而靠近土崗，其三面爲水田，一面（多在南面）有一比水田較高的條形地帶。這地帶一般寬約20，長約200米左右，連接土崗。遺址的文化層薄，內含物單純。丹徒諫壁至大港沿長江南岸的遺址，都屬於這一類型。在長江與土崗之間，還有少數孤立的土山，山上也有文化層，頂上文化層極薄，近山脚處則較厚，如烟袋山遺址就是這種現象。

第二種：兩面是大山，中間形成一條平坦的山冲，河流貫串其中，遺址即分佈在河流兩岸接近大山餘脉的土崗處。這些遺址的周圍多有水田、平地或池塘，也有少數在一面有

較高的條形地，與土崗相連。這些遺址的文化層複雜，含物豐富。在丹徒太平河沿岸以及江寧秦淮河沿岸等遺址，都是這一類型。

第三種：四周是大小山崗，形成中部低窪的小型盆地，沿山崗不遠，分佈着遺址。遺址四周爲圩田、小溪或池塘。文化層複雜，含物豐富。南京玄武湖周圍以及馬鞍山市慈湖鎮一帶，都是這一類型。

在以上三種類型遺址所在的地區中，存在着少數的土墩，表皮土極薄，在厚約 0.5 米以下，即爲石塊，這樣的大多數無古代文化遺存。也有個別的這類的土墩，有極薄的文化層。還有在平坦的山冲內，有河流貫串着，或者是盆地，但這種都是地區極小，周圍是比較高的崗巒包圍着；也有一望無際的平原，土層是後代的冲積層；諸如此類的地方，都難於發現新石器時代的台形遺址。另外，有些遺址雖然不作台形，但文化遺存與台形遺址相同，這些遺址多在山脚坡上。關於這個問題，在後面將加以討論。

根據我們目前所得的資料，"湖熟文化"遺址，雖然有三種不同的類型，其文化遺存也有豐富與貧乏的區別，但其包含的內容基本上是相同的，文化層次也是大同小異。在已發現的 159 處遺址中，經過探掘和發掘的有 14 處，它們是：江寧縣湖熟鎮西的老鼠墩、前崗 2 處，江寧縣秣陵關的神墩 1 處，江寧縣元山鎮的溝墩 1 處，南京郊外的窨子山、鎖金村、安懷村、邁高橋 4 處，南京城內的北陰陽營 1 處，丹徒縣葛村的癩黿墩、文昌閣 2 處，丹徒縣大港的烏龜墩、丁崗的斷山墩、諫壁的小團山各 1 處。遺址的文化層，一般厚約 3 米左右，最厚處有到 5 米的。它基本上分爲上下兩層。在上層的表面，有耕土或擾土層，土質鬆軟，色雜，多灰土或黃灰土，有紅燒土塊及屑，多爲後代如六朝、宋、明、清的墓葬或小溝渠所打破，這些墓葬或小溝渠有時深入到下層中。包含物除新石器時代的石器與紅砂陶外，常有六朝至現代的陶、瓷、磚、瓦、鐵棺釘、金飾等出現。上層多爲一層層均匀的軟灰土，或間隔一層黃淤土。在灰土層中含物甚多，除石器、紅砂陶、獸骨外，還有幾何印紋硬陶(某些遺址這一層出少數的幾何印紋軟陶)與少數的黑皮磨光陶，後者主要是壺、罐、瓿、盆等較笨重的器物，與北方出土的春秋、戰國時陶器形制近似，同出土的還有銅鈴、銅鑿、銅條、三棱式銅鏃、銅銹渣等，如湖熟的老鼠墩、南京的鎖金村與北陰陽營的西部和中部、丹徒的癩黿墩和斷山墩、秣陵關的神墩，都是這種情形。也有這層爲黃膠土層，質硬，有的還顯出夯打痕跡，近似夯土，含物少，夯土面上有許多大小石塊錯亂地分佈着，似乎是古代的建築地基，如北陰陽營東部就是這樣的。在上、下層之間，常有紅燒土面或紅燒土塊的堆積。有的遺址有石片、礪石和石製半成品的堆積，厚約 0.2 米，顯係製作石器的殘跡。北陰陽營中部及鎖金村北部都有這種現象。有時在上下層交界處，有燒造陶器的窯，窯底伸入到下層甚至更下。北陰陽營所發現的窯較完整，窯內有幾何印紋硬陶和釉陶的發現；秣陵神墩、溝墩及安懷村則只存窯的殘跡。下層被後代擾亂的情況較少，土色灰，質軟，普遍含草灰、木炭、竹器殘片以及燒土塊堆積或燒土面。內含石器較多，陶器以紅砂陶爲主，紅砂陶扁足鼎爲這一層所特有，還有與銅器式樣或花紋相同的黑皮磨光陶和幾何印紋軟陶(個別遺址有極少數的幾何印紋硬陶存在)。與石器同出的，有北方出土的殷末周初式樣的銅刀、銅鏃以及銅煉渣等，北陰陽營還出有煉銅的陶缽。這一層在上部灰層掘完時，常常露出灰坑的上口，灰坑作橢圓形或作不規則的形狀，內含物很多，其中多獸骨、魚骨、龜殼、蚌

殼、蛤蜊殼、螺螄殼等。在北陰陽營這一層，還有燒坑的發現，坑內有大量的灰土和木炭，並有鼈骨、魚骨、麻龜板、卜骨、卜甲等。

以上所述地層情況，是指遺址一般的而言，尤其是在第二、第三兩類型的遺址中，這種情况更爲普遍。當然各個遺址的具體情况是不盡同的。像北陰陽營遺址在"湖熟文化"下層（即本遺址的第三層）以下，還有第四層的出現。[3] 在第一類型遺址中，有許多文化層很薄。如丹徒大港的海船山、豆腐墻山、濱竹烏龜山、鑼鼓山等遺址的文化層，只有 0.5—1.4 米厚；大港烏龜墩遺址的文化層只有 0.8 米的厚度。

根據近幾年調查發掘所獲的資料，我們可以初步了解"湖熟文化"時代人們生活概况。

當時人們的生產工具，主要是石製的，多複合工具，可以安柄來使用，如有段石錛、有槽石斧、穿孔石鐮、穿孔石斧、穿孔石刀、有鋌石矛頭與石鏃，都是爲便於安裝木柄、縛以繩索或將鋌部插入桿中而製作的。石料多就地取材，有閃長岩、角頁岩、砂岩、頁岩、粗砂岩、燧石岩多種。[4] 石器的製作過程，係先將石塊打成雛形，再打出刃部，然後磨光。石斧類大型器主要磨製刃部，但有的也全磨光。一般小件器，如石刀、石鏃、小石錛等，都通體磨光。鑽孔技術，基本上分爲兩種：一種利用質料堅硬的尖狀器兩面對鑽，孔壁粗糙，孔呈"X"形；一種用管狀工具旋孔，孔壁光滑，旋下的石核心腰部呈現略爲突出的一圈，[5] 顯示在旋製將通時，用力打下來的。用來旋孔的管狀工具，可能係竹管（古人很早就使用竹器，北陰陽營第三層出有竹編織物）。在南京北郊宋家山遺址發現的石核心 1 件，直徑爲 4.3 厘米；在丹徒諫壁烟袋山遺址發現的 1 件，厚 2，直徑 3.7 厘米，可證明石器本身之大。

由於遺址中常發現石料、礪石、半成品、石核心以及集中的石片堆積層，説明當時居住在這些地方的人們都自己製造石器，自己使用。他們製造石器的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製出的器物數量也相當大。器形可分爲以下類別：

石斧　分爲橢圓柱形、扁平形、扁平邊棱上帶槽或身上穿孔等式樣。

石錛　多扁平梯形，有近長方形與方形的，刃部或齊平或傾斜。另有一種有段石錛。

石刀　多作半月形，有雙孔、單孔或多孔的，刃多在弧線上，也有在直邊上的。另有帶柄刀、條形刀及穿孔條形刀。

石鐮　彎曲近弓形，凹刃，一端寬、一端窄，窄端成尖狀，也有穿孔的。

石鏟　形似有肩石斧，但體薄；另有作鉞形的，多雙孔。

石鑿　多錛式條形，刃部窄小。

石鏃　基本分爲帶脊三角式與扁平三角式兩種，前者多有鋌。

石矛　形近鏃，惟較鏃大，分爲有鋌與無鋌兩種形狀。

戈形石器　有援、胡、內，援及胡均有刃，反面光平。

其他石器　1. 石杵與錘：成圓柱形或橢圓柱形，一端有錘擊痕。2. 紡輪：扁平圓形，直孔。3. 石拍：作扁圓形或半圓形，常爲礫石製成。4. 礪石：大的形狀不規則，通常有磨痕；小的多長方扁平形，一端有孔，通體光滑，似爲掛身應用之物。

石飾　多小件佩帶品，石質光滑細膩，也有用松綠石製成的，形近四棱條狀，上頂尖，下端有鋌，大致爲簪頭飾品。

在各遺址出土的石器中，以石錛、石鐮、石鏃爲較多。如南京北陰陽營遺址出土的石

碲，鎖金村、丹徒葛村出土的石鐮，皆佔相當大的比例。再有杵碓的出現，可能當時農業在生產中已佔主要的地位。牛、羊、狗骨及猪牙的發現，表示當時已有了畜牧業。石鏃、[6]網墜、魚骨、龜殼、鼈骨、螺螄殼、蛤蜊殼、蚌殼、[7]庥龜版等的發現，表示漁業在當時經濟中也佔相當重要的地位。鹿角以及其它獸骨普遍的發現，表示當時狩獵生產活動還相當多。許多紡輪的出現，證明當時有了紡織業。當時人多住在湖畔水濱，便於取水捕魚；又距離山崗不遠，對獵獲野獸，採取果實，砍伐木材，以至在山脚下耕種，都是非常方便的。

當時人們已能燒造陶器，在各遺址中普遍的發現製陶工具，如陶拍、陶墊、打印花紋的陶拍和使陶器表皮光滑的打磨工具。[8]各遺址都發現有大量的紅燒土塊，其中有火度高而燒成蜂窩狀的。在燒土塊上，常有一節一節的植物枝幹痕，內顯草拌泥狀，這些都是與燒造陶器有關聯的。1957年秋，我們在南京北陰陽營遺址進行第三次發掘時，在第二、第三層交界處，曾發現陶窯兩座，烟口已不存，但火門與窯腔下部還在。窯作長方形，其中一座腔內口 2.1 × 1.1 米，現高約 0.6 米，另一座大小略同。兩座四壁表層經火燒後，相當堅硬，色黑紅，有植物枝幹印痕與窯汗，窯牆由內向外逐漸轉黃而灰，窯內塡灰燼及木炭塊，還有殘破陶器。這更證明當時人們自己燒造陶器，自己使用。他們是採用當地黃膠土作原料，按照器物不同的用途而摻入不等量的細砂、粗砂或其它羼和料。製造以手製爲主，許多泥質印紋軟陶四壁尙存指印，但也有輪製和模製的。陶器的類別，依質料可分爲四種：

（一）夾砂粗陶　約佔全數陶器 60％左右。色多紅，也有灰色的。形制以鬲、盆、罐較多，也有甗。另外還有小型陶器，多杯、盂、鬲、罐，似爲隨葬品或兒童玩具。鬲以袋形足與錐形足爲多，也有帶把手的。甗有袋形足和劃紋的扁足兩種。安懷村遺址曾出過一件完整陶甗，下部鬲的口沿有注水孔。盆多笨重大器，均有附加堆紋，似爲仿木器製作。

（二）泥質黑皮或灰皮磨光陶　在下層約佔全部陶器 25％ 左右。器形以豆、罐、盆、缽、盤爲較多，且有與青銅器式樣相同的罍、瓿等。

（三）泥質紅陶　在下層佔全數陶器約 15％ 左右。多幾何印紋軟陶罐，也有缽形器，某些缽內還有劃紋，其紋縱橫交錯而深，邊沿有一扁形流，似用作研磨的器皿。

（四）夾砂質幾何印紋硬陶　有瓿、尊、缶等，多發現在上層，下層中只有少數。

以上四種陶器的紋飾，大致如下：1. 紅砂粗陶多繩紋、附加堆紋和指窩紋；2. 黑皮磨光陶多弦紋、貝紋、凹點紋、鏤孔紋、菱形劃紋、折帶紋和雲雷紋；3. 幾何印紋軟陶多蓆紋、篦紋、回紋、方格紋、菱形紋和曲折紋，也有雲雷紋和編織紋相間隔的；4. 幾何印紋硬陶多回紋、變形雲雷紋、波浪紋、編織紋等，都印得很深。

當時人們將吃剩下來的牛、羊、猪、鹿、魚等動物的骨、角，製成器具。如骨箭頭和矛頭，其形狀同石鏃、石矛。箭頭分有脊的与無脊的兩種，均有鋌。骨錐多用骨片的一端磨光，便於錐刺。角錐用鹿角尖端使用，其本上往往有孔，可穿繩。還有刀形器，係將骨片磨光，一端成刀狀。在北陰陽營遺址中，曾發現鹿角一隻，形似戈狀，柄部被砍削，可插入桿中，顯然是作武器使用的。

當時人們已掌握冶銅技術，但所生產的東西極少。在北陰陽營35探坑第三層灰坑中，就出現了煉銅陶缽1個，直徑17厘米，內表有銅液一層，伴出的有煉渣多塊。又在其附近東面的殘窯底，出土帶柄陶勺1件，柄及勺身都甚厚，最厚處達 6.4 厘米，全長 17.8 厘

米;勺身下有二足,與柄平,可以平放;左側有流,便於傾注;柄有方洞,便於插入長桿;全器爲草拌泥製成,經火燒,器壁現灰黃色,器表作綠灰色光滑面。這勺大致是鑄銅器時用來挹取銅液、傾入範模內用的。器表沒有銅液,又出現於殘窯內,是剛剛燒好而未用過的器具。有許多台形遺址,如南京鎖金村、安懷村、窨子山、丹徒斷山墩等遺址的下層曾發現銅刀、銅鏃、銅斧、銅鼎耳及足、銅魚鈎以及銅銹渣等。上層則出土時代較晚的銅鏃、銅鈴與銅鑿。銅刀基本爲條狀,形近殷代武士所佩帶的刀,柄部有突起斜棱,似曾纏繞繩狀,也有柄部作環狀的。下層銅鏃多背脊高起,兩翼後鋒外侈,均有鋌,鋌長短不一。上層銅鏃作三棱狀。銅斧刃部兩側外侈,近戚狀,有銎可安柄。銅魚鈎似現代魚鈎,僅在鎖金村遺址發現1件。銅鼎耳及足在安懷村遺址曾出土,耳直立方形,足直立圓柱形,似殷末周初銅鼎作風。北陰陽營遺址亦出土同樣鼎足。

當時人們居住的地方,經常將地面拍平,有時兼用火燒乾,所以多出現厚約12厘米左右的光滑燒土面,直徑有達10米的,上有煙熏痕。燒土面上發現有圓形或長方形小窩,窩內常有陶片、獸骨,個別情形有小孩骨架。有的燒土面邊沿處,向上直起,好像牆壁的殘跡。在燒土面附近,往往有橢圓形灰坑或長方形火坑。火坑內多燒過的獸骨、魚骨、鼈骨等,並多外有烟痕、內有水銹的鬲片以及木炭燼餘;這些火坑很可能是當時的人燒火取暖兼燒煮食物之用的。灰坑內多灰綠色粉狀土,似乎是糧食所化,還有獸骨、陶片、石器等;這些灰坑可能是儲食物的窖穴兼垃圾坑。

當時人還有娛樂生活與宗教生活,在安懷村遺址下層中,曾出土陶塤1件,泥質,色紅,圓形,內空,頂有孔,器壁另有一孔,能吹響。高5.8,直徑約6.4,厚約1厘米。表面光滑,無紋飾。在北陰陽營遺址第三層灰坑中,出土龜甲和牛、羊的肩胛骨片,甲骨上的灼痕,或直接用火灼成淺窩,或者先鑽成扁圓形窩,再加火灼,這明明是爲占卜用的。鎖金村遺址曾出土陶祖1件,形象逼眞,這表示當時可能還有崇拜男性的習俗。

當時人們死後埋葬問題,根據現有的材料,是埋在居住房屋之內或居址旁邊的。我們在鎖金村遺址下層,曾發現過人架埋在紅燒土地面附近,另有一小孩骨架埋在紅燒土地面下。至於大批人架的發現,到目前爲止,只有北陰陽營遺址西部葬地區一處,[9]經前後四次發掘,共獲人骨277具。人骨排列無一定方式,但頭多向東北。每一具人骨,都有隨葬品,最豐富的達40件之多。隨葬品中有和青銅器式樣相同的黑皮磨光陶、夾砂的紅陶鬶形器和鏤孔高圈足豆,有通體磨光的石器,製作精美的玉器和瑪瑙器等。

在調查蕪湖青弋江蔣公山時,在山的西部發現很薄的文化層。據採石人說,在山東坡上集中地出土大量石器,一層一層的,還有人骨粉。出土的石器,有七孔刀、穿孔扁石斧、條形𥐻等,和北陰陽營出土的石器差不多完全一樣。這可能是一個葬地區,與西部的居住地相隔百多米。也可能當時人有這種習俗,將生人與死人分開,生人住在山的這一邊,而死人埋在山的那一邊。

## 二、有關"湖熟文化"的幾個問題

從以上所述的各遺址的形狀、地理環境、文化層次和發現的遺跡遺物各方面的特徵,以及對當時人類生產與生活各方面的揣測,我們對"湖熟文化"的面貌,有了初步的認識。自

然又出現一系列的新問題,現在把它們提出來。

第一、"湖熟文化"和一些相類似的文化遺存的關係問題

在淮南瓦阜湖周圍、[10]霍邱城西湖和姜家湖以及壽縣西南、[11]蚌埠西淮河南岸釣魚台與五河縣西北濠城邊沱河北岸大孤堆[12]等處所發現的台形遺址,在形狀上,與江南的台形遺址相同;在地理環境上,也是濱湖沿河,但不是處在山陵地區,而是位於平原上一個個孤立的土墩。這些遺址出土的紅砂陶和某些石器,如穿孔大扁斧、小磅等,也和江南出土的同類器相似,但還沒有發現幾何印紋軟陶。

在江蘇太湖周圍地區發現的許多新石器時代遺址,有些是台形的,有些在山坡上,有些埋在地下。這三種遺址出土的紅砂陶和石器,與"湖熟文化"遺址出土的大致相同;但後一種遺址下層,出有"良渚式"的黑陶,這是"湖熟文化"所沒有的。如吳江團結村,曾集中地出土大量"良渚式"黑陶,並有一層木炭,與良渚情形一樣。這些黑陶和"湖熟文化"的黑皮磨光陶,迥然不同。"良渚式"黑陶近於龍山黑陶,有平底器、鏤空圈足器等;而"湖熟文化"的黑皮磨光陶,却和殷末周初銅器的式樣與春秋、戰國時陶器的式樣相同。

遠至江西清江的贛江平原與沉香溪谷地所發現的遺址,[13]其形狀、地理環境、部分遺物特徵,也都和"湖熟文化"相接近。但許多遺址有大量的幾何印紋硬陶與石器同出,其中部分遺址出土的陶器差不多全是幾何印紋硬陶,與閩西光澤一帶一些遺址出土的遺物情況相似,這是"湖熟文化"所沒有的。

以上所述這些地區的遺址與"湖熟文化"遺址有什麽關係?是屬於一個文化系統,還是互相影響?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第二、江南台形遺址與山坡遺址的關係問題

兩種遺址文化層的厚薄不同,但包含差不多完全一樣。某些地區,同在一地,就有這兩種遺址存在。在錫山公園、溧陽城西羅家山、溧陽社渚農場、溧水城西北窯崗山、蕪湖城東大荊山和蔣公山[14]等處的山坡遺址,文化層都不厚,而且零星地分佈着,面積不大,其分佈地多在山的南面或東南面,其中還有相當大片的紅燒土堆積。所含遺物不豐富,有石器、紅砂陶以及少量的黑皮磨光陶。由此看來,山坡遺址和台形遺址是同屬一個文化系統。也就是"湖熟文化"時代的人們,既住在台形地上,也住在山坡上。我們發掘台形遺址,發現在文化層下面的生土,都是地質上第四紀下蜀系的紅黃色粘土(我們也稱爲黃膠土)。這種土質和附近山崗的土質一樣。而台形遺址周圍的平地,在耕土和堆積的熟土以下,卽爲近藍色的淤泥土,顯係古代湖沼的遺跡。從這些情况可以看出,古代的台形地,係山崗餘脉所構成。這些餘脉在當時的一片沼澤中一小塊一小塊地略爲突出,與山崗相近,當時的人們卽在這些突出的地面上居住,經過多年堆積,文化層愈堆愈厚,同時周圍的水面逐漸下降,因而形成一個個高起的土墩。在當時的情况下,人們對於山脚下的坡地,一定也是利用作居址的。至於現在山坡遺址存在很少的原因,我們揣測,可能當時人們利用台形地作居址較多些,因台形地比山坡具有更有利的條件,如取水捕魚以及防禦野獸等;另外山坡上居址的文化層,易於被高處冲下的水冲掉,所以文化層常較薄或完全不留;而台形遺址,沒有高處冲下來的水,故易於保存。

第三、幾何印紋陶與"湖熟文化"的關係問題

“湖熟文化”的台形遺址，下層普遍存在着泥質幾何印紋軟陶，上層普遍存在着夾砂質幾何印紋硬陶。雖然兩種印紋陶在製作技術上，有原始與進步的區別，但在形制和紋飾上，顯然有先後因襲的關係。[15] 再看浙江嘉興雙橋鎮、武康紅家嶺、温州羅浮山、[16]江西清江、閩西光澤[17]、閩江下游曇石山[18]以及閩南華安、武平和廣東[19] 許多地方所出土的幾何印紋硬陶，雖各有地方的特徵，但與“湖熟文化”遺址上層出土的幾何印紋硬陶，有許多相同之點。那麽印紋硬陶的製作技術，是從南向北發展、還是從北向南發展呢？或者是各地土生土長而相互影響呢？從時代來看，江西、福建、廣東所出土的幾何印紋硬陶，是屬於新石器時代的；而“湖熟文化”遺址與太湖沿岸蘇州、無錫一帶遺址所出的幾何印紋硬陶，只有極少數出於新石器時代文化層中，大多數是出於時代較晚的文化層或墓葬中的。從江蘇省境內幾何印紋硬陶分佈的情況來看，太湖沿岸的蘇州、吳縣、吳江、無錫、震澤等地，爲幾何印紋硬陶密集地區；鎮江、丹徒、武進等地遺址的上層，幾何印紋硬陶數量就較少些；至秦淮河流域的句容、江寧、南京等地的遺址，雖有幾何印紋硬陶存在，爲數就更少了。似乎可以說，幾何印紋硬陶的數量和台形遺址成反比例；就是說，印紋硬陶密集的地方，是台形遺址較少的地區，而台形遺址密集的地區，印紋硬陶却不多。這是什麽原故呢？是否可能太湖沿岸是福建、浙江的幾何印紋硬陶北來的交接地區呢？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第四、“湖熟文化”遺址上下層的關係問題

“湖熟文化”遺址上、下層是有區別的。1. 下層文化層比上層要厚些；2. 下層出土的遺跡，如居住地面、灰坑等，比上層多；3.下層幾何印紋軟陶較多，而硬陶只是極少數，上層反是；4. 下層黑皮磨光陶較多，式樣有的似殷周銅器，上層這種陶極少，式樣似春秋、戰國時的陶器；5. 兩層所出銅器，式樣也不同。不過，儘管兩層有這些不同之點，它們所出遺物，仍表現出先後因襲的關係，而且主要代表“湖熟文化”的紅砂陶與石器，兩層所出，在質料、製作技術、形制各方面，都是相同的，只是上層所出的數量要少些。從以上這些情況來看，我們認爲上、下層是屬於一種文化，而且是連續的，不過時代有先後之分。下層是“湖熟文化”的前期，上層是後期。前期是“湖熟文化”最發達的時期，比後期所經歷的年代要長些。

第五、“湖熟文化”屬於哪一個部族的問題

“湖熟文化”遺址，發現的如此的多，其分佈範圍如此的廣，但其文化遺存都表現出同一面貌，自然是一個部族的遺產，而這一部族，肯定是當地的土著人。按史記吳太伯世家：“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自號勾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裴駰集解引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又引皇覽曰：“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司馬貞索隱引吳地記曰：“仲雍冢在吳鄉常熟縣西海虞山上。”是則當日太伯、仲雍所奔地，在今蘇南地區，而住在當地的土著人，實爲荆蠻族。“湖熟文化”既爲一種土著文化，其中心地區又在江南，則其人亦爲荆蠻族無疑。當時住在台形地上的人們，是否文身斷髮，從考古材料上還沒有得到證據。但看今日台形遺址周圍多水的情況，揣測古代實爲水鄉，這和記載上“常在水中”的話是相合的。

第六、“湖熟文化”與北陰陽營遺址第四層文化的關係問題

從出土遺物來看，代表“湖熟文化”前期的北陰陽營遺址第三層，和它的第四層是有相當的關係的。兩層都出紅砂陶、黑皮磨光陶、穿孔扁石斧、小石碎、陶製或石製的紡輪等，

而且這些陶器和石器的式樣都相同。這些情況似乎告訴我們，第三層文化是從第四層發展而來的。但第四層出土很多的彩繪陶，第三層很少見；而第三層出土很多的幾何印紋軟陶，第四層未曾見過一片。這又說明兩層文化是不連續的。再則第三層灰坑常常打破第四層墓葬的情況，又顯示出，第三層的人對於第四層的墓葬，或者是故意不尊重，或者是遺忘了。第三層出現的冶銅技術，第四層不見一點痕跡，表示兩者在生產上進步與落後有很大的區別。所以我們揣測，這兩層文化，在時間上可能有個相當長的距離，而兩層的人，不一定屬於一個部落。

第七、"湖熟文化"和殷周文化的關係問題

在關於東南地區幾何印紋陶時代的初步探測一文中，我們認爲"湖熟文化"是在殷末周初時期受了中原文化的影響的。其理由是：1."湖熟文化"中的幾何印紋軟陶、黑皮磨光陶與紅砂陶，在形制上，如甗、罍、鬲、甗、簋、盂、皿、豆等器以及附加的耳、鼻和乳丁；在紋飾上，如雲雷紋、貝紋、三角帶紋、弦紋，都和殷末周初的青銅器相似；2."湖熟文化"中的石器，如石戈、石鏃，和殷周的銅戈、殷虛出土的銅鏃形狀十分相似；3."湖熟文化"下層中出現殷末周初式樣的銅刀、銅鏃、銅鼎耳、鼎足，[15]我們到現在還保持這個看法。但也可能"湖熟文化"與殷周文化是各自發展，在某些地方偶然相似，而在另一些地方又相互影響。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第八、"湖熟文化"與烟墩山和奄城銅器的關係以及江南冶銅技術的來源問題

丹徒烟墩山那批銅器，其來源似不一致。一部分器，如宜侯夨𣪘、雙耳龍紋𣪘、圓鼎、弦紋鬲以及帶獸蓋的雙盉，其形制、紋飾與銘文，完全是中原銅器的風格。它們可能是在中原鑄造好而帶到江南來的，也可能是分封在江南的領主在本地設立鑄銅工場、在自己直接的指揮之下而鑄造的。另一部分器，和中原銅器的作風不很相同。例如那對兕觥，背上有小蓋，蓋上有立獸狀鈕；又如祔葬坑中出土的兩件小銅鼎，鼎耳都作立獸狀，這都是中原銅器所少見的。這兩個小鼎的形制，如淺身和帶弧形的扁足，與"湖熟文化"下層出土的一些陶鼎差不多完全一致。最特別的是那一對角狀器，器上的紋飾爲編織紋，與幾何印紋軟陶上的編織紋完全一樣。另同出的幾件馬飾具上紋飾也有同樣的編織紋。這部分銅器，可以相當肯定地說，是在本地鑄造的，所以它們吸收了本地文化的某些特徵而表現出來。這批銅器的鑄造年代，可能有先後的不同。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宜侯夨𣪘是鑄造於西周初年，[20]而同出的一件大銅盤，其紋飾頗像戰國時的蟠螭紋，其鑄造年代不敢肯定。帶有本地文化色彩的那部分銅器，從形制上看，似乎不會晚於西周，也可能和宜侯夨𣪘年代相差不遠。其鑄造年代，正當"湖熟文化"前期發達的時代。

武進奄城出土的那批銅器，[21]從形制、花紋來看，似乎是春秋、戰國之際的產物，同時它們強烈地表現出地方的色彩，例如帶雙虬的三輪盤、帶獸首管狀流的匜、帶扁片狀柄的匜與滿佈針狀紋飾的尊，都是中原銅器中所從來沒有見過的。這批銅器，應該說是本地所鑄造。和這批銅器同層出土的，還有十多件幾何印紋硬陶罐，這些陶罐的形制、花紋和"湖熟文化"上層的幾何印紋硬陶差不多完全一樣。這樣我們可以說奄城這批銅器鑄造的年代，是正當"湖熟文化"後期發達的時代。

既然在"湖熟文化"發展時代，江南地區能製造烟墩山和奄城出土的那樣的精美的銅

器，那江南冶鑄銅器的技術，是由中原傳來、還是由本地發明和發展起來的呢？從現有的材料來看，當殷商後期，中原地區的冶銅技術已達到很高的水準，但在江南地區還沒有這種發現，這表示冶銅技術由北而南的可能性要比較大些，但這不等於否定了江南地區有獨立發明冶銅技術的可能性。

第九、"湖熟文化"時代的社會性質問題

從"湖熟文化"遺存（特別是下層的遺存）的各方面來看，當時人的生活是相當原始的。我們原來的看法，認爲當時的人們，既然過的是新石器時代末期的生活，那當時的社會性質應當還停留在原始社會末期。不過今日看來，我們討論"湖熟文化"時代的社會性質，不應離開北陰陽營第四層文化而孤立地來談。北陰陽營第四層葬地區出土那樣多的隨葬品，包括許多磨製光滑的從來未使用過的石器、精美的玉和瑪瑙器，以及許多專爲隨葬用的陶器等，表示當時生產力已達到相當高度，生活資料的獲得比較容易，因而有剩餘的人力來製造這許多不是生活上所必需的東西。各人隨葬品多少的不同（多的至四十件，少的只有一、兩件），表示當時可能開始有貧富不均的現象。在這個基礎上，就容易產生剝削，產生階級對立。北陰陽營第四層情形是這樣，那後於它的"湖熟文化"，就有產生奴隸制的可能。再從"湖熟文化"遺址下層所發現的冶鑄遺跡（不論這種冶鑄技術是從外面傳來的或在本地發明的），可看出"湖熟文化"前期已進入向金屬時代過渡的時代。向金屬時代的過渡，標幟着生產力的高漲，同時又促進生產力的繼續發展，這就必然會導致社會內部的深刻變革，也就是說，導致階級社會的產生，這是本地自然發生的情况。另外，當"湖熟文化"發展的時候，來自北方的征服者盤據在江南地區，統治着本地人民，同時帶來了在中原地區業已高度發展的奴隸制度，儘管本地人民的生產、生活還處在相當原始的狀態中，而外來的統治者倚靠着對本地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榨，過着驕奢淫佚的生活。烟墩山的那批銅器，大致就是在這種狀況下鑄造出來的。[22]

第十、"湖熟文化"的年代問題

我們認爲"湖熟文化"的年代，上限可至殷商末期甚至更早些，其前期發達年代當西周初葉，這時在江南地區還是銅石並用時代；下限則可至戰國時期，這時早已進入銅器時代了。

以上意見都是很不成熟的，只是問題的提出，希望能獲得有關方面的重視和討論。

## 註釋

[1] 參看南京博物院：江寧湖熟史前遺址調查記 南京附近考古報告 1952 年；
尹煥章、張正祥：寧鎮山脈及秦淮河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普查報告 考古學報 1959 年第 1 期；
南京博物院：南京鎖金村遺址第一、二次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 1957 年第 3 期；
南京博物院：南京安懷村古遺址發掘簡報 考古通訊 1957 年第 5 期；
尹煥章、黎忠義：江蘇江寧元山鎮遺址的試掘與調查 考古 1959 年第 6 期；
南京博物院：江蘇丹徒葛村新石器時代遺址探掘記 考古通訊 1957 年第 5 期。

[2] 尹煥章、張正祥：寧鎮山脈及秦淮河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普查報告，圖一 考古學報 1959 年第 1 期。

[3] 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北陰陽營第一、二次的發掘 考古學報 1958 年第 1 期。

[4] 1951 年湖熟鎮附近遺址出土石器，經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李毓英先生鑑定。

[5] 尹煥章、張正祥：寧鎮山脈及秦淮河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普查報告，圖二，9 考古學報 1959 年第 1 期；

南京博物院：南京安懷村古遺址發掘簡報　考古通訊 1957 年第 5 期，圖版叁，3。

[6] 用鏃安在桿上刺魚，在古代很普遍，現代少數民族，如海南島黎族，還有這種習慣。

[7] 1952 年經中國科學院秉志先生鑑定：蛤蜊殼爲 *Corbicula* 科 *Cyrenidae* 屬，蚌殼爲 *unionidae* 科 *unio* 屬，均係淡水產。

[8] 南京博物院：南京鎖金村遺址第一、二次發掘報告，圖版肆，3—6　考古學報 1957 年第 3 期。

[9] 同[3]

[10] 王　湘：安徽史前遺址調查報告　中國考古學報第 2 册，1947 年。

[11] 華東文物工作隊：四年來華東區的文物工作及其重要發現　文物參考資料 1954 年第 8 期。

[12] 治淮陳列館、安徽博物館、南京博物院 1957 年合組治淮文物工作隊的資料。

[13] 饒惠元：江西清江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考古學報 1956 年第 2 期。

[14] 尹煥章、張正祥：寧鎮山脈及秦淮河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普查報告　考古學報 1959 年第 1 期。

[15] 尹煥章：關於東南地區幾何印紋陶時代的初步探測　考古學報 1958 年第 1 期。

[16] 尹煥章：華東新石器時代遺址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

[17] 福建省文管會：福建光澤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報告　考古學報 1957 年第 1 期。

[18] 福建省文管會、華東文物工作隊：閩侯曇石山新石器時代遺址探掘報告　考古學報第 10 册，1955 年。

[19] 林惠祥：福建南部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考古學報第 8 册，1954 年。

[20] 郭沫若：矢毀銘考釋　考古學報 1956 年第 1 期。

[21] 參看倪振逵：奄城出土的銅器　文物 1959 年第 4 期。

[22] 關於"湖熟文化"社會性質問題的一些看法，我們採用了周邨同志的意見。

# ON THE "HU SHU CULTURE"

TSÊNG CHAO-YU AND YIN HUANG-CHANG

The remains of the "Hu Shu Culture" are found along the bank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provinces of Kiangsu and Anhui. Their date ranges from the end of the Neolithic through the Bronze Age. Between March, 1951 and June, 1959, a total of 159 sites of this culture had been discovered of which fourteen were also excavated. An interseting feature of all these sites is that they are almost invariably located on flat-topped high grounds which fact gives rise to the name "*tai*-shaped site" ("台", raised platform). These high grounds usually attain a height of 6—7 meters above the ground level and measure 6,000—7,000 square meters at the top. Their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ften falls into either one of the following catagories: 1) lying on the southern bank of the Yangtze with its back adjoining some earthen hills; 2) spreading along the banks of a small river which winds its way around the foothills of big mountains on both sides; and, 3) standing at the bottom of a basin surrounded on all sides by mountains and hills.

The deposits at these sites often reach a depth of about three meters which reveals two distinctive layers. Consisting of layers of evenly distributed soft ashes, the upper layer usually yields stone implements, coarse red ware, hard ware with impressed geometric design, a few black polished ware (mostly in the familiar Ch'ung Chiu and Warring States shapes of "hu", "kuan", "p'ên", etc.), bronze bells, chisels and arrowheads. The upper part of the lower layer often reveals a thin layer of baked red clay which originally might have served as a kind of floor, along with some lumps of baked red clay and remains of kiln sites and workshops of stone implements. The soft grey ashes of this layer contain a generous amount of straw ashes and baked

clay. In addition to the stone implements and coarse red ware which constitute the bulk of the artifacts, there are also some polished black ware similar in both shape and decoration to the bronzes of the Yin and Chou, a few pottery with impressed geometric design and the remains of bronze workshops.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collected in recent years has provided us with some interesting picture of the life of the people of this culture. Thus, we know that for the most part they used composite stone implements in production. The abundance of the stone sickle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stone pestles seem to suggest that farming must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ife of these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rich remains of animal bones (cattle, goat, dog, and pig) as well as those of fish bones, shell, snails and pottery net sinkers show that they also lived on fish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However, the presence of large quantity of remains of deer and other beasts suggests that hunting was still very important. That they mastered the art of weaving as well, in addition to making pottery and casting bronze, is borne out by the discovery of spinning whorls. Their dwellings were usually provided with a level earthen floor which was sometimes dried with fire. Near the layer of baked clay the excavators often came upon oval-shaped storage pits and rectangular fire holes. The discovery of a pottery wind instrument called "tao hsün" (陶壎) and some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for divination indicates that they also had some form of music playing and religious belief. Their dead was usually buried near the dwellings.

The authors make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s regarding the "Hu Shu Culture":

(1) There exist many points of similarity as well as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u Shu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tai*-shaped" sites of northern Anhui, southern Kiangsu (around the shores of the Tai Hu) and Ch'ing Kiang County of Kiangsi on the other. This fact gives rise to the question as to the real nature of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2) In spite of the difference in the thickness of their respective deposits, the artifacts unearthed at the "*tai*-shaped" sites are almost identical to those found at the "slope-type" sites. This seems to suggest the possibility of the people of the "Hu Shu Culture" having occupied both types of sites.

(3) The pottery with impressed geometric design unearthed from the lower layer of the "*tai*-shaped" sites includes both the primitive and advanced typ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semblance between this ware and the hard pottery with impressed geometric design found in Chekiang, Kiangsi, Fukien and Kwangtung also raises the issue as to the origin of this distinctive type of pottery in Neolithic China. Was it first originated in the south and then transmitted to the north——or vice versa? Or else each region started to make this ware independantly but later came under mutual influences?

(4) The upper and lower layers of the "Hu Shu Culture" represent two unbroken stages of the same culture with the difference that the latter flourished for a longer duration of time than the former.

(5) The fact that all the sites of the "Hu Shu Culture" show the same basic characteristics may be taken as an indication that they all belong to a single tribe who was probably indigenous to the area.

(6) Judging on the basis of the excavated objects, there is a certain connection between the fourth and the third layer which represents the early stage of the North Ying Yang Ying site. However, the two are not continuous and there is also a marked improvement in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of the fourth layer. This latter fact shows that there must have been a considerable time gap between the two layers which opens up the possibility of their not belonging to the one and same tribe.

(7)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seems to indicate that the "Hu Shu Culture" came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North China at the end of Yin or in early Chou.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the two cultures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for a very long period during which any resemblance between them was merely accidental.

(8) Some of the bronzes unearthed at Yen Tun Shan, Tan T'u County, Kiangsu, show distinctiv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shapes suggest that their date could not have been posterior to the Western Chou. They are accordingly attributed to the height of the early stage of the "Hu Shu Culture." Likewise, the bronzes unearthed at Yen Ch'eng, Wu Chin County, Kiangsu are attributed to the height of the later stage of this culture corresponding to the period between the Ch'un Chiu and Warring States. The authors are also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art of casting bronzes was probably introduced from the north.

(9) The objects excavated from the fourth layer of the North Ying Yang Ying site show that the productive force of the time had already attained such a high level that it was possible to divert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labor for the production of luxurious funerary objects. This fact suggests that there was already a marked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at so early a stage. It also stands to reason that the emergence of the slavery system would have been a likely event during the later and more developed period of the "Hu Shu Culture".

(10) The authors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Hu Shu Culture" dated from the end of Yin or perhaps even earlier and flourished until the Warring States, attaining its first peak of development about the time of early Western Chou. However, in Early Western Chou time the "Hu Shu Culture" was still slumbering in the Chalcolithic and did not enter the Bronze Age until much later.

# 安徽屯溪西周墓葬發掘報告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

目　　次

一、引言
二、墓地簡述和發掘概況
三、墓葬結構
四、隨葬的遺物
(一)陶器　(二)釉陶器
(三)青銅器　(四)玉件及漆皮殘跡
(五)值得重視的幾個問題
五、對出土遺物的初步研究
(一)屯溪的古代釉陶工業
(二)屯溪青銅器的冶鑄
六、結束語

## 一、引　　言

安徽屯溪市地當皖、浙、贛三省交通要衝，四面環山，地勢拔海 130.8 米，是新安江上游山區的一大商業中心地。解放後，在黨的領導下，開始設市，以進行有計劃的開發皖南富源，於是屯溪市的面貌，便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新景象。

1959 年 3 月間，在屯溪市西郊發見了兩座西周墓葬，出土有一大羣釉陶器和青銅器等珍貴資料。參加這兩座墓發掘的人員有：安徽省文化局葛伯和、殷滌非、陳廷獻、張道宏，還有休寧縣和屯溪的文教局和文化館幹部吳慶鈺、舒肇祖、鄭寶榮等同志。參加這篇報告室內整理的人員中，還有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派劉國強同志為出土器物攝影，安徽省博物館金潤生、陳碩甫兩同志分任器物修復和銅器花紋拓印工作。

在未編寫本篇報告以前，安徽省文化局曾專就這兩座墓出土遺物召開一次學術研究座談會。大家一致認為這兩座墓的清理發掘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既豐富了我國青銅器文化的研究內容，而且為周代前期歷史提供了極重要的實物資料，因此，便促使本篇報告加速成稿。

## 二、墓地簡述和發掘概況

墓地位於皖南屯溪市西郊，距屯溪約 5 公里，在新安江南岸奕棋自然村南約 1 公里的地方，在廣闊的平坦肥田沃地中，有一條自東而西的崗巒。這兩座周墓，一座在這條崗巒將要終結的中脊地方；一座則在崗巒終結的南邊田畈間的一個不甚高大的孤堆下。孤堆

下的這座墓(第1號墓)先發見,先進行發掘,後於崗巒中脊發見第2號墓,也跟着加以發掘。在墓上層曾發見了幾座漢代塼室和土坑殘墓。

墓2在墓1東北約0.25公里許的地方,墓底已殘缺不全,出土遺物較少。墓1的孤堆上部分雖然也有些破壞,但保存情況仍然非常完整,成爲我們重點發掘的對象。全部發掘工作,自3月27日開始,至4月4日結束。出土遺物,除漢代殘墓所出者由休寧、屯溪文教局留下供地方博物館陳列外,兩座周墓所出文物全部運至合肥,交安徽省博物館保管陳列。

## 三、墓葬結構

這兩座墓的結構與一般墓葬有所不同,有坟堆而無墓穴,是一個新的營造墓葬的法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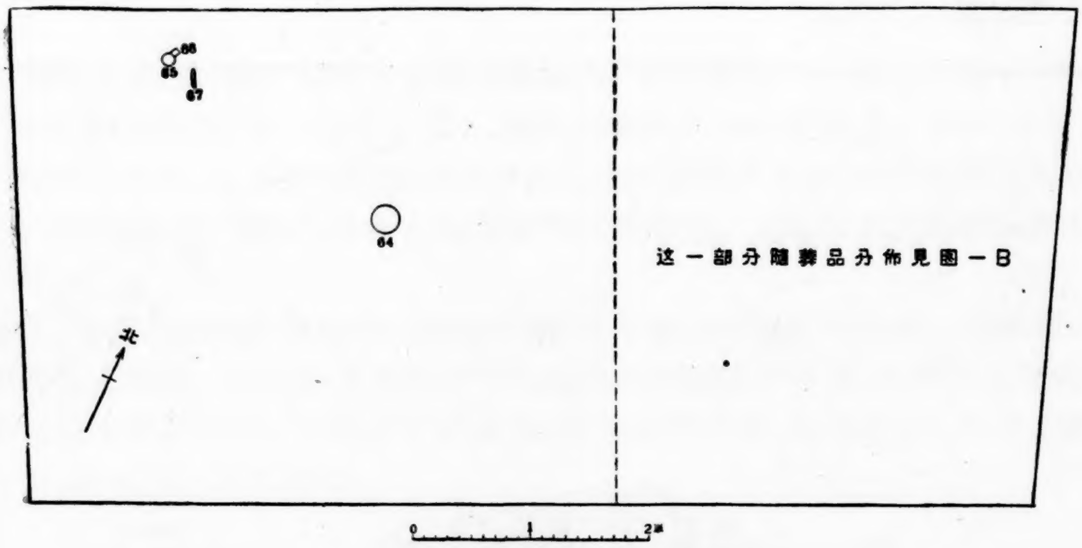
第1號墓

方向爲110度。墓底的地面高出現存田畈的地平面,在墓底地面上加鋪一層厚約25厘米的鵝卵石作爲墓底,其上再加封土,即完成了這座墓葬的營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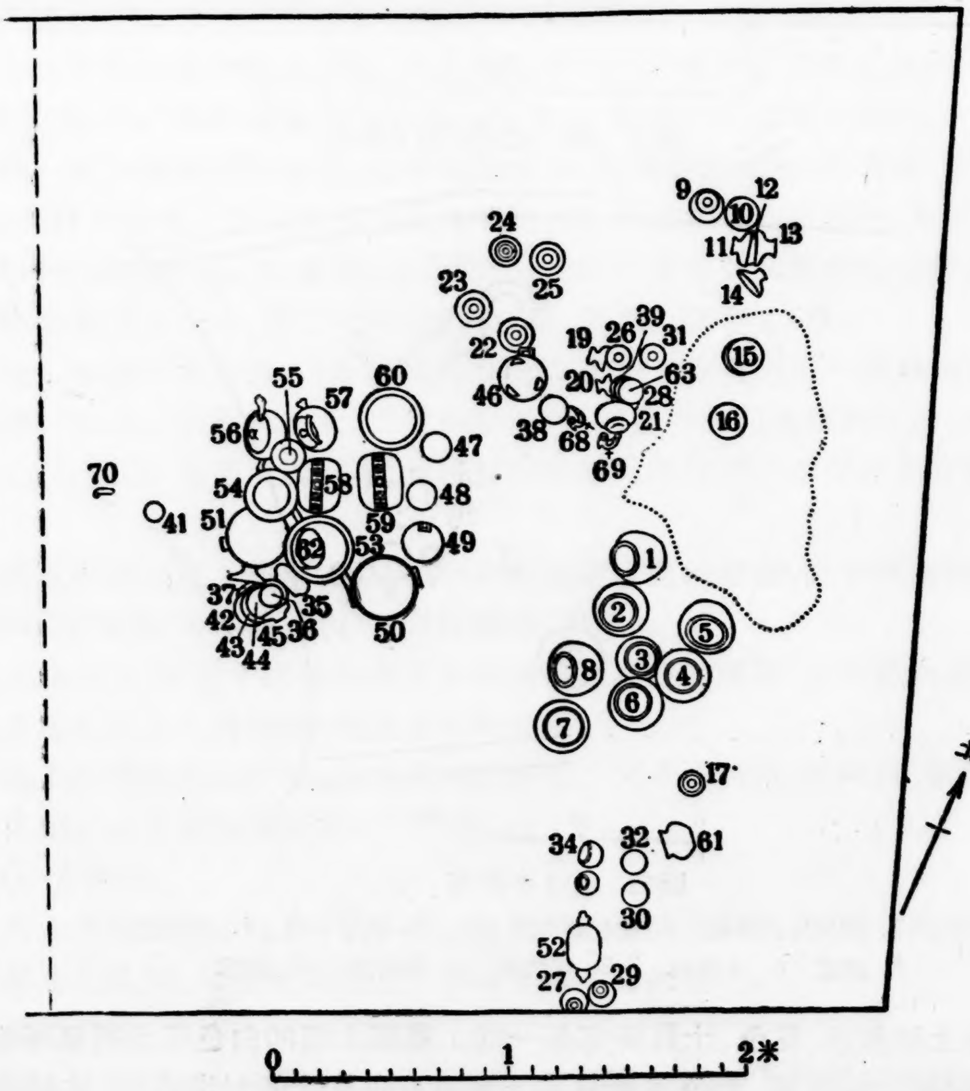
鵝卵石的鋪砌方法,其下層(即與地底面相接的那一層)似乎是任意堆填於地面使之平坦的,因而還看不出每個鵝卵石相接砌的痕跡。上層(即墓底表面的一層)鵝卵石則是一個銜接一個的縱橫連續接砌的,石身大都是側面橫立,也有少數是平面橫擺的。其側面或平面的排砌都很整齊有序,以緯爲度,以經相承,砌成的墓底平面中間稍高,四邊斜下,但坡度不甚顯著,形成有一個微小弧度的底平面。四周底邊又由墓底向外弧出,接砌成向外弧的向下低入的溝漕。這大約是造墓者用此方法,既可鋪石防潮,又可使之起到散水和出水的作用。

墓底平面的東北角,又和其他角的平面結構不同,有一特殊做法。它是把這個墓底角平面再向下低至10—15厘米左右,與現存孤堆邊沿的地平面近平,形成一個墓底高、角平面低的三角形的台階似的。其三角形的勾長0.75,股長1米,其弦的對角就是墓底面的東北角。它的三邊鋪石結構:勾、股兩邊是和墓底邊做法一樣,也是由墓底向外弧出向下低入成漕溝,與墓底邊的東邊和北邊直線相連;弦邊與墓底東頭向下低入的邊沿相接,形成"凹"字溝漕,其左右兩端與墓底的東邊和北邊的溝漕相接,由東北向西南順着弦邊的方向逐漸坡下。這個三角形底平面的鵝卵石鋪法,也大都是側面橫立接砌,但也有奇特的地方,在這低下的三角形底邊靠近墓底的地方(即墓底的東邊),有用4塊同大的鵝卵石嵌砌成圓形的四瓣花。

整個墓底鋪石是東西長、南北寬的長方形,它的長寬尺度恰爲二與一之比。其南、北兩邊沿各長8.5,中間全長8.8;東、西兩邊沿各寬4.3,中間整寬4.4米。四周以鋪砌鵝卵石爲界,沒有墓坑,也沒有墓壁,它是在鵝卵石層面上加堆封土,因而形成一個圓形孤堆。孤堆的直徑長33.1米,由鵝卵石層面的墓底至現存孤堆頂高1.75米,墓底居孤堆中部偏西2米左右的地方。封土係極純淨的粘土,既無砂粒,又無腐朽物,也未夯打,土質非常鬆軟,觀其花色均勻,可能是經過精細的調拌。在靠南和靠西的孤堆坡邊上層封土,係紅色雜花土,也同樣是沒有砂粒和腐朽物的純淨粘土;下層爲白色花土,厚約75厘米,與墓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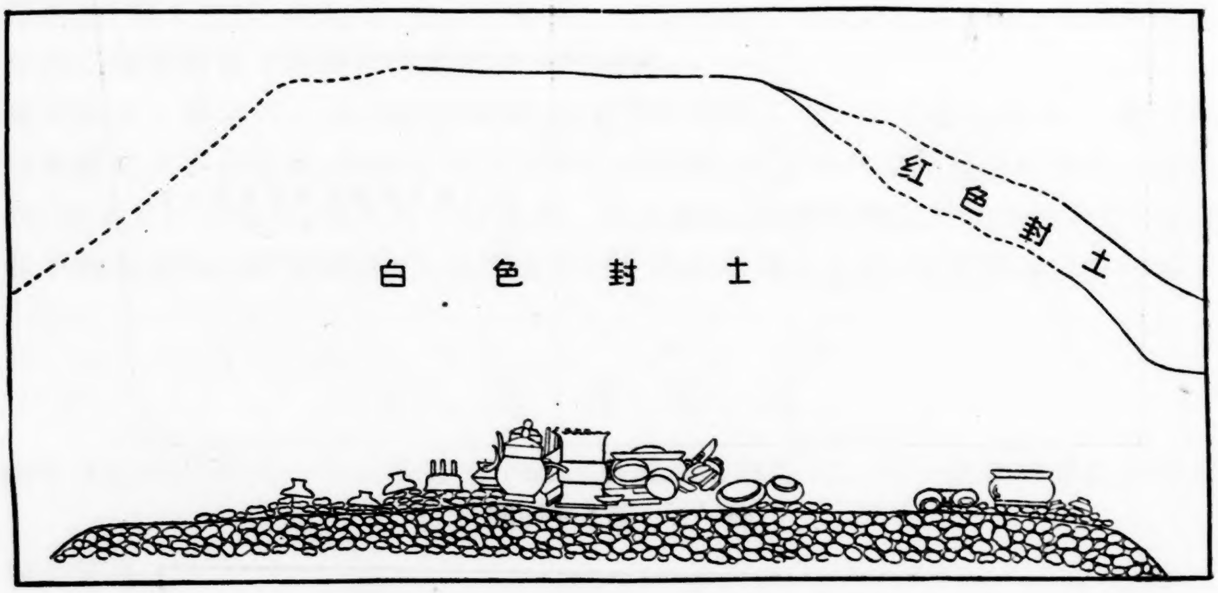



圖一A　墓1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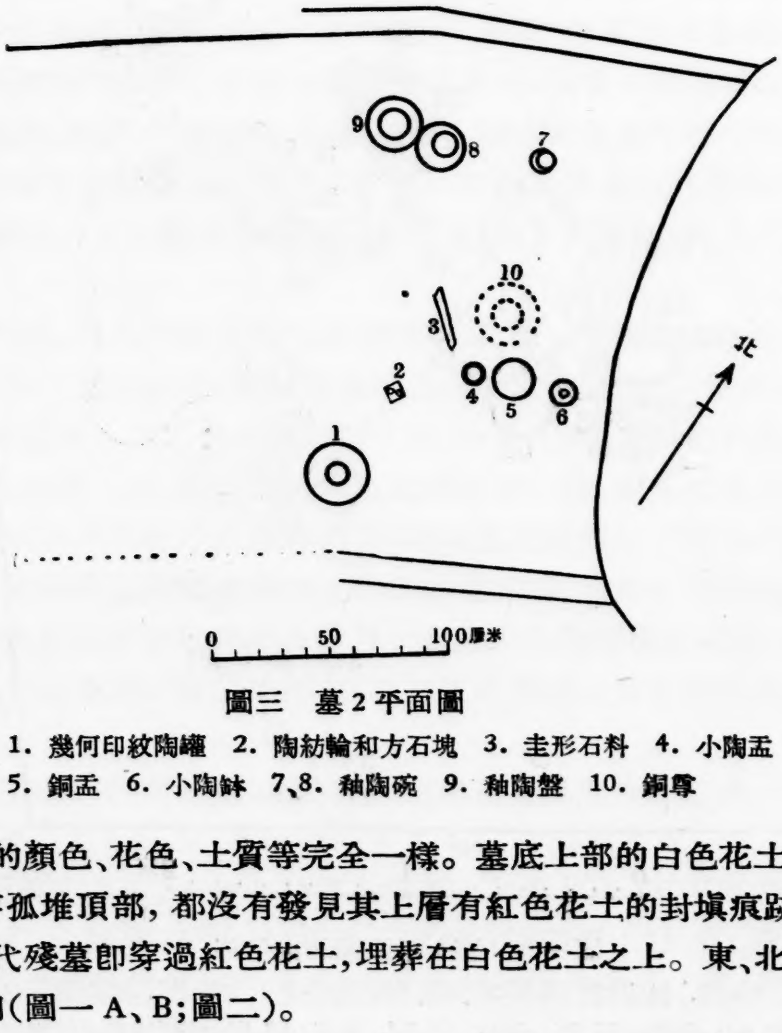



圖一B　墓1平面圖的東半部

1—8. 釉陶罐　9—32. 釉陶豆　33—37、62、63. 釉陶盂　38—45. 釉陶碗　46—49. 銅鼎　50、51. 銅盤　52、53. 銅毁　54、55. 銅尊　56、57. 銅卣　58、59. 銅"鐘形五柱樂器"　60. 銅盂　61. 釉陶尊　64. 三足銅器　65. 砂陶鉢　66. 礪石　67. 白色石條　68、69. 銅鳥飾　70. 玉飾　（虛線圈內在發掘前取出釉陶罐、豆、盂、盂、尊、碗等22件）




圖二　墓1立面及封土情况




圖三　墓2平面圖

1. 幾何印紋陶罐　2. 陶紡輪和方石塊　3. 圭形石料　4. 小陶盂
5. 銅盂　6. 小陶鉢　7、8. 釉陶碗　9. 釉陶盤　10. 銅尊

上部的全部填土的顏色、花色、土質等完全一樣。墓底上部的白色花土較孤堆南邊白色花土爲厚，直至現存孤堆頂部，都沒有發見其上層有紅色花土的封塡痕跡，其厚爲 1.75 米左右。墓西側的漢代殘墓卽穿過紅色花土，埋葬在白色花土之上。東、北兩坡邊上層封土因已取去，情况不明（圖一 A、B；圖二）。

第2號墓

方向爲 120 度。它是位於一個自東而西的起伏崗巒將終結的地方。墓的營造方法，

基本上與墓1結構一致。墓底也是鋪砌鵝卵石，東西殘長5.2，南北全寬2.2米。兩頭已殘，東頭爲漢代殘窰打破。也沒有墓坑，但有用鵝卵石堆砌高約25，厚約10厘米的南、北兩邊的矮壁。因此，這座墓在兩壁的底平面上也不接砌成溝漕，形成的鵝卵石鋪底面接近水平，因而推知原東、西兩端也定有鵝卵石堆砌的矮壁，這是與墓1的結構稍有差異的地方(圖三)。

總之，這兩座墓的營造結構，在我國已發見的古墓中還是新出的一個範例。這種平地無墓坑的封土葬法，很可能與皖南新安江流域的地理條件有關，因爲平地挖坑易於出水，不如平地封土較爲適宜。而鵝卵石的鋪砌，旣有防潮作用，又是新安江沿岸河灘上易於取得的材料，故利用它來作墓底。

## 四、隨葬的遺物

兩墓的遺物都是排列有序的放在鵝卵石的底面之上。墓1的遺物除少數幾件在墓底西頭偏北地方和中間偏西的地方外，其餘遺物都有序的集中排列在墓底的東頭(圖一，A、B；圖二；圖版壹，1)。根據東頭遺物的排列次序，大體可以分爲兩大組。

第一組：在東頭靠東的地方，以釉陶器爲主，就其器類來說，計有尊、盉、碗、豆、盂、罐等，由南向北橫列成排。其偏南邊的是釉陶豆、盂、I式尊及素面銅毁；居於中的全爲釉陶罐；偏於北邊的爲釉陶豆、盂、銅鼎、銅鳥飾等；在此二者之間又靠東接近墓底邊緣的地方，在未發掘前的取土工程中，還挖出有釉陶尊、盉、豆、碗、罐等22件。

第二組：在第一組之西，以青銅器爲主，僅其西南側聚集叠置一些釉陶盂、碗、豆，其餘全是青銅器。雙卣一盂縱列在北；二尊斜置於西；二盤一毁間隔縱放在南；三鼎橫排在東，兩件"鐘形五柱樂器"相並放於其中，並在盤和毁的兩器口沿之間存有朱紅漆皮殘跡(圖版壹，2)。

墓2的遺物不如墓1豐富，也是集中分佈在墓底面的東頭，計有釉陶碗、盤；灰陶鉢、盂；幾何形印紋陶罐；青銅鼎、盂和陶質紡輪等(圖三)。

根據上述情況，兩墓中的遺物都是集中地放在墓底的東頭，這可能與墓的葬式有關。它們如果不是在墓主人的頭部，便是在他的足部。

兩墓出土的遺物共102件，以其質地區別它，可分爲陶器、釉陶器、銅器、玉石件和漆皮殘跡等五類。玆分別叙述於後：

(一) 陶器

兩墓出土的陶器數量極少，共6件。其質地計有泥質灰陶、夾砂紅陶和幾何印紋硬陶三種。按其功用區別，又可分爲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器兩類。

**1. 生產工具類**

**陶紡輪**　2件(2:76、2:77)。泥質灰陶，中腰鼓出向上下斜殺形成腰部的尖銳脊稜，兩端面平，正中縱穿一孔，形如算珠。其腰徑3.5，兩端平面徑1.8，高2厘米。出土時兩件並放在一個正方扁平的紅砂石塊上(圖版拾捌，5)。

**2. 生活用器類**

**小陶盂**　1件(2:73)。泥質灰陶，腹壁接近垂直，色近黑，雙耳平底，口腹不成正圓，

手製。腹徑 10.4，高 4 厘米(圖版拾捌，3)。

小陶鉢　1 件(2:74)。泥質灰陶，斂口方肩，最大徑在肩腹間，自肩而下漸收小，平底，手製。腹徑 10.1，高 1.4 厘米(圖版拾捌，4)。

砂陶鉢　1 件(1:99)。夾砂紅陶，出土時已經破碎成小片，堆於墓底面的西北角，其下還壓着一塊紅色細膩的礪石。據其殘片復原，知係方肩，斂口，直壁，平底，形如小陶鉢。

幾何印紋硬陶罐　1 件(2:69)。色深灰近黑，火候高，泥條圈叠製成，平底，鼓腹，短頸，口沿微外捲，頸表面有細密的弦紋，頗似刮削留痕，腹部表面全部模印以斜鉤相連的幾何形陰紋圖案(圖七，16)。腹徑 19.4，高 11.2 厘米(圖版拾柒，3)。

（二）釉陶器

釉陶器是這兩墓出土遺物數量最多的一種，共 71 件，佔全部出土器物總數的 2/3 強。就其器類區別之，計有碗類、盂類、豆類、尊類、盉類、盤類和罐類等。

1. 碗類器

說文："盌、小盂也"。盌俗作碗。這些釉陶中的碗共三式 11 件。Ⅰ式和Ⅲ式碗形近似，惟口沿外折程度稍有區別。Ⅰ式碗口沿外折與腹壁相連構成角度，口沿面向內傾斜有弦紋三道。Ⅲ式碗口沿與腹壁相連接處成弧度，口沿面平。Ⅱ式碗口沿外折，圓肩，腹最大徑在肩上，自肩而下漸下收，口沿與肩壁相連構成內凹的口壁，口沿面內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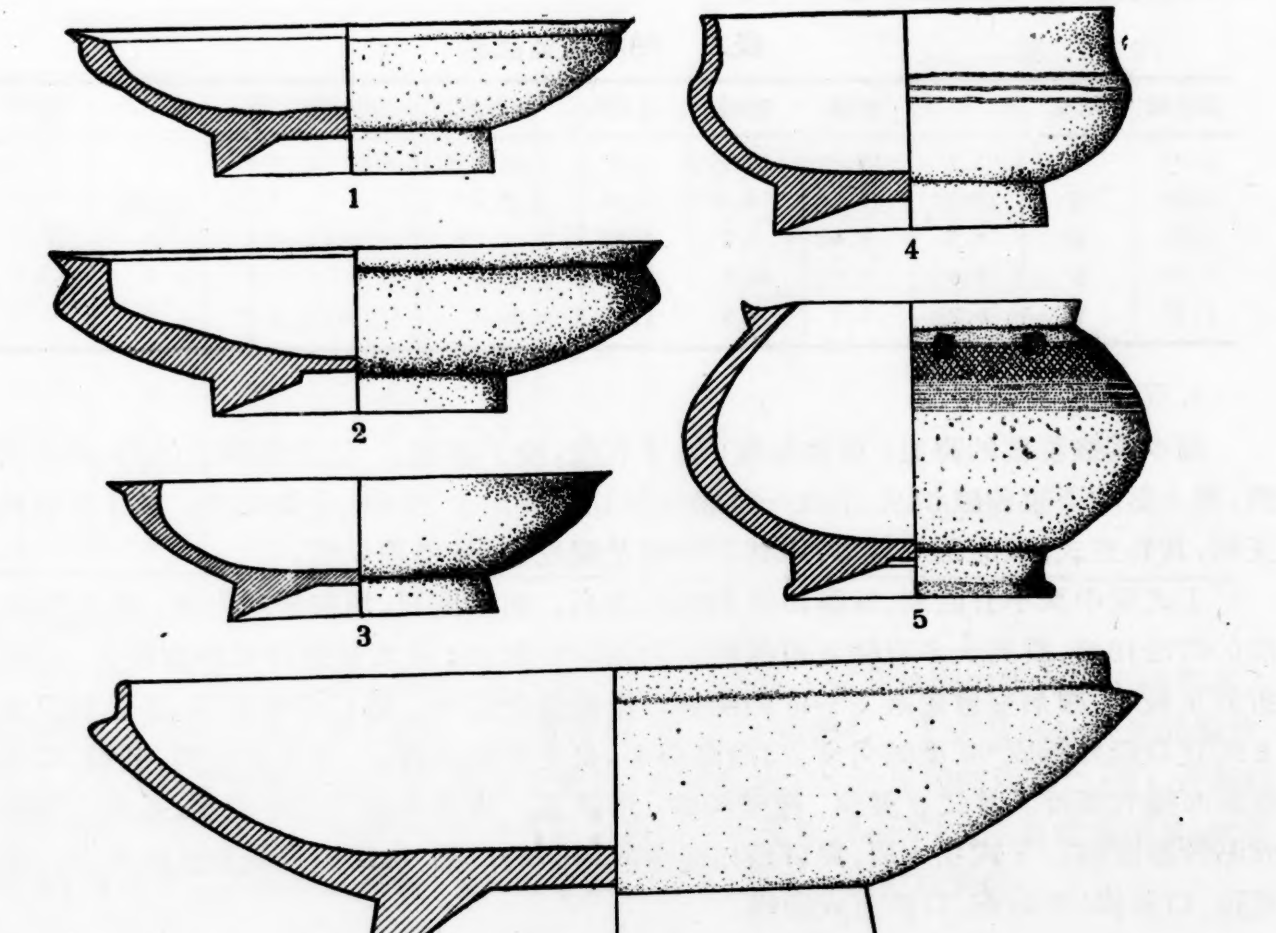
**表一　釉陶碗登記表**

(尺寸以厘米爲單位，以下同)

| 器物號 | 類型 | 高 | 口徑 | 腹徑 | 足高 | 圖版號 | 插圖號 | 備註 |
|---|---|---|---|---|---|---|---|---|
| 1:38 | Ⅰ | 3.9 | 11.8 | 11.2 | 1.0 | | 七，12 | 器底有劃紋符號 |
| 1:39 | Ⅰ | 3.0 | 11.8 | 11.0 | 0.9 | 拾伍，3 | 四，1；七，10 | |
| 1:40 | Ⅰ | 3.5 | 11.6 | 11.0 | 1.0 | | | |
| 1:41 | Ⅰ | 3.6 | 12.2 | 11.4 | 0.8 | | 七，11 | |
| 1:42 | Ⅰ | 2.8 | 9.5 | 8.7 | 0.7 | | 七，8 | 底有用黑色塗寫的記號和劃紋符號 |
| 1:43 | Ⅰ | 2.7 | 8.9 | 8.4 | 0.7 | | | |
| 1:44 | Ⅱ | 3.7 | 12.5 | 12.3 | 1.0 | 拾伍，4 | 四，2；七，13 | |
| 2:70 | Ⅱ | 4.4 | 13.0 | 12.0 | 1.2 | | | |
| 1:45 | Ⅲ | 3.0 | 12.5 | 11.4 | 0.8 | | 七，14 | 未發掘前出土 |
| 1:46 | Ⅲ | 3.0 | 10.4 | 9.4 | 1.0 | 拾伍，5 | 四，3；七，7 | |
| 2:72 | Ⅲ | 8.4 | 20.8 | 20.1 | 2.5 | | | |

2. 盂類器

說文："盂、飯器也"。出土的釉陶盂，在墓中與釉陶碗、豆同出於一個地點，應爲食器。盂亦可盛水，所謂水盂，與碗、豆一起出土，亦可爲水漿之器。盂共出土 5 件，分五式。Ⅰ式盂鼓腹，圓肩，豎口沿，圈足，底下有黑色塗寫的"十"形字跡(圖版拾貳，4、5)。Ⅱ式盂有矮小的外折口沿。Ⅲ式盂頸部與口部相混爲一體，無明顯的分界線。Ⅳ式盂斂口鼓腹。Ⅴ式盂外折口沿較Ⅱ式盂爲高，口沿面微成凹弧，腹有小鈕已殘斷。




圖四 釉 陶 器

1. Ⅰ式碗(1:39) 2. Ⅱ式碗(1:44) 3. Ⅲ式碗(1:46) 4. Ⅲ式盂(1:35) 5. Ⅴ式盂(1:37) 6. 盤(2:71)
7. Ⅰa式豆(1:5) 8. Ⅱ式豆(1:24) 9. Ⅵ式豆(1:32) 10. Ⅳ式豆(1:30) 11. Ⅲ式豆(1:29)

## 表二 釉陶盂登記表

| 器物號 | 類型 | 高 | 口徑 | 腹徑 | 足高 | 圖版號 | 插圖號 | 備 註 |
|---|---|---|---|---|---|---|---|---|
| 1:33 | I | 5.1 | 14.0 | 15.1 | 1.3 | 拾貳,4、5 | | |
| 1:34 | II | 3.3 | 5.7 | 6.6 | 0.3 | 拾貳,6 | | 灰青釉 |
| 1:35 | III | 4.5 | 8.4 | 8.7 | 1.2 | 拾叁,1 | 四,4;七,4 | |
| 1:36 | IV | 4.8 | 8.3 | 10.1 | 1.0 | 拾叁,2 | | |
| 1:37 | V | 6.2 | 6.8 | 9.5 | 1.0 | 拾叁,3 | 四,5;七,5 | |

3. 豆類器

豆本爲盛黍稷的器皿，腹淺如盤，盤下有校，校下有鐙。這批釉陶豆的鐙、校混爲一體，與上盤的下腹收斂相連，形成一種體矮的豆。共出土32件，分爲六式。其I式豆尙存豆制，其餘五式，頗似碗或盂形，以其下的圈足似豆鐙，故仍列豆類。

I式豆中又小有區別，Ia與Ib區別在於腹肩，前者圓肩，肩壁微向內收，與外折近90度的口沿相接，腹周大多有雙乳釘的附飾對稱貼於器面；後者肩壁內收斜度較大，口沿外折斜度較小，腹肩交會處近方；Ic肩部與口沿關係近似Ia，惟口沿面近平，有弦紋三道。II式豆口沿外折成90度的角度，口沿面全平，也有弦紋三道。III式豆鼓腹，圓肩，口沿近垂直而微有弧度。IV式豆鼓腹，腹壁較深，形似盂，腹周分佈三個小鈕鋬，是用二泥條捏成貼於器面的。V式豆方肩，與口沿相接構成內凹的口壁，口沿面內斜有弦紋三道。VI式豆腹、口外侈，形如碗，口沿面成凹槽。

## 表三 釉陶豆登記表

| 器物號 | 類型 | 高 | 口徑 | 腹徑 | 足高 | 圖版號 | 插圖號 | 備 註 |
|---|---|---|---|---|---|---|---|---|
| 1:1 | Ia | 5.7 | 12.5 | 12.8 | 1.7 | | | |
| 1:2 | Ia | 5.6 | 11.9 | 12.9 | 2.0 | | | |
| 1:3 | Ia | 6.1 | 12.0 | 12.8 | 1.8 | | | |
| 1:4 | Ia | 5.9 | 12.5 | 13.3 | 1.7 | | | |
| 1:5 | Ia | 7.2 | 13.8 | 14.0 | 2.4 | | 四,7 | |
| 1:6 | Ia | 5.8 | 12.3 | 13.0 | 1.8 | | | 發掘前出土 |
| 1:7 | Ia | 6.6 | 12.6 | 13.4 | 2.6 | | | |
| 1:8 | Ia | 5.6 | 12.3 | 12.8 | 1.7 | | | 發掘前出土 |
| 1:9 | Ia | 6.1 | 12.5 | 13.0 | 2.0 | 拾壹,1 | | |
| 1:10 | Ia | 6.5 | 13.3 | 14.1 | 2.3 | 拾壹,2 | | |
| 1:11 | Ia | 5.5 | 11.8 | 12.5 | 2.2 | | | |
| 1:12 | Ib | 5.2 | 9.7 | 10.6 | 1.7 | 拾壹,3 | | |
| 1:13 | Ib | 5.4 | 8.6 | 10.0 | 2.0 | | | |
| 1:14 | Ib | 5.6 | 9.2 | 10.7 | 1.5 | | | 發掘前出土 |
| 1:15 | Ib | 5.3 | 9.5 | 10.7 | 1.6 | | | |
| 1:16 | Ib | 4.8 | 8.4 | 9.7 | 2.1 | | | 足殘存小半,發掘前出土 |
| 1:17 | Ib | 5.7 | 8.5 | 9.7 | 2.3 | | | 發掘前出土 |
| 1:18 | Ib | 5.1 | 8.3 | 9.5 | 2.0 | | | |
| 1:19 | Ib | 5.1 | 8.0 | 9.5 | 2.0 | | | |
| 1:20 | Ib | 4.3 | 6.9 | 8.8 | 1.5 | | 七,1 | 底有劃紋符號 |
| 1:21 | Ib | 4.7 | 8.3 | 9.6 | 1.6 | | 七,2 | 底有劃紋符號,發掘前出土 |

(續 上 表)

| 器物號 | 類型 | 高 | 口徑 | 腹徑 | 足高 | 圖版號 | 插圖號 | 備 註 |
|---|---|---|---|---|---|---|---|---|
| 1:22 | Ic | 4.9 | 10.3 | 10.8 | 1.5 | 拾壹,4 | | |
| 1:23 | Ⅱ | 3.8 | 10.2 | 10.0 | 1.0 | 拾壹,5 | | 灰青釉 |
| 1:24 | Ⅱ | 4.0 | 10.1 | 10.1 | 1.2 | | 四,8 | |
| 1:25 | Ⅱ | 3.7 | 11.1 | 10.1 | 1.3 | | | 發掘前出土 |
| 1:26 | Ⅱ | 4.2 | 11.1 | 9.7 | 1.2 | | | 發掘前出土 |
| 1:27 | Ⅱ | 3.1 | 7.9 | 7.2 | 1.2 | | | 灰青釉 |
| 1:28 | Ⅱ | 3.2 | 7.7 | 6.8 | 0.9 | | | |
| 1:29 | Ⅲ | 4.8 | 8.6 | 9.9 | 1.1 | 拾壹,6 | 四,11 | |
| 1:30 | Ⅳ | 5.6 | 13.4 | 14.2 | 0.8 | 拾貳,1 | 四,10 | |
| 1:31 | Ⅴ | 3.9 | 10.4 | 10.4 | 1.5 | 拾貳,2 | 七,3 | 底有劃紋符號 |
| 1:32 | Ⅵ | 3.6 | 12.5 | | 1.8 | 拾貳,3 | 四,9 | |

4. 尊類器

尊 7 件。形侈口，斂頸，鼓腹，圜底或平底再加圈座。這些釉陶中近似尊形的都列入尊類，就其形制的差異分爲三式。Ⅰ式尊折肩，侈口，下有圈足。Ⅱ式尊形如常見的銅尊，其中Ⅱa 式尊腹最大徑偏於下腹，頸壁垂直，口成斜直線向左右展開而成侈口；Ⅱb 式尊腹最大徑偏於上腹，頸壁成曲線，口壁成外弧曲線向左右展開而成侈口。 Ⅲ式尊中Ⅲa式侈口較高，腹周有二泥條揑成的鈕；Ⅲb 式尊侈口較矮，腹有小乳釘以爲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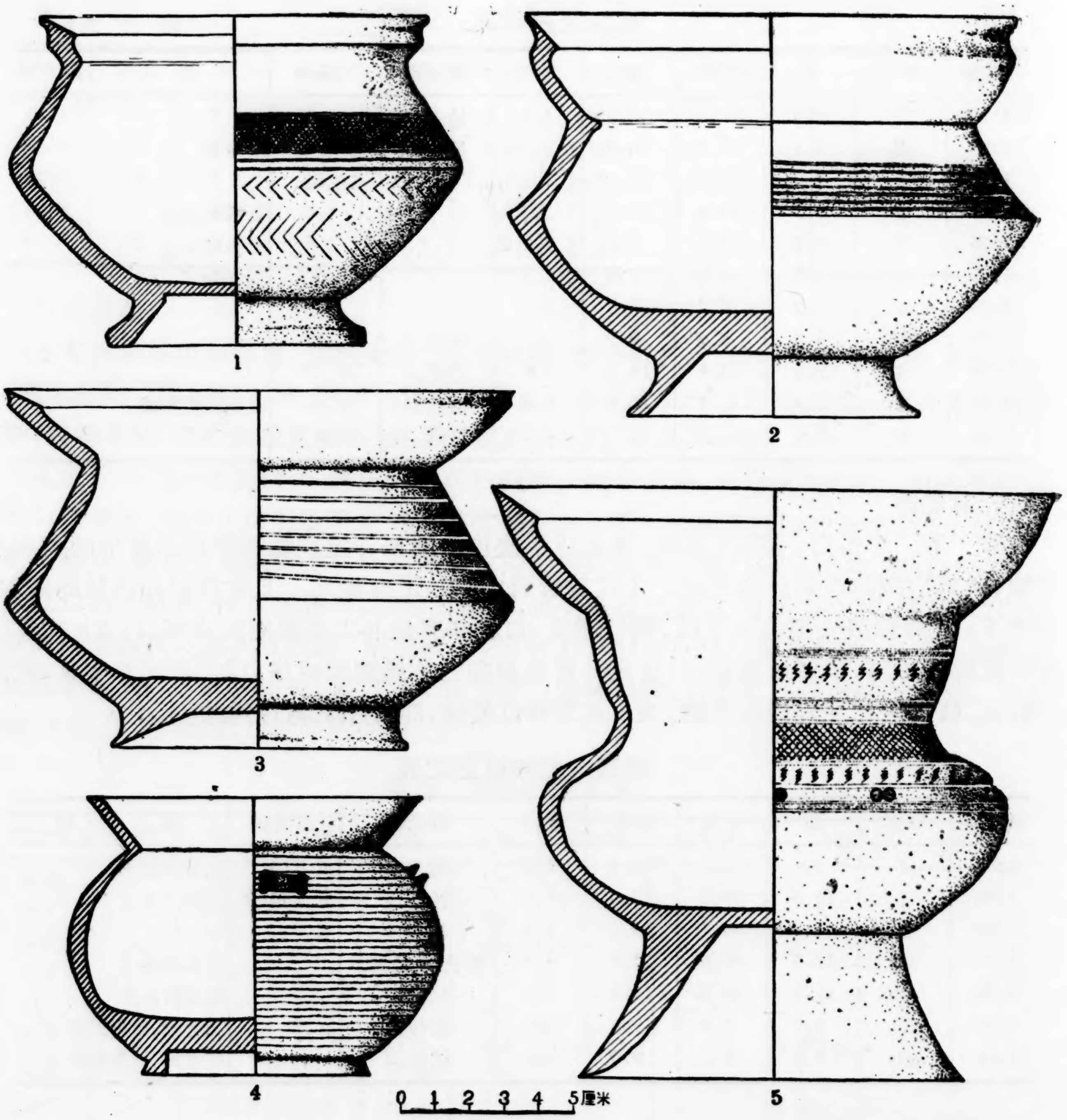
**表四 釉陶尊登記表**

| 器物號 | 類型 | 高 | 口徑 | 腹徑 | 足高 | 圖版號 | 插圖號 | 備 註 |
|---|---|---|---|---|---|---|---|---|
| 1:47 | Ⅰ | 9.6 | 11.1 | 12.4 | 1.5 | 拾叁,4 | 五,1;七,15 | 發掘前出土 |
| 1:48 | Ⅰ | 11.6 | 14.0 | 15.0 | 1.7 | 拾叁,5 | 五,2;七,6 | 發掘前出土 |
| 1:49 | Ⅰ | 10.3 | 14.4 | 14.4 | 1.2 | 拾叁,6 | 五,3 | |
| 1:57 | Ⅱa | 18.5 | 17.6 | 12.4 | 4.7 | 彩色版;拾肆,1 | | 發掘前出土 |
| 1:58 | Ⅱb | 17.3 | 16.3 | 13.4 | 4.7 | 拾肆,2 | 五,5 | 發掘前出土 |
| 1:50 | Ⅲa | 8.0 | 9.6 | 9.6 | 0.5 | 拾伍,1 | 五,4 | 灰青釉,發掘前出土 |
| 1:51 | Ⅲb | 5.6 | 8.1 | 9.0 | 0.5 | 拾伍,2 | | 灰青釉,發掘前出土 |

5. 盉類器

盉之爲用，王國維云：盉"在受尊中之酒與玄酒而和之，而注之於爵"。[1]盉亦兼温酒之用，其形制有喙、有蓋、有足(三足、四足或圈足)、有鋬或提梁，其有圈足的很像現代的酒壺。出土的釉陶盉共 5 件，可分三式，形狀即近於現代酒壺形。其中Ⅰ式盉腹側有曲直的短鋬，沒有提梁，蓋與盉身混爲一體。 Ⅱ式和Ⅲ式盉無鋬有提梁(殘缺已復原)，提梁按置在蓋上，並與盉的口沿粘合在一起，蓋與器也是粘合不可分離。 惟Ⅱ式盉蓋嵌合於口沿內，口沿微外侈，腹周有三個小鈕，係用二泥條揑成粘貼於腹面。Ⅲ式盉蓋合於口沿，口沿面平。據其蓋器混爲一體，和蓋與口沿粘合不能分離的情況看來，它與洛陽出土西周的銅扁盉[2]具有同一的用途，即專作殉葬用的明器。陶盉均爲發掘前出土者。

1) 王國維：說盉，觀堂集林卷三藝林三，中華書局 1959 年 6 月版，第 1 册 153 頁。
2) 全國基本建設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覽圖錄，圖版一四六，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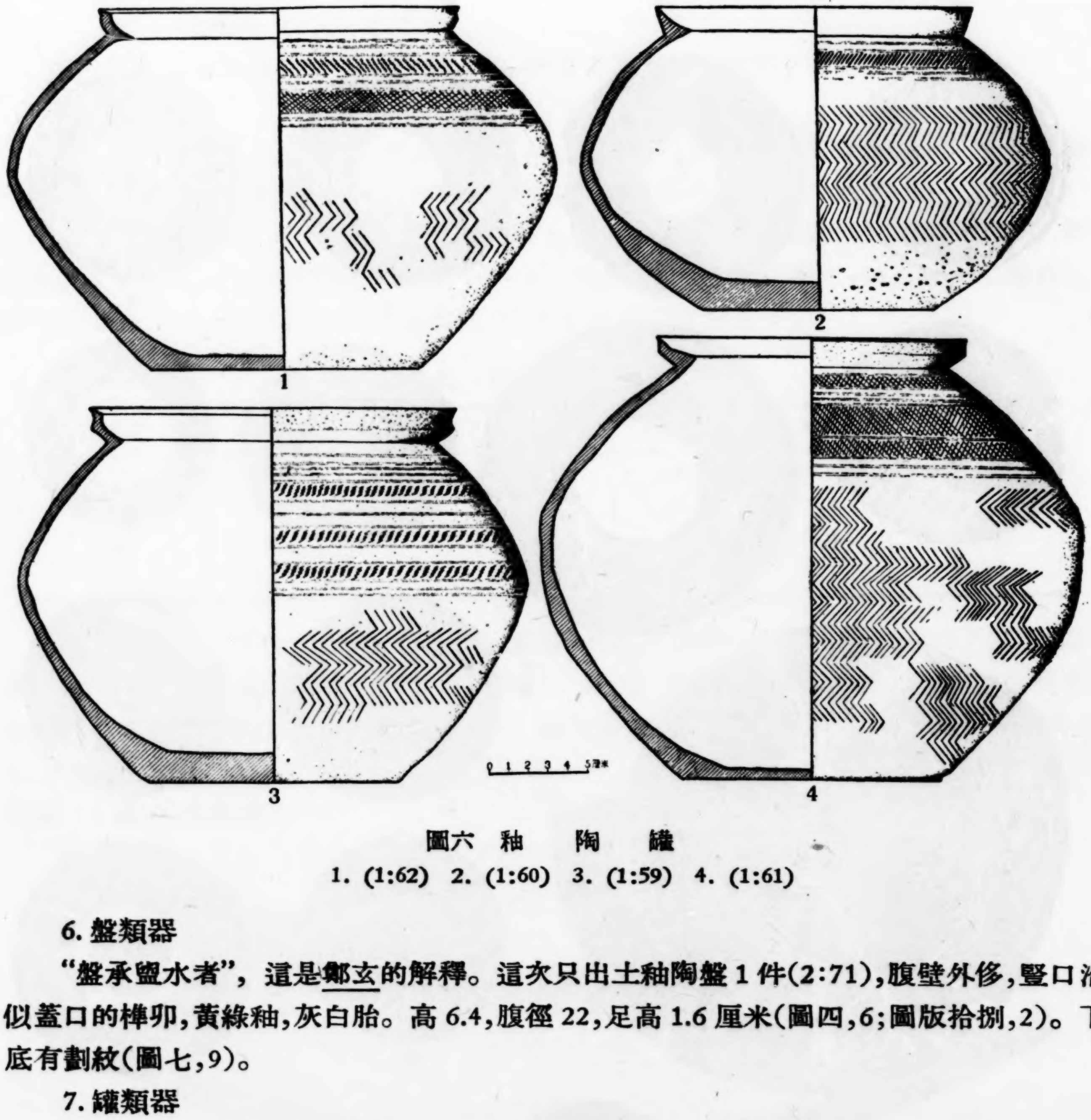



圖五 釉陶尊

1. I式尊(1:47) 2. I式尊(1:48) 3. I式尊(1:49) 4. Ⅲa式尊(1:50) 5. Ⅱb式尊(1:58)

**表五 釉陶盉登記表**

| 器物號 | 類型 | 通高 | 口徑 | 鋬 | | | 流 | | 腹徑 | 足高 | 圖版號 | 備註 |
|---|---|---|---|---|---|---|---|---|---|---|---|---|
| | | | | 高 | 厚 | 寬 | 高 | 徑 | | | | |
| 1:52 | I | 10.4 | | 3.4 | 0.4 | 1.6—3 | | | 11.8 | 0.5 | | 灰青釉,管狀流殘缺 |
| 1:53 | I | 10.0 | | 2.7 | 0.7 | 1.7—2 | 2.0 | 1.8 | 8.9 | 0.9 | 拾陸,4 | 灰青釉 |
| 1:54 | I | | | | | | 2.0 | 2.0 | 8.6 | 0.5 | | 灰青釉,頂、鋬皆殘缺 |
| 1:55 | Ⅱ | 7.0 | 10.4 | | | | 2.5 | 1.8 | 12.0 | 0.3 | 拾柒,1 | 灰青釉 |
| 1:56 | Ⅲ | 8.1 | 9.1 | | | | 2.1 | 2.5—3 | 10.9 | 0.5 | 拾柒,2 | 灰青釉 |




圖六 釉 陶 罐
1. (1:62) 2. (1:60) 3. (1:59) 4. (1:61)

**6. 盤類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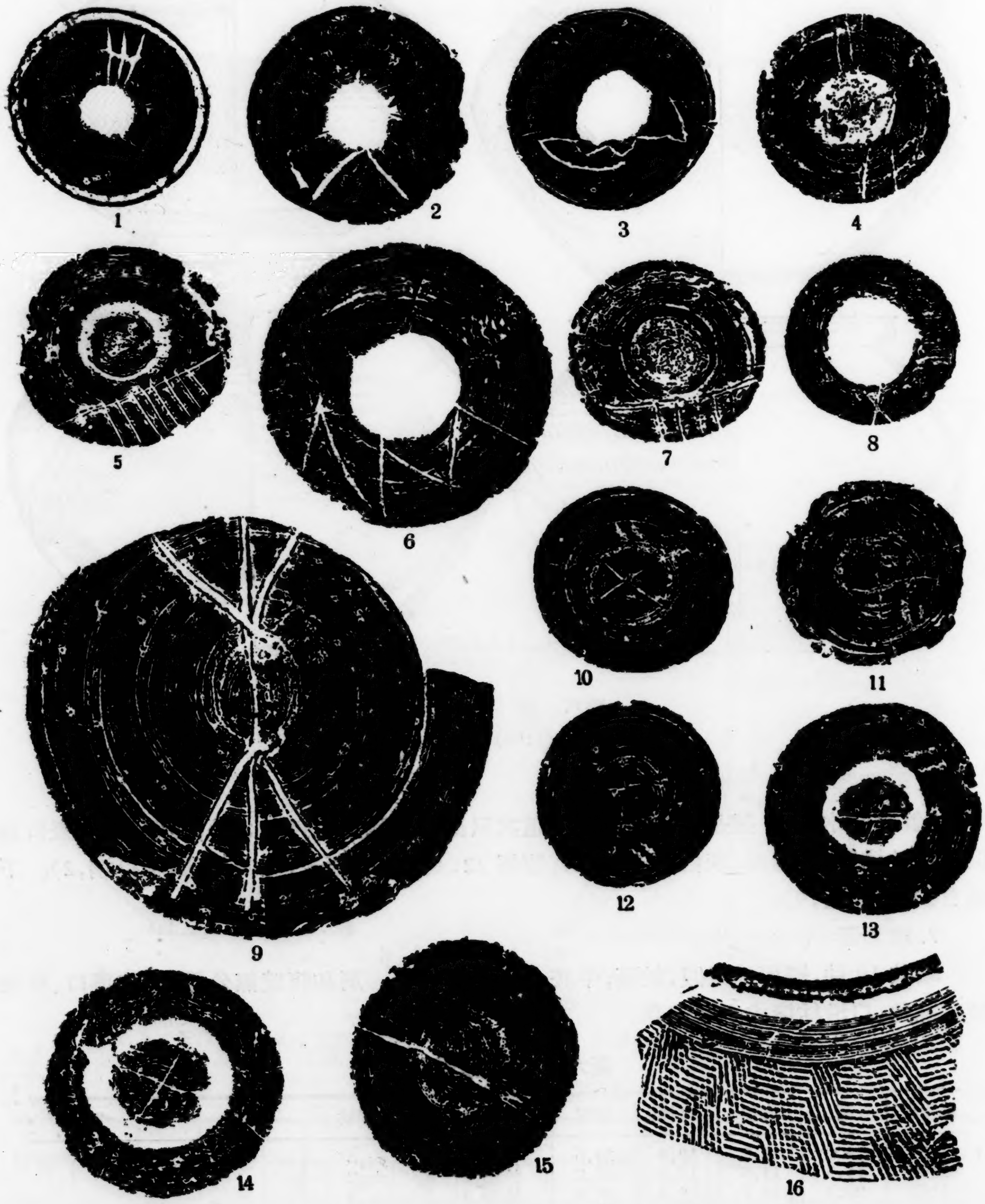
"盤承盥水者"，這是鄭玄的解釋。這次只出土釉陶盤1件(2:71)，腹壁外侈，豎口沿似蓋口的榫卯，黃綠釉，灰白胎。高6.4，腹徑22，足高1.6厘米(圖四，6；圖版拾捌，2)。下底有劃紋(圖七，9)。

**7. 罐類器**

罐共10件，體形都近似，鼓腹，平底，下有草印痕。肩和腹壁無分界，頸斂與口、腹相接成銳角，口沿結構或小有差異。

**表六 釉陶罐登記表**

| 器物號 | 高 | 底徑 | 口徑 | 腹徑 | 圖版號 | 插圖號 | 備註 |
|---|---|---|---|---|---|---|---|
| 1:59 | 19.0 | 12.2 | 18.4 | 24.6 | 拾伍,6 | 六,3 | |
| 1:60 | 15.3 | 11.5 | 16.0 | 23.2 | 拾陸,2 | 六,2 | |
| 1:61 | 23.3 | 12.7 | 15.6 | 27.4 | 拾陸,3 | 六,4 | |
| 1:62 | 18.8 | 13.1 | 18.3 | 25.4 | 拾捌,1 | 六,1 | |
| 1:63 | 17.7 | 11.0 | 16.7 | 22.6 | | | |
| 1:64 | 15.8 | 11.5 | 17.0 | 23.7 | | | |
| 1:65 | | 10.3 | | 22.8 | | | 口腹殘缺,發掘前出土 |
| 1:66 | 18.5 | 10.5 | | 24.4 | 拾陸,1 | | 口殘缺 |
| 1:67 | 20.6 | 9.0 | | 25.2 | | | 口殘缺 |
| 1:68 | | 10.7 | | 23.0 | | | 口殘缺 |




圖七　釉陶器底部劃的符號(1/2)

1. Ⅰb豆(1:20)　2. Ⅰb式豆(1:21)　3. Ⅴ式豆(1:31)　4. Ⅲ式盂(1:35)　5. Ⅴ式盂(1:37)　6. Ⅰ式尊(1:48)　7. Ⅲ式碗(1:46)　8. Ⅰ式碗(1:42)　9. 盤(2:71)　10. Ⅰ式碗(1:39)　11. Ⅰ式碗(1:41)　12. Ⅰ式碗(1:38)　13. Ⅱ式碗(1:44)　14. Ⅲ式碗(1:45)　15. Ⅰ式尊(1:47)　16. 幾何印紋陶罐紋飾(2:69)

（三）青銅器

青銅器在這兩座墓內出土是很豐富的，計有食器、酒器、水器和樂器四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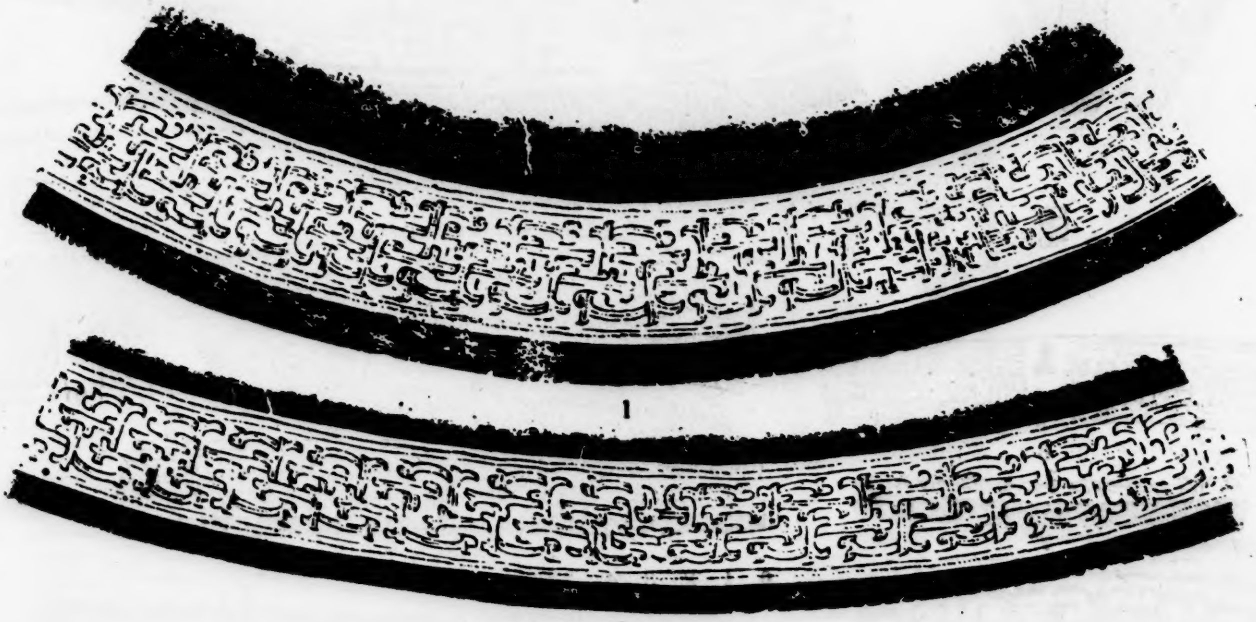
1. 食器類

鼎　4件。圜底三足，豎耳無蓋。分二式：Ⅰ式圜底，深腹，頸部稍斂，腹向下漸大，最大徑近腹底。足是上粗下細斷面近半圓形的柱足。腹部各鑄飾以斜角相對雲紋（圖十，8）或人形紋和四瓣渦紋（圖十一，1）。Ⅱ式淺腹如盤，圜底，三足向外展開，足形上粗下尖，斷面也是近半圓形。腹飾四首夔紋（圖十一，6），鼎口緣亦有夔紋（圖十，10），鼎底部飾以三角形紋（圖十，9；圖版拾，3）。下底有煙跡，應是實用器埋於墓中。

**表七　銅鼎登記表**

| 器物號 | 類型 | 通高 | 器高 | 腹徑 | 足高 | 圖版號 |
|---|---|---|---|---|---|---|
| 1:79 | Ⅰ | 24 | 18.3 | 19.2 | 9.8 | 貳，1右 |
| 1:82 | Ⅰ | 17.5 | 14 | 14.8 | 7.4 | 貳，1左 |
| 1:80 | Ⅱ | 12.2 | 9.9 | 13.8 | 5.3 | 貳，2左 |
| 1:81 | Ⅱ | | 11.6 | | | 貳，2右 |

毁　2件。1件（1:83）體作橢圓形，圈足，平底，口微侈，腹最大徑稍偏於下腹，素面，僅頸腹間有弦紋三道。有獸首形雙耳，無蓋。高11，口徑19.5，腹徑20，足高2.2厘米。另1件（1:96）體作圓形，鼓腹，圈足，平底，豎口沿微侈，雙耳背鑄飾鏤空夔紋，與足、耳及口沿花紋具同一作風，腹飾斜方格乳釘紋（圖十一，3—5）。高16.5，口徑27.7，腹徑31.3，足高3.3厘米（圖版叁）。



圖八　銅盂花紋拓片（1:95，1/2）
1. 肩部花紋　2. 下腹花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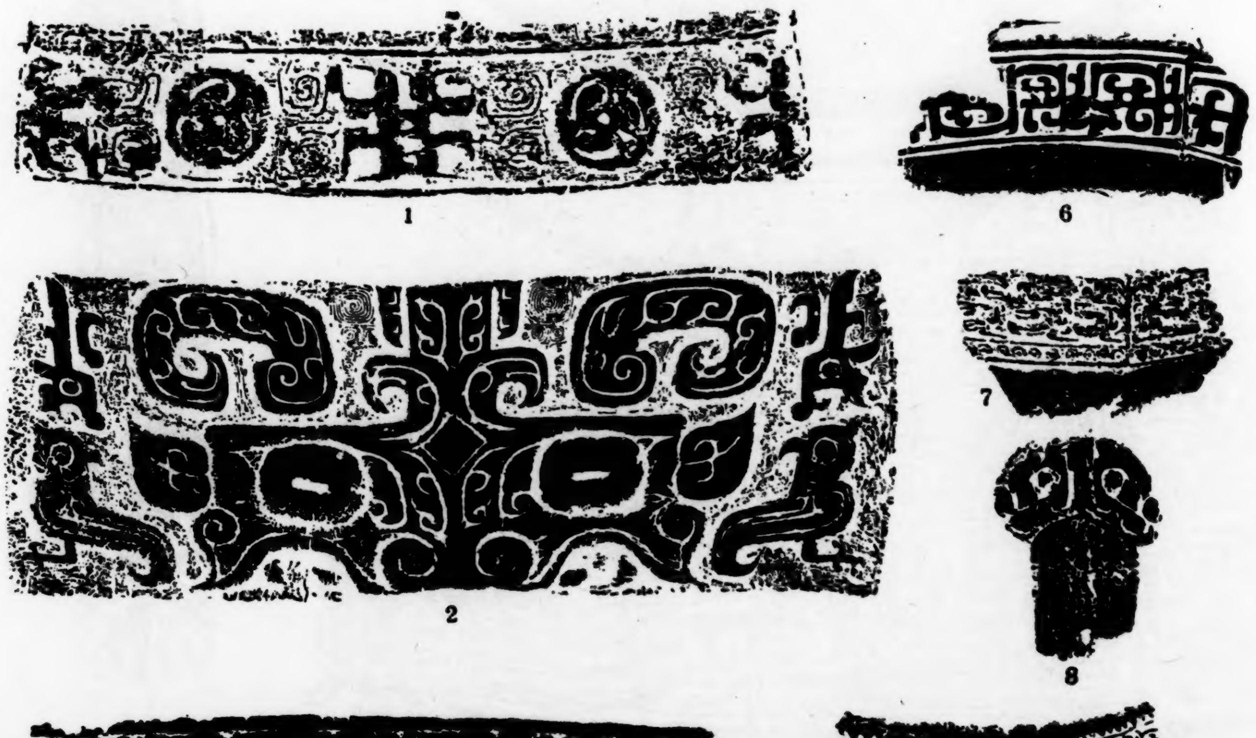
盂　2件。1件（1:95）方肩，淺口沿向外侈，圈足。肩、足和下腹飾夔紋（圖八）。高11.5，口徑27.5，腹徑31.4，足高1.8厘米（圖版玖，1）。另1件（2:87）肩方，底平，腹有對

圖九 銅器花紋拓片

1. 卣提梁正面(1:93) 2. 卣蓋(1:93) 3. 卣腹(1:93)
4. 卣足(1:93) 5. 盂的附件(2:87) 6. 盂腹(2:87)
7. 盂足(2:87) 8. 盤腹(1:84) 9. 盤足(1:84)
10. 盤耳(1:84)

圖十　銅器花紋拓片(1/2)

1. 卣蓋(1:94)　2. 卣腹(1:94)　3. 卣足(1:94)　4. 卣提梁(1:94)　5.盤腹(1:85)
6. 盤足(1:85)　7. 盤耳(1:85)　8. 鼎腹(1:82)　9. 鼎底(1:80)　10. 鼎口緣(1:80)



圖十一　銅器花紋拓片

1. 鼎腹(1:79)　2. 尊腹(1:90)　3. 殷口緣(1:96)　4. 殷腹(1:96)　5. 殷足(1:96)
6. 鼎腹(1:81)　7. 三足器腹部(1:88)　8. 三足器足部(1:88)　9. 尊肩(2:86)
10. 尊腹(2:86)　11. 尊足(2:86)　12. 尊腹(1:89)

稱的花紋附耳。盂內放一"十"形小銅件，均飾夔紋(圖九，5—7)。高 4.6，口徑 16，腹徑 16，足高 1.6 厘米。

三足器　1件(1:88)。圜底，三獸面形足，腹飾夔紋(圖十一，7、8)。該器在出土時破成碎片，不易修復，因其有三足及下底有煙跡，故暫列入食器類。

2. 酒器類

尊　3件。其一(1:90)圜底圈足，頸較長，內底有銘文"𠬪父乙"三字(圖十四)，腹飾饕餮紋、夔紋、鳳鳥紋和雷紋(圖十一，2)。高 29.5，口徑 23.9，腹徑 14.6，足高 8.5 厘米(圖版伍，1)。其二(1:89)平底圈足，腹飾夔紋(圖十一，12)。高 17.9，口徑 16.9，腹徑 12.5，足高 5.8厘米(圖版伍，2)。其三(2:86)腹折轉部分有稜角，肩與腹原有空花附飾已失，腹、肩飾夔紋(圖十一，9—11；圖版拾，2)。高 19，口徑 19，腹徑 15.5 厘米(圖版拾，1)。

卣　2件。形制相同，提梁兩端作龍首形，蓋作龜甲殼形，體作橢圓形。1件(1:93)卣蓋頂鈕球狀，其紋飾有鳳紋、羊首紋、回首夔紋、丁形雲紋、圓圈紋和雷紋等(圖九，1—4)。通高 34.5，器高 22.8，口徑 18.1—12.4，腹徑 22.6—20.4，蓋高 7.5 厘米(圖版陸，1、2)。另 1件(1:94)卣蓋頂鈕作西瓜形式，其紋飾有夔紋和丁形雲紋(圖十，1—4)。通高 33，器高 22.3，口徑 15.6—12.6，腹徑 23.2—20.1，蓋高 7.8 厘米(圖版柒，1、2)。

3. 水器類

盤　2件。1件(1:84)飾有圓圈紋、雷紋和夔紋(圖九，8—10)。高 7.3，口徑 26.8，腹徑 25.3，足高 2.5 厘米。另 1件(1:85)飾有夔紋、雷紋、圓圈紋、丁形雲紋和幾何形紋等(圖十，5—7)。高 9.9，口徑 31.6，腹徑 30.1，足高 2.8 厘米(圖版肆)。

4. 樂器類

"鐘形五柱樂器"　2件(1:91、92)。器形奇異，自北宋以來未曾見著錄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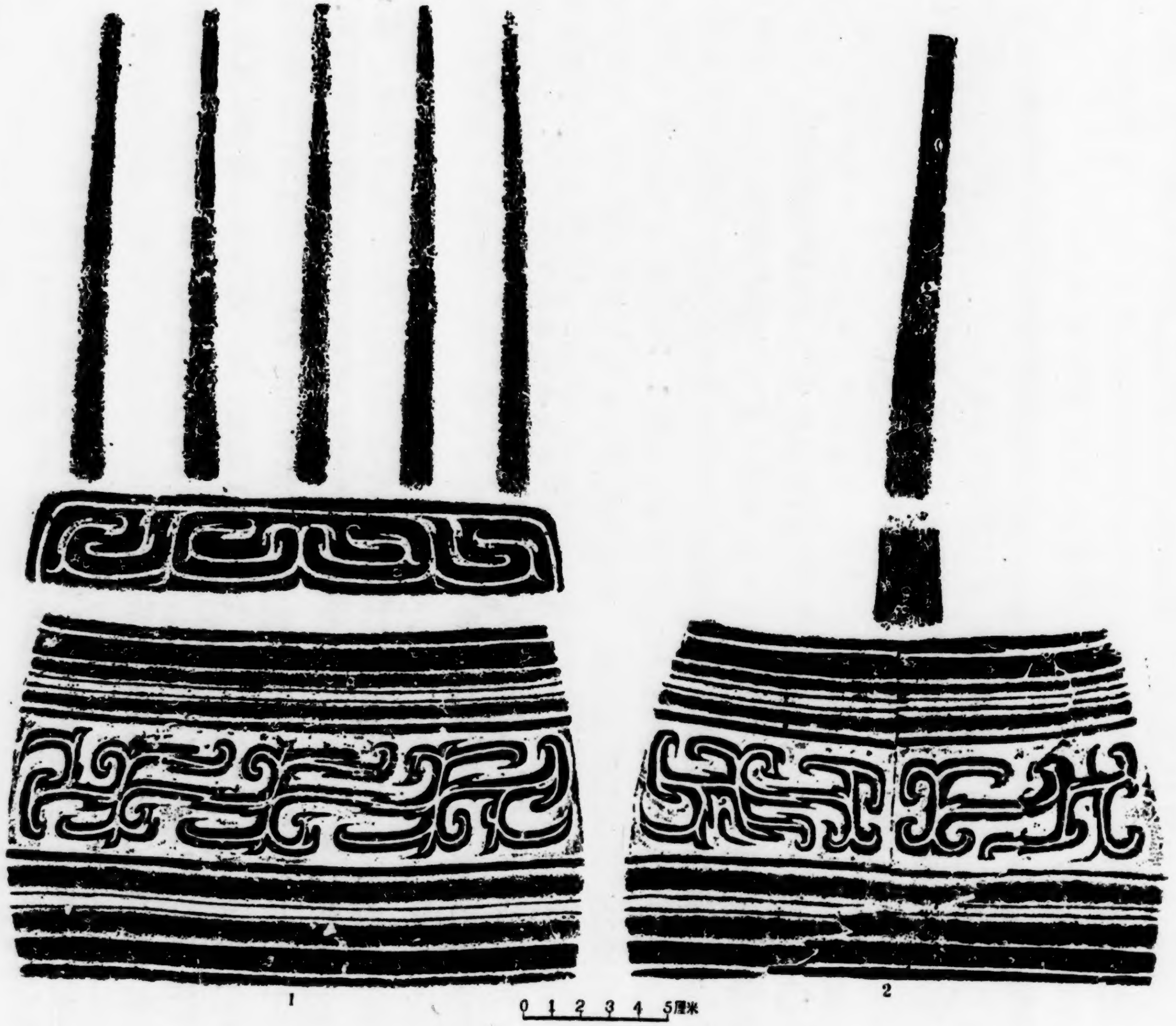
器的下部形似西周初的鏞，口部齊平，有鉦、鼓而無篆枚，[1]鉦間飾雙鈎夔紋。其午上的脊，飾"C"形雲紋，此"C"形雲紋與西安所出西周中期的鐘午紋相同。[2]其器特異的地方，是午上有脊，脊背上有排列間隔等距的五柱(圖十二、十三；圖版捌，1、2)。其大小尺寸如表八。這器很難說出它的名稱和用途。據友人徐子鶴君謂上海某友告他說，此爲奏樂用具，是用來插置管樂器以待吹，口部平齊便於放置穩固，脊上的五柱，就是插置準備吹奏的管樂器的。這種說法，我認爲也許有些道理，但可惜我們在發掘時還沒有見到其五柱附近有管樂器的腐朽殘跡爲之佐證，故還不能把它的用途肯定下來。要解決它的用途問題還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

按樂午上的脊，不在午的正中，因此脊兩邊的午寬爲 7比65 和 7.1比64 厘米。脊本身的高低厚薄也有差異，兩器都是左高右低；左厚右薄(見表八)，脊上的五柱，中柱稍長，左右四根柱子長度相等。脊下午內有一條溝槽，其溝槽的情況是：一器(1:91)溝槽較淺窄，溝壁兩端斜下，深 0.8，中間深爲 1.7，長 17.5，寬 1 厘米；另一器(1:92)溝槽較寬厚，溝壁兩端垂直下陷，深 3，中間深 3.7，長 16.5，寬1.2—1.5厘米。並且在槽內底部鑄有四個矮小的隔梁，分溝槽爲四段(圖版捌，2)。因察其結構不同，故作過試敲測音，所得的結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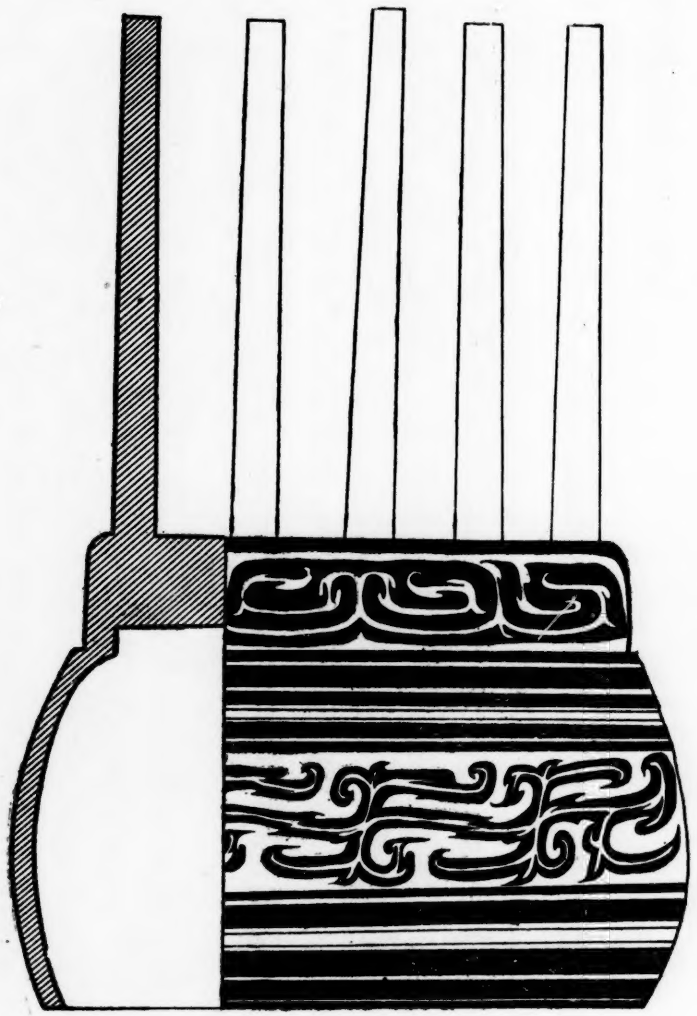
---

1) 鏞是安徽省博物館藏品，見西周銅器斷代(五)，圖版拾壹，鏞一，考古學報 1956 年第 3 期。

2)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長安普渡村西周墓的發掘，圖三，考古學報 1957 年第 1 期。




圖十二　銅"鐘形五柱樂器"花紋拓片
1. 正面(1:91)　2. 側面(1:91)



圖十三　銅"鐘形五柱樂器"(1:91,1/3)

（1）一器上的五柱發音各不相同，或與古樂五音有關；

（2）每柱不同部位，也有不同聲音；

（3）試敲兩器左端第一柱的聲音後，知道午內溝槽深寬者音節較高，午內溝槽淺窄者音節較低。其他各柱音節高低，兩器也不相同。

據此，這兩件銅器午內的長方形溝槽，可能與信陽出土編鐘內的午部孔槽具有同樣的作用，與音律和校正音高有密切關係。[1]

**表八 "鐘形五柱樂器"登記表**

| 器號 | 通高 | 器高 | 中腹寬 | | | 中腹長 | | | 邊腹長 | | |
|---|---|---|---|---|---|---|---|---|---|---|---|
| | | | 左 | 中 | 右 | 上 | 中 | 下 | 上 | 中 | 下 |
| 1:91 | 31.3 | 11.1 | 18.6 | 20.0 | 17.6 | 19.2 | 22.8 | 21.7 | 17.2 | 19.7 | 18.6 |
| 1:92 | 31.3 | 11.1 | 18.6 | 20.1 | 17.6 | 19.1 | 22.7 | 21.7 | 17.1 | 19.5 | 18.5 |

| 午 | | | | | | 柱 | | 柱徑 | | 圖版號 | 插圖號 |
|---|---|---|---|---|---|---|---|---|---|---|---|
| 中脊高 | | 中脊厚 | | 長 | 寬 | 左、右柱各長 | 中柱長 | 上 | 下 | | |
| 左 | 右 | 台下 | 左下 | | | | | | | | |
| 3.4 | 3.2 | 2.0 | 2.5 | 17.4 | 14.4 | 16.5 | 17 | 1.2 | 1.6 | 捌，1右、2右 | 十二、十三 |
| 3.6 | 3.4 | 2.0 | 2.5 | | | 17.7 | 殘存 16.7 | 1.2 | 1.7 | 捌，1左、2左 | |

5. 鳥飾

鳥作佇立待飛之狀，翼翅上嵌有綠松石，部分脫落，造型的風格與安陽西北崗所出殷代銅觶上的鳥紋完全一樣。[2] 1件（1:97）身高2.1，通尾殘高9，下柱殘長2厘米（圖版玖，2左）。另1件（1:98）身高2，通尾高7，下柱殘長4厘米（圖版玖，2右）。

（四）玉石件及漆皮殘跡

礪石 1件（1:100）。紅色細膩，六方都有磨痕。出土時被壓在紅砂陶鉢（1:99）的下面，據此，其上的砂陶鉢定爲盛水礪磨的用器。石長14.7，寬5.7—4.9，厚3—1.3厘米（圖版拾，5）。

方石塊 1件（2:75）。紅色砂石，正方扁平形。長6.2，寬5.9，厚0.9厘米。出土時，其上面放着兩個算珠式的紡輪（圖版拾捌，5）。

圭形石料 1件（2:78）。灰青色，質鬆軟，長7.3，寬3.8，厚3.8厘米（圖版拾捌，6）。

料石圈 1件（1:102）。乳白色，質粗半透明，徑長1.1，孔徑0.7厘米。

石質條片 1件。白色，質薄，出土時放在砂陶鉢的東邊，破碎幾成粉末。

玉件 1件（1:101）。長扁圓形，上端穿一孔，下端底平面有刻痕似獸形，很可能是作壓印用的。出土時放在墓底東頭中部的地方。長5.5，寬2，厚1.1厘米（圖版拾，4）。

漆皮殘跡 出現於𣪘（1:96）及盤（1:85）的口沿內外邊，僅見朱紅色細小的薄片，數量也不多，無法辨明它是什麽漆器。

1）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調查組：信陽戰國楚墓出土樂器初步調查記，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1期。
2）考古學報第七册，圖版拾玖，圖24，1954年9月。

（五）值得重視的幾個問題

綜觀上述出土遺物，它在某些成分上，值得我們特別重視的有以下幾個問題：

1. 釉陶成套成組的出土了完整的一大羣，所組合的器類如：食器有碗、盂、豆，酒器有尊、盉，水器有盤、罐，這些器類如與銅器相比，如出一轍。其中有些器形甚至是仿銅器做成的，如尊、盉、盤等即是。這確有繼續進行研究的必要。

2. 青銅器在我國南方的皖、浙、贛邊界地區成羣成組的出土還是初見。其器數成雙，但又不出於一範，這與江蘇丹徒所出西周銅器的情况相近。[1]它在形制、花紋風格上，與其他各地出土的同時期的青銅器相較，有其統一性，也有其地方性。在器形、紋飾和構圖諸方面實與中原青銅器有明顯的差別，因此，它對於研究我國南方青銅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3. 遺物中還包含一些南方晚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某些因素，如在器形方面：幾何印紋硬陶罐（2:69）與浙江老和山、江蘇溧陽農場所出的幾何印紋硬陶罐全同。[2]其他如釉陶Ⅰ式豆與浙江錢山漾的灰陶豆形全同；Ⅲ式豆（1:29）與崇德出土的黑陶毁形極似；小陶鉢（2:74）與錢山漾黑陶鉢形同型；小陶盂（2:73）與進賢的硬灰陶小盂全同；[3] Ⅵ式釉陶豆（1:32）與南京鎖金村出土的泥質小陶豆形相同。[4] 奇異的是通常見於"幾何印紋陶文化"或"銅石並用時代"遺址如：閩侯曇石山、福州浮村、福建永春縣、南京鎖金村和江西清江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的算珠式陶紡輪，也在墓2中出現了。[5]

在陶文記號方面：福州浮村遺址中所出新石器時代遺物中的陶片上，有15塊帶有符號，這符號也與屯溪兩墓中陶文記號的做法相同，甚至有些符號一模一樣。[6]

在紋飾方面：幾何印紋硬陶罐（2:69）的花紋，墓1釉陶罐、尊（1:47）等器的下腹幾何形印紋，和銅盤（1:85）耳的幾何形紋圖案的紋飾，都是"幾何印紋陶文化"中最易見的一種紋飾。

所述這些因素究竟說明它們之間是直接影響的關係，還是間接影響的關係或繼承關係的問題，目前還不能作出適當的解答，但可肯定它們之間是有了某些關係的。據此，通過這兩墓的發掘，已經把我國南方青銅文化與南方晚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關係問題提了出來，這應該是這次考古發掘工作的一項重大收穫。

總之，上述的三個問題的提出是非常重要的，前二者的解說，可以爲我國古代釉陶工業和南方青銅文化的創造技術，也就是我國南方古代物質文化發展的問題提供可靠的研究資料；後者可以爲我國南方遠古文化發展的過程找出一些實物證據。由於資料的局限，這一問題只有留待今後討論。

---

1) 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丹徒縣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銅器，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5期。

2) 蔣纘初：杭州老和山遺址1953年第一次的發掘，圖版肆，1、3、5，考古學報1958年第2期。

3) 浙江文管會、浙江博物館：浙江新石器時代文物圖錄，圖版貳壹，1、貳貳，1、柒伍，3、玖伍，1。

4) 尹煥章等：南京鎖金村遺址第一、二次發掘報告，圖版叁，6，考古學報1957年第3期。

5) 林惠祥等：一九五六年廈門大學考古實習隊報告，廈門大學學報1956年6期；曾凡：福州浮村遺址的發掘，圖六，5，考古學報1958年第2期；華東文物工作隊福建組、福建文管會：閩侯曇石山新石器時代遺址探掘報告，考古學報第十册，1955年2月；尹煥章等：京南鎖金村遺址第一、二次發掘報告，圖六，3，考古學報1957年第3期；饒惠元：江西清江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圖七，2；圖版拾，2，考古學報1956年第2期。

6) 曾凡：福州浮村遺址的發掘，圖七，23—38，考古學報1958年第2期。

## 五、對出土遺物的初步研究

墓中出土的遺物，以釉陶器和青銅器兩類爲大宗。爲了對於我國南方古代物質文化發展的研究，進一步探索當時的釉陶工業和青銅器冶鑄技術，有着重要的意義，因此暫就墓裏遺物中的釉陶器和青銅器的製作技術加以初步分析。

### （一）屯溪的古代釉陶工業

我國釉陶的製作，最早發見於安陽殷墟，那是1929年在小屯地方發掘出與甲骨、刻花白陶等在一起的一些釉陶破片。[1] 近年來鄭州二里岡殷代文化層中出土有一件褐綠釉陶尊；西安和江蘇丹徒又出土有西周的幾件釉陶豆等，確定了殷周時代已有了釉陶。這次屯溪出土的釉陶器，既系統，又完整，所以我們在此把它加以系統的分析。

屯溪釉陶器從這兩墓中出土的有71件，佔全部出土遺物總數的2/3強。我們從其製法、質地、釉料等方面進行考察，作如下的分析和研究。

1. 質地的分析

關於這批釉陶的質地問題，據考察的結果：陶胎分白色泥質和灰白色泥質兩種，前者泥質較粗糙，火候較低，敲之無清脆之音，剖面有氣孔，入水吸收水分能力較強，呈現出鬆軟的現象，其中以罐類胎質最爲顯著。後者泥質較細膩，質地堅硬，有緻密性，無吸收水分能力，火候較高，擊之有鏗鏘之聲。二者土質都較純淨，應不是一般粘土，它或許經過精選過程，而與其出土地點的鄰縣祁門瓷土有關。按祁門瓷土的分子式是：

| $SiO_2$ | $Al_2O_3$ | $Fe_2O_3$ | CaO | MgO | NaO |
|---|---|---|---|---|---|
| 70.89 | 21.42 | 1.36 | 0.66 | 0.55 | 0.84 |

這批釉陶胎土，經選送三塊罐片（白色泥質）和一塊豆片（灰白色泥質），由中國科學院安徽分院化學研究所光譜分析的結果：

| Si | Al | Fe | Ca | Mg | Na |
|---|---|---|---|---|---|
| 大量 | 約10％ | 約1—3％ | 約0.03％ | 約0.5—7％ | 多量或較多 |

從上述胎土中所含化學元素的成分上看，應是較純的矽酸鋁化合物，屬於"高嶺土"之類，並與祁門土基本近似。這種土加水後，可塑性很強，可以任意造型。不過屯溪釉陶胎土提選的程度，還沒有現代祁門土提鍊的精細。

據此推之，屯溪釉陶工業的胎土取於祁門，燒製釉陶的地點也應在祁門鄰近的地區。它究竟在何處，還有待於考古調查來解決。

2. 胎坯的製法

關於這批釉陶胎坯的製法問題，在其本身上留下了下列一些證跡：

（1）器的內底面或腹壁內表，大都存在有泥條圈叠和按捺壓平的遺痕，從器表釉層裏顯露出來。器腹和口不正圓。

（2）圈足器的圈足或圈座與器身留有分作的痕跡，也有少數圈足的足內壁的凹入周壁上，留有挖刮的遺痕。

---

1) 李濟：民國十八年秋季發掘殷墟之經過及其重要發現，安陽發掘報告第2期，1930年。

(3) 平底器的下底面有草印痕，且底面傾斜不平，因而器的高度也呈現出左高右低的現象(圈足器也有此現象，但沒有平底器那樣顯著)。

(4) 在脫釉部分或無釉部分的腹壁或足的外表面，可以看出用濕手抹平的殘痕。

據此四點，這批釉陶器應是用手抹泥條叠築法製成的。在泥條叠築製造時，在底下用草墊墊着，以免製器時受力按後粘合於其他物體之上不易分離。關於器足的做法可能有兩種：其一，在成坯時搓圈泥條粘合於器底，揑抹而成的，如盂(1:33)底等即是；其二，造型時即在其底下留有一塊適當的泥團，於成坯時用木質或竹質片狀工具挖刮中間泥塊而成中凹的圈足，如盂足等即是，故有少數圈足內壁尙存挖刮遺痕。至於尊、豆足座的製法，其足矮者，製法也是搓圈泥條粘貼於器底；其足高者，則用條叠製器法，先造其型，然後用原泥調和粘合於器底，即用分製胎坯粘合法製成。據此，這批釉陶雖是手製，但其技術，已達相當成熟的階段。

3. 紋飾的種類和製法

釉陶器物的口沿面上、腹部、肩部的紋飾，都是透過釉層而現露出來的，其製法大體是模印和刻劃兩種，都是在成坯未乾時加工的。劃紋有劃道深淺粗細之分，全視裝飾部位的需要而定。粗的左右斜劃兩次，然後將劃去的泥線取出，形成一道一道的陰文細溝，即所謂刻的手法。其口沿面上及肩、腹間的粗弦紋都是用這種方法刻劃而成。細的只用木質或竹質片狀工具垂直劃上一次，因而劃道的兩側還現出劃後的稜脊，即所謂劃的手法。如器腹和肩部間的花紋圖案都是用這種方法刻劃的。模印的紋飾，大約是在事先做好一種帶花紋的印模，壓印在器胎的表面上，使成各種紋飾，有如在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曾發見過一些製陶的模印工具，因此在紋飾裝飾的方法上，還保留着原始性的孑遺，並不是很進步的技術。其花紋大體有如下數種：

(1) 弦紋　多在口沿面上，或肩、腹部。在肩、腹間的弦紋，如夾有其他種紋飾，即以此弦紋作其間隔。如盂、罐、尊類器的肩、腹弦紋即是。

(2) 斜方格紋　是兩組不同方向的平行斜線紋交錯而成，構圖如"網花"。多刻劃於盂、罐的肩、腹間。

(3) 平行斜線紋　即多條的平行斜線組合而成，都在罐的肩部。

(4) 波紋　紋飾的結構，是以直的曲線平行相連續而成，形如水波，多刻劃在尊、罐的肩腹間。

(5) 指甲紋　似用手指甲作模印工具，如盂(1:33)腹部的紋飾。這種紋飾在南方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有發現。

(6) 幾何形印紋　是用印模工具模印在器面上的一種紋飾，其構圖形式，作多道斜線相連成銳角相套的幾何形圖案，如罐的下腹，和豆(1:5、10)、尊(1:47)的下腹都有這種紋飾，它與幾何紋陶罐(2:69)的腹紋完全一樣。

4. 釉和施釉

陶器加釉，不僅光澤、滑潤而美觀，而且經久耐用，其作用最大者：

第一、釉層蓋住胎坯的氣孔，就使之不染汚穢，不吸收水分，裝了油脂的東西，也很容易洗刷乾淨。

第二、釉層抵抗化學力很強，酸性物置於釉陶器內，並無任何損害。

屯溪的釉陶，應是殷代釉陶工業的發展，我們研究了屯溪釉陶的釉和施釉，或也有助於對於殷代釉陶工業的進一步了解。屯溪釉陶表面釉層的特徵是：

（1）釉色分薑黃綠色（卽灰綠中帶微黃的顏色）和灰青色兩種，其中薑黃綠釉器有61件，灰青釉器只有10件。

（2）薑黃綠釉全施於白色泥質胎骨或少數白灰色泥質胎骨的內外表面上，釉層浮於器面，易於脫落，故陶器外表面脫釉的地方較多，有個別器表面幾乎全部脫釉，如豆（1:8）及罐（1:61）是。

（3）施薑黃綠釉的器外表下底和足部，多不施釉，其餘器的內外表都施釉，而施釉的地方也是濃淡不勻，濃的地方還有少數流痕。

（4）灰青釉和器胎幾乎融合成一體，釉薄且勻，器面與釉層分不出明顯界線。全施於白灰色泥胎的內外表和足部。

屯溪所出釉陶的陶片，經中國科學院安徽分院化學研究所光譜分析的結果：

| 化學元素 | Si | Al | Fe | Ca | Mg | Na | Ba | Sr |
|---|---|---|---|---|---|---|---|---|
| 薑黃綠釉罐片 | 大量 | 約10% | 約2% | <10% | 約2% | 多量 | 約2% | >3% |
| 灰青釉豆片 | 大量 | 約10% | 約1% | <10% | 約2% | 多量 | 約2% | >3% |

（詳見附表二）

據上面分析結果，可知薑黃綠釉與灰青釉的主要區別，卽在於所含的鐵量。這應該是鐵元素對於這些釉陶的釉色起了主導作用。夏鼐先生說："釉質的青綠色是由於含有氧化鐵。尤其是一氧化鐵（EeO）；至於三氧化二鐵（$Fe_2O_3$），是使釉色帶黃色、棕黃色以至黑褐色的。"[1]這批釉陶的薑黃綠釉，基本上還是屬於灰青綠色，只不過灰青綠色中帶有黃色而已。因此，它必然是氧化鐵的作用。

至於這些釉陶配釉的方法，已無文獻記載可以參證，因此只能根據後世瓷器配釉的方法推尋其線索。朱琰陶說云：

> "釉無灰不成，釉灰出樂平縣，在景德鎭南百四十里。以青白石與鳳尾草製煉，用水淘細，配以白不細泥調和成漿，按器種類以爲增減。"

據中國科學院安徽分院化學研究所檢驗這批釉陶片後告訴我們說："陶釉除粘土之外，可能還加一些白雲母之類的物質，使其熔度降低一些"。按"白雲母"也是祁門瓷石中的混合微細的物質之一，因此，我以爲這陶釉中的"一些白雲母"，或許不是加入的，而是當時利用祁門瓷土作配料中的含量。又釉灰出樂平，而樂平釉灰係配青釉的熔劑。[2] 樂平和祁門都是現今景德鎭製瓷的主要原料產地，今人採用，當必淵源甚古。屯溪附近的古代勞動人民，由於釉陶工業的發生和需要，發現和利用附近樂平、祁門等地自然資源的釉料，這是很自然的事。

關於這些釉陶的施釉方法問題，其中薑黃綠釉是器內全施釉，器表釉不到底，它應是用刷子之類的工具把釉水塗刷到器胎上去的，所以器內外表的釉層濃淡不勻，並有少數器

1）夏鼐：跋江蘇宜興晉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7年第4期。

2）江西省輕工業廳陶瓷研究所：景德鎭陶瓷史稿，頁39，三聯書店，1959年2月。

的釉層下部還有流痕。刷子蘸着的釉漿有時濃,有時淡,表現的釉層當然就濃淡不勻了。盂(1:33)下底的墨書"十"字符號(圖版拾貳,5),其墨跡中還有明顯的刷子遺迹,刷痕的形式,和現代毛筆書寫的筆鋒完全一樣。可見其時已經使用刷筆。

灰青釉陶是全器表裏都施有釉,其釉層既薄且勻,當不是塗刷的手法所能完成。其施釉的方法,可能是全器浸入釉水中。所以全體有釉,且呈現出勻整融合的現象。但當時這種浸釉的技法,並不是很成熟的,所以有少數器物如盉的下底部還有一些裂縫;所保存於遺物中的浸釉器物的數量也很少。刷釉雖然使用的比較普遍,製成的器物數量很多,但器面釉層剝落的現象很嚴重。據此推斷,這批釉陶的製作水平,達到一定的高度,但其釉層的特徵與殷代釉陶釉層一樣,還是較爲原始的,[1]基本上還是我國釉陶工業的早期階段。

5. 釉陶生產過程的探索

綜觀上述,屯溪出土的古代釉陶,生產程序當如下:

選土製泥 ⟶ 搓條造型 ⟶ {修飾器面 / 配釉成漿} ⟶ {挖足(包括圈條粘合足、座)成坯 / 刷、浸施釉} ⟶

入窯燒製 ⟶ 出窯成器

屯溪古代釉陶工業的生產,還是我國釉陶工業的早期階段,然其對於自然物質的認識和掌握使用方面的知識和技術,却已達到相當成熟時期。特別是就地取材進行較有規模的釉陶生產,這是古代勞動人民從長期生產實踐的鬥爭中獲得的成果。另從生產過程較繁雜的情況上來說,這時的釉陶生產,可能已有專門技術人員來承担。那麼,當時社會生產面貌,應除有較細的農業與手工業之間和手工業本身內部的分工外,甚至釉陶工業的本身也有分工。因此,它所反映的這一地區的古代文化,是已有較高的水平了。有人說,殷代的釉陶,是由於對殷代地域以外的貿易關係傳入的,並不是殷人的製造。因有"釉陶是其(指殷商)旁支"之說,我以爲這話有其理由。就屯溪古代釉陶工業的生產水平來說,釉陶發生於南方,而由南方輸入於殷也是很可能的。

## (二) 屯溪青銅器的冶鑄

我國江南的青銅器,除所見的一些吳、越器之外,再早的銅器昔無所聞。自1954年6月間,江蘇丹徒縣出土宜侯銅器後,這次屯溪又由墓中發掘出20件成組的青銅器,而出土地點又較宜侯銅器出土地點更加靠南,它已遠隔江岸靠浙、贛二省邊界了。我們把屯溪出土的青銅器冶鑄技術,進行系統的分析,以說明我國南方青銅文化的發展。

1. 青銅的原料

我們曾檢送8件屯溪出土的銅器破片,計包括鼎腹片、簋腹片、盤腹片、盂腹片、三足器腹片、尊口唇片各1片,卣提梁獸頭耳片共2片,請中國科學院安徽分院化學研究所進行光譜分析,其結果是:

---

1) 李文信先生在關於我國陶瓷的幾種新資料一文(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10期)中說:"……因爲這次二里崗發見的胎質不厚,細密堅緻,刀劃不破,已無吸水性,釉層跟胎骨混化一體(有幾種釉層脫落殆盡的恐係久埋地下所致)"。按"釉層跟胎骨混化一體"的應是浸釉上釉;"釉層脫落殆盡的"是刷釉法上釉,李先生言此"恐係久埋地下所致",非是。因陶器上釉經燒製成器後,有較強的抵抗化學力,不易與他種物質起分解作用,故釉層脫落是上釉的技術問題,而與"久埋地下"似乎沒有什麼關係。

| 銅 | 錫 | 鉛 | 鉍 | 銀 |
|---|---|---|---|---|
| 主要的 | 大量的 | 多量、較多或少量 | 多量或較多 | 多量（詳見附表一） |

以此屯溪的銅器的合金成分與考工記所載“六分其金而錫居一”，其含量是相近的。至於含有極少量的鉛、鉍、銀等物質，這是銅質中的雜質，並不是人工加入的。屯溪銅器脫胎無銹部分的顏色，青灰而帶白色，或許是含有少數銀質的結果。再把它與殷代青銅器銅錫合金的成分比較，情況也是類似的。這批銅器的青銅質料很純，可能因我國的青銅主要原料銅和錫的名產地都在南方吳、越地帶。就目前所知的材料來說，皖南地區的銅礦，富饒程度居全國重要地位，其隣近的贛南錫鑛，也是聞名的。可見銅、錫自古就是江南地區的名產，這與屯溪出土的這批質純的青銅器的冶鑄是有關的。

2. 鑄造方法

關於這批青銅器的鑄造方法問題，目前還只能就其銅器本身上的遺痕來探討它。

（1）器足、底、腹和口沿諸位置上，有兩相對稱的範痕，如卣、段、盤、盂和“鐘形五柱樂器”等，範痕都在器身的兩側。鼎的範痕，由三足經底、腹至口部有三面存有凸起的鑄縫，鑄縫至鼎底形成三角形。

（2）器內平滑，器外表鑄花浮於器面。

（3）器形相同的，器面花紋不同，如卣、鼎、盤、“鐘形五柱樂器”等，都是如此。

（4）質地薄，呈現出青湛湛的顏色，而且光澤滋潤，似可鑑人。

據此推知，這些青銅器的鑄造方法，應是合範的通體渾鑄。因此，在兩半鑄範接合的地方，器成去範後，仍留有突起於器面的對稱鑄縫。鼎底部存留的三角形鑄縫接痕，分及三足和腹、口部，也是渾鑄之證。

渾鑄的方法，必先用模範，它在造模翻模的工作中，器模作型不雕花，花紋是刻在範上，因而下型後，鑄花浮於器面，器內表則平滑。從器形相同，器面花紋不同的情況分析，這批銅器是用一範一器、還不是一範多器的冶鑄方法鑄成的。所有這些都是證明它是屬於早期的冶鑄法。

3. 花紋結構

屯溪青銅器的花紋，在藝術構圖上也有它的特殊風格，反映出當時工藝創作上的成就。

（1）饕餮紋　構圖有首無身，紋面間飾以雲形陰紋，其空隙間襯以雷紋。饕餮紋的兩側，在上的是張口垂尾的夔紋，在下的是昂首單冠、尾向下收捲的鳳紋，與夔紋上下相對，形成主次分明的“三層重疊”的構圖，如尊(1:90)腹紋是。

（2）鳳紋　有三種。其第一種是兩鳳相對，獨足佇立在丁形雲紋上，回首向後，單冠垂於前與相對的另一鳳冠穿繞如環，隙間填以雷紋。如卣(1:93)腹下層鳳紋是。第二種是兩鳳相對共一首，身成兩歧，尾上捲如鈎，作展翅翺翔之狀，其間襯以雷紋，如卣(1:93)足花紋是。第三種即是尊(1:90)腹饕餮紋旁的浮雕式的鳳紋。

（3）乳釘斜方格雷紋　紋式作乳釘狀突起於斜方格雷紋中，如段(1:96)腹紋是。

（4）四瓣渦紋　即在突起的圓紋中，飾以四條渦狀陰紋，在兩四瓣渦紋中配合以人形紋，空隙填以雷紋，如鼎(1:79)腹花紋是。

(5) 羊首紋　飾於器腹上層花紋的中軸線上，作雙角向外捲曲的羊首形，如卣(1:93)腹上層的兩丁形雲紋間的突起紋飾是。

(6) 圓圈紋　紋式作小圓圈內加小點，散列於器物花紋的上下邊緣，或其他種花紋上下層之間的間隔。如盤(1:84、85)、卣(1:93、94)、尊(1:89)、三足器(1:88)等器腹上花紋的上下邊紋是。

(7) 雲紋　一種是斜角相對雲紋，如鼎(1:82)腹花紋是；另一種是丁形雲紋，紋式作丁形連續的陽紋，如卣(1:94)足紋是。有在丁形雲紋上下加飾圈紋的邊緣，如卣(1:93)蓋紋和盤(1:85)足紋是。也有加垂三角紋而與相對呑食的雙鈎夔紋相同的丁形雲紋，如尊(2:86)紋和盂(2:87)及其附件花紋是；第三種是鈎連C形雲紋，如"鐘形五柱樂器"(1:91、92)的中脊紋飾是。

(8) 夔紋　大體可以分爲四種：第一種張口曲身，尾捲如丁形雲紋，回首向下，如鼎(1:81)腹紋是；第二種曲身展唇，尾捲成丁形雲紋，回首向後，如鼎(1:80)腹紋、卣(1:93)腹上層花紋是。以上二種是寬線條的陽雕；第三種是兩夔相向的紋飾，有正面相向和一倒一正相向兩種，都是雙鈎夔身，但細部各有不同。"鐘形五柱樂器"上的花紋，是兩夔相向張口，雙鈎夔身的。另一種式樣是夔身雙鈎，身間(紋面)排列直線式的散點，紋式作縱橫相對呑食之狀，上下邊緣飾以圓圈紋，如設(1:96)口、耳、足紋，盂(1:95)肩、足和下腹紋，尊(1:89)腹紋，卣(1:94)腹及蓋紋，盤(1:84)耳紋等，均屬此類。還有的在雙鈎夔身間，不填散點式紋飾，而以丁形雲紋相間，邊緣飾以垂三角紋，如尊(2:86)腹肩紋，盂(2:87)紋是；第四種是兩夔相對，一正一倒，無目張口，首身不分，一角雙冠，捲尾如鈎，其間塡以雷紋，上下邊緣飾以圈紋，如盤(1:85)腹花紋是。或者是夔身雙鈎，角與首不相連接，首前口部有五根平行線條，如盤(1:84)紋是。

(9) 蛙形紋　紋式作一蛙匍伏之狀，四足伸展，雙目注視，非常生動。蛙的藝術造型，也見於殷墟遺物中。

(10) 人形紋　作兩人手舞足蹈回首對語之狀，如鼎(1:79)腹四瓣渦紋之間的紋飾是。這是最具特色的紋飾。

(11) 三角形紋　在鼎底的三角形鑄縫間，飾以大小三角形相套的紋飾，係幾何形紋的一種，如鼎(1:80)底紋是。

(12) 幾何形紋　紋式作多層斜線曲折相接所組成的幾何形紋，其構圖完全與幾何形印紋硬陶罐(2:69)上的花紋一樣，如盤(1:85)耳紋是。

4. 年代的考訂

關於這座墓的年代問題，曾在安徽省文化局召開的學術座談會上引起分歧的意見。把它歸納起來，有三種不同的看法：一是西周時代；二是西周末春秋初；三是春秋時代。究竟它屬於什麽時代的呢？通過上述青銅器冶鑄的種種分析，已可得到一些概念性的認識。爲了更加明確它的年代，故作如下論證。

(1) 尊銘的分析

在20件銅器中，只有尊(1:90)內底有銘刻，其文爲"𠬝父乙"(圖十四)。這一短銘文，對於這批青銅器年代的推定非常重要。按照殷周彝器通例，"父乙"是人名，"𠬝"是國族

名。過去都以有"以日爲名"的一、兩個簡單的名號，如"父甲"、"父乙"等爲殷習，因定有此名號的銅器爲殷器，其實也不盡然，它到西周中葉都還保留着。[1]如穆王時器的競卣、競毁等仍有"父乙"一名。[2]

（2）花紋的分析

從上文所述的花紋的結構上看，這批銅器的紋飾計有：饕餮紋、鳳紋、乳釘斜方格雷紋、四瓣渦紋、羊首紋、圓圈紋、雲紋、夔紋、蛙形紋、人形紋、三角形紋和幾何形紋等十二種，其中饕餮紋、斜方格乳釘紋、四瓣渦紋、圓圈紋、羊首紋和蛙形紋，都通行於殷末或周初。例如尊(1:90)腹饕餮紋，鑄花三層，既與武英殿彝器圖錄頁 14 饕餮紋鼎的紋飾相同，也與普渡村西周墓出土的爵紋相似。[3]乳釘紋風格，與殷墟 M188 出土的毁腹紋全同。[4] 四瓣渦紋，則與事父毁紋相似。[5] 其他如圓圈紋、羊首紋、蛙形紋，也常見於殷周銅器的花紋中。

圖十四 （原大）
銅尊(1:90)銘文拓片

此外，雲紋、鳳紋、夔紋等，又多具西周風格。例如鼎(1:82)腹雲紋，其方形圓角捲曲相套的作風，則與作父丙觶的雲紋相同，但也有其不同的，那就是斜角相對；又與穆王時長由四器中的盤足雲紋近似。[6]卣(1:93)腹鳳紋，作回首向後的姿態，與康王時的庚嬴卣、穆王時的靜毁、孝王時的效卣、效觶諸器鳳紋的風格全同。鼎(1:80)腹及卣(1:93)腹上層夔紋的回首向後的作風，也和成王時的衛毁、懿王時的免觶、孝王時的效卣上的夔紋相同。[7]

新出的紋飾要算人形紋、三角形紋和幾何形紋，前者是二人舞蹈圖，是研究我國南方舞蹈史的好材料。 後二者都是幾何紋之類，是追尋南方青銅文化與南方晚期新石器文化關係的線索。都是值得重視的。

其中尊(1:89)腹上的夔紋，有人據此以定它爲春秋時器，說它不類西周紋飾。

我以爲屯溪出土的這批銅器，在某些成分上它與北方黃河流域同時期的銅器相比較，是有其共同性的。但它畢竟出土於皖、浙邊界的屯溪地區，所以有其特殊性。其表現在器形方面如此，表現在花紋的風格上也是如此。我以爲鑑定這類夔紋的年代，在還沒有看到有準確年代的標準器花紋可以作爲鑑定年代的標尺時，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

1)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書頁 7，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6 月。
2)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科學出版社 1958 年 1 月。
3) 石興邦：長安普渡村西周墓發掘記，考古學報第八册，1954 年 12 月。
4) 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發現附論小屯地層，圖十六，4，中國考古學報第二册，1947 年 3 月。
5) 容 庚：頌齋吉金圖錄，圖九，1933 年 7 月。
6) 陝西文管會：長安普渡村西周墓的發掘，圖八，2，考古學報 1957 年 1 期。
7)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圖編59、63、168、174、201、205。

① 這種夔紋，既出現於尊(1:89)的器面上，同時也出現於卣(1:94)腹蓋上，𣪘(1:96)、盂(1:95)的器面上，這些器制和器類，可以作其年代的參證。

② 與這種夔紋同在一器上的還有其他種紋飾，可以互爲印證它的年代。例如卣(1:94)腹與卣(1:93)腹間的圓圈紋，即具有同一風格。其提梁及足上的丁形雲紋與卣(1:93)蓋的丁形雲紋風格全同。𣪘(1:96)腹間的斜方格乳釘紋，也可以作爲𣪘足、耳間夔紋年代的論證依據。

③ 與這種夔紋同墓出土的器制、器類，以及墓的結構，都應是它斷代的直接依據。

我們只要把上述三點弄清楚了，這類夔紋的年代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據此，乳釘斜方格紋，具有殷代的風格，而也延續到周初，再往後就不見了。那麼同出現在這種乳釘紋的同一器上面的夔紋，其時代也應與此乳釘斜方格紋同時，這是不容置疑的。同時，此𣪘雙耳無蓋，是殷末周初的形制，也可作爲一證。

總之，從紋飾上分析，我們也可以得出與尊銘年代相適應的論斷。例如鳳紋回首向後的風格，似有明顯的年代界限，其早見於康王時代的庚嬴卣，其晚見於孝王時代效卣、效觶。與此相應的回首向後夔紋，其早見於成王時代的衛𣪘，其晚見於孝王時代的效卣，所以這批銅器年代的上限不出於西周初期，下限也不可能遠隔康、昭、穆、恭、懿、孝諸世；或者也可以說就當西周這一階段。

(3) 渾鑄法的年代界限

這批青銅器的冶鑄方法，是屬於早期冶鑄階段。此種早期冶鑄法，也是推斷相對年代的很好條件。郭寶鈞先生說：

> 殷周冶鑄技術，有兩種不同方式，一是通體合鑄，一是分鑄釬接。前者通行於春秋以前，後者新起於春秋以後"。[1]

由此可見，屯溪新出土的這批銅器，既是通體渾鑄，也是於春秋以前冶鑄的。

(4) 器形和器類的比較

這批青銅器中的卣，除其蓋作龜殼形外，其餘幾乎與孝王時的效卣如出一範。I式鼎和II式鼎也和江蘇丹徒所出西周鼎形相同，其他如盤、𣪘的形制，也都是通行於西周，同見於江蘇丹徒的西周銅器。[2] 關於器類方面，特別是卣和無蓋雙耳𣪘具有明顯的時代性，它只盛行於殷及周初的成、康、昭、穆之世，絕於恭、懿以後，[3]因此，它也是這批銅器斷代的好標尺。

總觀上述，從銘文、花紋、冶鑄、器形、器類諸方面分析，這批青銅器的年代，可能相當於中原地區的西周中期到晚期這一階段。

## 六、結 束 語

屯溪市西郊這兩座墓的發掘是很重要的，從所出土的實物資料上分析，豐富了我們以

1) 郭寶鈞：關於軑之演變，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附錄二，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8 月。
2) 江蘇文管會：江蘇丹徒縣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銅器，文物參考資料 1955 年 5 期。
3) 郭沫若：彝器形象學試探，青銅時代附錄頁 319—326，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6 月。

下的一些知識。

（一）大批釉陶器出土，啓示了我們關於我們古代釉陶工業生產的一系列問題，同時提供了解決殷代釉陶來源的線索，證實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創作釉陶工業，對於我國古代文化有很大的貢獻。

（二）成羣的青銅器出土，反映出我國南方青銅文化發達的情況。

（三）從遺物中含有某些物質文化因素上看，又爲研究我國南方晚期新石器文化與青銅文化的關係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的線索。

關於墓葬的相對年代，從墓葬結構和出土遺物上分析，第 1 號墓的相對年代，可能是西周中期到晚期這一時期的墓葬。第 2 號墓出土材料較少，作全面的比較研究有些困難，從其部分出土遺物考察，它與第 1 號墓相較，或許有早晚的分別，但也不致相距太遠，可能還是西周晚期的墓葬。

執筆者：殷滌非

## 附表一 屯溪青銅器的光譜定性及半定量分析

(中國科學院安徽分院化學研究所)

| 估量(百分比) 元素 / 器號 | 銅 Cu | 錫 Sn | 鉛 Pb | 鉍 Bi | 鐵 Fe | 銀 Ag | 鋅 Zn | 鎳 Ni | 鎂 Mg | 鋁 Al | 銦 In | 鍺 Ge | 矽 Si | 金 Au | 銻 Sb | 砒 As | 鈹 Be | 釩 V | 備註 |
|---|---|---|---|---|---|---|---|---|---|---|---|---|---|---|---|---|---|---|---|
| 1:82 | 主要 | 大量 | 多量 | 多量 | 微量 | 多量 | 痕跡 | 0.001 | 極微 | 極微 | —— | 痕跡 | 少量 | 較少 | >0.3 | 多量 | 0.001 | <0.003 | 鼎腹片 |
| 1:83 | 主要 | 大量 | 多量 | 多量 | 較多 | 多量 | ~0.01 | 0.005 | 極微 | 極微 | 0.005 | 0.002 | 少量 | 少量 | >0.3 | 多量 | 0.001 | 0.003 | 簋腹片 |
| 1:84 | 主要 | 大量 | 多量 | 較多 | 微量 | 多量 | ~0.01 | 0.05 | 極微 | 極微 | —— | 0.002 | 少量 | 微量 | >0.3 | 較多 | 0.001 | 0.003 | 盤腹片 |
| 2:87 | 主要 | 大量 | 多量 | 多量 | 少量 | 多量 | <0.01 | 0.02 | 極微 | 極微 | 0.001 | 0.001 | 少量 | 少量 | >0.3 | 多量 | 痕跡 | 0.003 | 小盂腹片 |
| 1:90 | 主要 | 大量 | 少量 | 多量 | 較少 | 多量 | —— | 0.01 | 極微 | 痕跡 | —— | 痕跡 | 少量 | 微量 | 0.03 | 較少 | 0.001 | 痕跡 | 尊口唇片 |
| 1:93 | 主要 | 大量 | 較多 | 多量 | 較多 | 多量 | 痕跡 | 0.005 | 極微 | 微量 | 0.003 | 痕跡 | 少量 | 較多 | >0.3 | 多量 | <0.01 | 0.01 | 卣提梁獸頭耳片 |
| 1:94 | 主要 | 大量 | 多量 | 多量 | 少量 | 多量 | 0.03 | 0.05 | 極微 | 痕跡 | —— | 0.002 | 少量 | 微量 | 0.03 | 較少 | <0.01 | —— | 卣提梁獸頭耳片 |
| 1:88 | 主要 | 大量 | 較多 | 多量 | 微量 | 多量 | 0.01 | 0.01 | 極微 | 微量 | —— | 0.002 | 少量 | 微量 | 0.03 | 多量 | <0.01 | 痕跡 | 三足器腹片 |

## 附表二 屯溪釉陶器的光譜半定量分析

(中國科學院安徽分院化學研究所)

| 估量(百分比) 元素 / 器號 | 矽 Si | 鋁 Al | 鐵 Fe | 鈣 Ca | 鎂 Mg | 鋇 Ba | 鍶 Sr | 錳 Mn | 鈦 Ti | 鈉 Na | 釩 V | 鉻 Cr | 銅 Cu | 鉛 Pb | 錫 Sn | 鈹 Be | 鋯 Zr | 鎳 Ni | 備註 |
|---|---|---|---|---|---|---|---|---|---|---|---|---|---|---|---|---|---|---|---|
| 1:臨1釉 | 大量 | >10 | 約2 | <10 | 約2 | 約2 | >3 | 約0.2 | 約0.3 | 多量 | 約0.003 | 痕跡 | —— | —— | 約0.001 | 約0.003 | 約0.001 | 約0.001 | 釉陶罐片 |
| 1:臨3釉 | 大量 | 約10 | 約2 | <10 | 約2 | 約2 | >3 | 約0.2 | 約0.3 | 多量 | 約0.003 | 痕跡 | 約0.003 | 約0.002 | 約0.02 | 約0.002 | 約0.001 | 約0.003 | 釉陶罐片 |
| 1:27 | 大量 | ≥10 | 約1 | <10 | 約2 | 約1 | >3 | 約0.5 | 約0.3 | 多量 | 約0.003 | 痕跡 | 約0.003 | 約0.003 | 約0.03 | 約0.001 | 約0.03 | 約0.001 | 灰青釉豆片 |
| 1:臨2 | 大量 | ≥10 | 約2 | 約0.03 | 約0.7 | 約0.5 | 約0.5 | 約0.5 | 約0.5 | 多量 | 約0.02 | 痕跡 | 約0.001 | 約0.01 | 約0.002 | 約0.002 | 約0.01 | 約0.003 | 釉陶罐片(白胎) |
| 14臨3 | 大量 | ≥10 | 約1 | 約0.03 | 約0.5 | 約0.5 | 約0.5 | 約0.5 | 約0.5 | 多量 | 約0.01 | 痕跡 | 痕跡 | 約0.002 | 約0.001 | 約0.001 | 約0.001 | 約0.001 | 釉陶罐片(白胎) |
| 1:臨4 | 大量 | ≥10 | 約3 | 約0.03 | 約0.7 | 約0.1 | 約0.5 | 約0.05 | 約0.5 | 多量 | 約0.02 | 痕跡 | 約0.001 | 約0.002 | 約0.001 | 約0.003 | 約0.03 | 約0.001 | 釉陶罐片(白胎) |
| 1:27 | 大量 | ≥10 | 約1 | 約0.03 | 約0.5 | 約0.03 | 約0.5 | 約0.03 | 約0.5 | 較多 | 約0.01 | 痕跡 | 約0.001 | 約0.01 | 約0.001 | 約0.001 | —— | 約0.001 | 灰白胎,灰青釉豆片 |
| 2:臨5 | 大量 | ≥00 | <10 | 約0.01 | 約0.5 | 約0.01 | 痕跡 | 約0.03 | 約0.5 | 少量 | 約0.02 | 約0.03 | 約0.002 | 約0.002 | 約0.001 | 約0.002 | 約0.03 | 約0.001 | 印紋陶罐片 |

# EXCAVATIONS OF TWO WESTERN CHOU TOMBS AT T'UN CHI, SOUTHERN ANHUI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BUREAU OF CULTURE, ANHUI PROVINCE

In March, 1959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of the Bureau of Culture, Anhui Province, excavated two Western Chou tombs about five kilometers to the west of the city of T'un Chi. They were located to the south of the village of Yi Ch'i Ts'un on the southern bank of the Hsin An Chiang. Both tombs had been disturbed by the tombs of the Han Dynasty which were superimposed directly above them. And tomb No. 2 in particular had suffered very severe damage.

The structure of these two tombs was rather unique, having only the mound but without the tomb pit. To build the tomb, gravels were piled up to form the base which had a rectangular plan. The dead and funerary objects were simply laid out on this gravel base and then the earth was piled up on them in a haphazard fashion to form the mound. While excavated, tomb No. 1 had a mound measuring 33.1 meters in diameter. Its height was 1.75 meters from the base up to the top of the mound. The base itself had an additional thickness of 25 cm. The structure of tomb No. 2 differs slightly from that of tomb No. 1 in that its gravel base was further surrounded by a low wall of gravels. At the time of the excavation, the north and south sides of this wall were still in good shape, retaining a height of 25 cm and a thickness of 10 cm.

All the funerary objects were laid out on the gavel base in an orderly manner.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found at the eastern end of the tomb seems to indicate that originally they were probably buried near either the head or the feet of the dead. In all, 102 objects were excavated from these two tombs, including pottery, bronzes and some implements of jade and stone. The most significant is the discovery of 71 pieces of glazed pottery which are all hand-made, with either brownish or greyish green glaze (Plates XI—XVIII). A spectro-chemical analysis conducted by the Institute of Chemistry, Academia Sinica, Anhui Branch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 in glaze color is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the proportion of iron contained therein. It has also been ascertained that the brownish glaze was applied with a brush while the greyish green glaze was obtained by soaking the whole vessel into the liquid glaze. For this reason, the latter ware was glazed on both sides. The shapes of the glazed pottery include the bowl, deep bowl, "tou", "tsun", "ho", "p'an", "kuan", etc. In some cases, the underside of the vessel bears incised marks of an irregular but interesting kind. Judging on the basis of the quantity as well as the variety of the ware, the glazed pottery industry of the time must have been developed on a considerable scale.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probably still in its infancy from a technical point of view as suggested by the absence of wheel-made vessels and the rather crude quality of the glazes. However, the discovery of so many vessels of this unique ware from a closed find of so early a date is a matter of great importance in both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It also raises the question as to the origin of this distinctive type of pottery. The authors are inclined to the opinion that it was originated in the south and that all the stray finds of such ware at Yin Hsü and other sites of North China were probably imports from the south.

Tomb No. 1 has also yielded a large quantity of bronzes including the "ting", "kuei" "yu" (卣), "tsun", "yu" (盂) (Plate IX, f. 1), "p'an" as well as two unique bell-shaped bronzes

with five small columns which were probably some sort of musical instrument (Plate VIII). But there were only two bronzes in tomb No. 2: a "ting" and a "yu". A very interesting feature of these bronzes is the unique form (such as the bell-shaped bronzes with five columes) and decoration found on many of them which indicate very stro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many respects they are reminiscent of the well known pottery of this region with impressed geometric design. Of all the bronzes only a "tsun" has an inscription of three characters on the inside of the bottom reading "[illegible]父乙". It appears that all the bronzes were cast in composite moulds. The discovery of so many bronzes with their unique form and decoration will provide us with some valuable data for the study of the bronze culture of this region.

Some of the objects excavated from these two tombs such as the lone hard pottery "kuan" (罐) (Plate XVII, f. 3), the spinning whorls with their interesting shape (Plate XVIII, f. 5) and the incised marks on the underside of the glazed pottery, suggest influences from the late Neolithic culture of South China. Careful researches based on these material will probably shed much new li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te Neolithic and Bronze culture of South China.

屯溪西周1號墓出土
Ⅱa式釉陶尊(1:57)

1．墓1隨葬品出土情況的一角

2．墓1銅器出土情况(由北向南攝)

圖 版 貳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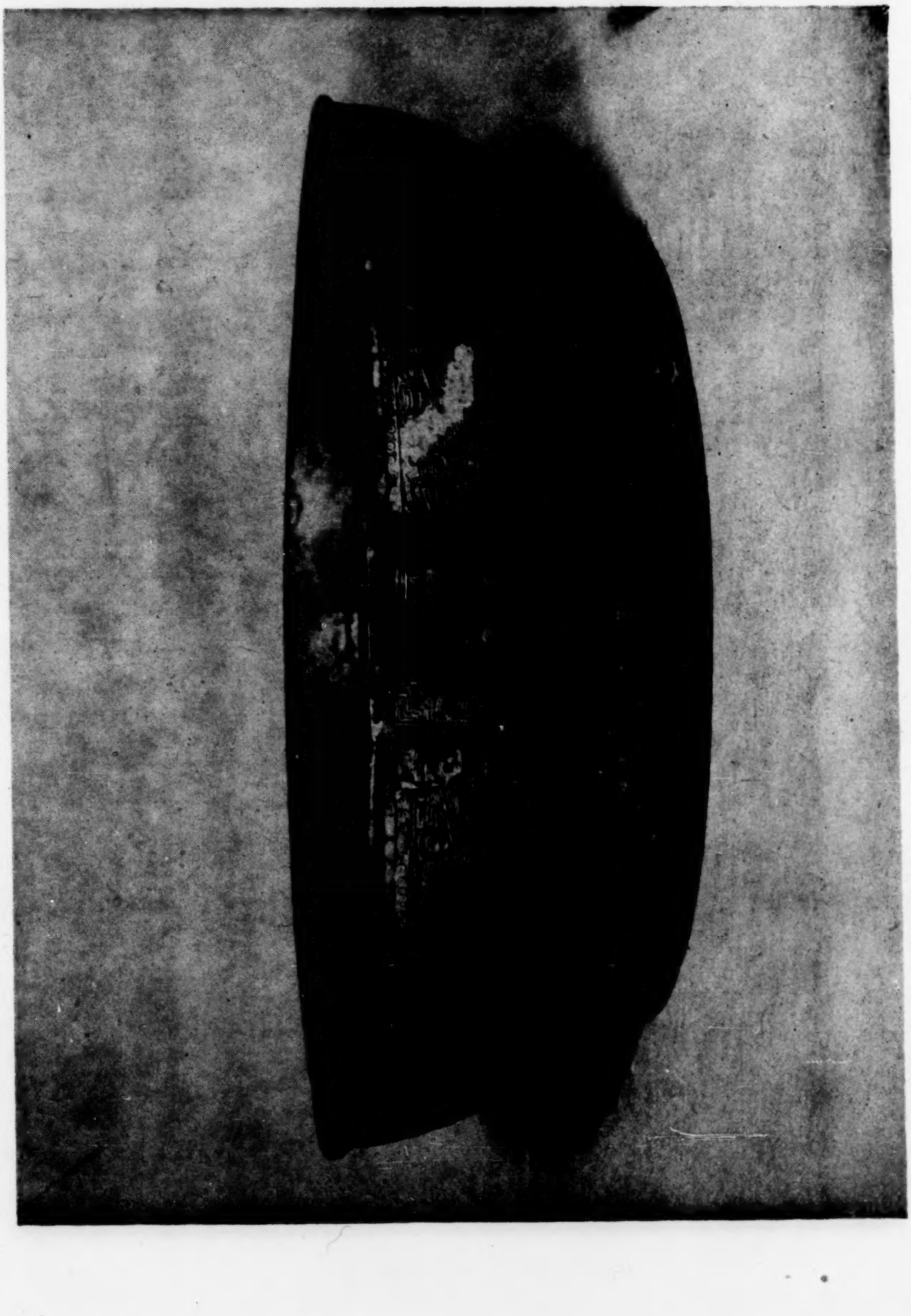
1. 銅鼎(1:82、1:79, 1/4)

2. 銅鼎(1:80、1:81, 1/3)

圖 版 叁 (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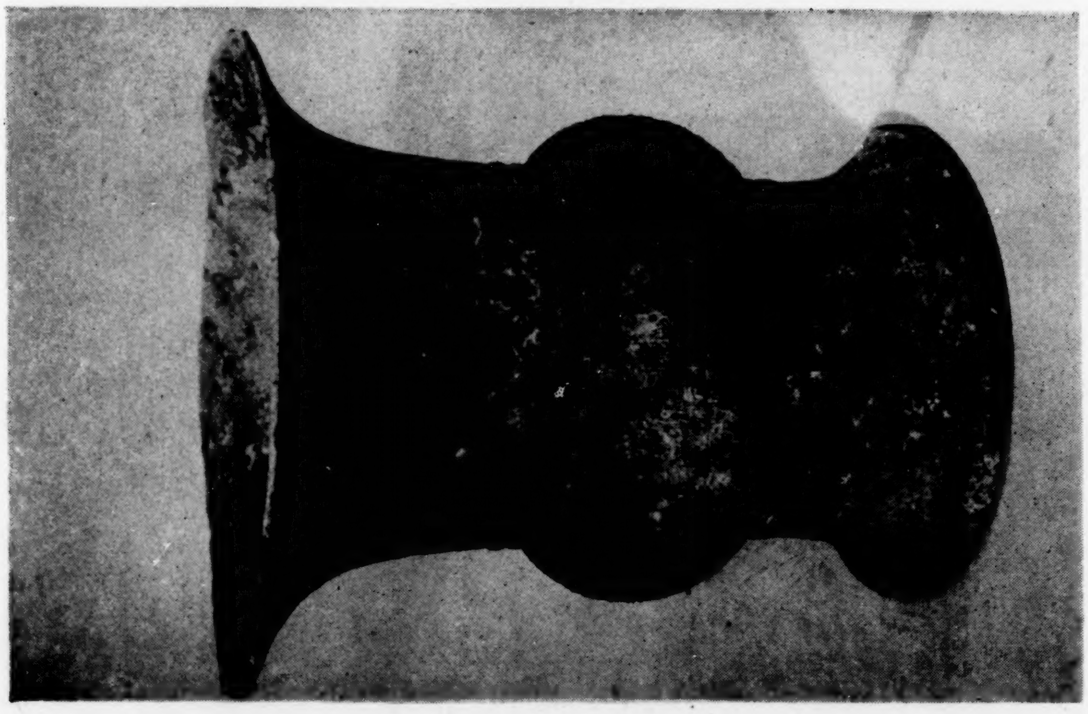
銅 𣪘 (1:96, 約 2/5)

圖 版 肆 (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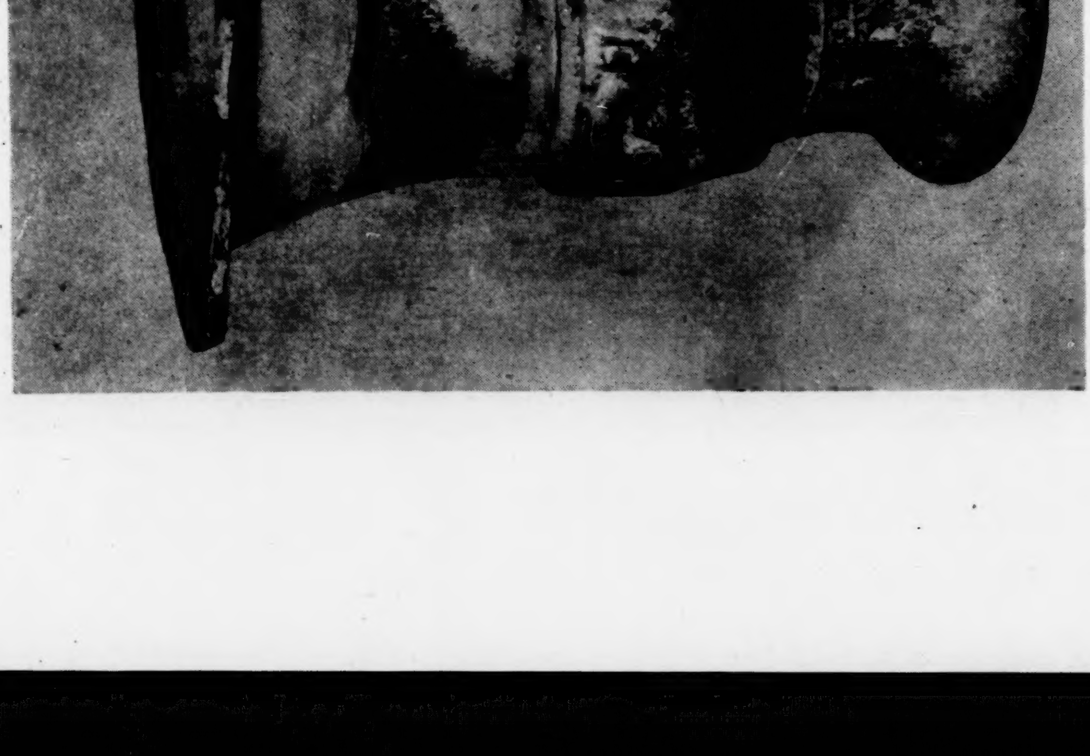


銅 盤(1:85, 1/2)

# 圖 版 伍 (V)



2. 銅尊 (1:89,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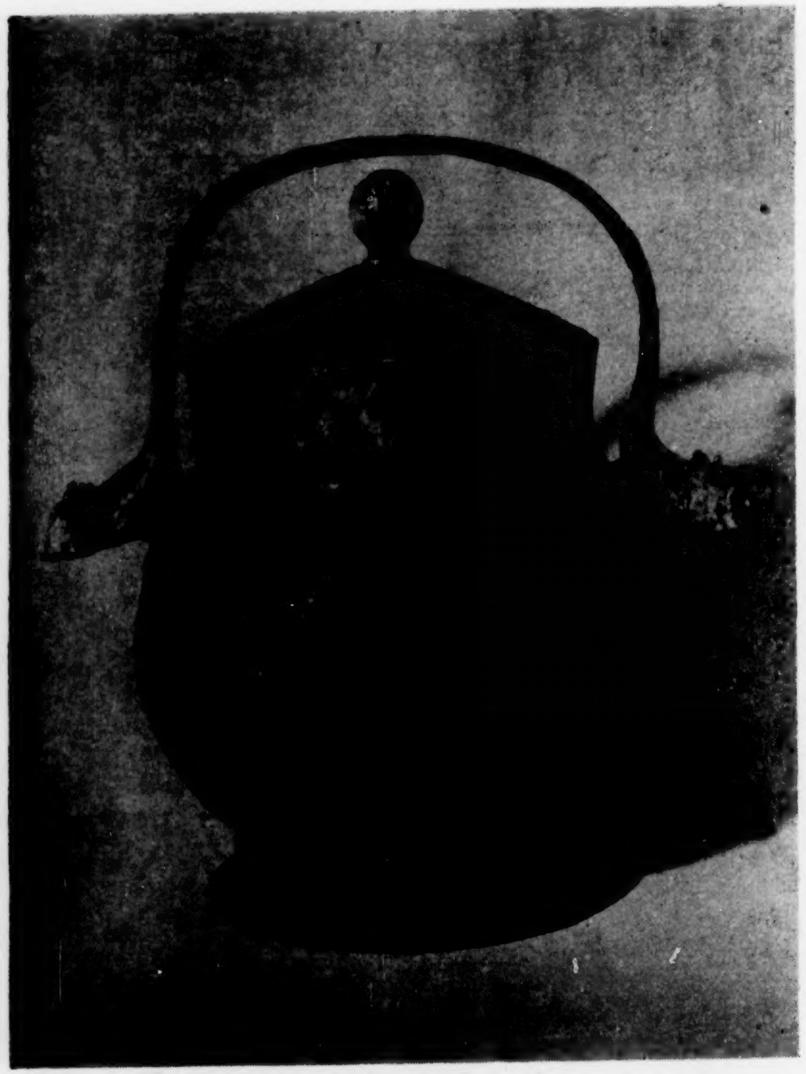


1. 銅尊(1:90, 1/4)

圖版陸 (VI)

1. 銅卣 (1:93, 1/4)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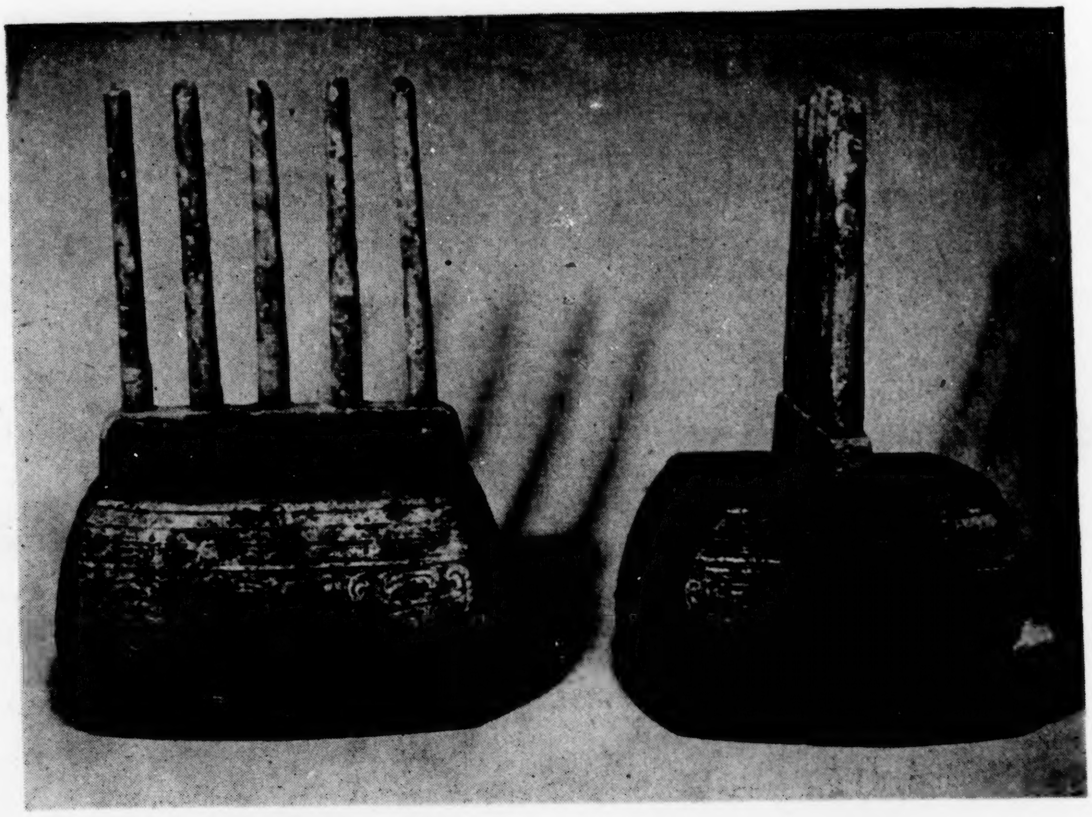
2. 銅卣 (1:93)面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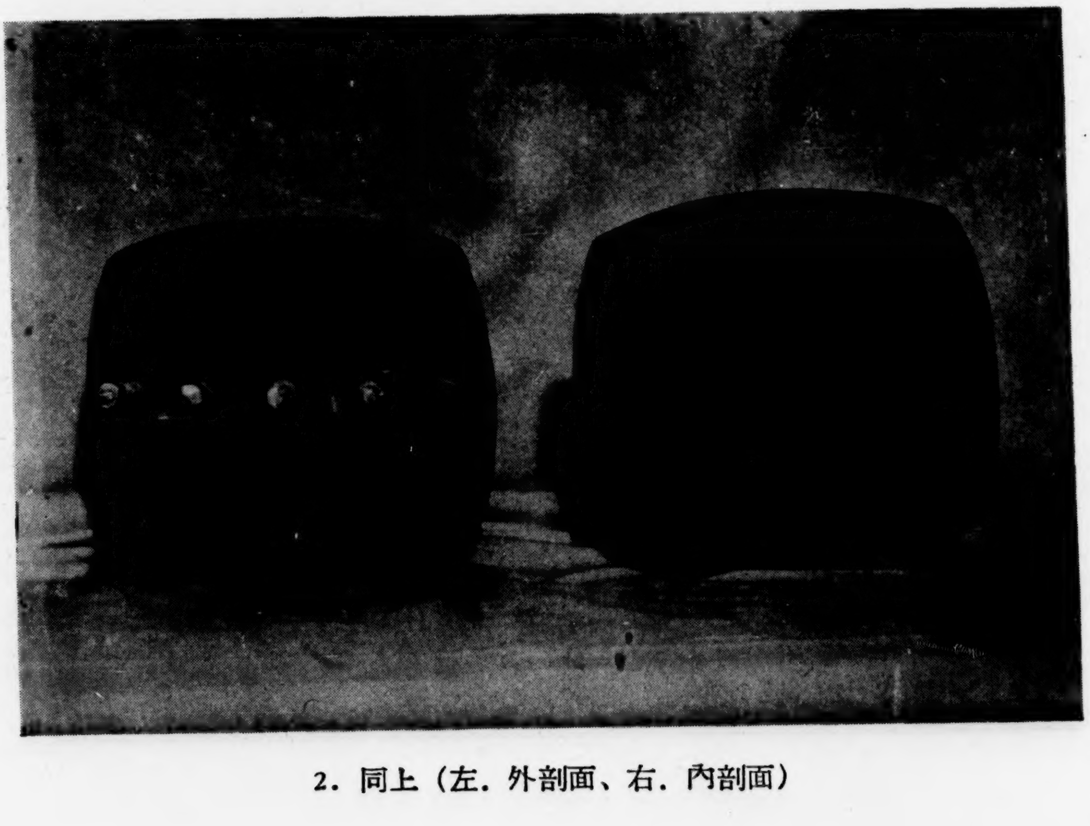
1. 銅卣 (1:94, 1/4)正面

2. 銅卣 (1:94, 1/3)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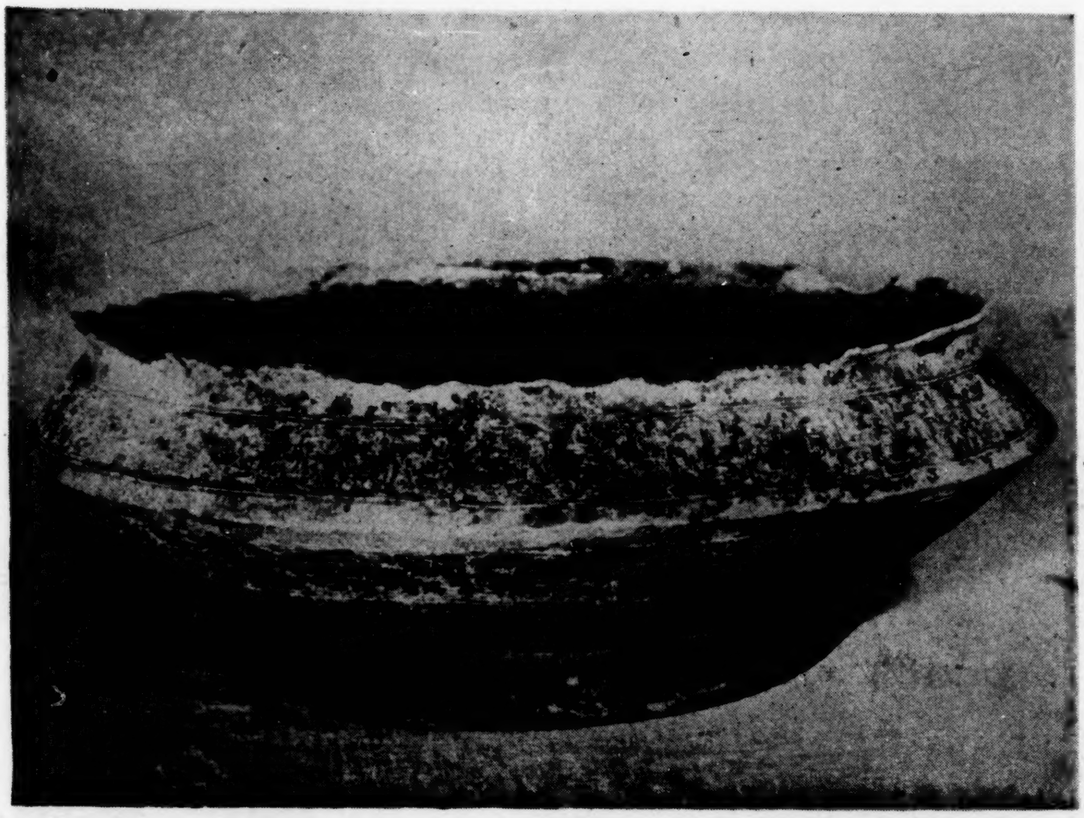
# 圖 版 捌 (V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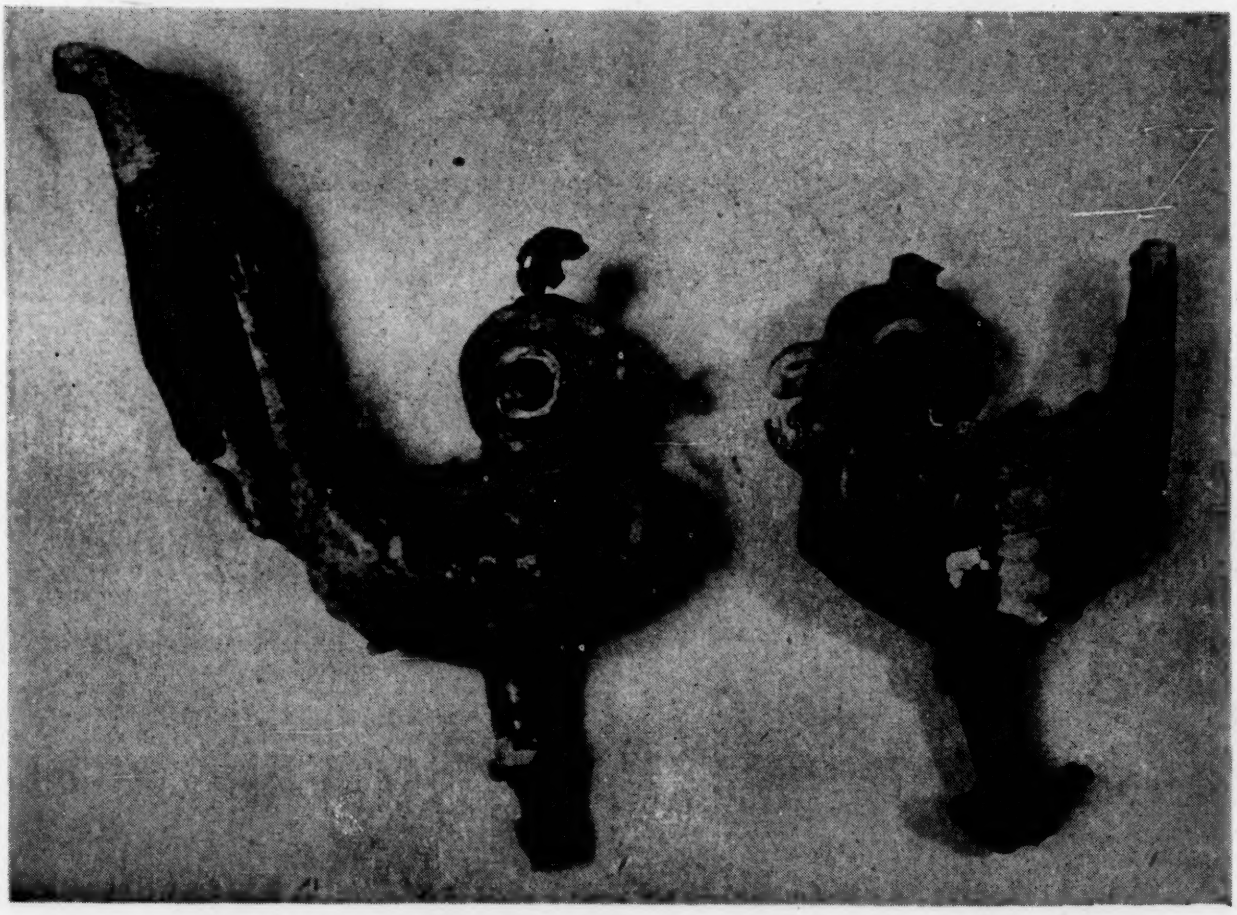
1. 銅"鐘形五柱樂器"(左. 1:92、右. 1:91, 1/5)



2. 同上 (左. 外剖面、右. 內剖面)



1. 銅盂 (1:95, 1/3)



2. 銅鳥飾(左. 1:97、右. 1:98,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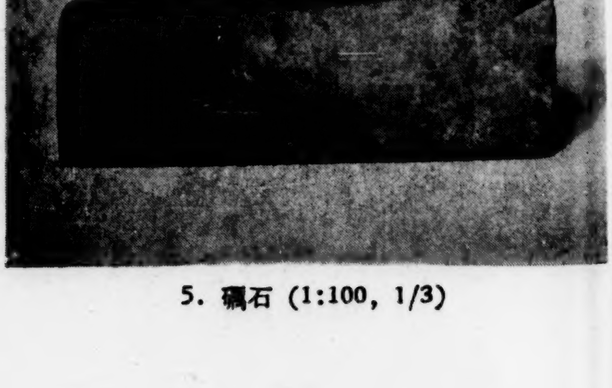
# 圖 版 拾 (X)

1. 銅尊 (2:86, 1/3)

2. 銅尊腹部花紋 (2:86)

4. 玉件(1:101, 1/2)

3. 銅鼎底紋 (1:80,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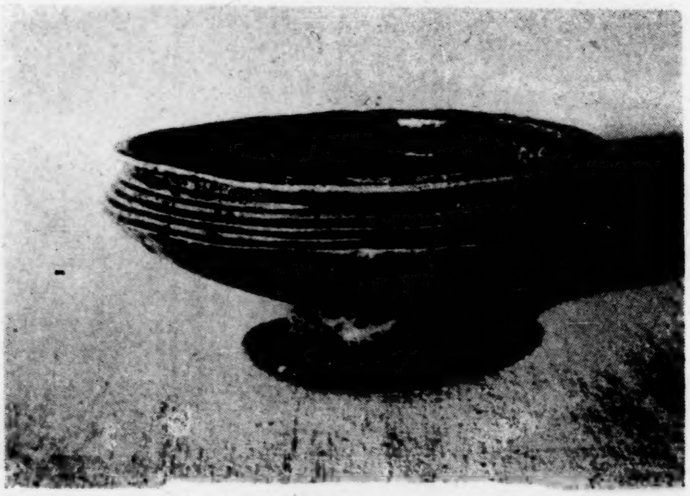


5. 礪石 (1:100,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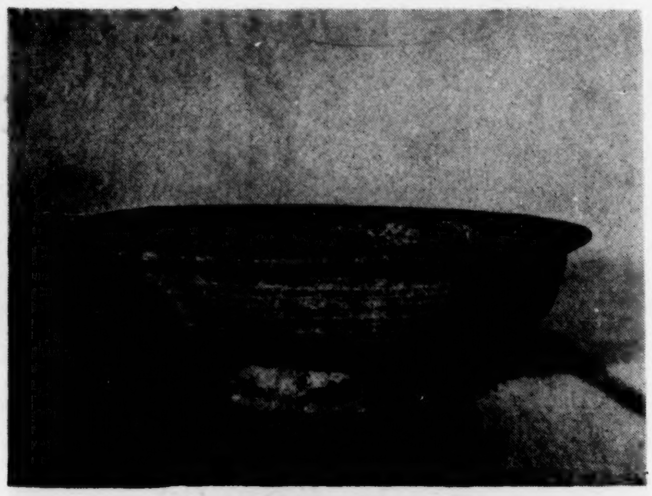
1. Ia式釉陶豆 (1:9, 1/3)

2. Ia式釉陶豆 (1:10, 1/3)

3. Ib 式釉陶豆 (1:12,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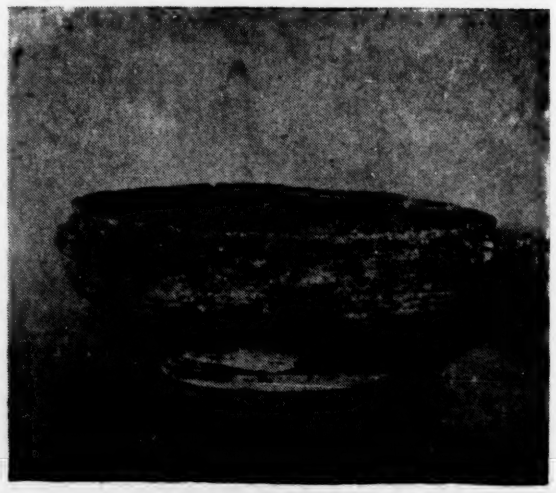
4. Ic 式釉陶豆 (1:22,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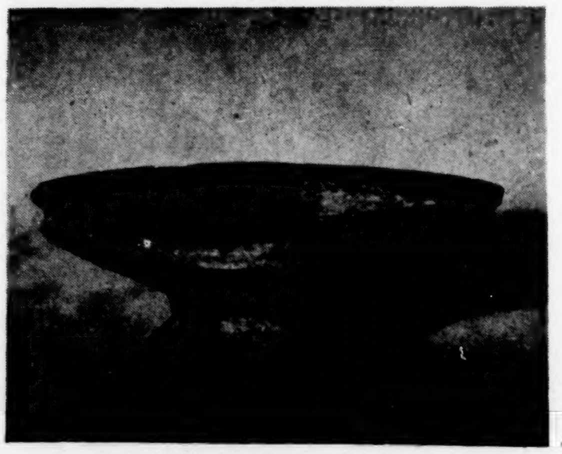
5. II式釉陶豆 (1:23, 1/2)

6. III式釉陶豆 (1:29, 1/2)

圖 版 拾 貳 (X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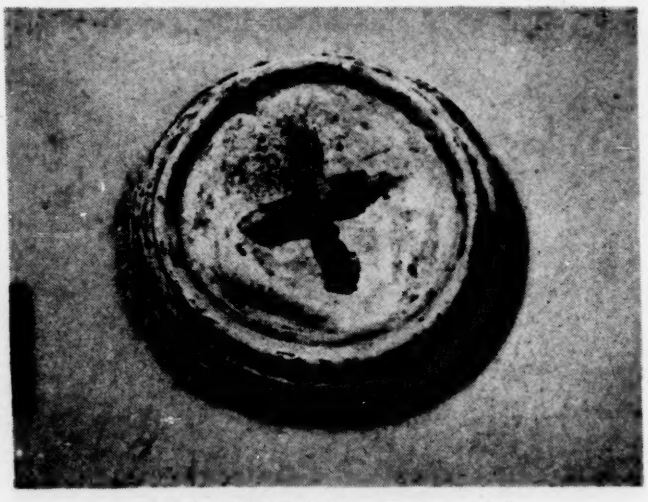
1. Ⅳ式釉陶豆 (1:30, 1/3)



2. Ⅴ式釉陶豆 (1:31, 1/2)

3. Ⅵ式釉陶豆 (1:32, 1/2)

4. Ⅰ式釉陶盂(1:33,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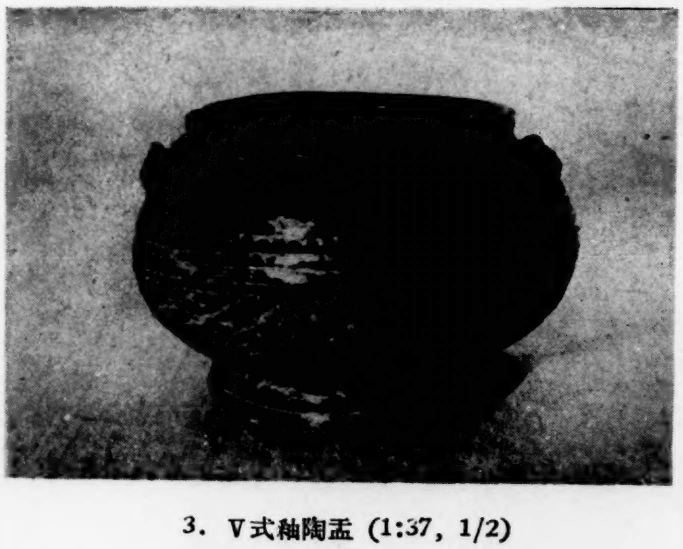


5. 盂底塗的"十"字 (1:33, 1/3)

6. Ⅱ式釉陶盂(1:34,1/2)

1. Ⅲ式釉陶盂 (1:35,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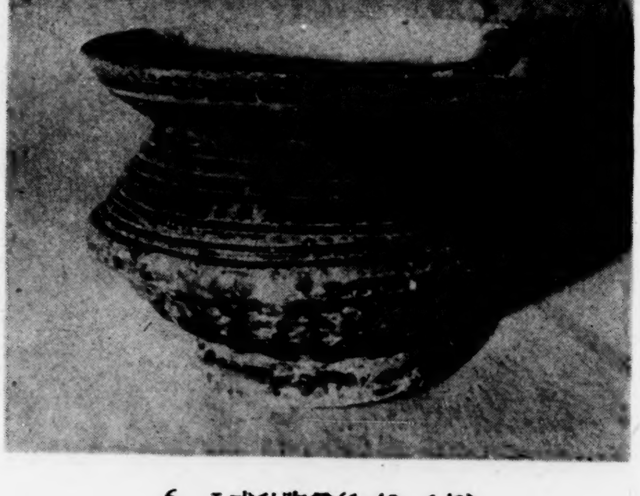
2. Ⅳ式釉陶盂(1:36, 1/2)



3. Ⅴ式釉陶盂 (1:37, 1/2)

4. Ⅰ式釉陶尊(1:47, 1/3)

5. Ⅰ式釉陶尊 (1:48,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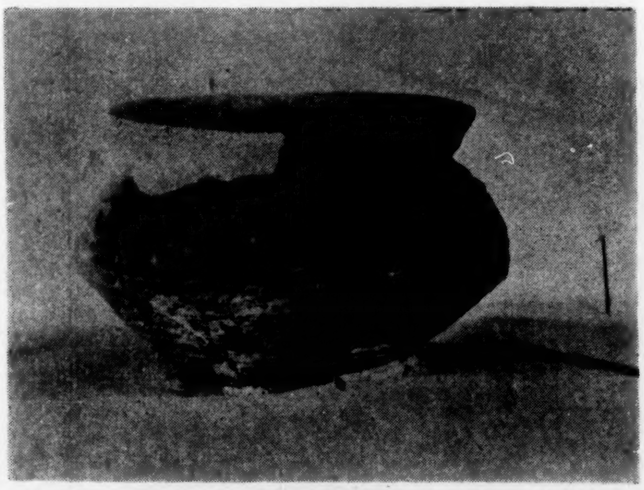
6. Ⅰ式釉陶尊(1:49, 1/3)

圖版拾肆 (X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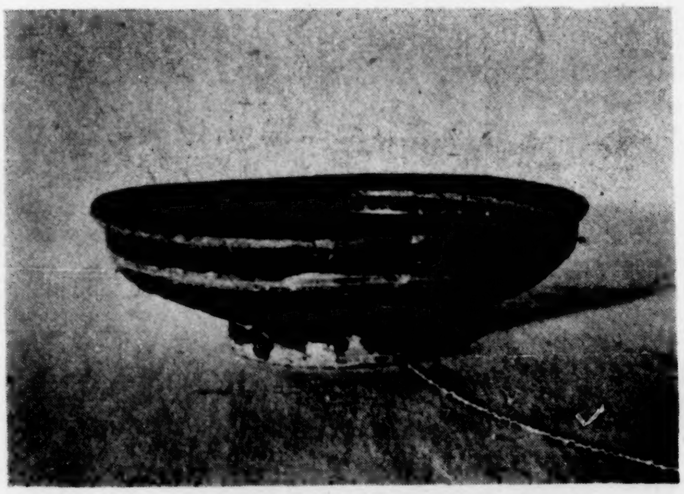
1. Ⅱa式釉陶尊 (1:57, 1/2弱)

2. Ⅱb式釉陶尊 (1:58, 1/3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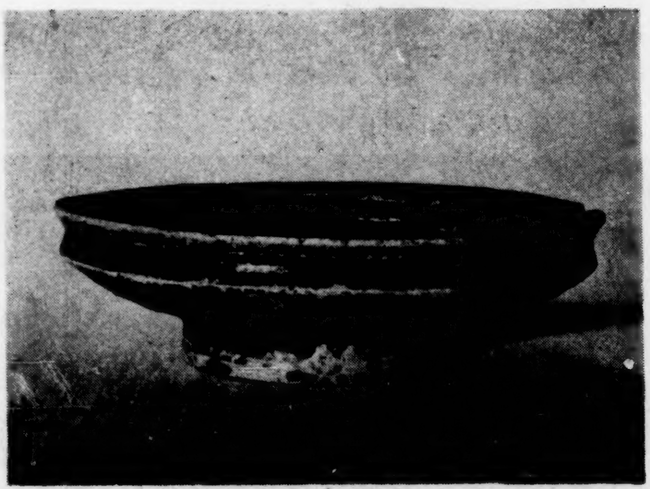
1. Ⅲa 式釉陶尊 (1:50, 1/3)



2. Ⅲb 式釉陶尊 (1:51, 1/2)



3. Ⅰ式釉陶碗 (1:39,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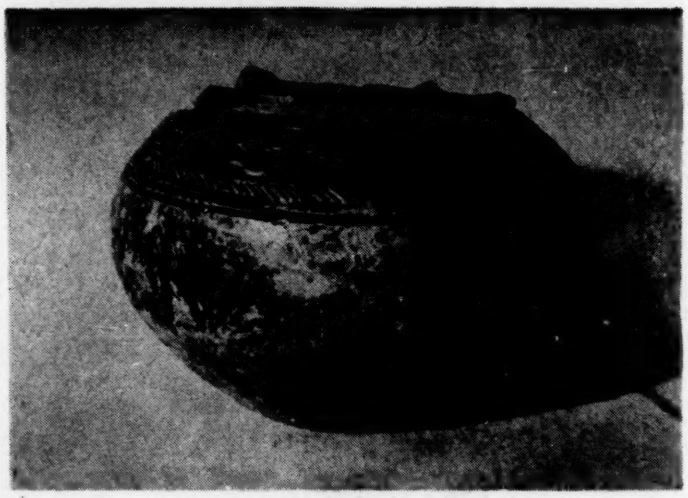


4. Ⅱ式釉陶碗 (1:44,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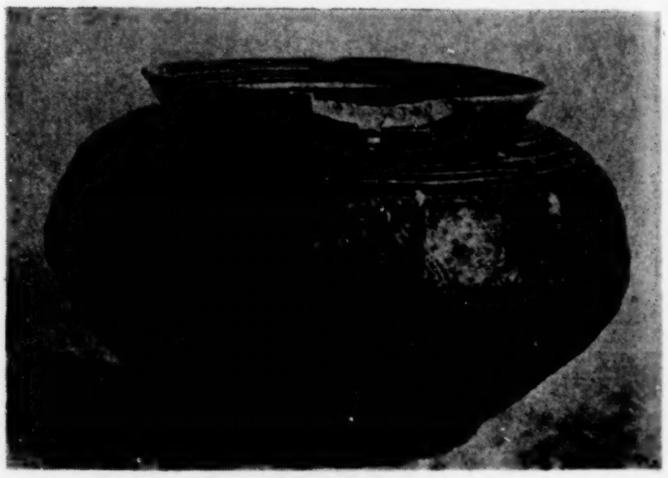
5. Ⅲ式釉陶碗 (1:46, 1/2)

6. 釉陶罐 (1:59, 1/5)

# 圖版拾陸 (XVI)



1. 釉陶罐 (1:66,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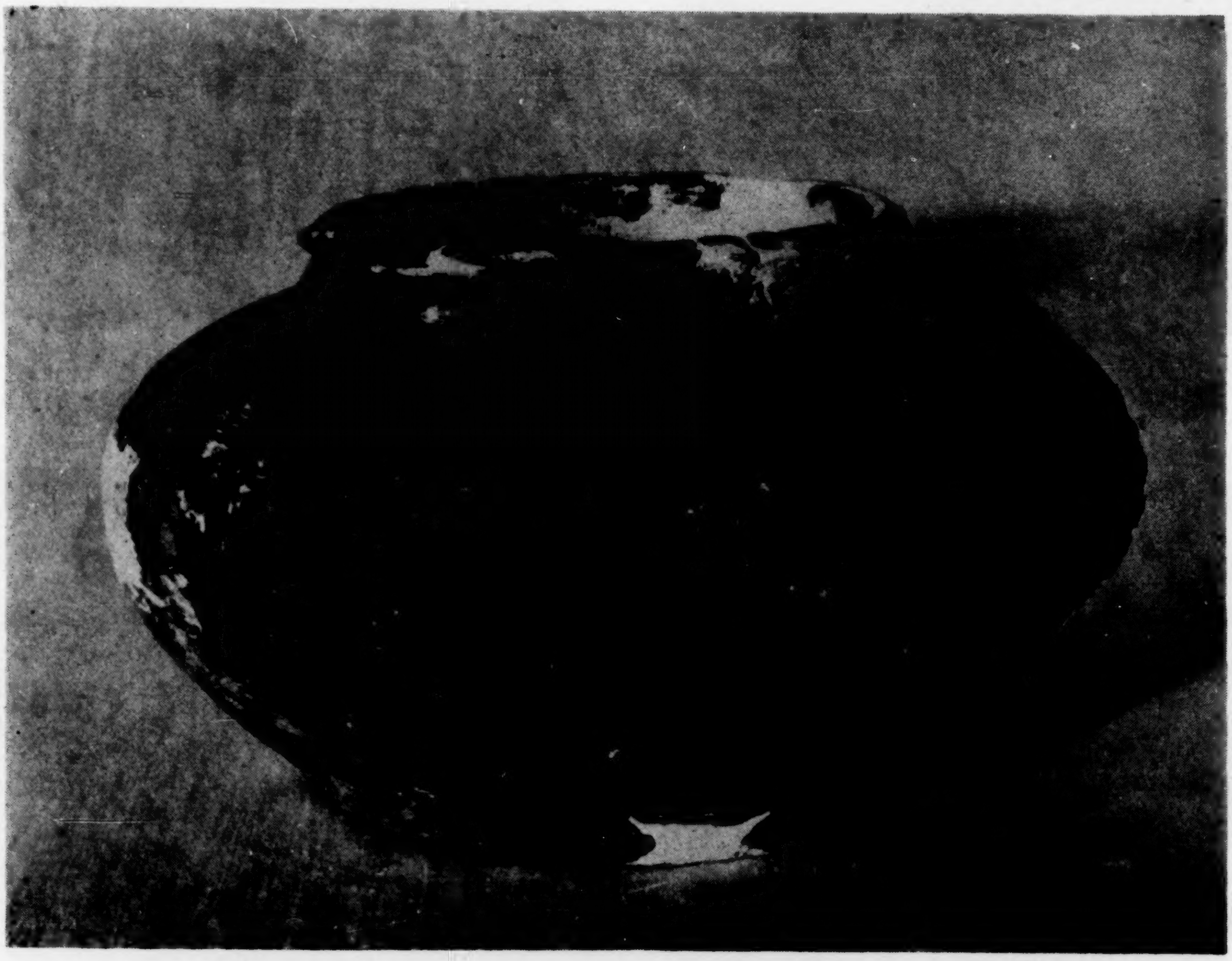
2. 釉陶罐 (1:60, 1/4弱)

3. 釉陶罐 (1:61, 1/4強)

4. I式釉陶壺 (1:53, 約4/5)

1. Ⅱ式釉陶盉 (1:55,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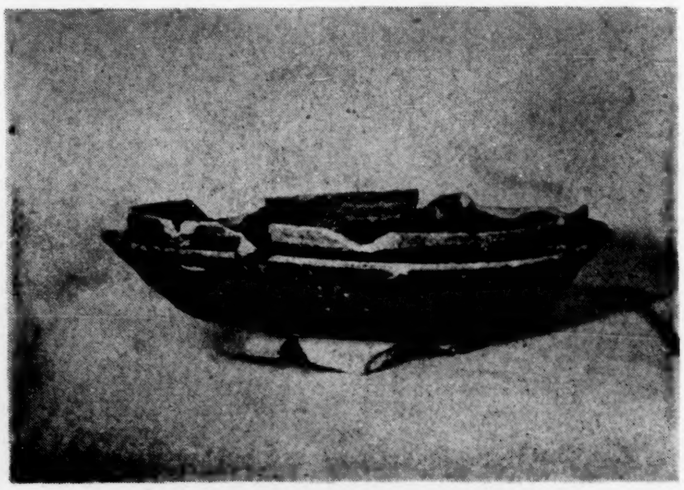
2. Ⅲ式釉陶盉 (1:56, 1/2)



3. 幾何印紋硬陶罐 (2:69,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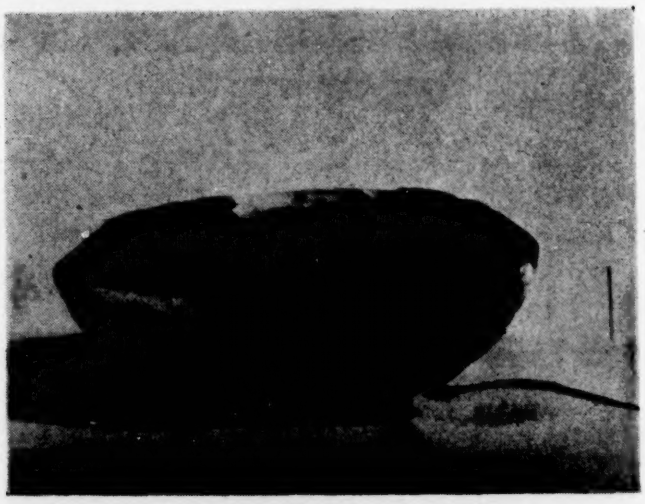
# 圖版拾捌 (XVIII)

1. 釉陶罐 (1:62,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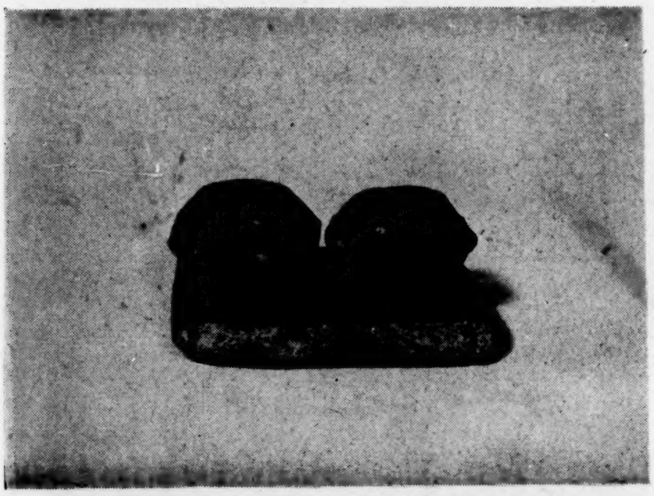


2. 釉陶盤 (2:71,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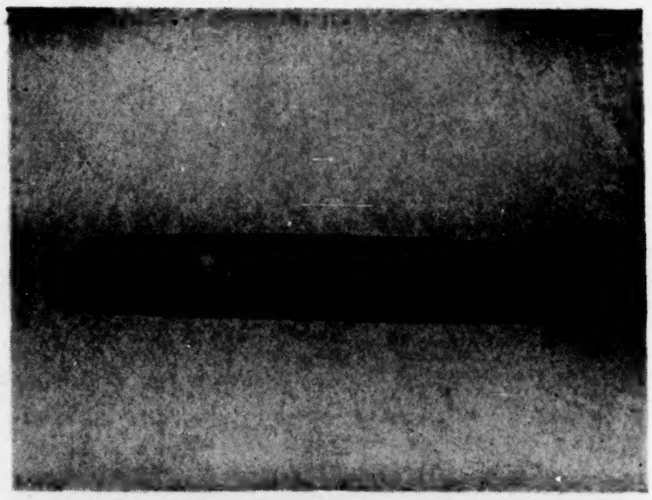
3. 小陶盂 (2:73, 1/2)



4. 小陶鉢 (2:74, 1/2)



5. 陶紡輪 (2:76、77)、方石塊 (2:75, 1/2)



6. 圭形石料 (2:78, 1/5)

# 晉代鋁銅合金的鑑定及其冶煉技術的初步探討

楊　根
(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

## 一、鋁銅合金的發現

1956年，南京博物院在江蘇宜興的晉墓中，發掘出一種金屬帶飾。[1]這種帶飾是在墓主人的腰部發現的，總數(包括殘片在內)有20幾片，形式分做幾種不同的類型。部分實物如圖版所示(圖版壹，1—9；圖版貳，1)。

這種帶飾已被1000多年的腐蝕層和塵土所遮蓋，外表是灰褐色的，內層的金屬比較薄，大約只有1—2毫米。這種帶飾是當時貴族周處的用品。[2]

帶飾出土以後，即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他們選擇了其中的一片請南京大學化學系進行化學成分分析，其結果如下：

| 帶飾內層的合金成分 | | |
|---|---|---|
| 鋁～85% | 銅～10% | 錳～5%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鼐副所長十分重視這次的發現和分析，為了防止可能的偏差，他又從這批金屬帶飾中選取了一片樣品，請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陸學善先生代做光譜分析，分析的結果也肯定了帶飾中的大量成分是鋁。

| 光譜定性分析結果 |
|---|
| 鋁（大量）銅 鐵 錳 鉛 鎂（其他甚微） |

由於鋁是一種難於冶煉的金屬，在1827年以後，才用金屬鉀把它從氯化鋁中還原出

1) 羅宗真：江蘇宜興晉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7年第4期。
2) 同上，頁103—104。

來。60年以後又用電解熔鹽的辦法得到了少量的金屬鋁。一直到1889年俄羅斯的工程師發明了三相電流以後，鋁才能大規模地用電解法生產。[1]因此，在1000多年以前發現了含大量鋁的銅合金是一件十分令人注意和興奮的事。

東北工學院輕金屬冶煉教研室沈時英等同志也很重視這件事，他們也索取了此項帶飾的殘片進行了分析。但是十分奇怪的是分析結果和上述的全然不同，此項金屬帶飾並不含鋁，而是含大量的銀。[2]

| 光譜定性分析結果 | |
|---|---|
| 銀 銅<br>（主要成分） | 金 鉍 矽 鈣 鐵 鉛 鎂<br>（甚 微） |

## 二、鋁銅合金的鑑定

這種分析結果的差異，引起我們十分的重視。於是，我們針對從考古研究所取到的一片金屬帶飾殘片，也進行了各方面的考查。這片殘片只有小手指甲般大，是夏鼐同志親手從一片帶飾上取下，當面交給我們的。

我們的考查是：

1. 用比重瓶測得它的比重是4.49；

2. 把它放在硝酸中加熱，溶解，加濃鹽酸後不生白色沉澱，又加過量的氫氧化銨，出現絮狀沉澱；

3. 對它進行光譜定性分析，結果（圖版貳，3）；

| 光譜定性分析 結果 |
|---|
| 鋁（大量） |
| Cu Fe Pb Mn Mg Ag（少量） |
| Cr Sn Si Ca（微） |

（由於樣品很少，還保留一部分供檢驗用，所以沒進行化學成分定量分析。）

4. 用金相顯微鏡觀察了帶飾的合金組織（圖版貳，2）。

所有這些考查，證實這片金屬帶飾的成分大部分確實是鋁，而不是銀。

那麼，這種分析結果的迥異是怎樣產生的呢？夏鼐副所長認爲這些片金屬帶飾的成分可能並不一樣，其中有的含大量鋁，也有些含大量的銀，我們和沈時英同志都同意這一看法，分析的結果也正說明是這樣的。鋁銅合金在晉代帶飾中出現，經過三方面分頭鑑

1) А.И. БЕЛЯЕВ: 輕金屬冶煉學，陳展猷譯，頁3，1954。
2) 東北工學院分析報告（未發表）。

定,成爲顛撲不破的事實。

爲了更加愼重地對待這個問題,我們又親自到南京博物院調查了關於此項帶飾的詳細情況:

1. 實物情況。現共有 17 片,還有少許殘片,其中有一片外部的淤積物已剝落,合金上面有一層氧化膜;

2. 實物的可靠性問題。我們訪問了南京博物院的尹煥章同志和該晉墓發掘者又是報告執筆人羅宗眞同志。據尹、羅兩位同志介紹:晉墓共兩座(一號和二號),一號墓被盜過,墓內有些變動,二號墓基本上沒有動過。這種帶飾是出自一號墓,但從帶飾在墓中人骨架上的位置和形狀看來是保持原樣的,並沒經過變動,這就是說實物是可靠的。現在所分析和保存的實物,仍是出土時原樣,並未進行修整過。

爲了進一步分析研究,在今年春,南京博物院又送來幾片殘片交給我們。經過分析考查,其中的一片(前述的外部淤積層已剝落的一片),化學成分大部仍是鋁。

化學處理的結果,和光譜分析的結果和上次考查的完全一樣,金相組織也大致相同。

除這片以外,另有兩小塊殘片,經分析後,斷定其化學成分大部是銀。

至此,我們肯定,遠在 1000 多年以前的晉代,出現了世界上第一塊成分大部分是鋁的合金,這是世界化學史和冶金史上的一次創獲,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的卓越成就。

直到目前爲止,由於在同時期的其他地方,以及後來的各個朝代中,都沒有再發現鋁的合金(有人曾說西安唐墓出土的一個白色金屬盆,質地很輕,後來經過鑑定是銀質的)。又由於晉墓中的鋁合金僅是小片,而且是雜在銀合金的物件中,因此我們認爲這項鋁合金帶飾的出現是偶然的,是古代的勞動人民無意中得到的。

## 三、鋁銅合金冶煉技術的初步探討

晉代人民如何在無意中掌握了比較困難的技術條件,煉出了鋁銅合金呢,我們從技術和社會條件兩方面進行初步探討,提出一點線索,供更多的同志們進一步研究時參考。

第一、技術方面的探討

從現代的科學觀點來看,使鋁的氧化物在高温下用炭還原是比較困難的(鋁在自然界中的礦物,大部分經高温灼燒後都成爲氧化鋁),這是因爲氧化鋁的離解壓很小,難於還原,而且在氧化鋁被炭還原的温度條件下,鋁的蒸汽壓很大,反應不能進行完全,再加上鋁的蒸汽容易與炭在高温下化合成炭化鋁,所以金屬鋁幾乎得不出來。[1]

氧化鋁被炭還原的反應方程式如下:

$$Al_2O_3 + 3C \rightleftharpoons 2Al + 3Co - 320000 \text{ 卡}$$

就這個反應測得的 CO 分壓與温度的關係是:

$$\lg P_{co} = -\frac{22500}{T} + 10.01 \text{ 大氣壓}$$

1) А. И. БЕЛЯЕВ: 輕金屬冶煉學,陳展猷譯,頁 304,1954。

由這個式中可算出(根據 $\lg P_{co} = 0$ 的條件)氧化鋁還原反應開始的温度是 2250° K (1977℃),而鋁的沸點在大氣壓下也是2000℃左右。

但是,這種氧化鋁被炭還原所遭到的困難,如果還原過程中有足够數量的一種沸騰温度比鋁高的金屬在場(如銅,沸點 2300℃),鋁一經還原出來,便溶解於銅中而形成合金。鋁旣然存在於液態的合金中,則其蒸汽壓必然低於純鋁的蒸汽壓,因而有利於還原作用的進行。此時,一氧化炭的分壓力,也必小於一個大氣壓,因而,反應進行的温度也可以比2000℃低一些。

我們設想,這也許是古人得到鋁銅合金的一種可能途徑(當然,並不肯定)。問題是:高温的技術條件古人究竟怎樣掌握的?我們又進一步設想,加入助熔劑,也許會起一定作用。爲了驗證這種想法,我們也做了一點探測性的實驗。現在把結果介紹於下,作爲參考。

| 實　驗　結　果 | |
|---|---|
| 還原劑 | 炭粉 |
| 原料成分 | 氧化鋁粉末～75% |
| | 銅粉　　～25% |
| 助熔劑 | 硼砂 |
| 加熱温度 | 1600℃以上 |
| 生成物 | 得到少量鋁銅合金 |

這次實驗並不能解決問題,但初步探索的結果,可以幫助下一步深入地研究。

除了熱熔法用炭還原氧化鋁以外,另一個途徑可以考慮的是在高温下用炭和燒鹼作用,可以得到少量的金屬鈉,在反應中同時有含鋁的礦石和銅(或銅礦)存在。那麽,金屬鈉一經游離出來,即可能從鋁的礦石(當時已成某一種鹽或氧化物)中取代出少量的鋁,又立即和銅生成鋁銅的合金。

中國科學院原冶金陶瓷研究所在 1958 年研究土法煉鋁時大致就是這樣進行的。[1)]

他們提製純鋁,是將土法煉成的鈉和冰晶石一起反應得到的。

$$C + 2NaOH \rightarrow H_2O + CO\uparrow + 2Na$$

$$3Na + Na_3AlF_6 \rightarrow Al + 6NaF$$

這種方法,他們僅在試驗室製成功了,技術問題還沒有全部解决。

第二、從當時的社會條件來探討

由於中國在 3000 年以前就進入了輝煌的青銅時代,當時除了積累了豐富的冶鑄技術經驗以外,至少已經掌握了 1000℃ 以上的高温技術,否則銅是不會熔化的。到了戰國時代,又出現生鐵的器具,能够掌握的温度就更高了,至少要達 1200℃。兩漢近 800 年的歷史過程中,由於生產的需要和技術的提高,冶鐵術不斷提高,掌握高温技術也如此。到東漢末年,杜詩總結勞動人民的經驗,創造了水排,更是提高技術的一個重要關鍵,因爲强

1) 中國科學院冶金陶瓷研究所:土法煉鋁,1958。

大的鼓風設備是得到高温不可缺少的條件。

另外，一項重要的改進，就是煤的使用。根據漢書地理志的記載，[1]和山東省平陵漢代冶鐵遺址，[2]河南鞏縣冶鐵遺址的考古發掘，出現了未燃盡的煤，都可以證實在漢代，已經用煤作燃料了(將在另文中詳述)。

加以在魏晉以來，道教興盛，講究道術的人越來越多，他們最重視兩件事：一件是煉出"長生不老"的金丹；另一件就是煉寶劍，這兩件事都和金屬的冶煉有關。儘管他們的想法有不少怪誕、迷信的成分，但是他們之中有不少人，成年累月躲在深山幽谷中摸索煉金丹和寶劍的秘密，經常把幾種金屬或礦石混合燒煉，再加進一些其他的物質，日子久了，很可能在無意中發現一種新物質或摸索出一些新技術。像晉以後南北朝的陶弘景就得到不少經驗，作了一部古今刀劍錄，北齊時的一位講究道術的人綦毋懷文就發明了煉灌鋼的方法，煉出了世界最早的鋼刀，北齊書上有着記載。[3]我們並不是肯定說當時的鋁銅合金也是這麼樣摸索煉成的，但這可以反映當時的社會條件，既然在晉以前的戰國兩漢能煉出生鐵，用煤作燃料，發明了強力的水力鼓風機，在晉以後又有了古今刀劍錄和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灌鋼(比歐洲約早1200年)，[4]那麼在晉代就也有出現杰出成就的可能性。

在晉、南北朝時期，我國的其他科學技術出現了不少杰出的成就，像祖冲之對圓周率的計算，賈思勰的齊民要術，葛洪的抱朴子中的煉丹和製藥知識，以及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等等，都是劃時代的科學創舉。冶金化學上出現的創獲，正和其他各門自然科學的高度發展相適應。

至於古人爲什麼要在同一件袍帶的幾片帶飾上用成分大不相同的合金來做，古人是否有意識的這樣做(大量鋁的合金和大量銀的合金，比重相差雖很大，但是由於用的數量較少，也可能覺察不出，似是無意。)？這些問題連同冶煉技術問題，都還需要各方面進行研究，這裏只是提供一點線索。

、　附　記

全部帶飾實物，現已由南京博物院寄到北京，已於今年在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展出，其中全部完整的有五片，另外的一些由於稍有殘缺，可以看出金屬的斷面。因爲對珍貴文物的保護，沒有全部分析，從外表上看不出還有哪些是鋁的合金，因此還不能統計出全部帶飾有多少塊是含鋁的。

本文的寫成，曾得到張子高教授的指導，謹此致謝。

本文爲中國歷史博物館古代冶鑄小組報告之一。

1) 章鴻釗：石雅，1927。
2) 山東師範學院考古報告(未發表)。
3) 北齊書卷49綦毋懷文傳。
4) 楊　寬：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的發明和發展，第99頁。

#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СПЛАВА АЛЮМИНИЯ С МЕДЬЮ ДИНАСТИИ ЦЗИНЬ И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ТЕХНИКИ ЕЁ СПЛАВКИ

Ян Гань

В 1956 г. при раскопке цзиньского кургана в уезде Исин пров. Цзянсу, произведенной Нанкинским музеем, были найдены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е поясные бляхи[1]. Их поверхность серо-бурого цвета, внутренний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й слой имеет толщину только 1—2 мм. Хим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произведенный химическом факультетом Нанки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 спектра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произведенныи заместителем директора Института прикладной физики АНК Лу Сюе-шанем,) образцов блях установили, что основным составом их является алюминий. 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тов. Шэнь Ши-ин из кафедры по плавке лёгких металлов при Дунбайском политехническом институте попросил образца блях на анализ и определил, что они содержает в составе не алюминий, а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серебра.

Различ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анализов привлекли наше большое внимание. Мы также достали одну бляхи и исследовали разными способами. Результат наш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одтверждает, что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состава этих блях алюминий. Однако чем же об'ясняются различ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анализов? Тов. Ся Най считает, что причина такого явления состоит в различии состава этих метеллических поясных блях, одна часть которых содержит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алюминий, а другая——серебро. Этот взгляд разделяется тов. Шань Ши-ином и автором этой статы.

Держа осторож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этому вопросу, мы лично побывали в Нанкинском музее с тем, чтобы проследить детальность об этих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х поясных блях. Весной текущего года Нанкинский музей прислал нам обрзцы блях на анализ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нашей работы говарят, что в химическом составе одной из пряжек содержится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алюминий, а других двух——серебро.

В такое отдалённое время как династия Цзинь,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ей больше тысячи лет тому назад, были получены первые в мире листы сплава, в составе которых содержится большое комлество алюминия, э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большое событие в истории химики и металлургии всего мира. Поскольку алюминиевый сплав из цзиньского кургана является только маленькими кусками, причем они были смешены с предметами из серебряного сплава, то мы можем говорить, что появление блях из алюминиевого сплава было случайным и несознательным.

---

1) Ло Цзун-чжэнь: Раскопки цзиньского кургана в уезде Исин пров. Цзянсу, «КАОГУ СЮБАО», № 4, 1957 г.

Как же народ династии Цзинь несознательно освоил трудные техинческие условия и сплавил алюминий с медью? Проследим этот вопросв связи с техническими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и условиями этого времен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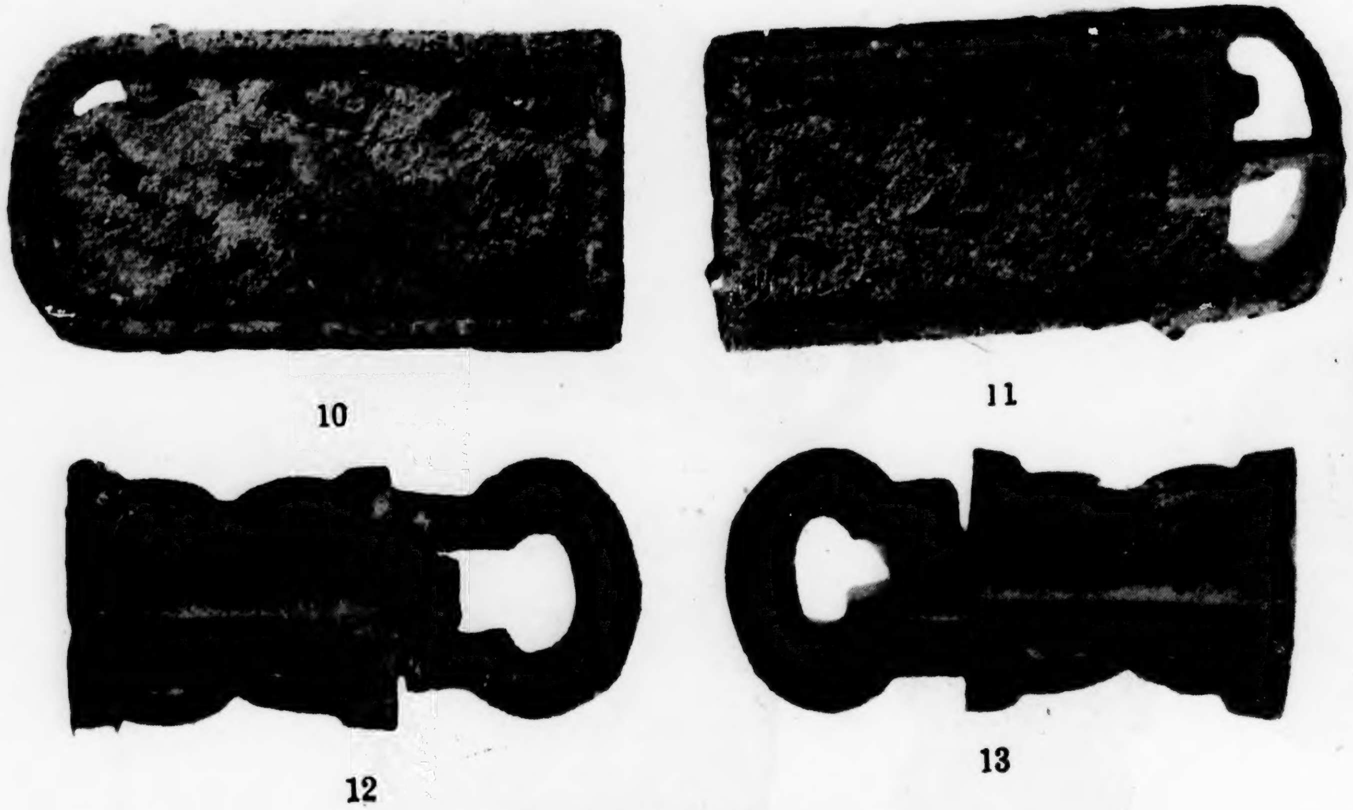
I.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в отношении техники. Поскольку алюминиевый пар дает огромное давление, то окись алюминия трудно восстанавливать хотя бы при высокой температуре. При восотановлении окисы алюминия его пар легко соединять с углеродом и получается углеродистый алюминий, а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й алюминий почти невозможно получать. Однако если при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и наличествует в достаточном количестве металл, точка кипения которого выше алюминиевого (напр. медь), то алюминий после свое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тотчас расплавляется в этом металле и обращается с ним в сплав. При этом случае давление алюминиевого пара непременно понижается, а температура реакции также понижается. Это благоприятно для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алюминия. При эксперименте мы вместе вложили окиси алюминия (75%) меди (25%) (оба в порошке), буры (в качестве флюса) и порошка углерода (в качестве восстановителя), подогрели их выше 1600°C. Мы получили в небольшом количестве медноалюминиевый сплав, содержащий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30% алюминия. Помимо того,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й натрий, полученный при реакции угля и щелочи с помощью высокой температуры, способен замещать алюминий в алюминиевой руде.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если наличествует медь или медная руда, то алюминий сразу же соединится с медью.

II.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в отношен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условий. Три тысячелетия тому назад наша страна уже вступила в бронзовый век. В эпохи Воюющих царств (403—221 г. до н. э.) наш народ уже начал применять железо, в начале династии Хань уголь начал применямься в качестве топлива, техника по плавке железа также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повышалась, в конце Восточного Хань появилось гидровлаческое приспособление для дутья. Отсюда ясно, что народ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давно освоил технику, дающую высокую температуру. С вэйской и цзиньской династий оживлялся даосизм 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лась алхимия 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драгоценного клинков. Тогда люди часто плавили в печах различные металлы или руды. Это дало широкую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открыть новые вещества и освоить новые техники. Во время Цзинь—Южной и Соверной династий наша страна достигла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х успехов в области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 Все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тогда уже существовал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условия дл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плава алюниния с медью.

Вопрос о том, нарочно ли цзиньские люди изготовили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е поясные блях из различных сплавов, пока еще неизвестен. Необходимо изучать его и вопрос о технике п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сплавов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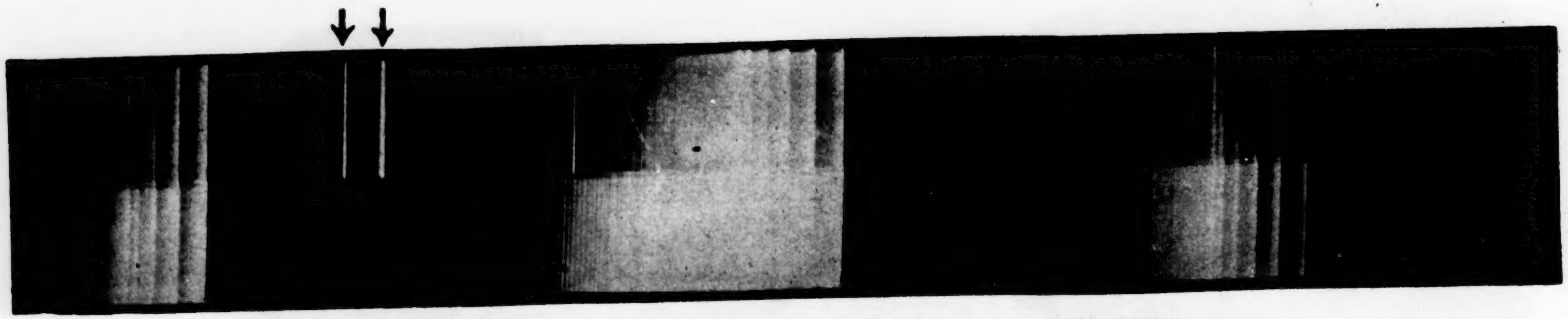
江蘇宜興第一號晉墓出土金屬帶飾 (約 1/1)

圖版貳 (II)




1. 宜興第一號晉墓出土金屬帶飾(約 1/1)

2. 金屬帶飾的金相照片（這是一種多相的比較均勻的組織，表明是多相合金。腐蝕劑，32% $FeCl_3$ + 10% HCl + 58% 水。放大 250 倍）



3. 金屬帶飾的光譜照片(上面一條是帶飾的光譜，下面一條是純鐵光譜，有↓↓處是鋁的譜綫)

# 考古學報目錄索引

## 一九五九年一至四期（總第二十三至二十六册）

### 一、考古調查發掘


| 篇名 | 作者 | 期 | 頁 |
|---|---|---|---|
| 甘肅山丹四壩灘新石器時代遺址 | 安志敏 | 3 | 7—16 |
| 廣東南海西樵山出土的石器 | 廣東博物館 | 4 | 1—15 |
| 昭烏達盟巴林左旗細石器文化遺址 | 內蒙文物工作組 | 2 | 1—14 |
| 河南信陽三里店遺址發掘報告 | 河南文物工作隊 | 1 | 1—12 |
| 河北唐山市大城山遺址發掘報告 | 河北文管會 | 3 | 17—35 |
| 山東安邱景芝鎮新石器時代墓葬發掘 | 王思禮 | 4 | 17—29 |
| 寧鎮山脈及秦淮河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普查報告 | 尹煥章　張正祥 | 1 | 13—40 |
| 安徽屯溪西周墓葬發掘報告 | 安徽文物工作隊 | 4 | 59—90 |
| 洛陽澗濱東周城址發掘報告 | 考古所洛陽隊 | 2 | 15—36 |
| 附：永樂大典卷9561引元河南志古代洛陽圖十四幅 | | | 37—43 |
| 長沙楚墓 | 湖南博物館 | 1 | 41—60 |
| 西安西郊漢代建築遺址發掘報告 | 唐金裕 | 2 | 45—55 |
| 河南新安鐵門鎮西漢墓葬發掘報告 | 河南文物工作隊 | 2 | 57—73 |
| 一九五五年洛陽澗西區小型漢墓發掘報告 | 同上 | 2 | 75—94 |
| 河南禹縣白沙漢墓發掘報告 | 同上 | 1 | 61—84 |
| 貴州清鎮平壩漢墓發掘報告 | 貴州博物館 | 1 | 85—103 |
| 長沙兩晉南朝隋墓發掘報告 | 湖南博物館 | 3 | 75—105 |
| 一九五五年洛陽澗西區北朝及隋唐墓葬發掘報告 | 河南文物工作隊 | 2 | 95—107 |
| 四川昭化寶輪院南北朝時期的崖墓 | 沈仲常 | 2 | 109—126 |
| 浙江餘姚青瓷窯址調查報告 | 金祖明 | 3 | 107—120 |


### 二、論　　文


| 篇名 | 作者 | 期 | 頁 |
|---|---|---|---|
| 關於中國猿人的骨器問題 | 賈蘭坡 | 3 | 1—5 |
| 江漢平原新石器時代紅燒土中的稻穀殼考查 | 丁穎 | 4 | 31—34 |
| 清江遺址的文化分析 | 饒惠元 | 3 | 37—51 |
| 關於江蘇的原始文化遺址 | 蔣讚初 | 4 | 35—45 |
| 試論湖熟文化 | 曾昭燏　尹煥章 | 4 | 47—58 |
| 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 | 徐中舒 | 3 | 53—66 |
| 咸陽底張灣隋墓出土的東羅馬金幣 | 夏鼐 | 3 | 67—74 |
| 晉代鋁銅合金的鑑定及其冶煉技術的初步探測 | 楊根 | 4 | 91—97 |

## 更　　正

本刊1959年第3期,71頁末,注2),考古9期475、478、486、487頁,改爲472、475、482、483頁。

又第3期,100頁,表7行,55長絲營下5,改爲F5;8行57長二三廠40,改二〇三廠40。105頁後面:圖版陸(Ⅵ),1,(21:?)改(22:14)。5.坐俑,改女立俑。圖版捌,1,(21:?)改(23:?),5.(21:?)改(22:14)。圖版拾,3,(22:7)改(21:7)。

# УКАЗАТЕЛЬ СТАТЕЙ, НАПЕЧАТАННЫХ В ЖУРНАЛЕ «КАОГУ СЮБАО» № 1—4 за 1952 г.

(23—26-й выпуск общей серии)

## 1. *Доклады и полев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 | |
|---|---|---|
| Ань Чжи-мин: Неолитические стоянки в Шибатань района Шаньдань пров. Ганьсу | 3 | 7— 16 |
| Гуандунский провинциальный музей: Каменные орудия, найденные в горах Сицяошань уезда Нанхай пров. Гуандун | 4 | 1— 15 |
|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 Делам Культуры Внутренней Монголии: Стоянки микролита в аймаке Балинзо сейма Чжаоуда | 2 | 1— 14 |
|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тряд Бюро Культуры пров. Хэнань: Раскопка стоянки Саньлидянь, Синъян, пров. Хэнань | 1 | 1— 12 |
| Комиссия по охране культурны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пров. Хэбэй: Доклад о раскопках стоянки Дачэньшань г. Таншань | 3 | 17— 35 |
| Ван Сы-ли: Раскопки неолитических могил в поселке Цзинчжи уезда Аньцю пров. Шаньдун | 4 | 17— 29 |
| Инь Хуань-чжан и Чжан Чжэн-сян: Обширное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стоянки неолита на холмах Нинчжэн и берегу реки Циньхуай | 1 | 13— 40 |
|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тряд Бюро по делам культурны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пров. Аньхуй: Раскопки погребений Западного Чжоу в уезде Туньци пров. Аньхуй | 4 | 59—90 |
|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тряд Лояна Ин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АНК: Отчет о раскопках города периода Чжоу на берегу р. Цзяньхэ, Лоян (приложение: 14 карта древнего Лояна из «Юаньхэнаньсяньша» при «Юнлотадянь») | 2 | 15— 43 |
| Музей пров. Хунань: Могилы Чу (название древнего княжества Китая), Чанша | 1 | 41— 60 |
| Тан Цзинь-юй: Отчет о раскопках стоянки сооружений периода Хан в западных окрестностях города Сиана | 2 | 45— 55 |
|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тряд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 Делам Культуры пров. Хэнань: Отчет о раскопках захоронений периода Зап. Хан близ села Теныньчжэнь, Синьань. пров. Хэнань | 2 | 57— 73 |
|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тряд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 Делам Культуры пров. Хэнань: Отчет о раскопках Маленьких захоронений хан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в р-не западной р. Цзяньхэ, Лоян, в 1955 г. | 2 | 75— 94 |
|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тряд Бюро Культуры пров. Хэнань: Раскопка ханских Могил Бэйша уезда Юйсян пров. Хэнань | 1 | 61— 84 |
| Музей пров. Гуйчжоу: Раскопка ханских могил в окрестностях уездов Циньчжэнь и Пинба пров. Гуичжоу | 1 | 85—103 |
| Хунаньский провинциальный Музей: Доклад о раскопках могил цзиньских, Южных и Шуйских Династий в г. Чанша | 3 | 75—105 |
|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тряд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 Далам Культуры пров. Хэнань: Отчет о раскопках захоронений периода от Северных Династий до Суи-тан на западном берегу р. Цзяньхэ в г. Лояне в 1955 г. | 2 | 95—107 |
| Шэнь Чжун-чан: Скальные склепа периода Юж. и Сев. Династий близ села Баолунь, уезд Чжаохуа, пров. Сычуань | 2 | 109—126 |
| Цзинь Цу-мин: Доклаб об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печи для селадонных фарфоров в уезде Юйяой пров. Чжэцзянь | 3 | 107—120 |


## 2. *Статьи*


| | | |
|---|---|---|
| Цзя Лань-по: К вопросу о костяных орудиях синантропа | 3 | 1— 5 |
| Дин Ин: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исовой шелухи в обожженной земле не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в равнине района между реками Яньцзы и Ханьшуй | 4 | 31— 34 |
| Жао Хуй-юань: Анализ культуры стоянки Цзиньцзянь | 3 | 37— 51 |
| Цзян Изань-чу: Остоянках первобыт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пров. Цзянсу | 4 | 35— 45 |
| Цзэн Чжао-юе и Инь Хуань-чжан: К вопросу о Хушу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 4 | 47— 58 |
| Сюй Чжун-шу: Датировка «Юй-тина» и другие касающиеся вопросы | 3 | 53— 66 |
| Ся Най: Золотые монеты Восточной Рим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найденные в Дичжавуань г. Сяньянь | 3 | 67— 74 |
| Ян Гэнь: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сплава алюминия с медью династии Цзинь и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ехники её сплавки | 4 | 91— 97 |

# INDEX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KAOGU XUEBAO

## Nos. 1—4, 1959

### I. *Archaeological Surveys and Excavations*


| | Issues | Pages |
|---|---|---|
| An Chih-min: The Neolithic Site at Ssŭ Pa T'an, Shan Tan County, Kansu | 3 | 7— 16 |
| The Kwangtung Provincial Museum: The Stone Implements Unearthed at Hsi Ch'iao Shan, Nan Hai Country, Kwangtung | 4 | 1— 15 |
|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Bureau of Culture, Inner Mongolian Autonomous Region: Microlithic Sites in the Left Banner of Barlin, Chao Uda League | 2 | 1— 14 |
|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Bureau of Culture, Honan Province: The Excavations of the Neolithic Sites at San Li Tien, Hsin Yang, Honan Province | 1 | 1— 12 |
| CPAM, Hopei Province: The Neolithic Sites at Ta Ch'êng Shan, T'ang Shan, Hopei Province | 3 | 17— 35 |
| Wang Ssŭ Li: Excavations of Neolithic Tombs at Ching Chih Chên, An Ch'iu County, Shantung | 4 | 17— 29 |
| Yin Huan-chang and Chang Chêng-hsiang: Reconnaissance of the Neolithic Sites in the Ning Chên Range Region and the Ch'in Huai Valley Near Nanking | 1 | 13— 40 |
|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Bureau of Culture, Anhui Province: Excavations of Two Western Chou Tombs at T'un Ch'i, Southern Anhui | 4 | 59— 90 |
| The Loyang Archaeological Team,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Remains of the Walls of An Eastern Chou City at Chien Ping, Loyang | 2 | 15— 43 |
| The Provincial Museum of Hunan: The Ch'u Tombs of Changsha | 1 | 41— 60 |
| T'ang Chin-yü: Excavations of An Architectural Site of the Han Dynasty Near Sian | 2 | 45— 55 |
|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Bureau of Culture, Honan Province: Excavations of Western Han Tombs at T'ieh-Mên Chên, Hsin An County, Honan Province | 2 | 57— 73 |
|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Bureau of Culture, Honan Province: Excavations of Small Han Tombs in Chien Hsi District, Loyang, 1955 | 2 | 75— 94 |
|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Bureau of Culture, Honan Province: The Excavations of the Han Tombs at Pai Sha, Yü Hsien, Honan Province | 1 | 61— 84 |
| The Provincial Museum of Kueichou: The Excavations of the Han Tombs at P'ing Pa, Ch'ing Chên County, Kueichou Province | 1 | 85—103 |
| The Hunan Provincial Museum: The Chin Dynasty, Southern Dynasties and Sui Dynasty Tombs at Changsha | 3 | 75—105 |
|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Bureau of Culture, Honan Province: Excavation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Sui and T'ang Tombs in Chien Hsi District, Loyang 1955 | 2 | 95—107 |
| Shen Chung-ch'ang: The Rock Tombs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n Chao Hua County, Ssŭ Ch'uan Province | 2 | 109—126 |
| Chin Tsu-ming: The Celadon Porcelain Kilin Sites of Yüeh Yao, Chekiang | 3 | 107—120 |


### II. *Others*


| | Issues | Pages |
|---|---|---|
| Chia Lan-po: Notes on the Bone Implements of Sinanthropus | 3 | 1— 5 |
| Ting Ying: Notes on the Neolithic Rice Husks Unearthed in Hupei | 4 | 31— 34 |
| Yao Hui-yuan: Notes on the Neolithic Cultures of Ch'ing Kiang, Kiangsi | 3 | 37— 51 |
| Chiang Tsan-ch'u: Notes on the Remains of Primitive Cultures in Kiangsu | 4 | 35— 45 |
| Tsêng Chao-yu and Yin Huang-chang: On the "Hu Shu Culture" | 4 | 47— 58 |
| Hsü Chung-su: Notes on the Yu *ting* | 3 | 53— 66 |
| Hsia Nai: A Byzantine Gold Goin Discovered from a Sui Dynasty Tomb Near Sian | 3 | 67— 74 |
| Yang Kên: Scientific Analysis of the Chin Dynasty Alloy of Aluminun and Copper and Its Metallurgy | 4 | 91— 97 |

## 考古學報編輯委員會

尹　達　王振鐸　安志敏　范文瀾
夏　鼐　徐炳昶　郭寶鈞　黃文弼
張政烺　裴文中　翦伯贊　蘇秉琦

## 考古學報徵稿簡約

1. 本學報刊載下列各種論著:
   (1) 田野考古學的發掘及調查報告;
   (2) 有創造性的考古學研究論著;
   (3) 有關考古學與古代歷史問題的研究論著;
   (4) 蘇聯考古學先進經驗的介紹;
   (5) 重要考古學論著的評論。
2. 本學報以中文(語體)爲主,自左至右用稿紙橫寫。行文要簡潔,謄寫要清晰,並必須附標點符號。
3. 除特約稿外,每篇以不超過二萬五千字爲原則。
4. 若附圖版和插圖,要標明比例。插圖須用白紙黑墨精繪,並須在正文內注明位置。
5. 稿件由本學報編輯委員會送請專家審査,並有修改刪節權。
6. 投稿人請注明姓名、服務機關及職務、通訊地址。凡不刊載之稿,概於審查後寄還。
7. 投稿人請於接到校樣後,三日內校正寄還。如因作者地址關係,恐郵寄耽擱,編委會得請人代校。
8. 來稿請附外文提要(以俄、英文爲主,法、德文亦可)。否則請附約數百字的中文提要,由編委會請人代爲譯成外文。
9. 來稿中的度量衡,應採用下列的名稱,以求統一:
   mμ 毫微米,μ 微米,mm 毫米,cm 厘米,m 米,km 千米或公里;
   ml 毫升,dl 厘升,cl 公升,l 升,kl 千升;
   mg 毫克,cg 厘克,dg 分克,g 克,kg 千克或公斤。
10. 稿件刊載後,致送稿費,版權卽屬科學出版社與著作人所共有。作者如欲另行發表,不論任何形式,必須徵得科學出版社同意。
11. 投稿人需要抽印本,必須在投稿時說明所需本數,以便於刊出時與出版社聯系。
12. 來稿請掛號郵寄北京王府大街九號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室收。

本刊爲了便利國際學者瞭解文章內容，已於每一篇報告或論文的篇末，均附外文提要（以俄、英文爲主，法、德文亦可）。今後作者投寄稿件時，請擬好附來。否則請附約數百字的中文提要，由我室請人代爲譯成外文。

考古研究所編輯室


# 考古學報

（季刊）

一九五九年　第四期

（總第二十六册）

| | |
|---|---|
| 編輯者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
| 出版者 | 科學出版社 |
| 印刷者 | 中國科學院印刷廠 |
| 總發行處 | 北京市郵局 |
| 訂購處 | 全國各地郵電局 |
| 代訂零售處 |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br>科學出版社各地門市部 |

（京）道：1—1,380　報：1—1,300　　1959年12月出版

定價：道林紙本 2.20 元　白報紙本 1.80 元

本刊代號：道 2—　報 2—